

· 社会文化史译丛 ·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书籍的社会史

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

〔美〕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著 何朝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一部综合性研究18世纪前中国书籍史的无与伦比的精彩之作，读来真是一种享受。

——卜正民 (Timothy Brook)，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作者、抄书匠、刻工、刷印匠、装订工、出版者、发行者、书商、文人、学者、司书者、藏书家、贪婪的读者——中国一千多年书文化的全景式扫描——在《书籍的社会史》里被周绍明以雄辩的文笔和深邃的洞察力加以考察，他生动的叙述将使各种类型的书籍爱好者为之沉迷。

——尼古拉斯·A.巴斯贝斯 (Nicolas Basbanes)，著有 *A Gentle Madness*, *Patience and Fortitude*, *A Splendor of Letters*, and *Every Book Its Reader*



本书以广阔的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中国书籍的生产、发行、阅读、流传，而重在探究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书籍史和书文化的一部力作。书中对印本与手抄本的兴替、中国古代藏书文化与“知识共同体”，以及中西书史比较的论述，尤为精彩。本书反映了近年来西方中国史学界兴起的书籍史研究热的最新成果，是读者了解西方学者以社会史、文化史方法研治中国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动态的一个极佳窗口。本书是一部体例严谨、取材广泛、创见迭出的学术著作，同时笔触生动、细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ISBN 978-7-301-16163-0



9 787301 161630 >

定价：35.00元

· 社会文化史译丛 ·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书籍的社会史

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

〔美〕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著 何朝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449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美)周绍明(McDermott, J. P.)著;何朝晖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

(社会文化史译丛)

ISBN 978-7-301-16163-0

I. 书… II. ①周…②何… III. 图书史-中国-古代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4607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y Joseph P. McDermott,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文版由香港大学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球范围内出版发行。

书 名: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

著作责任者:[美]周绍明(Joseph P. McDermott) 著 何朝晖 译

责任编辑:张 晗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6163-0/K·065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9.25印张 240千字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献给

H. T. M, *s. q. n.*



中文版代序

书史与士人书籍的非士人背景

几千年来,人们在各式各样的书籍面前,迫切地想要了解其中的内容。摊开一堆简牍,打开一个卷轴,翻开一部印本,都会激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那急切的眼神仿佛恨不得用眼睛代替手指直接翻动书页。有的时候,读者会得到愉悦或激励,被带入另一个世界;有的时候,他们所读到的东西会震撼他们的心灵,改变他们的想法,甚至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而作为文盲的大多数看到这种种变化,会怀着嫉妒之心注视那些受过教育的上等人绽开灿烂的笑容,紧锁思考的眉头。他们很清楚这些幸运的读书人遇到了最慷慨的朋友——书籍,自然也会要求分得一杯羹。所以这些人会加入进来,高声朗读书籍,分享书中的故事、讯息、观念、快乐和好处,所有这些只有在书中才能得到。这样,通过他们的眼睛或耳朵,几千年来不论男女都从书中得到益处,而这些书通常都是由他们不认识的人所写的。

除了少数那些爱书成癖的人,这些人的愿望并不是不合情理的。长久以来书籍以识字者和文盲都便于理解的方式,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包含、甚至构成了世界最流行宗教的典籍基础,包含了今天多数政府所声称的权威合法性的文本基础。作为一种受人青睐的书写载体,它们被用来传递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为大多数文化和社会所珍视。更具体地说,它们使人们能够讨论生与死,公开自己的观点,建立知识体系,创立公共机构(最显著的是图书馆和学校,此外还有许多民间组织),这样

就为一个自觉的文化传统的信息及其传播奠定了基础。正如书写有助于固化一个社会的信仰和习俗,书籍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传播这些发现(真实与不真实的)也是不可或缺的。并不奇怪,亿万读书和不读书的人会把一些书作为真理的圣堂而加以顶礼膜拜。的确,对于一些读者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无论是他们自身的经验,父亲或老师的教诲,还是配偶的规劝——能够与这些书籍相比,这些书籍随时随地提醒他们如何过一种好的、有意义的生活。

然而,除了其中传达的观念和信息之外,书籍本身难道不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吗?思想史家倾向于关注书籍的内容,急于解释“一个思想者”如何、为什么形成对一组事件的看法。但是,难道这些书籍,不是像陶瓷、建筑,甚至土地本身那样,有着它们自身的历史吗?这个历史揭示了这些书中所述历史之外的大量史实。难道这门尚待开垦的“书籍考古学”,不是以与传统书目文献学迥然不同的方式,揭示了这些被称之为书籍的对象是如何、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获得了如此的重要性,又导致了怎样的后果的吗?这样,书史学者在吸收目录文献学家们的精细研究成果的同时,致力于探讨关于我们人类共同经验的独特的核心问题,诸如这些书中所包含的人类知识是如何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书籍如何催生了塑造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机构,书籍如何塑造和反映了思想的方式(相对于思想本身)。

在进行这项研究时,书史学家继承了前辈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从总体来看是在用一种单线的方式来叙述信息传播方式演进的各个基本阶段。按照这种理解,口头交流得到了书面交流的补充,而印刷的发明最终将书面交流的形式从手写本转变为印刷的书籍。但是,在今天的书史学家所成长的世界中,书籍仅仅被视为主要的信息交流媒介之一。他会很自然地发现,明智的做法是将历史的关注点从确定和分析手写本与印本之间的差异,或印本与图像之间的差异中跳出来,把详细考察这些技术和交流方式的交叠

变化对文化、社会和思想的影响包括进来。那么书籍作为一个对象就不仅仅被视为一种商品或一种信息载体,它还将被理解为一种组织信息和观点的方式,促进某些机构和社会群体形成的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对某些表达和论证方式的发展更为有利。远在1960年代之前很久,“知识经济”就已经开始了。

从长远来看,如果书史学家致力于探究有关书籍的非目录学、非哲学意义,他同样能够在书史的研究中追求一种远为社会的、以人为基础的研究路径。他很自然地会去探讨这样一些思想方式怎样为各种类型的读者所接纳和利用。在过去,这种接纳很可能被冠以“教化”之名。今天,我们对于社会差别更为警觉,想要知道读者如何借用这个概念框架,并最终改变其预设,导致了各种不同的“教化”。即,读者及其阅读方式是如何不仅创造了读者团体,还创造了各种概念化的群体的。这些群体更多地是通过其所读、所闻的共同关注点和思想方式而联系在一起,而不是通过社会和市场网络联系在一起。这样,那些相隔辽远、无法直接交流的男女,就能够参与到学习、思考、想象,直至构建梦想的共享世界中来,这个世界将会支配他们的行为。

由于使用了如此宽广的笔触来表述,书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问题似乎很适合于用来分析中国书写传统的主要传播者——士——的各种关切。大体来说,这是本书关注的焦点,因为通过中国士人的经验来观照,这代表了中国书籍在公元1000年至1800年间的一部社会史。显然这个方法很容易遭到如下批评:它把传统上中国士人十分淡漠于为了中国社会中其他识字群体的需要而从事大规模出版这一现象永久化了。有见识的专家会把他们的研究指向帝国晚期在一些小市镇和村落(例如福建四堡)中国地区印刷中心出乎意料的——按照西方的标准——形成,以及其更为大众化的出版物目录所揭示的出版活动及其影响,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视角。^[1]当然,中国书史未来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关注这个更为广

阔的非士人读者群。

这样,尽管本书主要关注的是士人撰写和收藏的书,但我想,本书是在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讲述这个传统的故事。从它关注一个18世纪的穷鞋匠,到它承认自13世纪、特别是16世纪以来,“士人”阶层涵容了各种社会类型,它都试图将中国士人以及士人书籍的历史放在某种程度上非士人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在这篇简短的序言中,我想说明是如何用至少三种新的方法来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以便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自始至终在脑海中记住,在这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有着更广大的非士人读者,有时甚至是非士人作者。首先,我们可以考察士人的竞争者们的书籍生产和收藏活动,尤其是佛教组织在宋代以前的鼎盛时期。其次,我们可以通过认清书籍在那些最著名的清代藏书中,经过多长时间变为家庭或宗族财产,来解构士人们对其藏书的私有观念。第三,我们可以分析士人们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是如何得到民间宗教崇拜的强化的,这些崇拜通过科举制度将儒家对读书的倡导与政治权力联结起来。我希望,这种对中国书史更广意涵与问题的强调,会使之处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更为中心的地位,使之成为任何一个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更为关注的一个话题。

在中国,士人并不总是主要的民间书籍收藏者。诚然,正如本书所呈现的,宋代以来士人享有尊崇的地位。但是,我们只需看看江西的民间藏书史,就可以知道他们在此前中华帝国史的头一千年里并不是一直拥有这种地位。文化史学者范凤书认为江西在宋代比其他各省拥有更多重要的私人藏书家。^[2]江西的这种优势显现了一种历史转变,这种转变既是量的,也是质的。在中国宋代以前的两千五百年历史中,据现有材料只有不到五个江西人曾积累或购买了一宗著名的藏书。^[3]然而,在宋代统治的三个世纪中,江西藏书家的数量成倍增长,据我的统计,增长了十四倍,达到七十人。事实上,江西在以后各代都没有达到宋代的这个数字。^[4]

宋代江西藏书家数量的崛起,还预示了中国文化和制度史上一个帝国范围内的重要变化,这种转变易于为中国藏书史所忽视,因为它的重点放在宫廷藏书,尤其是私人藏书家上面。过去学者们重点关注私人藏书家,事实上是把藏书史变成了一系列个人传记,绝大部分是中国士人的传记,他们被认为是整个中国历史上除了朝廷以外中国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者。但是,在公元后第二个五百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就变得非常不同了。在隋代(589—617)和唐代(618—906),南方宫廷藏书迁到长安,使得中国中部和南部的重要藏书既没有落到个人手中,也没有落到那些家族手中。与11世纪以来的情况不同,“在唐代,在印刷术传播之前,佛教寺院的藏书可能构成了都城之外仅有的大型藏书”^[5]。

唐代中国中部和南部最大、最著名的藏书(晚唐时的一宗私人藏书除外),位于江西北部庐山地区的东林寺。其藏书有万余卷,一半是佛教经典,另一半是关于佛教和非佛教的书籍,基本上都对外开放,吸引了无数佛门之外的人到访。^[6]这其中三十多人后来做了高官,包括三个宰相,还有十五个著名诗人,都曾在唐代后半期来这里学习。^[7]的确,这所藏书对其所藏“儒佛之美谈”^[8]的精心管理,使得东林寺成为晚唐华南的文化和思想中心。到了北宋,它成为文人佛学的一个中心。与此同时,其他许多位于江西的寺庙搜集了它们自己的佛教经典藏书。^[9]但是在宋代,从总体来说江西东林寺和其他寺院藏书的重要地位衰落了。佛教禅宗和净土宗的日益流行,降低了文献和学习文献的重要性,私人及其家族在长江流域独立建立了许多规模更大、更全面的藏书,东林寺的藏书遭到一个对佛教进行疯狂迫害的皇帝、战乱兵匪和入侵游牧民族的洗劫。同时,从11世纪开始,江西的儒学者通过利用朝廷藏书和在书籍市场上购买,构建了同等规模,甚至更大的藏书,而且其涵盖的思想范围通常要大得多。其中一些人甚至利用这些藏书开办了私人书院教授生徒。那么总的来看,这些民间学者私人藏书

的兴起,伴随的是东林寺藏书在宋代长江流域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的衰落和丧失。

这样,这种制度变迁就代表了江西和华南(南朝宫廷区域除外^[10])书籍世界的性质和关切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不仅仅是从寥寥几个藏书家和藏书楼到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也是从一种藏书家和藏书楼到另一种藏书家和藏书楼的变化。从一种很大程度上以寺院为基础、主要通过佛教典籍进行学习的状况——这种学习在隋唐时期是以一个主要地点为中心的——演进到远为世俗和分散的儒家学习网络,这个网络在宋代是以民间的私人 and 家族藏书为基础的。最终知识传播和保存的非中心化赋予这些藏书的拥有者,即士大夫,以极大的权力,他们的科举功名和仕宦生涯常常取决于他们所掌握的特定儒家典籍的知识。传统的观点认为,在宋代新儒家时期,新儒家士大夫和私人书院完全取代了佛教思想、机构和僧侣作为思想文化中心的地位。^[11]虽然晚近的研究对此提出了质疑,但宋代江西的藏书圈子里士大夫占据了压倒优势地位,这一显著的变化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儒家学者一直把宋代书文化的成长,视为他们在中华帝国晚期历史上崛起并占据文化与社会优越地位的关键一页。虽然正如本书所认为的那样,宋代可能不再被视为中国文化中印本在总体上取代手写本成为书籍主要形式的一个历史时期,但它当然是江西这个地方(以及中国其他大部分地方)士大夫藏书家在宫廷和都城之外首次成为主要藏书家社会类型的时期。

这样一种将士人的书籍世界纳入其历史背景的方法,也适用于从约760年至1100年这个中国社会著名的唐宋变革期之外的历史时期。它还适用于在帝国历史第二个千年的远端,即1600年至1900年华南藏书活动的研究。本书对这个时期的勾勒较少,这一时期大的重要私人藏书家不再必然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清代的士人藏书家们十分清楚,他们在宋、元、明的前辈难以确保其藏

书在两三代人之后,仍在自己的子孙手中。由于火灾、盗窃、怠慢,以及最常见的由于子孙们对家庭财产、包括藏书的析产继承,导致这些藏书很快崩解散佚,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子嗣们为接连不断的各种费用和需求所困,发现对待这些藏书有比收藏或阅读更好的解决办法;你只需看看这些藏书的首页上密密麻麻地布满各家收藏者的印记(主要是清代的),就会知道一代代藏书家的传家宝是如何落到他人手中的。既然17和18世纪的私人藏书通常规模很大(至少20000卷,著名一些的达到80000卷以上),既然重要的私人藏书加起来超过了任何皇家或政府藏书的数量(例如《四库全书》仅包括所有私人藏书家最初进献给朝廷书籍的三分之一),既然尽管受到皇室机构的查抄和需索,直到20世纪早期,重要的私人藏书家还继续保有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宋、元、明珍善本的印本和手写本,那么谁拥有和看管这些藏书的问题,显然对于我们理解帝国晚期精英书文化的传播和再生产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问题,实际上对那些在创建者或主人死后逃过肢解命运的私人藏书更为切合。与通常土崩瓦解的大多数藏书不同,这些私人藏书最后倾向于不是被个人,而是被家庭、支系,甚至宗族所拥有。这种现象发端于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兴盛于18和19世纪,大的藏书之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够维持其藏书长达几代,有时可以长达八代甚至十代。在清代,这样的家族仅在江南就达到至少七十四家,范凤书恰当地称之为“藏书世家”。^[12]既然此类私人藏书家数量的增长,与商业活动更深地渗透到江南一度极度热衷收藏珍善本的藏书活动中相一致,这类藏书家的出现和占据优势就值得引起注意,并需要对其“怎样”和“为什么”作出解释。

对“怎样”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存在于这些家族将他们世代以来专门用来处置土地遗产的做法应用于所继承的藏书。这样,可以看到藏书家们模仿宗族建立共有的义庄的做法,让

他们的藏书由男性继承人集体继承,这些继承人被告知要把这些藏书视作支系或宗族财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在宗族的支系首领、所有成员,有时甚至是地方官的同意之下,这些藏书才能分割,使之免于被轻率地肢解。规则规定,像天一阁这样的藏书楼,即使是把藏书向非宗族成员开放这样的事情,也需要取得所有宗族成员的同意。这实际上是更基本的规则的一种延伸,这种规则可以保护宗族集体财产中的任何一部分:只有在所有成员同意,有时还要在官方许可之下,才能将财产转让出去。

还有的家族找到了不那么完备的办法,来保障他们的亲族对藏书的保有。有时,藏书的主人吁请和接受来自其宗族组织的资金支持,可能是用来买书。有时他会以一定价格把藏书的所有权让度给其宗族支系中的其他男性甚至女性成员。有时,尤其是在清末的乱世中,藏书的主人会接受特别慷慨的朋友的帮助,这些朋友有的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们保护中国的珍善本免于遭受火灾、盗贼和掠夺的侵害。这些朋友或与藏书家有着姻亲关系,或同在一个藏书社团,或都与当时的大书商有联系,事实证明在19世纪的多事之秋,他们对于保护和保存许多江南家族藏书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为什么”这些家族如此执著于用他们的有限资源来如此长久地保有他们对书籍的所有权呢?现代的中国读者可能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解释:哪个有自尊的家族会愿意失掉这样一份藏书?正如第六章所要讲到的,这种态度确实在清代得到广为传播和强化,部分是由于珍善本书的收藏者们那些在举业上不怎么成功的后代,把所继承的藏书,作为了科举功名的可以接受的社会替代品。这样,我们就可以设想,这些藏书普遍对非儒家的宗教和哲学典籍,以及实用指南和娱乐之书不感兴趣。

然而,若要解释这样一种尊崇正统儒学的基础的社会和历史背景,需要把藏书家之外更广阔的背景包括进来。在清代,对书籍

以及对印刷和书写的字纸的更广泛尊崇,从两种民间宗教崇拜中找到了巨大的支持力量,而在以前各代清高的藏书家是不会参与这种崇拜的。正如第六章所略微详细讲述的那样,一个叫惜字会的迷信崇拜在整个帝国的城镇中发展起来。这些组织吸收了对书写字纸的传统尊崇,它们事实上从所有社会阶层中吸纳成员,这些人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印过或写过字的废纸的收集和焚烧。据19世纪中叶宁波一个英国传教士的说法,士人们常常在这类组织中担任监督者和出钱者的角色。

每个文人的书房里都有一只废纸篓……用的时候,就把它挂在墙上,不时承接被写过的碎纸片,哪怕只是一片最小的带有只言片语的废纸。当听到挑着筐子的人“敬惜字纸”的叫声时,他就会亲自或遣仆人到门口,把纸篓里的东西倒入收集字纸的人那轻便但容量很大的筐子。收集字纸的人通常是由一帮文人雇佣的,在这个例子中他小旗上的字告诉我们他属于“广文会”。这样收集来的纸在一个单独的焚化场所焚烧,通常是在一个寺庙的别院(厨房火灶太褻渎神灵)。一些更严格的士人甚至不能允许纸灰随风飘散,而是要带到海边或河边让水流冲走。^[13]

有时地方政府也会提供帮助,宣布该团体成立,设立注册登记簿,让当地组织确保规条得到切实执行,这样就要求字纸收集者不仅从当地书店,还要从街上和其他垃圾堆收集废纸。^[14]但是,正如科波尔德(Cobbold)在所指出的,这些组织的管理仍然掌握在当地士人手中,即便他们只是县学生员。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些义务,以至于会做噩梦,害怕他们在焚烧字纸及把纸灰与其他灰渣混在一起前,没有对字纸进行清洗、焚香和晾干。^[15]

必须指出的是,儒家学者对此类组织的掌控,是在这些组织出现一段时期之后。最初两个著名的此类组织,在清初建立于道教神

祠和佛教修行处^[16]，而正如我们已经在宋代大型民间藏书的形式中所看到的，清代中期儒家学者毫不犹豫地取代了佛教僧侣，成为这些民间崇拜的管理者。而且有时他们接管这类组织时，还让僧侣为他们服务。当掌管一个早期团体的和尚（他亲自收集和焚烧字纸）于1733年去世时，继任的儒家学者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惜字社，又雇了一个和尚来开展日常事务，替他们干体力活。他们甚至从儒家经典《礼记》中找了一个四字词组，来证明这种劳动分工的合理性，这种分工使他们免于体力劳动，支持了他们傲慢的社会优越感：

第儒者“藏修息游”，势不能奔走道路，历街衢巷陌，以收而惜之。佛者舍身利济，可以儒之所不能为。于是藉佛之人，崇儒之教，用其余间收惜遗弃，而六书遂无狼藉垢污之患，此其有功于儒也，亦不小矣。^[17]

简言之，这些士人已经把游方和尚变成了他们的拾荒者。

这些士人对印刷和书写字纸的神圣化，正如本书后面所要提到的，导致了俗众而不是僧侣的皈依。尤其是工匠，在士人对他们回收字纸的严厉批评下屈服了。在这些团体及其士绅成员的鼓动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颁布禁令，禁止回收废纸用于制作灯芯、雨伞、扇子和陶器，不得用来包裹糖腌肉（meat treacle）等易腐败之物，禁止漆匠用废旧字纸做扇子、盒子和其他物品（苏州），禁止用来糊墙纸和卷烟（广州），禁止以废旧字纸为原料制造机制纸（广州和北京），甚至禁止用写过字的纸做鞋底。^[18]有一个官员禁止景德镇的陶瓷工匠在碗底上写字，一些士人要求手工业作坊不要把它们的品牌写在产品上（比如织物上的纺织作坊名，包装纸上的纸铺印记），而用花样来代替。在一份1855年的呼吁书中，列举了多达48个这样的花样，并声称熏香店和烟草店已经作出了改变。^[19]文字和书被从体力劳动中纯化出来，成为一种拜物教，与书写和阅读关系最密切的社会群体成为值得尊敬的精

英而受到礼遇。

那么,如果这些团体中的士绅向普通民众施加如此有害的限制,这些团体又是如何变得这样流行,它们的领袖又如何这样受尊重呢?答案在于他们参与了普通的、通常是非制度性的宗教活动(佛教和道教除外)。有时这种参与涉及出版活动,能为参与者赢得“积分”。例如在一部晚清的善书中,印刷一部儒家典籍可记100分,销毁一部道德败坏的书版可得300分,污损一张书页扣5分,处置字纸不当扣50分,印一部淫书所扣之分“无法计数”。^[20]有时它与科举制度发生联系,比如一种神秘力量通过一个识字者手中的笔为其信奉者占卜科举考试中的运气(指扶乩——译注)。^[21]一种与科举制度更为有效和广泛的联系,涉及一种民间崇拜,该神祇自宋代以来就为科举士子和士人所崇拜,1801年被纳入帝国的正统神祇系统中。这就是文昌崇拜,数个世纪以来它赢得了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信徒,信徒们得到承诺,对字纸的尊重会为他们赢得积分,这些积分累积起来可以转化为科举考试中的成功。

直到最近,经许多当代的历史研究揭示,中国的士人才从以前形成的单维度形象,变成了一种远为复杂的社会角色,不再必然是主要的民间藏书家类型,不再必然是“他的”藏书的唯一拥有者,不再是完全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高洁世界中的居者。他与其藏书和藏书家朋友之间的关系随之有了微妙的变化,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士人”的社会阶层包括了多种社会类型,他们对书籍的消费也因而产生差别的话。虽然中国的士人常常对帝国的政治统一表示担心,而正是他们自身身份和文化的社会一体化,成为帝国晚期的一个关键问题。没有什么比一个叫钱近仁的人,更能尖锐地强调这个问题的社会维度了。

除了这篇专门为中国读者撰写的序言外,本书中文版的内容基本上与其英文版一致,但我在某些地方作了少量增补和修正。

我要特别感谢译者何朝晖博士所提出的改动建议,这些建议无疑使本书更为完善。

注 释

- [1] Cynthia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Trade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
- [2]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第82页。
- [3] 同上,第40—45,53—57页。
- [4] 同上,第62—82,138—45,168—86,和271—320页。
- [5] Erich Zürcher, "Buddhism and Education in T'ang Times," p. 28, in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eds.,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6] 傅璇琮、谢灼华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第1册,第264页;任继愈编,《中国藏书楼》(沈阳:辽宁人民,2000),第1册,第675页;白居易,《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43,第940页。
- [7] 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见氏著《唐史研究从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71),第367—424页,尤其是第387—395页。
- [8] 周绍良编,《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卷721,第8268页。
- [9] Mark Halperin, *Out of the Clois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7-89.
- [10] Xiaofei Tan,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77-95, 显示出梁代皇室和朝廷藏书的巨大规模。
- [11] T. Griffith Foulk, "Myth, Ritual, and Monastic Practice in Sung Ch' an Buddhism," pp. 147-208, in Patricia B. Ebrey and Peter N. Gregory, eds.,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 Hawai'i Press, 1993); and, Halperin.
- [12] 范凤书,第321—420页。
- [13] R. H. Cobbold, *Pictures of the Chinese; drawn by themselves* (London: J. Murray, 1860), pp. 51-52.

- [14] 余治,《得一录》(台北:华文书局,1969),卷12,页2a。
- [15] 同上,卷12,页6b。
- [16] 《苏州府志》(1883),卷24,页14b;卷41,页25a。
- [17] 《周庄镇志》(1882),卷2,页17b-18a。
- [18] 王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第558页;E. H. Parker, *Chinese Customs* (Shanghai: Kelley and Walsh, Ltd., 1899), p. 35 (其中说到:“在任何一个中国城镇,都可以看到在街上放着这样的容器,上面写着‘敬惜字纸’。在一些地方还用石头和砖块建起了造价不菲的塔。”)。
- [19] 余治,卷12,页1b,页15b—20b。
- [20] Hampden C. De Bose, *The Dragon, Image, and Demon* (London: Partridge, 1886), p. 223.
- [21] David K. Jordan and Daniel L. Overmyer, *The Flying Phoenix: 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esp. pp 39-49.



致 谢

这本书酝酿了很长时间。我多年来沉迷于中国书籍和印刷史,买下了用各种语言撰写的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著作中的大多数。然而,实际从事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令人诚惶诚恐,多少是因为我总是回想起杰出的中国书籍专家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睿智的忠告。三十多年前,在我和他一起饮下午茶时,他在吞云吐雾之际,不遗余力地告诫我不要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关于这个题目的中文史料少之又少,十分零散,有时甚至互相矛盾,而且许多书即便在东亚也不易看到。他建议倒不如在今后几十年整理阅读中碰到的片段资料,将来某个时候或许能写出一部书来讨论这个困难而又重要的问题。

最近几年,我对从事这一研究想法的改变并不仅仅是因为必要的时间积累。我还很幸运地得到了朋友们一系列慷慨的邀请,让我就这一问题发表讲演和文章。我想向他们表达我最深的谢意,把我在从中国乡村按部就班的考察中,拉进纸墨和印版的世界。首先要感谢包筠雅(Cynthia Brokaw),她在1990年代中期邀请我对她参与组织的关于中华帝国晚期书文化的会议论文进行评议。在为这项任务作准备时,我很快意识到这一领域近年来有了重要的进展。读了张秀民、大木康、贾晋珠(Lucille Chia),尤其是井上进的著作,促使我写了一篇论文提交给会议论文集。她以惯有的洞察力读了这篇文章,从此以后给予我慷慨的鼓励,并对我就相关问题所作的研究作出敏锐的评论。

随后,应另一位老朋友蔡志祥的邀请,我抓住机会继续追寻我

重燃的学术兴趣,于2002年10月初在香港和广州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数次学术演讲。其中三次是在他任主任的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举行,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在中山大学,刘志伟、陈春生和程美宝对我待若上宾。每次讲演后热烈的讨论,蔡教授及其助手们对我的热情款待,以及这一问题所引起的显而易见的广泛兴趣,使我更加相信中国书史包含了各种引人入胜的专业领域,这些专业领域汇聚在一起,可以比从它们各自学科领域出发进行单独探讨获得更大的重要性。

第三,在东京(2000)和仙台(2003)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我有幸受矶部彰教授和他所在的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之邀作了演讲。这些以东亚出版文化为主题的会议使我接触到许多日本和韩国学者所做的出色工作,其中一些成果以各种方式为本书所吸收。这些会议汇集了来自至少十二个国家的学者,证明对这一问题存在广泛的学术兴趣。如果本书中的发现有助于推动矶部彰教授曾经如此无私推动的事业,我将感到十分高兴。

这样,前面四章中的部分内容已经以论文形式在包筠雅和周启荣(Kai-wing Chow)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印刷与书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东方》(*Orientalism*)杂志2002年秋季号、矶部彰编《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にわたくし》(东京:二玄社, 2004)上发表过。我想向上述出版者允许我在这里使用这些材料表示感谢。

离开热情博学的东亚听众后不久,我收到最后一个邀请,科大卫(David Faure)慷慨地把我在香港系列讲座的文稿纳入他所编的一套关于中国历史的新丛书中。这些演讲中的三个(第2、4、5章)就这样经过扩充之后收入本书,又加上了另外三章和引言,完成了整部书稿。这些研究和写作基本上是在系列演讲之后完成的。

在修改这些讲演稿时,我有幸在牛津大学、台湾“中研院”、北京大学历史系、不列颠图书馆、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2003年年会、伦敦亚非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举行的小型研讨会或分会场上发表我的观点。这些地方的同行们拷问我的观点,指出我论点中的缺陷,帮我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虽然我不能说已经说服了所有在场的人,他们对于修正和完善我的分析都很有帮助。

xi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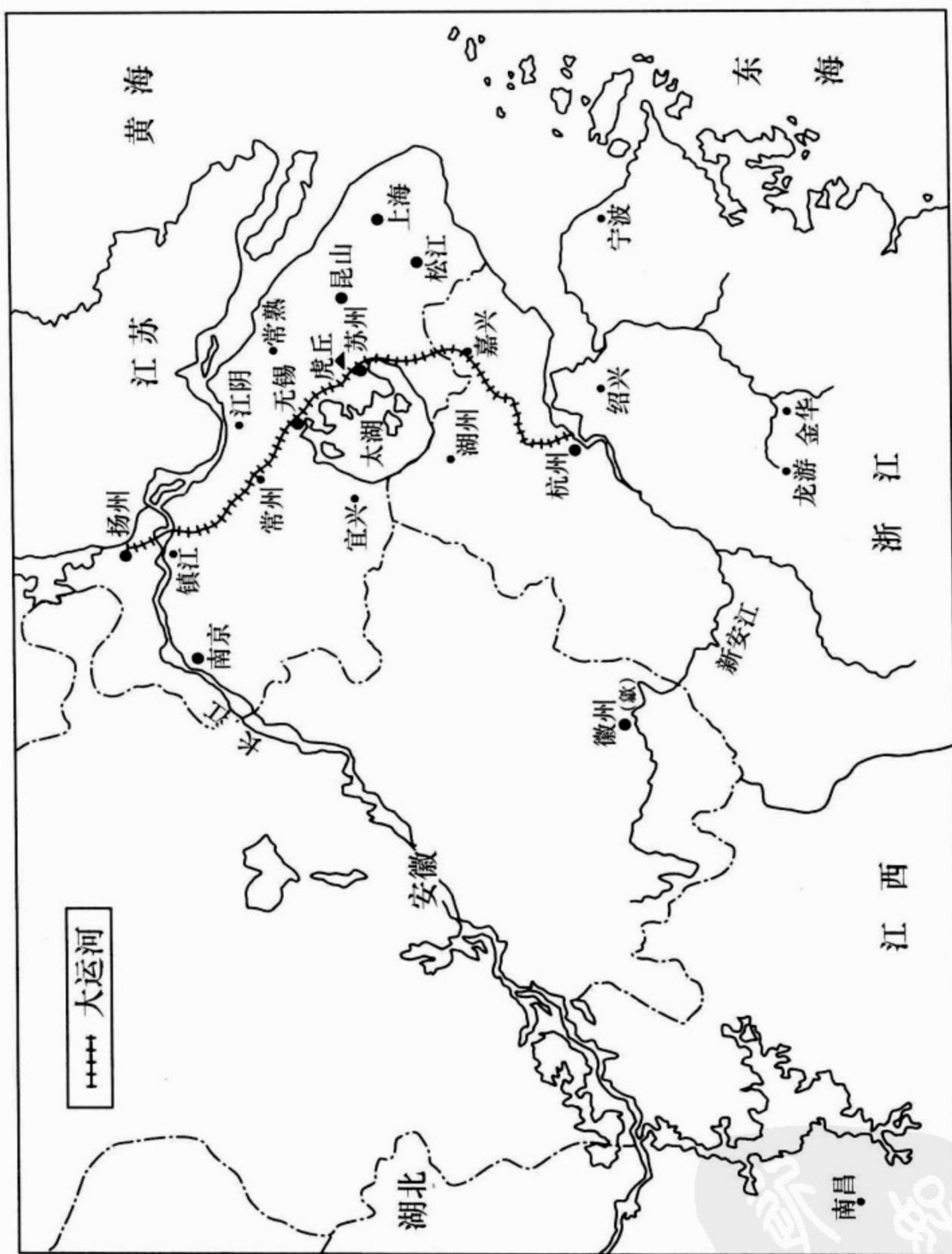
在本书形成过程中提供过帮助的还有其他学者。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的张瑞威和卜永坚博士,以及苏基朗和朱鸿林教授以极大的诚意接待了我。在北美和亚洲,艾思仁(Sören Edgren)、贾晋珠、何义壮(Martin Heijdra)给我提供了很好的陪同和指引。这三位优秀学者是耐心倾听并坦率交流不同观点的典范。北京大学的王小甫、邓小南、王天有和张希清等教授对我的热情欢迎罕有匹敌,刘翠溶、陈弱水、熊秉真、邱澎生、王汎森、黄宽重、柳立言等教授在我两度赴中研院查阅资料期间提供了帮助,令我在台居停期间极其愉快。

回到剑桥,彼得·伯克(Peter Burke)、杰克·古迪(Jack Goody)、斯特凡·里弗(Stefan Reif)和圣约翰学院其他许多同事使我能及时了解西方与其他地区相关问题的新进展。圣约翰学院图书馆优秀的馆员们(尤其是乔恩·哈里森(Jon Harrison))与我分享他们关于西方书史著作的丰富馆藏。克里·拜恩斯(Corey Byrnes)为本书编纂了词表和索引。在剑桥的中国史学者中,麦大维(David McMullen)、胡司德(Roel Sterckx)和崔瑞德(Denis Twitchett)阅读了部分或全部书稿,指出了一些有问题的论述,并提供了很好的建议。我要感谢的指出错误并提供有益建议的其他学者包括罗友枝(Evelyn Rawski)、丹尼尔·加德纳(Danny Gardner)、贝弗利·波塞勒(Beverley Bosseler)、马克·霍尔珀林(Mark Halperin)、布鲁斯·腊斯克(Bruce Rusk)、冯客(Frank Dikötter)、乔纳

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海因里希·冯·施达登(Heinrich von Staden)和张玲。

xiv 最后,但并不意味着不重要,我在研究中受益于常去的重要图书馆的馆员甚多,有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波德里安(Bodleian)图书馆、东洋文库、东洋文化研究所、内阁文库、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李约瑟东亚科技研究所和普林斯顿葛思德(Gest)图书馆等。在感谢这些无私的工作时列出姓名会引起反感,但我要特别提到几位:我的老朋友、东洋文库的斯波义信,总是为我利用他管理的藏书提供方便;还有剑桥的艾超世(Charles Aylmer)、小山腾和约翰·莫菲特,波德里安图书馆的大卫·赫利维尔(David Helliwell)。他们总是对我频繁而麻烦的询问和要求给予谅解。

因此,如果这本书比我作为一个羽翼未丰的研究生想写它时显示出更多的学识,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所有这些朋友所给予的帮助。我希望龙彼得对于这一遵从他劝告的结果不至于太过失望。



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及其周边环境

中华帝国晚期
 江南及其周边环境
 PDG

目 录

中文版代序	
书史与士人书籍的非士人背景	(I)
致 谢	(I)
引 言	(1)
第一章 1000—1800 年间中国印刷	
书籍的生产	(7)
米怜的记述	(12)
雕版印刷生产的变化	(22)
刻工的世界	(28)
第二章 印本在中国的崛起	(39)
藏书规模	(46)
印本的份额	(50)
获取书籍的难易	(51)
出版物	(57)
商业出版	(61)
第三章 书籍发行与士人文化	(74)
赠予	(75)
购买	(84)
士人	(92)
局限	(100)

第四章 中国学术世界中获取	
书籍的难题	(103)
知识共同体?	(105)
政府藏书	(114)
私人藏书	(120)
第五章 改良的尝试与知识共同体	(132)
解决方案	(132)
共享	(134)
共享协议	(138)
其他知识库	(144)
长远的解决办法	(146)
第六章 士人著述与钱近仁的案例	(152)
对读写能力和书籍功用的认识	(155)
钱近仁与他的资助者	(165)
注 释	(174)
本书所涉及相关书目的说明	(241)
索 引	(258)



插图目录

地图

- 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及其周边环境 (1)

插图

- 1 江苏苏州虎丘钱近仁墓 (1)
- 2 张湛注《冲虚至德真经》(北宋本) (24)
- 3 张湛注《列子注》(1530年本) (25)
- 4 孙鑛注《列子冲虚至德真经评》
(1621—1627年间刻本) (26)
- 5 18世纪中叶苏州半截街的书铺 (88)
- 6 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 (123)
- 7 宁波惜字会的拾字纸者 (163)



引 言

临近江南中心地带的苏州城的西北郊,有一座小山,山脚下的 1
狭窄街道里挤满了商店、寺庙和民宅。它以虎丘之名为世人所知,
一千多年来成为无数诗歌、绘画和故事的主题,和山上的建筑一起
为这座富裕而文明的城市增色,并成为它的一个象征。这座幽静
的山丘吸引了远近无数的访客,成为高僧、名媛和成功士大夫们的
最后居所。在这些尊贵的死者中,有一个名叫钱近仁的修鞋匠
(见图 1),两个多世纪前安眠在西麓山脚下的灌木和草丛之中。

这个终日忙碌的鞋匠之所以能安葬在这座文人休闲的著名小 2
山上似乎与其身份不相称的位置,是因为他对书和学问的热爱。
钱在幼时成了孤儿,被一个鞋匠收养,这家太穷,交不起他的学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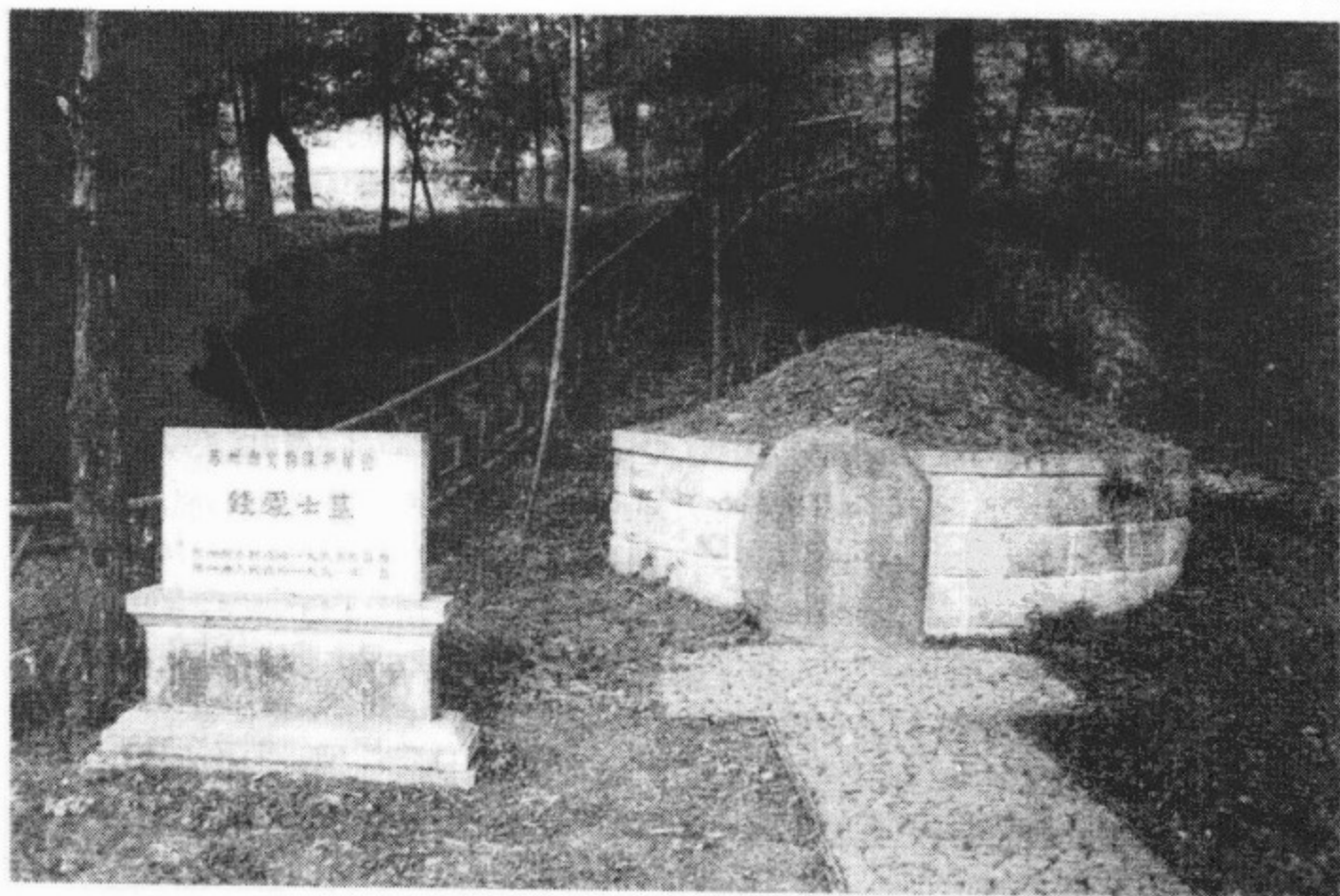


图 1 江苏苏州虎丘钱近仁墓

因而很实际地教了他修鞋的手艺。后来,根据一份史料记载,当他成年后有了微薄的收入,他就从邻居上学的孩子那里学会了读书。他的办法是每认一个字,就付给教他识字的人一个铜板。他后来又在苏州的书铺和寺庙里干活,作为交换,这些书铺和寺庙允许他借书读书,而不用付钱。这种状况持续了约四五十年,即使在他继续做鞋匠时也未间断,并且随着他自己藏书的增长,因为具备关于孔子《论语》和一部中等水平的流行文献《孝经》的知识,他慢慢在这个古典学术中心获得了些名声。苏州一些著名的学者拜访他,和他谈论共同感兴趣的与书有关的话题。他年老的时候,双脚溃烂,卧床不起,学者王丙前来救助他。王抛弃了早年再现其父科场辉煌的梦想,成为一个因儒学和医术而受人尊敬的医生。征得家人的同意,王把钱接到自己家中终老。因而,这个令人惊讶的识字工匠最后被人称为先生(虽然是“补履先生”),并荣耀地在这座文化气息浓厚的城市,在只属于富人和名人的地方获得一块墓地。而且,他的墓碑由该省高官按察使撰写,公开地宣示他进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精英圈子。那么钱的一生,似乎浓缩了传统中国人的梦想,任何人都可以仅仅因为掌握了这个国家的书写文化而提高自己的地位,由穷人变成名人。^[1]

但是,对钱的生活,尤其是他死去的方式,还有另一种记载,与这个获得社会成功的故事不甚匹配。1792年是一个荒年,钱死了,不是因为溃烂的双脚,而是直接或间接地死于袭击苏州城的食物短缺。仅仅是在钱因为食物短缺而不能出门之后,儒医王丙才把钱从他大半生租住的狭窄小屋里搬到自己家里更舒适的住处。大约百天之后,钱在那里死去,终年76岁,身后没有留下子嗣,没有一张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甚至没有自己的一口锅、一个碟。除了满架的破书,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苏州的几个学者捐钱救助他,使他免于不体面地与那些无名氏和游民一起葬在虎丘附近的六个公共墓地里。^[2]数十成百的文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在虎

丘山脚举行的他的葬礼,向这个整个一生都在尊崇他们和他们的学问的人致敬。^[3]

哪一个图景或印象更真实?时间隔了这么久很难说。但是,不管哪个是真的——可能两个都是真的——这两个故事都值得我们关注,以探究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中书籍的魅力和权力,及其与中国社会和经济等级的复杂关系。本书试图通过考察这两个问题,弄清中国的书籍史在公元1000年至1800年间,技术、知识和社会关系有哪些重要的变化。

对于中国内外的许多人来说,这样一种努力看起来似乎很奇怪。一部中国古书除了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还能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摆在书架上,用精致的函套包裹着,散发出一种静谧悠闲的学习氛围,并不是要引起任何关于历史的争辩。但是,中国世世代代的版本目录学者所作的关于这些书籍的基本事实,诸如它们最初的版本以及后印本的出版时间、地点、出版者和收藏者的研究,使这种理想化的幻境趋于破碎。在这里,通过利用这些版本目录学家的著作,以及最近更多的关于书籍生产、传播和消费的研究成果,我想用一个公正地反映从11到18世纪书籍在中国文化演变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的图景,来取代书籍作为贵重物品的形象。因此,在随后的每一章中,我要考虑过去很少与中国书史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社会和经济事务。首先,在最一般的情况下一部书是怎样印刷的?为什么在中国这种雕版印刷的方式作为书籍印刷的主要技术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其次,印本书在中国什么时候、如何取代手抄本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式?再次,印本书的采用给帝国晚期书籍的流通、消费和利用带来了什么变化?复次,中国学者什么时候、如何解决了书籍获取的问题,因而形成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个大的“知识共同体”(community of learning)?最后,中华帝国晚期识字者和文盲如何理解对识字能力和书籍的利用,他们是如何跨越社会分野的?

如果读者认为这些关于书史的问题过于书呆子气,那么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就被误解了。我相信书史应该处于我们理解中国精英文化的核心。至少在过去一千年中,书本知识在这个国家文化与政治精英身份和合法性的认定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是由这个国家的书面考试,以及精英阶层对其自身及其文化的定义所决定的。那么,书籍对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史,以及其中的众多男女,包括钱近仁和他的学术庇护者们的志向、烦忧和生存状况就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对于书籍生产、传播和利用的认识,将不仅大大有助于解释印本的逐渐崛起,或一部书、一名作者和一个学派的思想 and 文学影响,我们的结论还将揭示识字精英的知识世界如何演化,它在帝国范围内文人与非文人共同分享的文化的形成中可能扮演了什么角色。

试想一下书写的影响以及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各种载体。3500多年前,中国文字的创造帮助建立和强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这些制度使知识更加明晰和固化,使知识更成功地传播,并培育了知识的专家。古代中国的铜器铭文记录了创立这些制度的早期努力,刻有儒家经典的石碑也证明,使识字者便于获取这些已得到核准的知识的做法历史久远。手抄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纸的发明,代表了在一种书面文化的形成中为了更个人化地传播书面知识而不断进行的脆弱努力。进而,印本书,一个基于中国纸和印刷术发明的非凡产物,扩展了文字著作的受众和内容,使它们更易于迁移和传递,对受过教育的精英和社会大众更有用。这样,对于在中国文化中印本这种特殊的交流形式何时以及如何取得对手抄本的优势的研究,可以揭示人们如何对待书本知识,以及一种原已十分古老的书面文化如何在人民,尤其是识字阶层的公共和个人生活中扮演更广、更深的角色。换言之,中国印刷史,正如在后面的篇章中所要阐释的,将在地方和整个帝国的层次上,增进我们对中国知识的传播、制度的演化、学者的活动,以及知识共享团体的成长的了

解。想必,这样的考虑是不能被斥作书呆子气的。

本书的分析,尽管其关注面很广,但还是有两个重要的局限,一个是空间的,一个是社会的。本书并不试图解释八个世纪里整个中国的书史,而是聚焦于一个区域——江南,以及一个我们所最熟知的读者类型——士人。一个地区焦点对于确定手抄本到印本之间的转换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带来了作为本书分析基础的一些地方性因素,比如价格和发行。例如,在12世纪中期的中国,一部印本书价格的差别可能高达600%,取决于书是在哪里出版的^[4];这种差异,使得在分析这些价格如何影响书籍的生产和贸易时,任何帝国范围内的印本价格比较都是无用的。聚焦于江南地区同样是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为紧凑,因为这一区域从宋代(960—1279)到清代(1644—1911)在书籍的生产、发行和传播中保持了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在宋代,杭州作为印刷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两个竞争对手:闽北的建阳和四川成都。然而,到1230年代后,成都不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直到十八世纪,其印刷业才从13世纪中期蒙古人的征服中恢复过来。^[5]建阳在元代(1232—1367)和明代(1368—1644)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至少在书籍的产量上。^[6]但是在明代,建阳地区留存下来的关于书文化、尤其是书籍消费的信息,要比苏州、南京、杭州和江南其他书业中心城市加起来要少。^[7]这样,对江南书籍生产和消费的研究,尤其是对于这一地区从手抄本到印本文化的转换,以及当地居民使用书籍状况的研究,肯定会提供从11到18世纪中国书籍世界最完整的长时段图景。它还可以预示在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面对崛起的印本文化,手抄本没落的时间下限。

我们的分析的第二个局限,关系到我们所讨论的作者和读者的主要类型:士人。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写作、阅读和收藏书籍的中国人,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这些活动在他们自身和家庭的身份

认同中占有中心地位。这些世纪留存下来的书籍和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绝大部分来自士人或政府的藏书和著述。大量流行的印刷品,如年历、历书、歌谣、祈祷文和其他宗教文书,以及为“功利主义的读者”出版的小报和税单基本上都没有留存下来。虽然我们专注于更耐久的资料并不妨碍我们最终顾及这些通常短命的印刷品,这里多数章节所提出的证据和结论,主要仅指在这八个世纪里据认为是中国最富裕、最商业化、文化上最先进的地区中,在大部分人还是文盲的情况下最有文化的那部分人。当我们在最后一章回到钱近仁的案例时,我们对他的状况的理解,将会被我们所了解到的文人学者的生活和学问所改变,这些人的著作是钱所热切景仰的。然后我们可以进而看到,工匠和文人的两个世界在他们对于读写能力和书籍的理解方面有何共同之处。

我相信,即使严格说来,这些局限也有它们自己的作用。就我们现阶段对宋、元、明书籍世界的理解而言,从相对确定的信息转向不那么确定的推测的做法,比重复多数关于中国印刷史的著作中所充斥的宽泛而无根由的概括更有前途。一种地区的和文人的视角将最终为我们提供一个适当的机会,来弄清17世纪在多数重要的政府和私人藏书中印本相对于手抄本的比例,在获得名著的过程中即便是大的藏书家也会面临的困难,以及这些藏书家在社会地位、收藏重点、社会构成、甚至是一些阅读行为方面的变化。这一方法还将使我们能够分析从明中期开始印本最终永久性地取得优势的原因,以及确定宋代和晚明的出版世界有何不同。最后一章,在对钱近仁的学问和文化水平作出简短说明之后,探讨了帝国晚期对于识字和书籍的益处的各种不同理解,然后将钱和他在苏州的士人崇拜者对识字和书籍的态度加以比较。我们可能最终也无法确定,关于钱近仁最后的日子哪一种记述更有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书籍、尤其是印本,在11到18世纪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形成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

第一章 1000—1800 年间中国印刷 书籍的生产

整个上世纪,在中国学者眼中,印刷术的发明被看作是他们的国家对人类历史的最大贡献。当代中国书史元宿张秀民的观点代表了过去四代学者和藏书家的看法:“大家知道,我国不但发明了造纸术,又发明了印刷术(雕版与活字版),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很重要的贡献。”^[1]

如果对一个国家有能力发明某种东西之类的豪言壮语忽略不计,对于中国在发现纸和印刷术,以及在书文化发展中的中心地位,这句文化上的自得之词的确包含了相当的真实性的确性。然而,当人们审视中国人关于雕版印刷这一最古老、最普遍的传统中国印刷术的记述时,一个奇怪的现象慢慢显现。令人吃惊的是,中国的史料中只有极少关于印刷术发明的直接记述,尤其是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无法找到这一印刷术发明的确切日期,以及得到普遍认可的发明人的名字。^[2]关于这项发明在最初的 250 年中是如何在整个帝国传播的,只有极少的具体信息。对于它在其后六个世纪中如何得到应用的记载同样令人吃惊地匮乏,932 至 953 年间它在西南地区的四川被用于印刷儒家经典,而到 16 世纪晚期对书籍世界的一些异常详细的报告才突然出现。而且,这些材料极少告诉我们关于书籍生产的组织管理,以及其中不同部分之间关系的情况。事实上,我们只掌握极少关于中国雕版书籍如何制作的资料,即便印刷术与其他两项发明——火药和指南针一起,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名言来说,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文

学、战争和航海的整个面貌和状况”的(全部归功于中国人的)三大发明之一。^[3]

那么研究这一发明的困难,就始于它自身最初的混沌状态。从宋代开始,印刷术的起源就被人追溯至唐代(618—907)或10世纪中期儒家经典在四川的印刷。^[4]这些观点很少基于扎实的研究,在过去一百年中已经让位于新的解释。由于有了更具体的证据,这些现代的研究成果把关于印刷术早期历史的简单问题,变成了关于书籍、符咒和非汉字印刷品的复杂纠结。

例如,关于第一部印刷书的问题。唐代史料表明,9世纪在中国北部和中部的的主要中心城市已出现了印刷术和印刷品。这是指835年在四川和长江下游的淮南地区由私人印刷的年历,指不晚于861年在首都长安(今西安)印刷的一部关于针灸技术的医书,以及837—879年可能在另一个首都洛阳印刷的寺庙规章。还包括847—849年在江西印刷的一部诗集,以及883年在四川印刷的初级读物、字书,及解梦和占卜书。^[5]但是大约十五年前,张秀民从19世纪一位学者的读书笔记中发现,一条16世纪的史料记述唐代朝廷如何于636年或稍晚“梓行”一部书。该书是由一位已故皇后编纂的一部关于中国妇女楷模的书,被张认定为已知最早的皇家出版物,并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印刷的书籍。^[6]但是,正如张自己所承认的,并没有唐代的史料,包括那些在这部书中的材料,来证实他关于它是印刷而成的断言。进而,虽然这些明清史料使我们更接近于这个假定的事件,但距离仍有9个世纪之远^[7](正如现今仅存的诺曼人入侵英国的英语史料写于12世纪)。张所声称的发现7世纪早期出现了印刷活动,其证据来自另一条唐代史料,称佛教徒玄奘(664年卒)645年自印度回到中国后将一幅佛像大量印制散发。^[8]有趣的是,这些材料都没有宣称那位皇后编纂的书是中国最早的印刷书籍,这样倒可能令这一信息更可信。晚近蒂莫西·巴雷特(Timothy Barrett)的研究将雕版印刷的初次实

践和公开应用追溯至一个稍晚的年代,即 8 世纪早期唐代女皇武则天(670—705 年在位)印制佛教祷文和佛像。巴雷特甚至提出印刷术至少提早一个世纪应用于中国的可能性,但学术上的克制使他不再延伸证据。^[9]

这样,尽管很清楚唐代中国已出现类似印刷的活动,且不局限于朝廷,这一证据仍使我们陷于学术上不确定的模糊境地。^[10]为了找到更确切的东西,幸而我们可以求诸一件现存的唐代印刷品,一部印于 868 年的《金刚经》,它似乎应得到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的美誉。一个世纪前,这一 16 英尺长的经卷在中国西北遥远的敦煌佛经洞窟所藏的 4 万余件文献中被发现,其雕版技艺显示至少已有几代人的经验和传统积累。不出所料,它被证明不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印刷样本。^[11]这个荣誉——既然早期印刷术并不仅仅、而且不必主要用于书籍的印刷——有争议地属于 1944 年在四川省首府成都一个墓葬出土的佛教符咒,它被现代学术界认为印于 757 年后的某个时候。但即使这件中文符咒也不能肯定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因为在日本和韩国发现的古代符咒也很有资格获得这一称号。一些约于 770 年印于日本,及 704 至 751 年印于韩国的佛教符咒留存至今。1966 年在韩国东南的庆州一个佛塔发现的佛教经卷长约 14 英尺(它原先的长度可能超过 20 英尺),可能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在过去四十年中它所保持的这一称号使一些韩国人声称印刷术是韩国最先发明的,但韩国以外极少有学者认真对待这一说法。一些中国和西方学者甚至认为,这一经卷最初印于中国,虽然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总之,使用中文印刷的印刷术出现于中国的证据不晚于 18 世纪中期,有可能还要早上半个世纪。

如果印刷史上的时间和归属成问题,那么关于雕版书籍如何印制的信息也同样如此。用钱存训,一位来自芝加哥的著名中国书史专家的话说,“不同于造纸,中国文献很少记载印刷的技术过

程。关于雕版如何制作的信息……难以获得,除了偶尔有几个外国观察者和作家的零星记载”。我们可以找到在一块木板上涂上蜡以刻写书信的简短记载(约在 1135 年),这种做法至少可以追溯到 11 世纪晚期。^[12]然而,直到 1947 年,中国才有了第一份通过访谈记录下来的关于雕版印刷的四个阶段——誊写、刊刻、刷印和装订——的较为详细的记载,这时距离印刷术发明至少已有 1200 年了。^[13]即使在最近的 1987 年,钱存训如此深切地感受到中国文献记录中的空白,他访问了北京和上海的雕版印刷作坊,试图记录下他已研究了半个世纪的这一生产过程的第一手资料。^[14]

这一空白是很容易想见的。据认为,中国的工匠只把技艺传给子孙。但是,他们并不是从事书籍生产的唯一人群,12 世纪以来的许多学者自己也从事书籍的生产和发行,但从不在他们的著述里描述这项工作。^[15]

这样的缺略可以归咎于一种人们所熟知的情况,即这些学者讨厌记录手工劳动和生产的技術信息。即使是 11 世纪渊博的学者沈括,也由于他的算术而受到 13 世纪中期一位学者的挑剔,该学者断言:“士夫知算术者少。”^[16]但是,在其他四种紧密相关的技术中,却很难看到这种厌恶。例如,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关于中国工匠如何装裱字画的完整记述,是一个来自收藏世家的文人艺术家于 847 年所写。这种比较并不是随意的,因为一个挂轴不同部分的空间位置安排,可以作为一个印刷样张上对空白和文字进行分配和布局的样板(如此一个画卷和一幅印张会经常使用相同的术语来描述各个部位)。^[17]此外,第一批建筑师及其他木匠的详细手册早在 10 和 13 世纪就已成书和传播^[18],造纸技术在 10 世纪晚期被大体记述下来,并在 1637 年的《天工开物》中得到细致的描述。^[19]尽管晚明这部讲述技术的书籍基本上没有关注任何种类的印刷,中国的士大夫仍对中国发明活字印刷作了记载,沈括在 10 世纪中期首次记述,而后精于此道的士大夫又在 14 世纪早期和

18 世纪中期对此进行了详尽得多的记载。^[20]

在中国人缺乏对书籍生产过程的记载所有可能的原因中,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也是最为显而易见的。开始,一些详细描述印刷术的材料可能以手写或印刷的方式出现,但没有保存下来。同时,掌握生产高质量印刷品特殊技术的工人,没有理由和兴趣与非家庭成员分享这种颇具价值的知识。另一方面,一般性的技能和技巧是如此简单,到宋代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有文化的人认为它们太平常,不值得写下来。用 19 世纪中期一位中国学者的话说:“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21]这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读者会同意弗朗西斯·培根的看法,即印刷工艺基本上是浅显易懂的,但至少到 20 世纪早期他们还把培根关于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具有至关重要性的评价看作是少见多怪。^[22]

那么,关于雕版印刷的这样一份详细记录最初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故事中最古怪和最出人意料的。首先,现存关于中国雕版书籍如何生产的详细记录刊印于 1820 年。其次,关于印刷技术和过程的这一记录是在中国之外的马六甲写成和出版的。第三,其作者是一个当时住在马六甲的苏格兰新教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 14 出自他的英文书《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23]

所有这些中国印刷史编纂上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是 19 世纪早期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在东亚和东南亚所支持的传教活动的结果。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希望介绍和讨论 19 世纪早期米怜关于雕版书生产的格外详细的报告。利用这部此前所有关于中国书籍的研究都未注意到的书(法国著名的中国书籍专家戴仁(Jean-Pierre Drège)是个大的例外)^[24],我的目的不仅仅是出于书目学。我对米怜著作的兴趣不是因为其稀见和原创性,而是因为它对长久以来困扰中国书史的问题的透彻分析。我将首先

介绍米怜对雕版印刷生产不同阶段的记述,并解释这些阶段对工人工资和书籍价格的影响。下一个部分试图通过考察 15 世纪晚期和 16 世纪印刷品生产中某些简化和加速生产过程的技术变化,解释雕版书相对便宜的原因。在最后一部分,焦点落在工人、尤其是刻工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应对 16 世纪变化的技术和经济环境上面。

米怜的记述

伦敦传道会是一个成立于 1795 年的自发组织。为了将福音新教义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它于 1812 年派米怜到中国,成为第二个派到中国的传教士。在米怜到达东亚之前,他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如不借助于《圣经》的全译本,他和其他传教士在使人们皈依上帝时将面临怎样的挑战。伦敦传道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已在 1807 年成功地将《新约》译成中文,但米怜即便在将许多部出自旧约的书翻成中文之后,仍意识到他和马礼逊成就的缺陷。学习中文需要具有“铜骨、铁肺、橡木头、弹簧钢的手、鹰眼、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玛士撒拉(Methusaleh,《圣经·创世纪》中的人物,活了 969 岁。——译注)的寿命!”^[25]即便如此,一部好的中译本《圣经》仍然是不够的。它仍然需要印刷,并在一个更愿意用传教经费来满足实际需要的民族中广为传播。这个国家对新教传教士关上大门,迫使他们不得不依靠中国仆人在暗夜里秘密发行自己的书籍。^[26]

然而,什么是印刷这个译本最好——最快、最有效、最廉价——的方式呢?伦敦传道会为了帮助其管理委员会作出决定,要求从事印刷业的会员报告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这两种选择的相对可行性和相对成本。米怜意识到在伦敦向其提供财政支持的这

个委员会对中国的雕版印刷过程几乎一无所知,于是肩负起为他们解释和评估这种技艺的工作方式的任务。幸运的是,他曾当过学徒,在苏格兰成功地做了几年木匠,^[27]并在 1817 年把一些中国人从广东带到马六甲,其中包括印刷工匠。^[28]之后直到 1822 年去世前他都在那里经营或监管教会的出版事务,因而对中国的印刷工艺非常熟悉。^[29]而且,他常常用中国方式行事,靠中国的雕版印刷术来出版所有用中文写成的东西。在一个心怀不满的英国下属眼里,他在管理 18 个工人(其中有一个负责中文出版物的中国人)时,似乎把他们全都看作中国人:“至于传教活动所遵循的原则,我相信它是纯粹中国式的。它从儒家四书的规范和戒律中来,是一种父家长制家庭的原则,父亲独揽大权,发号施令。[传教士中]资历深浅之间的界限如此分明,如同中国人的长幼之序。”^[30]

在起草其报告的过程中,米怜受益于他在木匠和印刷作坊的经历,也咨询熟悉雕版印刷的中国人和非中国人。^[31]因此,他在《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中关于中国印刷术的长篇记述,成为所有语种中关于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一篇详细报道(东亚第一篇关于雕版印刷技术的论述是 1929 年的日文出版物《錦絵の彫と摺》)。^[32]再往后,是一篇对 1820 年米怜所写那本书的评论,其中夹杂着若干段米怜传教和印刷活动的继任者——沃尔特·亨利·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838 年写的关于中国印刷术的报告。

中国人在马六甲(还可能在中国东南部某些地方)最简单、同时也是最少见的一种雕版印刷技术,要求非常迅速地制作和刊刻分好类的木条:“……当来了一个急活,就叫来一些工人,每人给一小片木头,上面留有一两行或更多的空白。他们以极快的速度刊刻,当所有的版片都刻好后,就用小木楔把它们拼起来。”这种印刷方式用来印刷新闻及招贴、方志、告示等其他临时出版物,很显然不需要使用高水平的刻工。^[33]另一种快速的按需刊刻使用更

柔软的表面材料,如蜂蜡混合松香,或者胶泥,或研成粉的石膏。如用蜂蜡,就“在一个木制的框子上面铺一层蜡,然后,他们用一种雕刻工具在上面刻上字……”虽然这种方式在马六甲很少使用(米怜和他的中国工人声称从未见过),但在广东、宁波和北京被用来出版方志和其他临时出版物。^[34]这种做法至少可追溯至1090年前后,当时一些士大夫之家据说在蜡版上刻字,用来代替在纸上写信。十年后,为了有所凭据,人们纷纷在将信发出之前用湿纸覆在蜡板上摹印留底。^[35]

那种在米怜看来“几乎遍地风行”^[36]的雕版印刷方式要远为复杂,至少在其初始阶段是这样。它使用木板,比木片远为结实耐用,同时要求使用这些长方形薄木板的工匠特别细心:

准备和使用这些木板进行印刷的一般过程如下所述。木块,或木板,应该是梨木或枣木,他们对此这样描述:——“梨枣细而硬、油而亮;味酸;不易虫蛀,故用之印刷。”木板先被锯成页面大小的方形,上下留出空白,厚约半英寸。然后他们用一种工匠用的刨子将两面刨平,每面包括两页,实际上按中国人的看法只是一页。因为他们以“叶”计数,而不是书的页数。然后木板表面用煮成糊状有些黏稠的米饭擦拭,以填平没有被刨平的小凹痕,并软化和湿润木板表面,以便更易于印上字。^[37]

仅就便于保存和工匠们所进行的印刷工作来说,具有一些关于木材的不同种类及其特性的知识显然也是必要的:

誊写匠的工作,首先是确定页面的确切尺寸、行数和每行的字数;然后画一种他们称之为“格”的东西,即由彼此正交的水平线和垂直线组成的表格,这样就为每个字留了一个小方框——每一类文字的方框同等大小,无论笔画是繁是简:一个五十划的字,并不比只有一划的字占有更大的空间。这使

得页面在形式上规范统一,虽然许多复杂的字在行间密密地排在一起时显得很拥挤。空白通常留在页面上方,虽然并不总是这样。边上的注释和我们一样,用小些的字来写。这种表格被均匀地画好,送到印刷工人那里,后者挖去所有的方块,留下凸出的线。然后印上许多张,通常要求用“朱墨”印。然后誊写匠用黑墨将文稿填入方格,直至写满,加上圈点,然后把它送到刻工那儿。刻工在板上的浆糊干透之前,把纸反贴到上面,用手和一把刷子刷擦,直到它紧贴板面。然后他把板子放在太阳底下,或在火前放置一会儿,再用手指把纸完全擦掉,但要在每个字都清楚地转移到板上之后。然后就用雕刻工具把板子上所有空白的部位都挖去,显示文字的黑色部分被小心地保留下来。木板用各种不同的刀具刻好了,随后就是刷印的工序。^[38]

现代读者如果知道多数漂亮的东亚书籍都是用这种方式生产的,只能对这种制作和刊刻书版的过程之简单感到吃惊。在这项工作中,正如米怜敏锐地观察到的,刻工只用了一些简单的工具,它们“可以用工人手提的一个不算太大的布包袱带着……”^[39]米怜所说的这些“雕刻工具”包括“一个工匠用的刨子”和一些“带刃的工具”^[40],他没有说得很仔细,大概是因为它们只是普通木匠工具箱里的小刀、凿子、挖槽刀、磨刀石、刮刀和刨子。^[41]既然材料的选择主要不是出于成本而是为了耐用和实用,雕版的质量主要取决于操作者的技艺——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的职业训练、经验和对工作的兴趣。

不幸的是,米怜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刊刻方法的细节。关于这类信息,我们就得看麦都思 1838 年写的关于当时的中国及其对基督教书籍接纳情况的书。本来麦都思在英国被训练成一名活字印刷工人,他强烈支持用活字方法来印教会的中文书。但是,他十分关注中国雕版刻工的实际工作过程,并留下了很深印象:

18

木板刨平之后,被涂上一层浆糊;贴上纸,反复擦拭,直至变干。然后将纸尽可能去掉,你会发现字迹已经反向转移到板子上。现在把板子涂上油,以使字迹更清晰锐利,随后刻工开始自己的工作。第一步是,从上到下在文字的旁边直刻下去,把行间的空白处去掉,标点除外。然后工人开始刻所有水平的笔画,随后是倾斜的,再后是垂直的,贯穿整行,这样就不用刻每个字时都旋转木板。刻完字的四边后,他转向中心部分。稍后,页面就完成了。^[42]

麦都思所述刻工的技艺似乎只是在于他快速而便宜地刊刻木板的能力。他的目标不是再现字画的表现力,或原稿书法的神韵,而是简单地尽快刻出能够辨认的千篇一律的字体。

19 在米怜的报告中,书籍生产剩下的两个阶段——刷印和装订,似乎要简单一些:

书版被放在桌上,将一把毛刷蘸上墨,轻涂其表面。^[43]纸已经准备好了,每张都放在书版上,用一把用棕毛做的刷子轻轻擦压。然后揭掉纸,一个工人一天可揭 2000 张。中国的纸是很薄的,一般不作两面印刷,虽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这样做。装订时,中国人把纸对折起来,把没有印字的那面折在里面。在纸的中央,即折叠的地方,印上书名、页码和卷数,有时还有此叶内容的主题,如同欧洲的书一样,不同的是后者将这些内容印在书页上方,而在这里,它们被印在叶边上。一般折页的地方刊刻得如此精确,当读者翻页时,在一侧只看到字的一半,另一半则在另一侧。把组成一册书的若干张纸放平,压在两块板子之间,在上面一块板子上放上一块重石,然后用一种粗糙的纸作封面——不像欧洲那样用硬纸板。再裁切书背,用线缝上书册。缝的方式与我们不同,是通过事先用一个小而尖的铁制工具扎好的孔洞,从一侧到另一侧一次性将整

本书册缝上。然后裁切书首和书根,中国式书籍生产的整个流程——刊刻、刷印和装订就这样完成了。^[44]

有时所有这些工作只由一人完成^[45],但更多的时候这四个阶段由不同的专门工匠完成。^[46]虽然在 13 世纪中期,不晚于 14 世纪早期,一些工人、包括刻工可能是妇女和儿童,但工匠通常是成年男子。^[47]

这项工作的总体成本长久以来困扰着西方学者(中国的传统记载极少提及此事),在这件事上米怜向伦敦表达了他的困惑。首先,“总是有许多杂费,起初无法计算”^[48]。更令人烦恼的是在印刷各个阶段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变量,构成了一堆纠缠不清的数字和价格,难以就价格及由此带来的雕版与活字印刷相对成本方面的关键问题作出任何清晰的结论。

由于缺乏来自两方面的充分事实以形成适当的数据,我宁愿把这作为一个问题,而不对与之相关的任何事情作出断言。如果没有看到这两种方式充分展现各自的长处,就没有人可以对它们各自的优点作出恰当的判断;没有一个对两种方式所有各项开销所作的全面、清楚、明晰和商业式的财务报告,对于一项给定数量的工作(比如三万部一般篇幅的书),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定。^[49]

20

计算生产成本的一个主要复杂之处在于雕版的生命周期。随着时间的推移,雕版表面会磨损,这样就限制了所能清晰印刷的书籍数量。^[50]为了使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推迟发生,印刷者会在“印了 2000 到 3000 部后……轻轻清洗印版,反复晾干,防止书版表面因长时间蘸墨潮湿而变软,最后再把书版晾干,使之重新变硬,延长其使用寿命”^[51]。但是,书版开始漫漶、不可阅读的临界点一般说来很难判断,米怜的结论因而特别谨慎以求尽量准确:

中国印刷品的永久清晰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版所用木

料的质量,刻工的水平,墨的调和是否适当,以及印刷者的用心程度。比如,如果印刷者是一个笨拙而粗心的人,头一千部书就会印得油渍斑驳,书版也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可能如果不进行重刻,或至少是修版,就无法印出六千或七千部书。我无法确定地说,好的书版到底可以印多少部书。我们那里的印刷工人证实,如果具备上面提到的那些质量和优点的话,一付书版可以印出三万部书。从我们在传教中所用过的书版来看,印过多达一万部书,并且如果保管得好,它们看起来完全可以承受同样数量的另一版本的印刷。^[52]

二十年后,另一个传教士把米怜的上限数字 30000 提高了约三分之一:“外国人过去认为同一套书版能印出的书籍不会超过 15000 到 20000 部。但从最近的试验来看,可以达到 40000 部以上,印刷效果相当好。”^[53]

21 最后,最大印数这一基本问题,对于米怜和我们来说仍然是个太过复杂的问题,不是用一个数字就能说清楚的。他所指的木料、墨、印工的质量变量太大,无法得出一个单一的结论,而只能是一组最大值的估算,如对于刊刻低劣和保管不当的雕版是 6000,对在非常硬的木质上刻得非常好的书版是大约 40000,更为普通的印数则在 15000 到 30000 之间。而且情况可能更为复杂,即使这些书版还能印书,也可能被卖掉用来刻另一部书。^[54]

在向读者呈现所有这些复杂性后,米怜明白了雕版印刷的不足。他所提到的不足,诸如雕版印刷的生产周期问题,似乎不适合用它来印五花八门的临时印刷品,书版累积带来了储存问题,用过的书版印刷清晰度不断下降,同一文字需要多次刊刻造成重复劳动开销,用坏的书版不能使用,在中文栏间难以嵌入其他语言。但是,最后米怜并不掩饰他确信,在某些——如果不是许多——情况下,雕版印刷在印刷中文方面比活字印刷更便宜、更适合。诚然,他基本上对此前中国人在使用活字方面的另一种成功一无所知

(他似乎不知道毕昇(990—1051)早在1040年代就发明了活字,比古腾堡早400年)^[55],也不知道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早期书籍价格有大幅度的下降。^[56]而且,根据何义壮(Martin J. Heijdra)最近所作的一项复杂的分析,木活字可以说是印刷大约一百部以下少量书籍最便宜的方法。很可能基于他想大批量印刷《圣经》和宗教小册子的兴趣,米怜忽略了这种可能性,而像所有其他传教士一样专注于金属活字和雕版印刷的比较,想得出一个不管印数多少都能适用的结论。^[57]而且,他完全忽略了铅版印刷所取得的进展^[58],尤其是平版印刷的魅力,那是19世纪晚期的一项发明,代表了自古腾堡时代以来西方印刷技术最重大的创新。^[59]

尽管米怜的分析存在这些不足,他还是与同时代的大多数英国人不同,注意到了雕版印刷用于中文印刷的重要成本优势。首先,中国的雕版印刷者不同于西方的同行,不需要铸造厂来铸造活字,不需要昂贵而复杂的机器来进行印刷和装订,不需要厂房(租金昂贵)来放置设备和产品(他们只需放置雕版)。^[60]除了一些简单的雕刻工具外,刻工们只需一张小桌子和一只凳子。而且,这两件木头家具实际上可以放在任何地方,可以放在家里或寺庙场院中一个临时的地方,地下室或阁楼的角落里,与小屋里的床并排放在一起,田地或路边的空地上,甚至是一艘正在行驶的船的甲板上。^[61]这样,出版者的费用和租金降到最低,最初的启动资本和支付的利息也就最少。^[62]

其次,将中国文字铸造或雕刻成金属活字,至少在开始时比购买和刊刻雕版要贵,这不仅是因为中文由几万个不同的汉字组成,有些字还要做很多个来进行活字印刷。这些字长期使用会降低其成本,但许多初创的企业无法承担巨大的启动费用或借债利息,以便凑齐购置印刷机和活字的初始开销。这一次,米怜寻求资金用中文印刷其《论解说保罗的以弗所书》(*On the Exposition of the Epistle of Paul to the Ephesians*),并在另一部著作里解释为什么

用雕版印这部书比用西方的活字印刷便宜很多：

制作一整套优质书版的费用，我想至少是 50 磅。它包括 86000 个字。如果再加上标点和标题，就要达到 90000 个字。用我们所拥有的劣质活字来印刷，我想费用会达到四倍以上。因为，正如你将看到的，有三种大小不同的字，因而需要三种大小不同的字体。这肯定会非常贵。按照中国人的方法，大小不同的字都被刻在同一块木板上，用的是同一个工匠，难易程度相同，价格也大致相同。根据当时的情形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我们确实完全相信中国的印刷方式对于他们的语言来说是最为适宜的，也最适合于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63]

23 第三，雕版印刷生产的劳力成本明显低于活字印刷。刻工“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按照原稿的样子进行刊刻。对于雕版印刷来说，在中国有很多目不识丁的文盲，尤其是妇女（她们和男人刻得一样好），但他们却能以此为生。但是这些人并不能被雇为排（活）字工人”，因为一个排字工人需要有点阅读能力：“雇佣一个受过点起码教育的中国人，要用不低于一个机械工两倍的工资。而我相信只有受过起码教育的人才能担负这项需要速度的工作。”^[64]

这些雕版印刷工人的低工资及他们的高效率，令米怜吃惊。自 16 世纪晚期耶稣会士利玛窦注意到中国书籍“低得不可思议”的价格以来，所有对中国印刷术有过评论的西方人都对此目瞪口呆。^[65]米怜估计，在一年中，一个好的刻工一天平均可以刻 150 个字；两个中国工人，每人用一块版子印刷，一天可以印 2000 张。这两个中国工人，如果和一台每张印四个书页的英式印刷机的产量相比的话，可以生产出“两个使用英式印刷机的工人一天生产的差不多同样数量的印张，假使双方的技术和力气相当”^[66]。麦都

思在作出“[中国人]刊刻他们错综复杂的文字的速度真是令人吃惊,欧洲的工匠无法效仿以达到同样效果”的结论时,把第一个数字低估为刻工每天刻 100 字,却把第二个数字提高为一个印刷工一天可以印 3000 张。^[67]让麦都思感到同样吃惊的是中国劳动力的廉价:“如果一个伦敦的雕刻工人知道在英格兰需付六十或八十先令的活儿,一个中国工人只要半个克朗(比如 2.5 先令,即不到伦敦成本的 5%)就可以完成时,会感到很吃惊。”^[68]

然而,米怜注意到中国刻工的报酬相差悬殊,又一次显示了他对劳动力成本复杂性的敏锐洞察力。当广东著名的海幢寺(Haechang Temple)以每天一字一钱的价格雇佣刻工来刻印其招贴、节庆公告和小册子时^[69],他注意到他的同事马礼逊 19 世纪初从广东的几名刻工那里得来的几种迥然不同的估算,每刊刻 1 万字,三个等级的工作价格(“以西班牙[即墨西哥]货币为单位”)为:质量最优,30、21 和 11;其次,20 和 15;再次,12 和 7.5。西方人通常不得不比中国人付更多的钱,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政府禁止在中国印刷他们的宗教小册子,因而迫使米怜在马六甲而不是广东建立其印刷厂。虽说如此,马礼逊的第二个估算接近于约 1820 年米怜在马六甲所支付的刊刻费用。^[70]如果将它与活字印刷的成本比较,的确看起来更便宜,特别是如果出版者不打算对印刷事业作长期投资的话。

在米怜于 1822 年死后,他的忠告最终还是被用活字来印刷中文书籍的论调所压倒。该技术的倡导者认为一旦有了印刷机,一旦有了一副中文活字,实际上活字印刷更便宜。而且,他们相信既然这项西方技术的操作几乎不需要来自中国工人的任何帮助,将使传教团摆脱清廷对中国刻工的控制,使其出版活动更经常化。^[71]但是,我怀疑这个“西式”的印刷方案说服伦敦委员会的原因,是出于该委员会想通过中译本《圣经》来拯救 4.5 亿中国人灵魂的福音传道动机。活字有其不足^[72],但其印数大大超过中国式

的雕版印刷,最多可以便宜的价格印出约4万份。这样,救赎就和活字印刷机结合在一起,到19世纪中期,配套的活字制作完成,印刷机被运到香港,后又运到上海。不经意间,为传教士所译《圣经》刊刻的书版被废弃不用,两种西方的印刷方式——起初是平版印刷、后来是活字印刷,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绝大多数城市印刷品中取代了雕版印刷。

如果说米怜19世纪对雕版印刷的提倡在西方只赢得了寥寥几个支持者的话,他的分析仍然非常有价值,因为他在现代西方印刷技术——平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传入中国的前夜,对雕版印刷的生产过程及其经济特性进行了报道。它使我们理解为什么明智的中国人明知活字印刷的潜力,却仍旧偏爱雕版印刷,以及为什么它在中国的提倡者常常是冷静的生意人、文人和学者。

雕版印刷生产的变化

必须承认,米怜关于雕版印刷生产成本低的说法,得到了明中期以来许多中文记载和一些价格数据的支持。这些史料显示,16世纪在书籍生产的所有四个环节,生产成本都出现了显著降低。首先来看装订。米怜的描述中提到的线装,是在9世纪晚期至10世纪晚期出现的一种装帧方式,但直至16世纪才得到普遍应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使书籍更耐用。^[73]与10至16世纪使用更普遍的两种装订方式——使用硬质封面及粘连书脊的包背装和蝴蝶装——相对照,线装避免了在这两种方式中粘连不牢、书页散乱的问题。相反,它用一把锋利的锥子在折叠的书页上打孔,再缝在一起,辅以挤压,使之成为一叠装订均匀的书页。而且,生产这种形式灵活而又装订牢固的书籍,比其他装订方式需要更少的工人和更低的技术。实践证明这些书更方便运输和储存,无论有无函

套的保护。^[74]这样,这种线装形式的广泛采用——即便佛教典籍也采用这种形式,就使得书籍生产费用降低。^[75]

印刷成本,据我的观察,不是因为印刷过程本身的任何简化而降低,而是因为印刷所用纸张价格的显著下降。^[76]在宋代,正如晚明学者张萱所证实的那样,纸很贵,需要循环使用。张萱吃惊地发现,在明代皇家藏书中储存的宋代印刷品书页背面写有文字。^[77]宋朝甚至依靠出售废纸来筹集宴会经费或增加财政收入。^[78]后来,在 15 和 16 世纪,福建和浙江生产的便宜(有的经过改进)竹纸产量更大,加上对一度荒僻的江西森林的开发,极大地增加了华南便宜纸张的供应。^[79]纸变得如此便宜,以至于东南村庄的墙壁贴满了政府公告,神祠和寺庙时常被燃烧的纸钱照亮。^[80]

但是,中晚明书籍生产成本下降的主要因素来自将手稿刻成书版的劳动力成本下降。这些减省在生产过程的誊写和刊刻阶段最为明显,在已知的从晚明到 19 世纪对雕版印刷预算的估算中,这两个环节加起来构成了生产成本的大部分。^[81]然而直到明前期,将一部士人著作誊写到刻版用的版样的人可能是作者,或他的门徒、朋友、儿子,甚至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书法家。^[82]明中期以后即便是士人的著作,誊写者通常也只是一个“纯粹的抄手”。正如米怜所注意到的,这个抄手不是学者或士人,而是一个技能有限、地位低下的抄书匠:“写这种样子的字本身,在中国就是一种职业。有人特意学习它,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印刷而誊写的劳动中。有学问的人很少能写这种字:事实上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一个纯粹抄书匠的工作是辱没其身份的。”^[83]抄手要用一种书法字体写字,这种字体融合和简化了宋代流行的唐代书法家的字体,如欧阳询(557—641)、颜真卿(709—785)和柳公权(778—865)。这样,人们所熟知的“宋体字”——这正是米怜在他的分析中对抄手所写字体的称呼^[84]——这种整齐划一的字体,又被更准确地称为“匠体字”。它缺乏独特个性,靠对毛笔的运用来书写由五种笔画(一

丨丿、和冫)所组成的方块字。最终形成的像盒子一样千篇一律的字体便于刊刻和阅读,也使页面看起来有一种平衡感。^[85]但是,它不注意原始笔画顺序的动态关联和书法的风格,印成品看起来与手稿有显著差异(见图2、图3和图4)。^[86]自然,这在那些士人读者眼里是呆板无趣的。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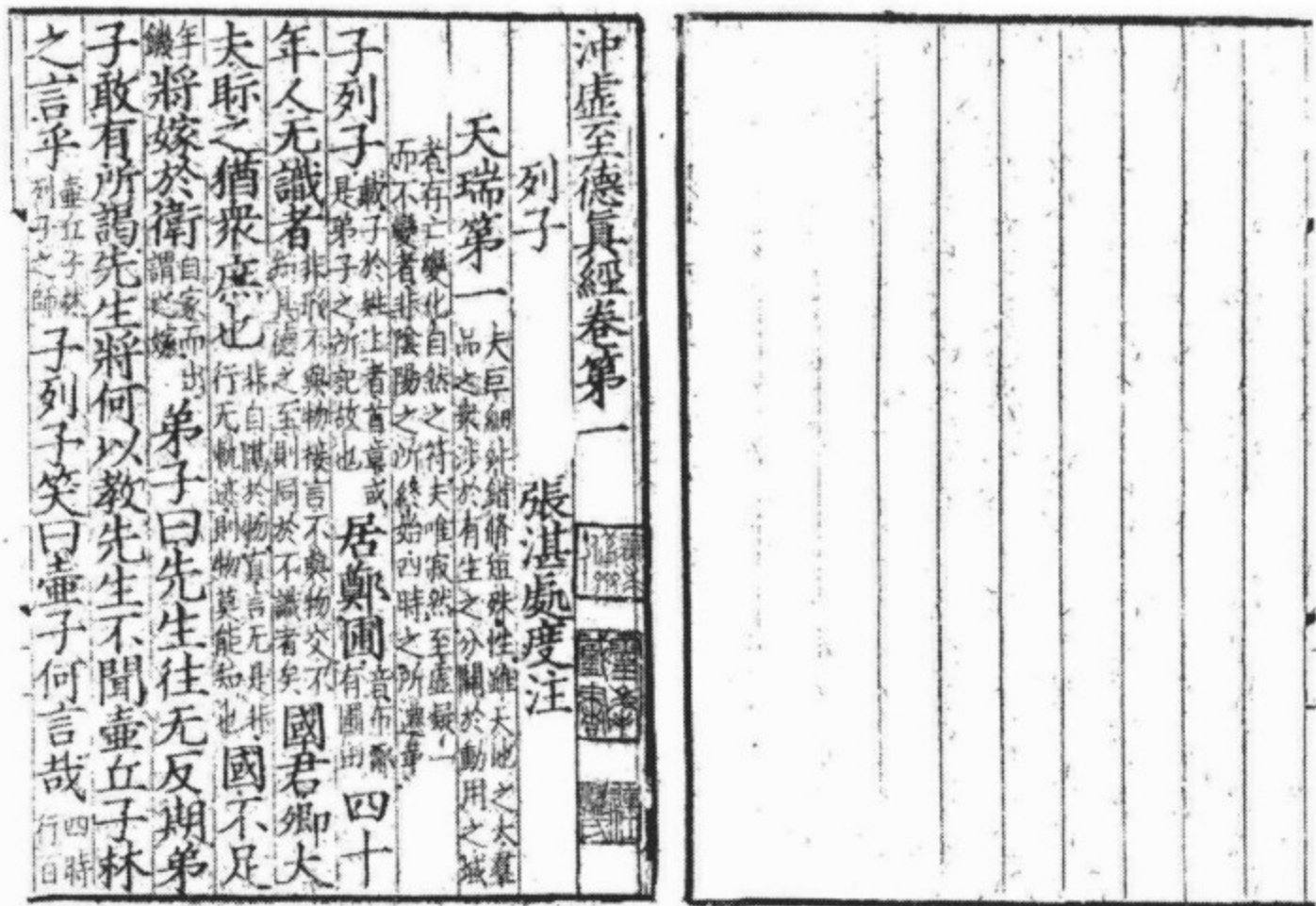


图2 张湛注《冲虚至德真经》(北宋本),见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列子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第2卷。

28

除了美学方面的考虑外^[87],书法风格的这一改变对于书版抄写和刊刻工作有显著影响。在贾晋珠看来,它削减了成本,因为它使出版者在书版上能挤进更多的文字。^[88]它对抄手所用笔画和刻工刊刻的范围加以严格限制,进一步降低了成本,因为它减低了这些工作所需的书法和雕刻技艺。这样刻工就可以将一部分工作交给刊刻水平不那么高的家庭成员,更快、更便宜,同时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关于成本节省的幅度,可以在18世纪内府给抄手和刻工规定的抄写和刊刻三种不同书法字体的报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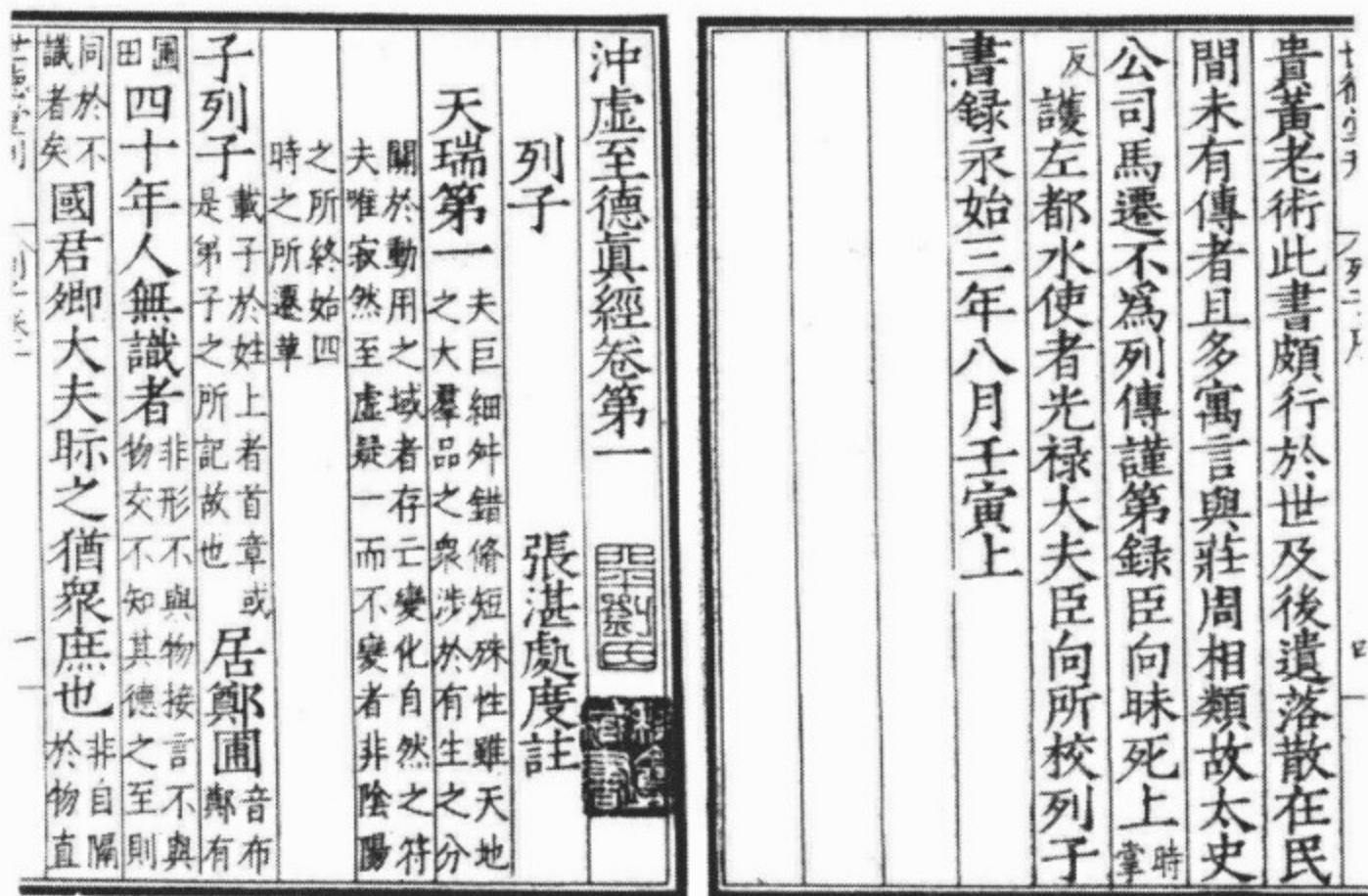


图3 张湛注《列子注》(1530年本),见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列子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第2卷。

中,找到最清晰的线索:

书法字体	抄手,每千字	刻工,每百字
宋体[或匠体]	2钱银子	8分
欧[阳询]体	4钱银子	1钱6分
标准体(楷书)	3钱银子	1钱3分 ^[89]

29

书籍生产这两个相对昂贵的环节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了50% (从标准体变为匠体)和100% (从欧体变为匠体),带来显著的减省。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最终必然导致面向消费者的书籍成本大幅度下降。

印刷字体的这种变化,似乎也导致了一种不同的刊刻方法,这种方法如果在这项工程中没有用到,那么在其他书籍的刊刻中曾得到应用。正如一个抄手用简单易刻的笔画将原稿上板,一个刻工在一块板子上也会先刻所有字的同一种笔画,再刻其他笔画。字的每一划成为被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恰当地称为中国书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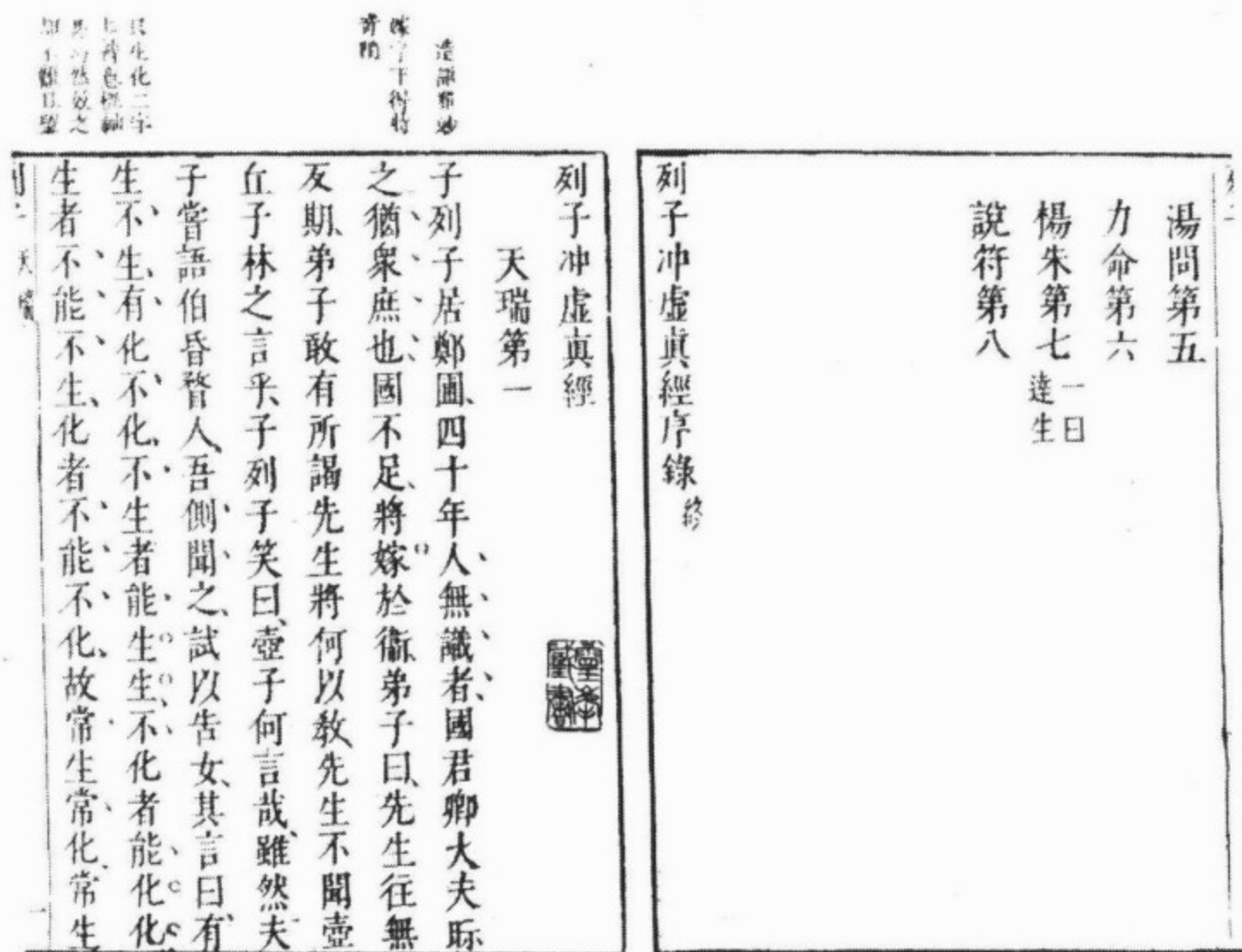


图4 孙鑛注《列子冲虚至德真经评》(1621—1627年间刻本),见严灵峰编《无求备斋列子集成》(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第8卷。

和艺术“模块系统”中的一个可复制的部分。^[90] 一经刊刻和印刷，这一抄件总是比它所模仿的著名大师们的书法更像金属或木质印刷体。那么以后见之明来看，明中期以来士人著作中这些匠体字的广泛采用，在中国印刷字体从手写体向印刷体的长期演变中代表了重要的一步。^[91] 随着19世纪晚期普遍转向平版印刷，及20世纪转向活字印刷，这一演变在中国达到顶峰。最后，它导致20世纪中叶雕版印刷实质上的消亡。^[92]

虽然我们在明代没有找到刻工们真实的劳动分工的记载(米怜自己的中国印刷工人在马六甲包揽了所有四个阶段的工作)，上述麦都思1838年的报道清楚地提到有一个刻工按笔画顺序刊刻书版上的字——先是水平笔画，然后是斜的，最后是垂直的——

与抄写的顺序十分不同。三份 20 世纪 30 年代的报告大致证实这一刊刻工作流程,并使之更为清晰。1999 年在扬州进行的一项对传统工艺的田野调查报告显示,5 种匠体字笔画完全是在整张书版上轮流刊刻,而不是逐字顺序刊刻的。^[93]这一工作流程的重组对刻工们自身有潜在的意义,即一旦以这种方式分工,理论上可由一个以上的刻工分担一块书版的刊刻工作。事实上,这种把劳动划分为不同工作模块的情形,在二战前被访问中国的田中子祥观察到。困难的工作(比如水平的笔画)由熟练的刻工完成,相对容易的工作(比如垂直的笔画)由他们的学徒和其他没什么经验的刻工来做,这样一块书版可由多至四名工人来刊刻。^[94]最近来自皖南徽州府的一份报告证实了田中子祥报告的基本观点,据说那儿的雕版工人把一块书版的刊刻工作按照匠体字的五种笔画分工(没有提到使用学徒,但并不必然表明没有这种情况)。^[95]

既然第一份详细的关于书籍生产流程的中文报告于 1947 年产生,那么就不必因为缺乏证实这种刊刻分工的明清史料就排除当时存在此种实践。实际上,晚明中国据称存在着细致得多的劳动分工(景德镇的皇家瓷窑生产瓷器的二十三道工序使用了多达 400 名工人)^[96],在类似的漆器工艺中也有采用简化的雕刻技术的趋势(这一变化源于这些工作被转移到大型作坊,在那里刊刻任务被外包给不同的刻工)。^[97]总之,我们应当考虑到与自明中期以来匠体字应用的增多相联系的多种刊刻实践,它们是由刻工的供求状况、不同的专业水准、工作时限、生产预算和其他地方性因素决定的。虽然更先进的劳动分工可能到明代以后才出现,但即使明中期以后只用一名刻工来雕刻匠体字,也可以基本简化以前的生产流程,使之更快捷、更便宜。这样,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在书籍出版技能,尤其是刊刻方面的变化,证实了弗朗西斯卡·布雷(Francesca Bray)对明代技术的总体评价:“总的技术趋势是朝着更小、而不是更大的规模,以及技术含量更高的方式发展”,但

只印证了前半句,而不包括后半句。^[98]即使匠体字的书写和刊刻需要独特的技能,布雷论断的后半句只适用于高端市场的士人著作以及他们所作序言的刊刻,其份额在整个明代的总体印刷市场中是急剧下降的。

生产成本低和书价便宜的论断,被我们手中掌握的非常有限的从宋代到元、明刻工工资和书籍价格的数据所证实。众所周知这些数据很难准确解读,因为根据劳力和材料的质量和获得的难易程度,生产地点的不同,金属货币可恶的复杂波动性及在这三个朝代长达七个世纪时间里的贬值,同一部书的价格和工作量可以有很大差异。然而,在江南刊刻 100 个字的价格数据显示发生了巨大的下降,从 1250 年左右的平均约 35 文降至 1600 年左右的平均约 3.5 文。^[99]这一书籍生产成本中如此关键的组成部分的下降,与我们已经考虑到的其他生产上的减省结合起来,只能意味着整体生产成本和书籍价格的显著下降。高成本的新旧图书仍在出版,但比这些书便宜得多的版本现在也可以买到,并且数量巨大。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生产和价格上的变化,将对明代最后一个半世纪商业出版的巨大扩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刻工的世界

那么,刊刻成本的下降与其他印刷生产因素对 16 世纪的劳动力状况和劳动力的组织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独立地看,影响可能很小。但是,得益于一些官方记录、印刷品本身的信息,以及雕版和印成品上工作记录方式的显著变化,我们可以试着回答这个关于刻工的困难问题。不幸的是,我们所拥有的史料很少提供关于印刷品生产中其他工匠的信息。

在印本书页的折叠处,序言、章节和题记的末尾,或在插图的角落,隐藏着 3000 名宋元刻工和 6000 余名明代刻工的名字。^[100] 他们的名字仅出现在这几个朝代现存印刷品的一小部分中——例如不到 4% 的明代出版物。^[101] 它们在某些地方的出版物上会比其他地方出现得更多。例如,宋代杭州、湖北和明代苏州的出版物,有此类信息的几率远高于明代的南京、广东、福建和地方藩府。^[102] 它们的数量远多于宋、元、明的其他手工业品,如瓷器、玉器、象牙和漆器上所记录的与生产有关的人名。同样,他们的名字也远比其他书业工人为多。例如,在宋代我们只知道 22 个刷印工匠的名字,装订工更少;在明代我们只知道 5 个刷印匠和 7 个装订工的名字。^[103]

当我们根据这些刻工对各种书籍出版的参与情况来推想他们的职业生涯时,这一信息显示从宋到明刻工的生活在某些方面没有显著的变化。刻工一般集中在书籍生产的中心。因此,到 13 世纪中叶,他们至少在华南 91 个府工作过,但主要是在杭州、闽南的建阳和四川成都。^[104] 在金代和元代,书籍生产中心是山西南部的平阳府,以及传统的位于华东南的杭州和建阳。^[105] 到晚明时,江南,主要是苏州和南京,将与建阳一起主宰市场。到 17 世纪早期,刻工也会到在宋元时只生产了很少的书籍,但最近开始为图书市场提供大量印刷品的地方(如湖南、陕西和广东)。

另一方面,从宋代开始许多刻工就是四处游走的。^[106]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的工具很少而且携带方便。一个地方、一个作坊对刻工的需求可能是不稳定和间歇性的^[107],可能只持续几天时间,也可能断断续续地拖到长达一个世纪。^[108] 并且,许多府缺乏能完成高质量工作的熟练工匠^[109],因此大量比较低级的刊刻任务被当地从事农业和其他职业的人当作第二职业来完成。在宋代和元代,许多四处旅行的刻工似乎是杭州或福建人。^[110] 在明代,许多人仍然来自福建,但也有浙江的,可能主要还是来自江

西^[111]（明代的抄手通常来自苏州，或至少自称来自苏州）。^[112]他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一个明代刻工可以在苏州书坊或晋北五台山寺庙这样相隔遥远、毫不相干的地方工作^[113]（有人怀疑有劳力或寺庙捐客介入其中）。到12世纪晚期，华东南的刻工劳动力市场开始整合，例如1177年杭州的刻工与福州、江西省的本地刻工在一起工作。^[114]到14世纪早期，尤其是16、17世纪^[115]，这一进程进一步发展，因而到16世纪晚期有来自东南5省50个县的多达387个刻工（还有84个抄手和3个插图刻工）在杭州府参与佛藏的印刷工作。^[116]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刻工组织、分工和社会地位方面，16世纪不同于明初的三个标志性变化。首先，到15世纪末，明代工匠家庭从国家的控制中获得了较此前更大的独立性。刻工家庭作为一种工匠家庭，尤其是那些住在像南京、北京和杭州这样有印刷作坊的大城市及其邻近地区的，以前每两年会被强征刊刻政府出版物，时间可长达两个月。例如150名刻工被指派到明初的首都南京，在礼部服两年一次的徭役，同时还有312名装订工和58名刷印匠服一年一次的徭役。^[117]在明朝统治的头一个世纪末，这种政府徭役开始被交纳现金所取代。到1531年，在礼部登记的仅从事出版的工匠数量就翻了一番多，达到将近1300名。其中，有48名制笔匠，62名造纸匠，77名插图工（或画工），77名制墨工，80名切削匠，134名刷印匠，189名折纸匠，293名装订工，以及最大的群体——315名刻工。其中许多工人很有可能并没有全时工作，而是雇佣他人替他们干活。但是很清楚，到1582年，北京的刻工建立了自己的行会，皇帝准予一个刻工行会（刊字行）和其他三十一个行会免税，其中包括北京两个京县的书业工人、抄邸报者、媒人和笔商的行会。^[118]在华南，1739年在苏州首次出现刻工行会的记载。^[119]这些至少部分为了方便成员集体纳税而组成的行会，其确切的管理情形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考虑到16世纪以来商业书

坊日益增长的需求,国家的角色肯定是后退了。

其次,随着政府控制的松弛,刻工似乎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工作群体。作为从事书籍印刷的各种工匠中的一种,刻工们一般以组为单位工作,并且至少从宋代开始每组通常只负责一部书中的一小部分书页。南宋(1127—1279)时,雇佣了多达 134 个刻工来刊刻新儒学大师朱熹 102 卷的集子。据称 17 世纪中期在比较大的印刷作坊——毛晋的汲古阁里,经常有 80 名刻工在工作。^[120]但是,在長沢規矩也和田中子祥看来,始于元代、15 世纪末之后日益显著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刻工工作组:名字刻到书版上的实际上成了一组刻工的头领。作为头领,他不仅要安排自己的工作,也要安排组里其他刻工的工作,不仅包括有经验的刻工,还包括学徒。关于工作组织形式变化的这一论断的证据,很大程度上来自下列情形:即从宋代几乎每张书页上都有刻工的名字,到明代只有几张书页上有,有时仅出现在一卷的最后一页上,单个刻工的名字出现在书版和出版物上的频率不断下降。^[121]既然宋代许多为商业出版者工作的工匠也有他们自己的小徒弟,很难想象这种工作组的形式是后来才有的。但是,实际情况可能是明代商业印刷的增长使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使头领为其他有经验的刻工及其徒弟、家庭成员、亲戚等安排工作成为可能。^[122]

35

各个级别的刻工根据技术、地域和关系的不同而加剧层级化,这方面的证据较上面的推测远为确凿。宋代以后在印刷品生产的整个流程中,刻工在涉及印刷品生产的四种工匠中是获得工资收入最多的一个群体。但是,即使他们的工资份额比其他工匠,比如抄手多九或十倍,一般抄手工作的速度却比刻工要快得多(有人估计一天可抄 2500 字)^[123],一年下来可能比普通刻工多赚很多。而且,抄手识字而很多刻工不识字,这样就使抄手更让人尊重,即便他比刻工年轻。^[124]明代,书籍生产中这种不同工匠之间的差别继续存在。然而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刻工们之间收入和地位

的差别加大了。虽然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差别无疑早在宋代就已经存在(那时这些工人或许拥有同样的工具和工作,来自同一籍贯),但在晚明我们看到一个要大得多的社会跨度,居于行业社会等级顶端的少数刻工,作为文人工匠与其他工匠区别开来。

文人刻工最显著的例子是皖南徽州府歙县的黄氏家族。从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他们中的数百人通过其精巧细致的雕刻技艺为自己和家族赢得了声望和财富。^[125]他们对雕刻工具的巧妙运用起初以地方性的徽派风格著称,最后影响了帝国其他地区的刊刻风格。这一名声不仅使黄家取代另一家族成了当地占统治地位的家族,还在清代的族谱印刷中赢得了特殊的市场份额^[126],并且在南京、杭州和江南其他城市赢得了他们作为刻工、甚至是小出版者的巨大市场。^[127]

36 这些黄姓并未刻意掩饰其作为农民、刻工甚至书商的微贱出身。^[128]他们中的许多男性,像晚明一些极受尊敬的陶工、园艺家和竹器雕刻者一样,更愿意使自己看起来像文人而不是工匠^[129](至少在19世纪,中国南北的刻工普遍崇拜文昌帝君这一士人和科举士子的神)。^[130]诚然,似乎没有哪个黄氏家族的人仿效过工匠朱圭亲自刊刻一部自己的著作。^[131]但是,他们的作品经常作为插图出现在盛极一时的士人戏曲、小说、图谱等书中,赢得了士人圈子的喜爱。那么,许多黄氏家族的人扮演起士人角色就可以理解了,他们像所有有抱负的士人一样,给自己至少起一个字和一个号。其中一些人在当地以书法闻名,自己写样上版刊刻。^[132]还有一些以写作、诗文和医术著称。^[133]一些人精于绘画、肖像艺术、书法和音乐等士人艺术。^[134]还有一些人成为小型出版作坊主。^[135]许多人频繁往来于徽州老家和江南的城市,承接活计,在苏州、南京、尤其是杭州等文化中心城市长期居住。^[136]如果说没有一个黄姓刻工曾获得超过生员层次的功名,他们的一些亲戚的确取得过官位,一个叫黄铨的人甚至成了兵部衙门的赞画官和礼部儒

士。^[137] 这里仅举一例,黄应澄(1565—1640)修订了自家的家谱,善于作文,曾为一部家谱作序,至少为一部知名著作刊刻过插图。^[138]

像黄氏这样成功的文人刻工所取得的报酬,与普通刻工到底有多大差异呢?目前还无法回答。但是,很显然他们的名声和较高的收入来自于出众的技艺,他们当中有超过 30 人成为插图(徽刻)刊刻家。^[139]撇开宋代一些优秀的版画作品(常常出现在佛教文献中),我相信,这个专门的术语和类别最早在晚明被赋予雕版插图刻工,作为对他们独特技艺的承认。^[140]

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更具典型性的底层,人们看到的是工作条件差、收入低的工匠。他们为人打短工,可能短到只有一天,每天要刻 100 到 150 个字。他们按天或每百字计酬,无论怎么算,他们的收入都很低,在 16 世纪的几个案例中每百字从 2.5 到 3.5 分铜钱不等。^[141] 一个刻工一整天的工作,比如刻 150 个字,可以挣到 3.8 到 5.2 分,此外还提供一张硬板床和两顿粗陋的饭食。如果他的工作被认为不够熟练,或达不到水准,那么,根据两份晚明的雇工合同(均印制于江南),他会丢掉一部分本来就微薄的收入。^[142] 虽然根据 19 世纪早期的材料,刻工的工资占到了所有购买、刊刻和刷印书版的生产成本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143],但当时以及此前的刻工几乎无法糊口(在晚明,一个和尚一天的微薄饭银为 1 分)。^[144] 因此,这些流动工人极少有储蓄,至少有一小部分没有自己的家庭(一部书籍的刻工通常姓氏相同,很可能他们是亲戚,但在我们所知的 6000 名明代刻工中极少发现父子)。要结婚时,许多刻工、尤其是流动刻工,多半请不起中国小说中为读者所熟知的媒人。

我们现有关于这些刻工生活和境况的最深入的材料,是苏州士大夫唐顺之(1507—1560)所写的一篇简短、但相当生动的传记,传主是一个名叫胡贸的书佣。^[145] 幸运的是,这个名字并不仅

仅是表面的两个字这么简单,唐对胡工作的欣赏打开了一扇窗户,通向前此从未被记载过的从事书籍生产的工匠的经历。在本案例中主要涉及装订阶段,地点可能是在苏州——以最好的装订而闻名的城市。^[146]胡贸出生于浙江西部的龙游县,他无钱继续从事其父兄贩卖旧书的生意。但他校订和装订书籍的技术,尤其是将大量印出来的书页排列顺序并用一把锋利的锥子在书页上钻眼的本事,令当时许多书业人士吃惊,其重要原因是他的工作速度和质量并不因他无法领会文字的意义而受到影响。开始,他的天赋为他在书店和文人学者家里赢得了许多工作,二者都经常刊印书籍。然而,他一生唯一的嗜好是酒精:“佣书所得钱无少多,皆尽于酒。所佣书家,不问佣钱,必问酒能厌否。贸无妻与子,佣书数十年,居身无一垆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复知也。”^[147]后来,他在许多学者家中谋生,但他装书的技术渐渐失去用处。最后唐因为怕胡无力准备自己的后事,为他买了一口上好的杉木棺材,并作了一篇短文夸赞他的技艺。胡贸和其他明代的雕版印刷工人在他们清醒的时候,对其工作条件的反应是不难想象的。但是,除了可能存在宗教信仰和互助之外,没有明代的材料记载他们有任何联合行动。显然他们没有采取过集体行动要求增加工资,这样的活动曾分别于1755年被苏州的造纸工人、1845年被印刷工人尝试过,但都归于徒劳。^[148]

这幅“原始工业无产阶级”(proto-industrial proletarian)的图景,显示了雕版刻工与他们所刻书籍的士人作者之间巨大的社会鸿沟。实际情况通常一定是这样,唐顺之的同情与其说是常态,不如说是例外。但是,晚明工匠与士人之间的界线不仅被黄氏那样的工匠,也被文彭(1498—1573)这样的江南士人所模糊。这个画家是16世纪苏州最著名的士人文徵明之子,他拿起凿子和雕刀来治印刻章,成了一名成功的篆刻家,却并没有对他作为士大夫的名声造成什么损伤。^[149]即使在雕版印刷领域,我们也可以注意到一

些这种相互渗透的迹象。16 世纪下半叶,南京国子监的一些学生刊刻了后来印成监版三种史书的书版(无论是宋代还是清代的监生都没有参与过这类劳动)。^[150]在毛晋的印刷作坊汲古阁的商业印刷世界里,被雇来生产“匠体字”书籍的 200 个工人与士人们一起工作,这些士人也成了他们雇主的朋友。^[151]

但是,这些跨界干手艺活的士人,即便是那些刻章售卖的士人画家,相对来说也还是很少的。^[152]我们知道 18 世纪下半叶一个叫穆进文的人籍苏州的南京人,放弃了生员头衔和做官的希望,自己开店谋生。为了生意他亲自刊刻书版印刷出售,刻过古代书法和碑铭方面的书。士人转而从事工匠工作的类似事例很少被记载下来(比如他的儿子承袭了父业,但没有资料表明他取得过任何科举上的成功)^[153],可能比我们从史料中看到的更为普遍。但是,刊刻普通印刷品的书版,不同于应人之请治印刻章,是个缺乏个性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地位。而且这种工作常常是集体性的,迫使士人与工匠一起参与印刷生产其他环节的工作。由于其性质,对许多有身份意识的士人、即使连生员都不是的人来说,这种工作完全是徒劳无益的。

然而,雕版生产的未来取决于工匠。18 世纪,它的简单、便携、低生产成本和对技术的低要求,使许多贫困家庭有希望通过技术上的成功来获得潜在的社会地位。中国的许多地方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印制便宜的单张版画,满足一个远为广大的市场对流行主题的更平民化表达的需求。^[154]像黄氏家族那样的士人化刻工的世界,让位于胡贺等普通刻工的世界。^[155]一方面在江南的大城市,出现了文人书的读者与其生产工匠之间的更大鸿沟——一个钱近仁试图弥合的鸿沟,另一方面这个廉价而又丰富的出版物世界也给予钱大致同时代的米怜留下了深刻印象,促使他写下关于这些书籍生产过程的生动报告。

附录 1.1

一部 16 世纪晚期印制于江南的佛教典籍,提供了不同出版阶段预算的详细情况。注意其中没有包括纸张、刷印和装订的成本,可能是因为没有想用这些书版刷印成书的人要自己负担这些费用和劳力。然而,这份预算中刻工工资的突出地位(约占四分之三),加上我们已知当时纸张和装订的较低成本,显示刻工工资在这个雕版印刷项目中是主要的成本开支。在井上《中国出版文化史》第 223 至 224 页,可以看到由刻本翻刻的该书的一幅图片和下面这段文字:

- 每字一百,计写工银四厘,刻工银三分五厘。
- 每板一块,自地头置买至搬运上山,共银三分四厘,又作平工银二厘,出边工银二厘。
- 每板一块,两面俱二十行,行二十字,共计八百字,成经二叶。[当一块板刻满八百字时,刻工将得到二钱八分银子]。
- 每板一块,两面刻成满行,通计费银三钱六分。(原文作“三钱四分”。据井上书改。——译注)

附录 1.2

沃尔特·亨利·麦都思《中国的现状与将来》(*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第 569—571 页:

1. 用雕版印刷,在马六甲:

九名工人往返中国

两千块木板,每百块 1 磅

工具、刻刀等

镑	先令	便士
72	0	0
20	0	0
10	0	0

誊写 2689 页,每页 9 便士	100	16	9
刻 1160548 字,每百字 1 先令 3 便士	725	6	10
刷印和装订 5378000 页,每千页 1 先令 8 便士	448	3	4
两百一十担纸,每担 2 英镑 10 先令	525	0	0
[合计]	1901	6	11

上述主要是在马六甲、巴达维亚和新加坡所做工作的费用。⁴¹对欧洲人来说,中国的价格是以上价格的约三分之二,但由于我们无法在广东安全地从事印刷,我们不得不在殖民地进行这项工作的估算。由九名刻字工、五个刷印和装订工完成上述工作所需的时间,大约为三年左右。

2. 用平版印刷,在巴达维亚:	镑	先令	便士
两台石印机	100		
原材料、维修等	100		
誊写 2689 页,两次,每页 9 便士	201	13	6
印 5378000 页,每千页 1 先令	268	18	0
装订,每千页 3 便士	67	4	6
纸张,与第一个方案相同	525	0	0
[合计]	1262	16	0

上述是巴达维亚的平版印刷费用,那里的劳力便宜。与每页纸都用手工刷印的中国模式相比,用印刷机印折叠和校订费用较低。由一个誊写工、四个印刷工和一个装订工完成这项工作,需两年时间。

3. 用凸版印刷	镑	先令	便士
3000 个冲压字模,由戴尔(Dyer)先生提供	425	0	0
制作字模所需一千磅金属,每磅 2 先令	100	0	0
一台铁制印刷机、箱子、设备等	100	0	0
排字 2689 页,每页 2 先令	268	18	0
印刷 5378000 页,每千页 6 便士	134	9	0

装订,每千页 3 便士	67	4	6
168 担纸,每担 2 英镑 10 先令	420		
[合计]	1511	11	

42 戴尔先生的活字比八开本《圣经》所用的活字略小,可节省些纸。但是,如果用法国人的活字,不仅初始费用会减少,而且还会省下一半的纸钱。刻字模所需时间无法精确计算,但假定活字已准备好,印两千部中文版《圣经》需要四个排字工、两个压印工和一个装订工一年的时间。

如此整个成本算下来,财务状况似乎开始以平版印刷为优,但最终是凸版印刷胜出。此外后者印刷速度更快,效果更好。在最初的两千部印出来后,如果再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印,留在我们手里的是一副只能用来印经文的书版,而且已经磨损得很厉害,只能再印五版,费用还达到初始成本的一半。如果用平版印刷机来进行这项工作,印完后我们只剩下印刷机和石板,其损耗还要厉害得多。但如果用金属活字,工作完成后我们还拥有一套冲子和字模,可以用来铸造数百万个活字,足够全世界用的。除了一台铁制印刷机、一整套活字,还可以用比雕版印一版书还低的费用再印五十版的书。



第二章 印本在中国的崛起

晚到 8 世纪早期发明雕版印刷术后,印本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个固定成员。我们常常在文献中看到,宋代科举制度的盛行如此地刺激对书籍的需求,以至于到 11 和 12 世纪,印本已在多数读者和书店的书架上将手抄本驱逐出去。虽然这一解释对科举考试所用书籍是适用的,但那些没有包括在狭窄的考试科目之外的大量书籍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印本什么时候、怎样取代手抄本成为那些书籍,进而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随着印本的崛起和最终胜利,在书籍生产、发行和消费方面又带来了哪些变化?

43

为了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并探究我们的发现所包含的意蕴,我们不妨用量化的方式来表述这些问题:印本的数量在什么时候、怎样超过了手抄本的数量?或更具体地说,一部特定的书籍在什么时候、怎样作为印本比手抄本更常见?提出这些问题远比回答它们容易。对于大多数中国书籍而言,我们缺乏明确的手段来区分哪些是印刷的,哪些是手写或手抄的。我们所掌握的关于书籍最丰富的信息源——序言(常常与原书分开单独留存下来),很少说明我们想搞清楚的那本书是否是印刷的。但即使我们手头有一份从晚唐到 19 世纪所有印刷书籍的清单——现在已不可能列出,我们仍然无法知道这些书到底印了多少部。在 13 个世纪的中国古代印刷史中,我们明确知道印数的雕版印刷书籍不到所有印刷书籍的 0.1%。如果硬要推测的话,我们在前一章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仅仅告诉我们需要慎之又慎。对于用雕版可以刷印的书叶的最大数量,各种有事实根据的估算差异很大,从 6000 ~ 40000

44

不等,但实际的印数范围可能在 0 ~ 30000 之间,我认为这通常是一付雕版可以清晰刷印的最大数量。显然,这些混乱的数字无法给我们的问题一个轻易的解答。

第二种量化方法聚焦于现存的手抄本和印本,对我们的帮助更大些。这些书籍的存在,构成了无法否认的证据,证明这些书曾经存在过,有些还被印过。那么理论上,我们可以把这些现存印本的数量和现存写本的数量加以比较,以得到它们相对数量和相对重要性的大体概念。关于这类数据,我们可以利用最近的一项全面调查统计,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 56787 种中国古籍,除了少数例外,这些书都产生于 1796 年前,目前收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781 所图书馆中。根据这项研究,这些书中的 30% 为抄本,9% 为稿本,12% 为校本(见附录 2.1)。因此该书编纂者得出结论,在所有 56787 部书中手写本 (manuscripts) 占了大多数 (51%),其在所有古代中国书写和印刷书籍中的比例可能也是如此。这个观点当然是有道理的,并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会得到其他大量材料的证实。事实上,编纂者们还声称该目录略去了大量省级图书馆所收藏的手写本,这更加证实了这一观点。但是,用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加以检验,得出直至 18 世纪末手写本一直占有压倒优势这样的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一观点所依据的数据来自 1980 年代对中国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的调查,而晚近对这些图书馆的又一次调查发现,它们的馆藏中至少还有 15% 没有被揭示出来。⁽¹⁾这个结论还可能有所夸大,因为 1980 年代调查中的批校本中间,实际上有一部分是手写本的批校本,而不是印本的批校本,此外在 1980 年代的调查中,这些数据的汇编者没有说明对于同一书籍和版本,手抄本和印本的相对数量。

然而,这一原创性调查的数据清楚地显示,手写本、尤其是抄本,直至中国雕版印刷发明 1300 年、活字印刷发明 1000 年后,仍然在现存 1796 年前产生的书籍中占有惊人的高比例。那么,提出

一个类似的、如果不是更肯定的论断,即在早得多的那些年代,比如宋代,手写本或抄本占据压倒优势,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我们将要在这里展示的非量化证据也指向这一点,尤其是如果考虑到1500年后许多书籍的重印会导致在同一种书籍的流通中手写本总体优势遭到削弱的话。但必须指出的是,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研究太少了,哪怕只是对这些数字作出大致的估算,比如对所有古籍或单种古籍中手写本对于印本比例变化的估算也很少。我们不仅对今天中国的图书馆中现存的,以手写本或印本形式存在的1500年以前书籍的特性和历史的认识少得可怜,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1500年前的中国藏书中那些曾经存在的书籍知道得更少。

有几位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来探讨某些类型的、与行业技艺有关的专门知识的书籍中手写本所占的优势。最近两个中国学者用这个简单的方法得出结论,认为在现存1912年前的约12000部中医古籍中,大多数是手抄本。^[2]换句话说,在中医领域,传统的印本很可能从未取代更传统的手抄本,或只在尚未确知的某种方式上取代过。另一名学者,聚焦于雕版印刷发明一千年之后戏剧的写作,发现17世纪活跃于苏州府的16位剧作家现存的约80部剧本中,手抄本占了大部分。^[3]

幸运的是,我们通过更全面地对中国印本作历史分期的考察,显示了传统的四部书在各个时期的不同生产水平。通过绘制从南宋到明中期,即1131至1521年现存印本的出版时间表,并上进给了我们在这四个世纪里不同时期印本生产水平的大致概念。^[4]总体来看,他的两组数据——第一组以(北京)国家图书馆和位于台北的“国家图书馆”所藏印本为基础,第二组以一份最近出版的中国大陆许多图书馆的馆藏善本书目为基础——显示从南宋到元代现存印本数量的明显增加,明代的头一个世纪经历了起初的跌落并继续下滑,然后从15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到16世纪的头25年缓

慢上升并迅速上扬。经、史、子、集四部书的长时段出版记录相差巨大(见附录 2.2、2.3 和 2.4)。经部书的数量在元代达到高峰(主要归因于对流行的科举考试用书的兴趣),仅在 16 世纪早期再次达到同样的高度。史部书数量逐渐增长,直至明初,在 15 世纪早期回落,但在该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超越了早前的巅峰。子部书从宋到元都在增长,在明朝统治的前半个世纪遭遇严重萎缩,在 1430 年前后迅速上升,但只是在约一个世纪之后才永久性地超越这一水平。即使是集部书——在这段时期里基本上是学者和官员的文集,也在 15 世纪早期遭遇了下降,而不是在这四个世纪中稳步上升。简言之,经、史、子部书的印本只是在 15 世纪的后半段才显著增加,而集部书在 1500 年以后才这样。如此,与惯常的学术思维相反,井上认为只是在 16 世纪中期,而不是 11 世纪晚期或 12 世纪,印本才在江南地区永久性地取代了写本,成为传播书写文化的主要方式。

在井上工作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还可以加上勝山稔最近对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中关于明代出版的详尽数据的统计分析。杜的目录出版于 1983 年,从 44 种关于整个明代(井上的统计调查止于 1521 年)的馆藏书目中罗列了 5200 种明代印本及其出版日期和出版者。杜的数据,虽有许多缺略,仍可视为对明代出版信息的最详尽的汇编,因而勝山得以提出明代出版活动发展的三个阶段。在明朝统治的头一个世纪,除了最后一个十年——1458 至 1468 年外,所有其他的十年时间段里平均每年只生产不到十部书。到了下一个世纪,这个平均数翻了三番多,增长主要发生在 1508 至 1528 年间。第三个时期从 1561 年开始,到 16 世纪末每十年出版的书籍数量飙升至多达 53 部,直到 1644 年王朝终结才滑落至 16 世纪早期的生产水平。^[5]

在本章接下来的部分,我希望证明井上和勝山统计结论的正确性与重要性,但事先要强调这些数据与实际发展大势之间的惊

人吻合。井上的数字省略了现存 1131 至 1521 年间生产的大量印本(它们出人意料地漏掉了日本几个中国善本的收藏单位静嘉堂文库、尊经阁文库、内阁文库的收藏),而且勝山对整个明代更广泛的调查所援引的一部著作,所依据的是非常不完整、如今已过时的主要位于北京和江南几个城市的藏书目录。两位学者的数据也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那些数量远为巨大的佚失印本的信息,当然他们也没有揭示宋初与晚明之间任何一部印本的印数和发行数量方面的信息。

这最后的空白对于评估雕版印刷的成功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可以说根据这种技术的经济特性,它更倾向于重印旧书而不是出版新书。通常来讲雕版不仅比活字印刷产量高许多倍,而且不同于西方印刷术中所使用的活字框架,它可以在初印后保存起来,以备将来刷印之需。换言之,在一个世纪刊刻的雕版可以在后来的世纪里继续生产书籍。同样,雕版印出来的书页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版样,供刻工用另一付板子翻刻同一部书,这样做可以节省重印旧书的成本,与开印一部新书不同。这样,总的来看,使用雕版印本的种数来说明书的产量,容易低估这些世纪里的生产水平和读者人数。

并且,这些雕版书的数据本身并不能证明印本的相对成功,因为并不存在对应的曲线显示同期写本书生产和使用的下降。宋代是印本书得到广泛应用的第一个时期,当时很多学者的确并不认为印本是个好东西。^[6]如果我们可以根据那些现存的、在宋代最多只刊刻过一次的宋人著作的数量来判断的话,他们自己的许多著作似乎从未刊印过。事实上,未曾印刷的宋代著作很可能比宋代印刷的宋代及前代著作要多。这样,虽然今天编制一份完整的宋代产生的宋及宋以前著作的手抄本清单已不可能,当时产生的这两种手抄本的巨大数量,使我们在仅仅依赖宋代印本数据来确定印本和手抄本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发生转变的时间时,要持慎重态

度。对于元代和明代印本和手抄本生产的评估,同样的保留态度也是必要的,如果说可以稍稍大胆一点的话。

最后,这种仅仅关注印本的做法,尽管很诱人,但只是在助长一种错误的认识,即印本的流行必然导致手抄本生产的相应下降直至最终消失。正如任何一个图书馆的善本书目所显示的,那绝不是实情。到20世纪晚期,中国的手抄本书籍仍然在产生,而不仅是在12或15世纪。手抄本,无论我们把它们衰落和消亡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直到现在仍是其他抄本或印本的鲜活母本,正如我在这一章的结语中所要强调的,甚至直至今天它们还在继续塑造着中国印本书的内容。任何给印本的崛起和最终征服确定时间并作出解释的努力,都必须在任何一组上升的印本统计数字显示手抄本作为一种书籍形式衰落之后,把手写本和印本看作中国书籍生产中持续并存的伴侣。

如果这两种完全量化的方法很难独立地达到我们的目的或某种期待的目标,那么历史学家就不能完全依赖数字来进行工作,最重要的是要利用非量化的资料。这里,与通常的情况一样,证据很少是令人满意的,虽然井上、张秀民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会证明这些证据对我们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48 宋代现存关于书籍印刷和消费增长的少数几个论断,如果不是出于赞美皇帝统治的政治动机,揭示了印刷术的缓慢起步,只集中在有限范围的书籍和整个国家的几个地区。即便是佛教机构,尽管他们在唐代很早就使用了印刷术,至少到11世纪早期对这一技术只进行了极其有限的应用。在斯坦因收藏的8000余件敦煌文书(据称年代均为1020年前)中,只有20件是印刷品;伯希和收藏的1000件敦煌文书目录中只包括两件印刷品。并不奇怪,杰出的荷兰中国佛教史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得出结论说:“即使在至少250年后,印刷术在佛教文献生产和传播中的地位都是极其边缘化的。”^[7]

据记载从中唐到宋代早期的动荡年代里有大量古书散佚^[8]，所以宋代初期政府紧迫地感到需要将那些存世稀少的文献印刷出来。^[9]像《太平御览》这样的出版工程对于许多文献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否则据说在11世纪末，这部类书中四分之三的著作就会佚失，因为宋代初年能看到的书只有极少数有书版留存下来。^[10]在整个11世纪，政府陆续刊印医书、儒家经典、佛典和方志，使这些著作广为流传，正如政府刊行的皇帝诏令、历书、契单、税单和科举录传播了大量的政府行政信息。这样，尽管文献继续散佚——据估计编纂于1040年的四个主要皇室宫廷藏书目录中的书籍到1110年时已有三分之一不存^[11]——12世纪末，无论是新旧典籍的印刷都出现了繁荣：闽北成为廉价畅销书的印刷中心；杭州则是高质量书籍的印刷中心；四川成都可能是印刷业最繁盛的城市。^[12]据称到约1200年时，在这三个地方，这些书籍（除医书外）的印本很大程度上在人们的阅读和收藏中取代了手抄本。^[13]

但是在宋帝国的其他地方，即使是在作为文化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这种转变也是极不明显的。像胡应麟和徐燊这样16、17世纪知识渊博的藏书家，提出大量印本的出现不是在宋元，而是在明代后半期。^[14]一些现代学者，如潘铭燊、苏珊·彻尼亚克（Susan Cherniack）和戴仁（Jean-Pierre Drège）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详细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假说。^[15]

为了验证他们的观点以及井上的研究成果，可以将在中国印本何时取代手写本这一个问题变为更好回答、更具体的四个问题：政府和私人藏书的规模有多大；这些藏书中印本的份额；获得某些书籍的难易程度；手抄本和印本生产的相对成本。当我们在最了解的社会阶层和地区——江南地区的文人——中考察这四个问题时，我们的分析将不幸被局限于在这八个世纪中据称拥有中国最多文化和经济资源的地区受过最好教育的人群。但这些局限将有助于我们避免作出缺乏根据的概括性结论，这是太多关于中国印

刷的著作的通病。这些局限也将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即对于文人读者来说,到13世纪早期,印本作为书籍的形式,只在中国几个地区取得了对手抄本的优势,这种优势(除了某些书籍,如儒家经典)只是到了16世纪才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即江南地区实现,此时雕版印刷的发明已有八个世纪。即使到那时,仍可以看到手抄本在后来的世纪中继续塑造着中国印本书的形式和内容。

藏书规模

现存关于宋代书籍生产相对规模的最好线索,可能是宋代各个收藏、尤其是大型收藏中卷——中国藏书家喜欢用的计量单位——的数量。在宋代和16世纪以前的明代,除了可能的少数例外^[16],最大的藏书通常是皇家藏书^[17]。但是,如果我们假定“卷”——对宋代以前的文献通常译作“卷轴”(scroll)——相当于宋代及以后书籍的“一章”,那么在任何时期没有哪一宗宋代的藏书,超过隋唐,甚至更早的梁代(502—557)皇家藏书在它们各自高峰时期的藏书数量。^[18]战争、人为失误和自然灾害是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8世纪中期和9世纪晚期长安的浩劫,其后五代华北的动乱,导致唐代皇家藏书中许多文献的丢失。^[19]宋初,新建立的皇室藏书仅有书13000卷。^[20]随后宋朝获取了敌对政权的藏书,并通过其他途径使藏书急剧增长。但1015年的一场大火和糟糕的管理,使得到1041年藏书只有30669卷,后来11世纪有大约45000卷。^[21]该藏书1127年随着华北的陷落而落入女真人之手,迁都的宋廷建立了新的藏书,到1178和1220年分别有书44486卷和59429卷。我们所掌握的整个宋代皇家藏书的最高估算数字是大约1177年的72567卷。^[22]加起来,在安禄山叛乱破坏大唐皇家藏书的五个半世纪后,宋代的皇家藏书数量仍少于唐代

集贤殿 731 年的大约 89000 卷藏书。宋代印刷术的推广应用——再次假定卷的含义从“卷轴”到“章”的转变没有减低比较这些数字的有效性——看起来并没有确保宋代的皇家藏书比只藏有手抄本或手抄本占压倒优势的前代藏书有更大的数量。

明初的皇家藏书继承了可观的宋、金、元三代皇宫和朝廷藏书，它们奉朝廷之命从北京迁到南京。^[23]第一个和第三个皇帝几次下令访求书籍，购买了大量典籍，所以到 1420 年，皇家藏书已有书 20000 种 100000 册。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看到的，这一可观的收藏在质和量方面都急剧恶化，最后到王朝终结时只剩下从前的一个影子而已。^[24]

对于私人藏书家来说，故事更为复杂。总体来看，宋代私人藏书家的数量和藏书的平均规模都在增长，但仅仅从 16 世纪开始我们才发现一大批藏书家拥有超过 20000 卷的可观收藏。尽管在 5 世纪，一个家族可以通过阅读或保管仅仅几百卷书而获得学术名声^[25]，但在 12 世纪中期，“一个有点声望的官员家里总有几千卷藏书”^[26]。但是，大型私人藏书的收藏量上升了，在 8 到 16 世纪早期之间不再发生那么剧烈的变化。在唐代，一个藏书家有 20000 或 30000 卷书就可以出名。^[27]就像我们最近在范凤书对宋代 214 个最大的私人藏书家所作的详尽调查中所见，藏有 10000 卷以上的宋代藏书家的数量比前代要多得多（有趣的是，位于现今江西省的藏书家比起江南地区略多）。^[28]但是，在这 192 个可以进一步作粗略统计的藏书家中，超过三分之二（130 个）藏书量为 20000 卷或以下；其中十分之一弱（17 个）可以确定有 20000 卷以上；其余据记载有“几万卷”，即实际上在 10000 卷与 40000 卷之间。即使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1086）的藏书，据他自己的统计，在 1073 年“仅逾 5000 卷”。^[29]可能除了地理位置优越的两个开封藏书家外^[30]，其目录曾为叶梦得（1077—1148）所检视的北宋五位著名私人藏书家所藏不超过约 40000 卷。^[31]这些大的藏

书家没有一个出自江南,在那里仅仅“几千卷”或“上万卷”收藏就可以为一些苏州人赢得藏书家的名声。^[32]11世纪江南的最大一宗藏书,朱长文(1041—约1100)的收藏不过20000卷,12世纪早期叶梦得自己的收藏有约30000卷(1147年一场大伙烧掉了近一半),12世纪后半叶最大的藏书家无锡尤袤(1127—1194)的藏书也是30000卷。^[33]到13世纪,江南的藏书量已从女真人入侵者1129和1130年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但是,按照16世纪的书籍专家胡应麟的说法,所有宋代的藏书都不超过约40000卷。^[34]13世纪主要的例外是杭州陈振孙(1183—1261)的收藏:其书目中的49700(或51180余)卷显然使之成为南宋最大的私人藏书。^[35]但是,到王朝末期,当一名副宰相要为仅“几千卷藏书”^[36]修建一幢特别的房子时,它所指向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的趋势。

然而,未来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会变得清晰起来。依胡应麟看来,“元时板本尚希”,现在所知元代最大的收藏约300000卷,因包含了不少复本而被明显夸大了,其真实的藏书仅有30000卷。^[37]13和14世纪江南最大的藏书家,上海地区的庄肃(1245—1315),有藏书80000卷,足以质疑胡对元代大宗藏书的草率忽略;同样真确的是14世纪早期扬州陈季模大部分来自继承的50000余卷藏书,及杨维桢(1296—1370)和杭州一个“蓝门外处士”的“几万卷”藏书。^[38]这些足以说明这些藏书的规模对于这两个世纪来说是很不寻常的。江南更典型的是足以引人注目的10000卷到20000卷藏书——即使是富裕的文人画家常州人倪瓒(1301—1374)也只有几千卷,大部分是抄本。^[39]从长时段来看,元代藏书的突出特征不在于藏书的内容和规模,而在于严肃的藏书活动向社会低级阶层延伸的迹象:至少有两宗元代藏书的主人来自十分卑贱的社会背景,一个出身于屠夫之家,另一个来自布商家庭。^[40]

明初私人藏书整体规模的下降,从当时两个最大的藏书家族藏书规模的缩小可以看出。扬州葛氏家族和山东济南府李氏家族

的藏书加在一起略少于 42750 卷。^[41] 15 世纪后半叶,江南最大的私人藏书家叶盛(1435—1494)只有 22300 卷藏书,比 1250 年前后陈振孙藏书高峰时的一半还少。^[42] 明初撤销了宋元时出版前的审查程序和机构,取消了所有的印刷税^[43],因而大型私家藏书数量的这一下滑令人感到奇怪。但是,14 世纪中期长江中下游战火的蹂躏破坏了许多藏书。而且明朝的开国皇帝从骨子里不信任江南的士大夫精英,采取了对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极具摧毁性的财政政策。木材(因而纸张)价格昂贵。而且,杭州在宋代灭亡后降为一个省会,再也没有恢复其作为优质书籍生产和消费中心的首要地位。所有这些因素在明朝统治的头一个世纪延续着,有助于解释江南印刷产量的持续下降。^[44]

图书收藏发生重要转变的迹象到 16 世纪才出现,小的藏书家一般据说有 10000 到 20000 卷藏书,像何良俊、金瑄、范钦、王世贞和胡应麟只是在藏书比这个数字多两到三倍后才出名。^[45] 明代私人藏书的巅峰数字属于 17 世纪早期的绍兴藏书家祁承燾(1565—1628)。1597 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他所继承的约 10000 卷藏书,但到 1613 年,他又入藏了两到三倍于这个数字的书。到 1620 年,他的藏书有 9000 余种,超过 100000 卷。^[46] 还有两个迅速累积藏书的类似例子,一是有个新科进士在 1567 年和 1574 年间获得了 3000 多部书,二是一名南京国子监监生在 1631 至 1634 年的三年间成功地建立起一大宗藏书。^[47] 这些私人藏书家的崛起在 16 世纪末已经被认识到了,当时作为明代皇家藏书楼的文渊阁的藏书,被认为“还不到一个学者藏书的一半”。^[48]

那么在 16 和 17 世纪出版业大繁荣之前,一个拥有 10000 卷左右藏书的比较好的大型私人藏书楼都收藏哪些书呢? 其中大部分是 9000 卷官方学术的标准著作:《十三经注疏》、《史记》和 1100 年以前撰著的十八史,总共有 2750 卷;然后是 3000 卷左右的北宋早期丛书;另外 3000 卷左右南宋印刷的十余种丛书。这些文献,

在一个明代藏书家看来,可能构成了从宋代最后一个世纪到明代多数大的私人藏书家的核心收藏。^[49]只是到16世纪,范围才显著扩大。

印本的份额

54 这些藏书中印本的份额很难测定,但几乎没有材料表明,1500年前印本的比例像许多现代学者所认为的那样高。11世纪中叶,开封的朝廷官员王钦臣和宋敏求经常抄写他们所得到的手抄本和印本,这样他们的收藏中手抄本肯定占有高百分比。^[50]过了一代人,苏颂很大程度上是在手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收藏^[51],1135年叶梦得称他自己的约20000卷藏书“往往多余手自抄”。^[52]12世纪后半叶,常州府无锡县藏书家尤袤,建立了在他那一代人中被认为是最好的收藏,根据现代学者的计算有超过十分之九是手抄本。^[53]1177年,宋代的皇家藏书,包括主要藏书机构和皇家档案馆,有59.5%的抄本、32%的稿本,及仅占8.5%的印本(一次原因不详的事故使手抄本份额变为卷数的91%和册数的92%)。^[54]明代,北京文渊阁的藏书包括70%的手抄本和30%的印本。^[55]在江南,苏州藏书家沈方(1394—?)有几千卷藏书,“皆手自点校,以训子孙”。^[56]稍后在1483年的江南,宦官王敬索要星相和占卜方面的书是手抄的——亦即不是在苏州和杭州购买和印刷的,这一事实反映了同样的情形。^[57]16世纪中叶,印本的总量增长了,但还不足以改变它们在重要的私人藏书中的比例。例如,11世纪两个宁波的私人藏书家,印本与手抄本各占一半^[58],1561年前后著名的宁波天一阁仍是如此(虽然其创建者范钦声称80%的收藏是印本,只有20%是手抄本)。^[59]然而稍后,变化是明显的:16世纪晚期,胡应麟的藏书有70%是印本,30%是手抄本^[60];绍兴府

钮石溪藏书(可能仅指其善本)的一份手抄目录著录了其不到15%的藏书,只有8%的卷数是手抄本。^[61]

获取书籍的难易

55

书籍获取难易程度的关键性变化同样从16世纪开始。在那之前,无论贫富都在经常慨叹难以找到书籍。女真对江南的入侵破坏了许多北宋的藏书,以致很难找到“汉唐诸史”。^[62] 面临这样的短缺,中国其他地区的读者到四川(蜀)北部采购大量书籍。1070年代,一个官员从那里带回了如此多的书,以至于皇帝要求查看他的藏书目录。^[63] 12世纪中晚期的江南读者,如诗人陆游(1125—1210),走了1000多英里到那里去找在江南找不到的书,陆回来的时候船上除了书什么都没有。^[64] 虽然1165年前后一个四川北部的藏书家在杭州用薪水采购他在本省买不到的书^[65],1179年宋孝宗(1163—1189在位)却命令官员们在四川的官署和学校里搜寻书籍。他相信这些机构及其所藏北宋政府出版物躲过了1120和1130年代破坏性的叛乱和入侵,这些叛乱和入侵在中国其他大部分地方毁掉了如此之多的重要典籍。^[66] 并不奇怪,楼昉——宁波一个世家子弟承认,在他1193年中进士之前,“两汉犹为近古,愚未冠时,无书可观,虽二史亦从人借”。^[67]

无可否认,到12世纪末,印本在大宋帝国已更容易获得。北宋时印书的地方只有三十几处,在领土面积小得多的南宋则有二百多处(分散于总共17个路中16个路的至少91个府中)。^[68] 这6倍的增长不仅带来了更多的书籍,也使更多的地方有了自己的刻工,地区间有了更多的刻工交流,书目中的款目带有更详细的著录信息。^[69] 虽然12世纪中期的目录最多只在儒家经典和正史中把印本和手抄本区分开来,而一部13世纪中期的书目也给集部和子

部书作了这样的区分,甚至费心地说明其中一些印本的出版地点。^[70]1202年,杭州的藏书家周必大(1126—1204)注意到新近印刷了以前很难找到的许多唐代作家,如韩愈(768—824)和李翱(774—836)的文集。^[71]由私人书铺,尤其是专卖学生初级读物的书铺印刷的经典著作和其他畅销书,很可能在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及杭州使这些印本的数量超过了手抄本。

但是,某些种类,如方志和药典,比以前的印数要少,至少是在官府刻书方面。^[72]并且,在像杭州和宁波这样富裕的中心城市,书籍和印本的短缺甚至令未来的杭州知府和副宰相这样的高官发愁。当袁韶1187年中进士时,因为太穷,仍买不起书。“书多手抄强记……后官中都,凡二十有五年。乃务置书,以偿宿昔所志。其世所未有,则从中秘书及故家传录以归,于是书始备矣。”^[73]然而,即使在宁波这样非常靠近首都的地方也有持续的书籍短缺,这可以从13世纪中期一个朱熹哲学的信徒黄震(1213—1280)的记述中看到,他说自己并未受益于人们想象中儒家经典的印本随处可得的情况。他的朱熹《四书集注》仍然是抄写潦草的抄本,因为他无法从所在府署所藏的官府书版上得到一部印本。^[74]正如我们所能想到的,据记载在江西铅山县这样更闭塞的内陆地区同样存在书籍短缺。^[75]

在元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南宋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井上关于元代皇家藏书的数据,及来自其他史料的分散证据,表明江南的书籍产量在这段时间里有所增长。可以理解,北京的官员仍然把东南看作帝国内搜寻贵重书籍的最佳场所,甚至在1340年代派官员到那里去搜寻书籍。^[76]杭州仍然是重要的出版和发行中心,但可能比南宋时的巅峰状态有所萎缩——南宋时杭州作为首都,吸引了整个华南的大批学生、学者和官员,并且在13世纪早期可以看到印本在某些领域开始主导此地的书文化。然而,必须注意到这种印本超越手抄本的“进步”在宋代和元代的整个江南地

区并不普遍,印本的崛起似乎只是被局限在这个例外的首都里。

即便如此,在元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江南在书籍印刷及整体经济上并没有发生严重的倒退。从12世纪末开始江南发生了经济停滞,13世纪的经济恢复是间歇性和不稳定的,尤其是杭州从约1230年开始的经济恢复。^[77]但是,从1276年开始的蒙古人征服和统治并没有终止江南的“宋代经济奇迹”——或引申开来指印刷业的扩展(虽然蒙古人的确给四川的经济和印刷业以沉重的打击)。^[78]根据最近斯波义信和方志英(Richard von Glahn)分别进行的研究,江南直到14世纪中期元代统治最后混乱的一二十年才开始从宋末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严重衰退,随后明初的经济政策又加剧了这种衰退。^[79]贾晋珠最近的研究通过揭示明初,而不是元代,尤其是在江南书籍生产的下降,证实了这一结论。^[80]换言之,江南和福建“书文化的衰退”现在可以被理解为大约一个、而不是两个世纪的下降,但不是崩溃,并主要是在明初统治下的江南。

明朝统治的头一个世纪,书(所有的书?)版据说仅存于南京国子监和福建建阳地区,当时国子监的书版大部分没有使用过。^[81]如果是这样,那么江南地区的印本不易见到就不奇怪了。即使半个世纪以后,到正德(1506—1521)末期,据说只有王府、衙门和建阳书坊才拥有书版。顾炎武(1613—1682)说,“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非好古之家不蓄”^[82]。大众印刷品也苦于同样的短缺。依照法律,政府要向所有人家发放年历。但即使到15世纪末,许多首都的家庭仍然得不到这类印本,以至一名士人写道:“京师民家多无历可观。”^[83]

对明初出版下降的全面解释还需要作更具体的研究。但是,即使中国书史学家不需要解释从占压倒优势的印本文化到手抄本文化的逆转现象(没有任何已知的文化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下降的事实却是无可争辩的,无论它是由什么原因所导致的。15世纪

书籍的极度短缺在江南内外被广泛提及。1429年，一个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彦缙，不得不到福建去买一本书——结果这是一部抄本。^[84]在东南的江西省，著名士大夫杨士奇（1365—1444）授徒20年后，“仅得《五经》、《四书》及唐人诗文数家而已”。^[85]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即便在他做官之后，他的藏书也很少。许多学者从未达到他那样的高位、收入和作为藏书家的名声。正如陆容（1436—1497）在15世纪晚期所观察到的，“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86]

在江南，明初、甚至明中叶想要得到文学和历史名著的读者面临同样的困难。15世纪早期，四大北宋文学家——苏轼、欧阳修、王安石和曾巩——中没有一个人的著作可以从书坊中找到。^[87]苏轼的著作在成化（1465—1487）以前都难以获得，据称在皇宫之外，文天祥（1236—1283）的著作只能在其老家江西找到手抄本。^[88]即使是15世纪江南最大的藏书家，也很难找到司马光所写的非历史类著作。叶盛不得不花二十多年时间来凑齐一整套司马光的非历史类著作，他从三个朋友那里抄录了他们各自收藏的残本（他们当中并没有谁反过来用叶的本子补齐自己的抄本）。^[89]

6世纪成书的中国著名文学作品集《文选》的命运，可能是明初名著短缺最明显的例子。它首次在明代出版晚至1487年（河南）；后来又于1522年（北京）、1525年（山西）、1549年（苏州）与嘉靖时的评注一起刊刻。^[90]但直到16世纪中期，江南的文人读者常常很难找到并拥有一部。早前在15世纪，杨士奇说他用了几十年试图从十多家所藏的残本中凑齐这部书。然而，他最后拼凑的本子还是不全，令他为子孙后代写下一篇悲伤的跋语：“今书板多阙，不独此书。而欲得一书，有印装、补录之劳，非朝夕所能成者。”^[91]即使像杨循吉（1458—1546）这样富裕的苏州藏书家，也不得不耗费数年才得到一部完整的《文选》。^[92]他开始在北京国子监抄录了一个版本，发现这个本子不全。他又从市场上买了一部，但

只有后半部分。最后,他从好友王鏊(1450—1524)那里抄录了此书的前半部,这才得到一个全本。

9世纪著名诗人白居易和元稹的著作,对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的藏书家来说也同样如此。杨循吉不得不从他朋友那里借书抄录。^[93]礼部尚书耿裕(1430—1496)惊奇地发现像《集古录》、《唐鉴》和《后山集》在他生活的时代仍然留存,因为他以前从未见过。^[94]

至于历史名著,也是同样的情况。到12世纪晚期,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完整印本已很少见,据说读者更愿意读按事类重组及加上道德评注的简本。^[95]明初其流传范围并未扩大,因而松江人曹安即使在1445年中了举人之后,也只能得到一个简本。^[96]《史记》也流传不广。在元代印了两次(1288年和1306年)后,这部关于古代中国最著名的历史著作仅在1463年,即明朝统治的最初一个半世纪在福建由官府刻印了一次。^[97]其流通也极其有限,南京国子监明以前的书版损坏严重,而且不能随便刷印,后来于1515年和1517年刊印的版本只有位于主要发行地点的重要官员才能得到。直到1525年,当时人们仍说“好版本的《史记》还是匮乏”^[98],穷学者要离乡进城才能买到这部贵重的书。^[99]晚唐成书的《通典》,按杨士奇的说法,在明初很难见到其完整的版本,士大夫们只有节本。^[100]

同样,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正史也遭遇了长时间的冷落。明初,全本的《宋史》很少见,即使到了1534年,急于得到此书的苏州藏书家钱穀(1508—1578)发现著名苏州文人沈周(1427—1509)抄的一个本子缺了34卷,钱不得不自己找到另一个本子把它抄全。^[101]这样,顾炎武所观察到的“二十一史”只是在嘉靖时印于南京、万历(1573—1619)时印于北京之后才进入到士大夫藏书里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102]这样上述顾关于明前半期学术书籍总体来说流传十分有限的论断,就证实了我们对于

直到 16 世纪中期江南的文人书籍仍然匮乏的总体印象。

到目前为止所展示的证据显示,16 世纪早期以前大的藏书家很少;直到 16 世纪下半叶,通常藏书只在 10000 卷到 20000 卷之间,很少超过 30000 卷;普通的士大夫藏书比这要少得多;直到 13 世纪,即使是首都杭州的高官也不容易得到著名文人的著作,包括印本;随后杭州的情况有所改善,但邻近的大城市,如宁波,并没有明显改善;从 14 世纪到 16 世纪早期,所有这些地方都存在书籍短缺的报道。这些零星的细节,虽然单个地看说明不了什么,但最后合起来则基本上证实了对宋代江南大部分地方(但不是所有地方)书籍印刷状况的一种修正主义的、怀疑性的评估。

我相信,这一系列结论坚定了我们的认识,但我们必须首先回应两种重要的反对意见。首先,有人会说,像袁韶和黄震这样的学者对于书难以获得的抱怨说明不了太大问题。即,当一个宋代读者抱怨不可能得到某些书籍时,今天我们常常难以确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缺乏得到书的机会呢,还是仅仅没法从不愿共享书籍的藏家那里抄书?既然我们已经看到宋代的大藏书家很少,很少有人藏有很多的书,单个读者对难以得到书的抱怨更有可能来自于对书籍普遍短缺的真正感受,而不是来自于接触书籍遭受限制。回想嘉兴府藏书家曹溶(1613—1685)可怜的悲叹,他说他在宋以来的十余部书目中所见到的书籍,到 17 世纪中期只存十之四五,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读者在找寻那些他们耳熟能详的书时遭遇的不断挫败所带来的沮丧。^[103]

第二种反对意见更难对付。本章对于那些直到 16 世纪仍很难找到的中国书籍的调查,必然聚焦于当时缺什么书。而且,对书的选择反映了文人学者的趣味,他们对以往的著作比当代著作更感兴趣,对被认为能传之永久的著作比那些总是占中国印刷品大多数的临时出版物更感兴趣。这样,就忽略了实际印出的那些书,不能说独立地构成了一幅中国印刷文化,尤其是从宋初到明中期

五个半世纪里精神生活完整而准确的图景。

这一批评在我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可以转向一项详尽的调查，它可以大大抵消其批评效力，并获得对至少是文人印本文化的合理的有说服力的大体印象。这项调查利用已出版的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台北“国家图书馆”的目录，以这些世纪留存至今的印本为基础，还是由井上进所进行的。谨记井上对这些印本的描述，必然忽略在我们已经看到仍是一个手抄本的时代里所流通的大量手抄本，但我们还是可以利用他的观察来大致了解人们、尤其是江南的文人在读什么样的书，或至少了解他们或出版者在这些世纪里想要通过出版来宣扬哪些作家和主题。几乎可以肯定将来的研究会修正这些发现，但如果没有更广泛的调查，这一报告对于观察 11 世纪到 16 世纪早期江南和其他地方的文人印本世界来说，仍然是一个有用而重要的基础。它还将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证实我们关于名著短缺的发现，也将有助于我们弄清自 16 世纪初以来极大地改变这种状况的变化的重要性。^[104]

出版物

到 16 世纪，所印刷的书籍种类似乎扩展了，从几部佛典、医书、日历、告示、诗集和占卜书，到把某个作者的诗文集包括进来。这类出版物的首个记载是 923 年在四川印刷的和尚贯休（832—912）的集子。^[105] 宋初印刷的范围更广了，出版了个人的政论集，范围从曲折影射宫廷政治的诗歌，到对当时政治事务的直接议论。可以理解的是，朝廷官员并不愿意公开暴露其政治观点和活动，因而到 1009 年，他们对自由而轻易地印刷书籍设置了法律障碍。^[106] 但是，对所有书籍都进行印前审查的要求，并没有阻止一些聪明人伪造并于 1068 年在开封印刷“敕文”，此事甚至触怒了皇帝。^[107]

在 11 世纪的开封,科试录和科举程文也成功地赢得了市场,此外还有一大批在任和已故士大夫,如苏轼和欧阳修的著作。⁽¹⁰⁸⁾

自南宋以后,进入印刷领域的新品种,如戏曲小说,与越来越多传统类型的经典注疏、史书、诗歌、政书、占卜书和医书一起被印刷出来。在宋代印本中,哲学类著作中存世最多的是关于朱熹及其追随者所阐发的新儒学思想的道学著作;医书紧随其后。但我们一旦进入元代,医书就占了统治地位,其次是类书,这两种书几乎占了元代子部书的百分之六十。在这之后,才是朱熹新儒家学派的著作,反映了蒙古统治下儒家经典官学研究的瓦解。在宋代所印的集部书中,最多的是六朝和唐人的集子。但在元代,除了杜甫(712—770)和李白(705?—762),几乎没有印过此类唐人或更早时代人的著作。这种毫不冒险地只印名著和已被证明是十拿九稳的畅销书的现象,在明初尤为明显。

的确,似乎明初刊印书籍的范围更窄了。在元代,政府衙门有时还刊印文学作品和儒家经典。但在明代的头一个世纪,儒家典籍及其注疏的经典名著,加上一些这类经典的普及性质的节本、字典和韵书,这就是全部。至于史书方面,印刷了《通鉴纲目》和《续通鉴纲目》,但《资治通鉴》本身和简化改写的《通鉴纪事本末》没有印。事实上,在明代开初的这个世纪里印刷的重要史书很少,而且几乎都是官刻的,例如《元史》(印于洪武年间 1368—1398)、《史记》(天顺年间 1457—1464)和《宋史》(成化年间 1465—1487)。明初由私人印刷的史书很难找到。

明初印刷的集部书同样稀少。值得注意的是《朱子语类》,成化年间江西官刻本;《山海经》,北京国子监印。走红的作家与元代没什么区别,因为在明代头一个世纪,没有印过一个唐以前作家的作品集。唐代只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773—819)、陆贽(754—805)和陆龟蒙(9 世纪)的作品被印过。然而,版本的数量逐渐上升。看起来明初印刷的作品集比宋元多:在宋代,每十年印

4.7 部；元代，4.8 部；洪武年间，6 部；宣德年间（1426—1435），12 部；成化年间，35.7 部。

弘治和正德年间，有几个零星迹象表明在即将到来的 16 世纪将出现出版繁荣。旧的哲学著作，如《淮南子》、《盐铁论》和《独断》，开始出版。明代还第一次印刷了新儒家的核心著作，如《象山文集》、《二程全书》和《北溪字义》。但哲学类书籍的范围，即使是在正统新儒家的范围里仍然很窄。1565 年以前，即大多数思想史家所称正统新儒家朱熹学派的全盛时期，实际上唯一印刷过的与“道学”学派相关的著作是朱熹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及对“性命”原理的论述。鼓励讨论这一正统思想的尝试都少得可怜，遑论争鸣。结果，15 世纪精神生活的平淡状态，或许使之较中国历史上过去一千年中的任何一个世纪都索然寡味和缺少影响。

16 世纪到来了，一种要求更多样化的精神食粮的更强烈的愿望，推动了哲学关注点的扩展，最终反映到印刷上来。毫不奇怪，更广泛哲学论题的出版物的增长，与“道学”在明代精神生活中霸权的终结，以及对王阳明（1472—1529）思想兴趣的兴起恰好吻合。江南书籍世界中印本的增长，无疑有助于扩大新儒家思想内部对新趋势的认识。这些著作经常提倡实践高于理论，不惜笔墨地批判“道学”学派的迂腐。恰在这个时期，富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这种迂腐的终结，甚至其他种类的中国哲学精神食粮的书籍和读者数量都有了很大增长。 65

明中期，非哲学类出版物也发生了类似变化。出版者开始推出范围很广的早期历史著作——《汉纪》、《唐六典》、《文献通考》和《吴越春秋》——的新版本，这些书的印本此前流传不广。他们现在也出版相对晚近一些的史书，如《金文靖公北征录》、《皇明开国功臣录》，可以大体视为明朝的当代史料。在集部书中，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还出版了长时段范围的著作，比如像《文选》那样早自六朝的著作，及其以后的著作。对于儒家经典类，变化不那么

明显。但正德时期出版的《仪礼》和《春秋繁露》，表明对不那么经常出版的经典作品日渐增长的兴趣。

无论是在挑剔的学术著作，还是在江南更广阔的精神生活中，这些进步来得缓慢，却日积月累，并没有被当时的人所忽略。按照太仓人陆容的说法，在15世纪的第二个四分之一，“书籍”和“印版”还不是随处可得；他说直到该世纪末，情况才得以改善。^[109]即使到了1521年，顾炎武注意到，人们当中流通的书籍还“不过《四书》、《五经》、《通鉴》、《性理》诸书”。^[110]1530年及迟至1550年前后，可能由于价格相对低廉，某些苏州的家族和作家仍在依靠便宜的福建书坊来印刷他们的著作。^[111]

然而到嘉靖末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贾晋珠发现20个图书馆目录和其他13家书目中所列明代十分之九以上的现存刊本，都是在1505年以后出版的。^[112]到16世纪中叶，士人文嘉（1501—1583）写道，珍本书的出现不再像世纪之初那样引起苏州读者的骚动。^[113]那些在1500年前曾是稀有品种的书，本来很可能再也见不到而就此消失，从约1520年后开始重印的数量不断增加，这样就增加了其作为印本留存下来的可能性。现代《四部丛刊》的编辑者，以坚持只使用善本而著称，因而十分倚赖明后半期生产的印本。该丛书中44%的书来自于晚明的版本，与此相反清初普遍将明刊本视为编校粗劣而加以鄙弃。^[114]另一组数字显示了增长的幅度。尽管有10余种私家书目编纂于宋以前，60余种编纂于宋代，9种编纂于元代，但是到了明代，这个数字上升到167，接近于宋代的3倍。^[115]随着书籍出版的增长，带来了比中国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私人藏书家和私人藏书。可以预料，一些16世纪的学者把他们抱怨的对象从书的匮乏转向了书的过剩。常州士人唐顺之在世纪中叶抱怨道：“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誌；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116]其他人，比如苏州作家祝允明（1461—

1537),对近来的世风十分不满,语带讥刺,直接要求政府将堆积如山、有伤风化的书通通烧掉。^[117]

商业出版

67

这种向印本大量增加局面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两种文献——应试之书和某些应酬、娱乐之作(尤其是小说)——需求的巨大增长,和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商业出版的扩张,以及雕版印刷相比其他书籍生产方式相对成本的变化。从15世纪晚期开始,科举应试者人数急剧增长,带来了考试用书和应试手册的需求。例如,杭州下属的一个州于1480年前后因印刷科举程文盈利后,福建和其他地方的印刷者争相效仿,应试指南的出版甚至比南宋还繁荣。^[118]一些作者——许多是科场上的失败者——靠为这一膨胀的读者群编书为生。“比岁以来,”李廉抱怨说,“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119]

从16世纪初开始,人们对一些与当代事务有关的书籍的需求也开始上升。这些书不仅包括为某人的生日、升迁、离职而写的应景之作,此类作品充斥于许多16、17世纪的文集,这些类型的作品以前已经存在,只是不像现在这么多;远为重要的是,其中还包括了娱乐和想象的作品,包括点燃了晚明文学激情的小说和戏剧。最近在中国进行的一项对从南宋到20世纪初1056个书坊所印现存中国“小说”的研究发现,除了4家书坊外,其余都活跃于1520年以后(其中有140家活跃于明代该年之后)。^[120]另一项研究认为,在1507个这样的书坊中,只有3个来自南宋和元,有185个来自明代(其中明朝的最早出现于约1515年,第二部出现于1552年)。^[121]这些书中超过98%印刷于16世纪中期书籍出版大爆炸之后。而且,它们在一些文人圈子里所遭遇的严厉批评,受到它们

68

所获得的来自广大士大夫读者群普遍的热烈的欢迎——尽管也许这种欢迎并不总是公开的——的抗衡,并最终盖过了这些批评。用著名的山东收藏家李开先(1501—1568)的话说:“士大夫率喜小说,古人解经之书多阁而不行。”^[122]17世纪中叶,反传统的作家李渔所作的离经叛道的小说风行一时,他这样揶揄一些反对他的儒家学者:

吾之书成之后,普天之下无一人不买,无一人不读,所不买不读者惟道学先生耳。然而真道学先生未有不买不读者,独有一种假道学,要以方正欺人,不敢买去读耳。抑又有说,彼虽不敢自买,未必不倩人代买而读之;虽不敢明读,未必不背人私读耳。^[123]

明代对印本需求的增长,导致中国印刷机构性质的一个重要变化,政府传统的支配地位让位于许多私人、通常是商业出版者不可遏制的崛起。从10世纪到15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政府或官员印刷的精英读物实际上占了台北“国家图书馆”馆藏印本的一半。^[124]说得更具具体些,它们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台北“国家图书馆”和静嘉堂所藏210种已编目的现存宋版书中,占了48%(经部54%,史部59%,子部48%,集部36%)。^[125]由于官刻本比非官刻本更易于留存下来,它们在10世纪到15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之间,或仅仅是在宋代的份额,可能被这些数字夸大了。但是,它们在1465至1566年的一个世纪里占有所有印本的份额急剧下降到只有26%。而且,明中期的这一下降在四部所有书中都很明显。只有史部书——一个明初的作者和读者不怎么感趣味的学术领域——的份额仍然很高,有39%。但是政府出版的经部和子部印本在明代最初两个世纪里的急剧下降,其原因无疑在于商业机构印行的经典指南和医学书籍的流行。

私人、通常是商业出版者在中国东南部的大规模出现,代表了

中国印刷业在性质上的一个巨大变化。诚然，“书坊”、“坊刻”的称谓涵盖了多种实体，包括以家族为基础进行长期经营的印刷者（如建阳的出版者）、参与到出版业中来的书铺老板或书商、出版藏书以盈利的藏书家，可能还有那些转向出版业的士人家庭，他们把出版作为一种增加声望、或许还有收入的体面方式（这些出版物通常更宜归入“家刻”）。的确，根据胜山稔的研究，这些家庭出版者占据了明代中叶出版者和出版物的大部分，及整个明代出版者和出版物的将近一半。^[126]胜山稔对商业和非商业私人出版者的区分，来自于传统中国学术，太过僵化了，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即使政府机构也想印书卖钱，来为官员、学校、学生谋利，甚至为衙门建设筹集经费的时候。^[127]但是，他对明代印刷的统计调查显示，非政府部门的出版，不论其表现形式如何，很显然支配了明代的印本文化。这些私人，尤其是商业出版者在中国的出版世界中崛起，它们将在清代以及上世纪直至 1950 年代不断加剧的政府审查中存活下来。

印本崛起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成本的复杂性。宋、元和明初的刊本，在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和井上进看来，是很贵的。因而，实际需求量并不大，印刷者不能大量地生产。结果宋元版书很稀少，致使 15 世纪晚期以后随着书籍的需求量迅速上升，这些旧印本的价格急剧上涨。^[128]同时，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由于书籍生产中采取了节省劳力和时间的创新，新书和新印旧书的价格在 16 世纪显著下降。这些变化影响了书籍生产的所有阶段，在胡应麟看来，这些阶段决定了书的价格：“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129]但是，对印本来说其中某些价格的降低要更为重要一些。例如，胡所列举的前四项价格的降低，对手抄本价格的降低幅度与印本一样，这样它们就不能对印本生产成本

的相对降低起到关键作用。相反,胡应麟提到的最后两个因素只与雕版印刷有关,因而它们价格的降低影响到印本的相对价格。两者中价格降低幅度更大、更重要的又在于刻版,因为刊刻占了印刷预算的很大一部分,而木板本身并不很贵,手抄本生产中显然也不包含刻版的成本。

既然前面一章所提到的所有技术创新、尤其是匠体字及其刊刻方法的采用,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投入,除了一种特殊的书法字体外也不需要特别的技术(的确,据说即使低劣的刊刻技术也可胜任),不需要新的工具或技术,我们就很容易质疑为什么出版者们花了这么长时间——大约8个世纪——才加以采用。在这里,西欧手抄本的命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手抄本直至16世纪早期甚至之后即使在江南的出版作坊和藏书楼里还能顽强地生存。据一项最近的估算,西欧的出版者在书籍印刷的头一个半世纪(即1455至1600年)里,总共出版了1亿多册书(中国在印刷术发明的头一个半世纪里书籍生产的相应数字目前还不清楚,但肯定要远远低得多)。^[130]但是,在整个欧洲手抄本仍然普遍使用了至少两到三个世纪,在有些国家时间更长。在英格兰,这个欧洲印本书战胜手抄本速度最快的国家,早在16世纪初大多数印本就在没有津贴的情况下进行商业销售^[131],印本书的数量从1630年代的6000种上升到1790年代的56000多种,最后在1870年代升至大约325000种。与此同时,英国的手抄本消亡得十分缓慢:

在整个16和17世纪,手抄本的商业化流通继续与出版业并行不悖。可获得的手抄本与印刷品的相对比率在变化,手抄和印刷的书籍种类也在变化,但即使在18、19世纪,印刷品的统治地位仍不时受到手写交流方式的挑战。^[132]

那么,如果更恰当的问题变成是什么价格因素促使明中叶江南的出版者扩大其书籍生产,我们的注意力就不仅应放在已经提

到过的对书籍需求的增长上,也要放在雕版印刷出版者所面临的另外两种书籍生产方式——活字印刷和手抄——的竞争上。换言之,使雕版印刷物在书籍市场上的份额得以拓展,促使明中期的出版者用雕版印刷来生产更多书籍的关键性变化,似乎是雕版印刷与其他书籍生产方式相比较相对价格的下降,这样就使这些雕版印刷品对买主来说更便宜、更具吸引力。

要想理解一种雕版印刷生产的新方式得到广泛应用的原因,关于明代中国活字印刷竞争成本的资料极具启发性,虽然不一定具备完全的说服力。^[133]在15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和16世纪的最初三分之一,活字印刷在一些江南出版者和文人中间很流行(其中一人甚至租赁活字印了一部他无钱用雕版印刷的书)。无锡县的两个家族——华家和安家,分别生产了20多种、多达几千卷的活字印本。虽然他们的书赢得了相当多的赞誉和关注,但其他绝

72

大多数中国出版者并没有采取这种出版方式。对于个中缘由,有不同的解释。一些人强调中国学者的保守主义;然而,祝允明——一个典型的明代文人,提到文人鉴赏家对这种书籍生产新方式有极大的兴趣。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能够很容易地有效采用这种印刷方式的技术上的障碍,如传统中国墨水与金属活字不匹配,页面上活字排列凹凸不平,书上存在大量文字错误,每个中国字都需要大小两副活字,因而所需启动资金大幅增加。但是,通过更好的质量控制和分担投资,所有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比如,木活字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一种活字)。

最后,价格因素似乎在活字最终遭受的冷遇中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明代的最后一个世纪。正如在很久以后的1820年,米怜向伦敦的报告使我们相信,制造活字非常昂贵——华家和安家都很富有,在印刷事业中投入了大笔资金,并且风险很高——华家最后因为生意亏空而卖掉了大量田产。再者,我认为这种印刷方式可能促成了来自雕版印刷者的价格竞争。这一论点的证据是间接

的：上一章所提到的节约成本的创新，发生在同一时期华家和安家
在邻近苏州的常州府推广其新印刷技术的几十年里。这样，即使
雕版印刷业发生的这些变化并不是有意与华家和安家的活字印刷
展开竞争，在市场上它们肯定会在相同的消费圈子里引起竞争。

正如第一章所讨论的，明中期抄写和刊刻方式的重要变化导
致了印刷中雕版制作成本的下降。虽然明代没有数据说明匠体字
73 与其他刊刻字体的相对成本，前述 1770 年代四库工程中抄手和刻
工的工资表表明，抄写和刊刻过程中匠体字的采用，在雕版生产的
这两个基本阶段中节约了至少 50% 的费用。

这种成本降低，也会影响到长期以来雕版印刷与另一种书籍
生产方式——也是到那时为止主要的生产方式——手抄本之间的
竞争。^[134] 8 世纪以来，使手抄本经常比印本便宜的，是抄写劳动相
对于雕版刊刻的低成本。有时被雇来抄书的可多达 30 人^[135]，这
些抄手同时也做小吏，或是当地学校的学生，最普遍的是科举应试
者。^[136] 这些人组成了一大批长期存在的廉价剩余劳力，他们的存
在很大程度上使手抄本直至 16 世纪都比印本便宜。我认为，这是
中国的技术进步在获得广泛采用之前遭到长期延误的一个典型例
子：雕版印刷——一项不晚于 8 世纪的创新，未能立即对书文化产
生显著的影响，部分是因为传统抄写劳动的持续低劳力成本。它
最终能够取代大量的手抄本生产，主要归因于对某些书籍的更大
需求，以及来自活字印刷不断加剧的竞争所引发的技术变革而带
来的价格下降。

为了获得关于 16 世纪初手抄本与印本劳力和生产相对成本
的更具体的信息，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文人李诩（1505—1593）在
16 世纪出版繁荣的前夜关于手抄本生产的评论。李告诉我们，他
在江南北部边缘的江阴卫度过的童年时期，买不起应试所需的任
何一部印本。他只能使用抄手们的手抄本（从藏书的朋友或书商
那里），价格是每二三十纸二到三文铜钱——即每纸（通常 400 到

500 个字)0.1 文。^[137]很显然,就单本书来说,没有印本——只要其成本还是仅刻版 100 个字就要花大约 30 文——能和如此低廉的抄写生产成本竞争。

为了探究 16 世纪如此低廉的抄写费用,对于大量印刷书籍在财务上的可行性意味着什么,可以作两个合理的假设:首先,所有其他的印刷或抄写成本都是一样的(除了木板本身),并且在整个 16 世纪没有变化;其次,李诩所用手抄本中成本为 0.1 文的一叶,如同那些刊刻成本大约为 140 文的雕版一样,上面大概有相同数量的 400 到 500 个字。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一个 16 世纪的商业出版者想卖几千部、而不是几百部,最多可能达到 30000 部书的话(而且一副刊刻得好的雕版本身在印了这几千或几百部之后仍然可以出售),他会把兴趣从抄书转向印书。换言之,即使在明末低成本的情况下,商业出版的财务逻辑也倾向于不鼓励出版新书的冒险性选择,而是鼓励印刷那些在一个可以合理预测的市场里已经得到证明的畅销书。这些十拿九稳的出版物的目的娱乐多于教化,范围主要包括几个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的著作、科举应试手册、医书、“小说”、名作选本及流行时尚和时事。

晚明出版者的兴趣也会被消费者的口味所激发。对于同样的著作,读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印本而非抄本,他们看中抄本更多地是因为其美学价值,尤其是书法,而不是其内容的稀有。^[138]这种更注重抄书者,而不是书本身及其内容、价格的现象,突出说明了到 16 世纪末的江南书业中印本在总体上崛起的程度。

总之,让我强调一下 16 世纪印本的崛起并没有终结中华帝国晚期手抄本的影响和使用。首先,即使在印刷业的这场繁荣之中和之后,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人仍然在说找不到他们想要得到和阅读的某些书籍。16 世纪晚期,据胡应麟说,文人们仍然被周代(约前 1000—前 221)书籍、唐诗和宋代作品的短缺所困扰。^[139]而且晚明和清初江南一些重要藏书家找书的辛苦,为这种听来有些

74

75

奇怪的论调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苏州富裕的藏书家沈与文花了40年时间才在1534年完成宋代著作《河南邵氏闻见录》的抄写。^[140]富有经验的编辑家姚咨(生于1595)两次见到写于12世纪的著名笔记《清波别志》，中间竟隔了30年；第一次姚付不起要价，卖主把它当作稀世珍本，第二次他自己借来抄了一部。^[141]苏州一个富有的藏书家花了30多年才在1584年凑齐一部完整的10世纪著作《才调集》；1579年他记述道，在获得宋代著作《书苑精华》时遇到了同样的烦恼。^[142]苏州大藏书家赵绮美(1563—1624)花了8年时间才得到《洛阳伽蓝记》完整而准确的版本。^[143]他在万历年间还花了约20年时间试图凑齐宋代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他成功地买到了一部不全的印本，又从国子监借了一部抄全。^[144]晚明福州藏书家徐爌，不辞辛劳地在江南往复奔波达10年，寻找陶宗仪在14世纪中叶写的《南村辍耕录》，终于发现一个朋友所藏的残本可以补足自己藏的残本。^[145]徐又花了30年到处查找蔡襄的集子，最后在江西省一个藏书世家那里发现一部手抄本。^[146]即使到了17世纪中叶，嘉兴一个虔诚的朱熹追随者张履祥，在得到《近思录》——朱熹和吕祖谦所编的一部被经常引用的宋代新儒家著作选集——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同样的挫折。在经过了些波折之后，他偶然从书市上找到一部不是很好的本子。不久他借给一个朋友，朋友再没有归还，他又不得不等了20多年才弄到另一部给他儿子读。^[147]清初文人朱彝尊(1629—1709)虽然成功地累积了80000卷私人藏书，也花了40年时间寻找一部唐人文集(最后他只找到总共二十卷中的六卷)；他还花了很多年从朋友们那里借抄宋代初年著名的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结果仍未能凑齐。^[148]

这种情况持续到18世纪，尽管让人觉得问题主要发生在很特别的或本来就很稀少的本子上。孙允伽花了30年徒然地寻找一部《西洋朝贡典录》；吴騫(1733—1813)花了几十年寻找查慎行的

《人海记》也没有成功；龚橙花了三四十年查找《一行居集》（彭绍升（1740—1798）写的佛学论集）也没找到；钱大昕（1728—1804）花了40年也没找到一部宋代地理学著作《輿地纪胜》。如同我们所了解的清人在获得珍本书时所遇到的烦恼和挫折，我想进一步研究会把这个单子拉得更长。^[149]

这样，16世纪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极大地增加了印本书的数量，历史上首次催生了许多大型私家藏书。但它仍然没有完全缓解依赖市场的私人藏书家面临的书籍短缺问题。在必要和可能的时候，他们会转向手抄本作为解决短缺问题的最佳途径。

那么并不奇怪，在印本开始主宰江南的书籍世界很长时间以后，手抄本仍在继续生产和使用。一部书的印本的出现，并没有妨碍读者自己制作一个手抄本，或让人代抄，再把这部手抄的书传递给下一个主人。像尤袤一样，许多中国学者和藏书家坚持认为，掌握甚至阅读一部书的最好方法是用毛笔抄录一遍。^[150]即使一个人并不完全理解他所抄的东西，他也可以反复地读、记，最终掌握它。其他人，如12世纪的作家洪迈（1123—1202）则为了做学问而这样做；据说洪手抄了三份《资治通鉴》，一份用来研究其错误和成就，一份用来学习其文体，另一份用来掌握其中的儒家学问。^[151]在一个有人认为书出版得太多的时代，17世纪早期苏州的一个手抄本提倡者声称：“著书不如抄书。”^[152]

77

当然，尽管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印本在崛起，晚明为人抄书的工作仍在继续甚至繁荣。著名士大夫黄道周（1585—1646）有一段时间靠给人抄书为生。在因为批评政治而被囚于北京期间，或许是在他妻子的帮助下，他靠抄写《孝经》过活，每部售价二金。^[153]在苏州，一个17世纪中叶的科场失意者金俊明，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仍不得不在其他活计之外，靠给书坊写样上版，及给苏州的寺庙和酒肆题写供刊刻的招牌过活。^[154]即便晚至1769年，在著名的

北京琉璃厂书肆,许多手抄本和印本放在一起并排售卖;记述这个情况的人承认他居留京师期间,靠借书和抄书度日。^[155]

这样我们需要认识到,书印得越多、流传得越广,就越有可能至少在其传播的某一个阶段产生手抄本。这种相互影响是如此持久和普遍,以至于在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中手抄本和印本之间无法划出清晰和绝对的界限。印本 16 世纪开始在江南对手抄本占据显著优势的观点,必须考虑到手抄本传统的持续活力,它并没有到达一个终点而就此消失,而是一种重要的正在发生的文献生产方式,正如我们今天所读到和了解到的那样。正如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的杰出荣誉成员詹姆斯·海耶斯(James Hayes)博士 20 年前所提醒我们的,直到 1960 年代,新界农村的族谱、对联集以及他们的家庭习惯和社会习俗手册还是手抄本而不是印本。他们其他种类的书籍,如关于占卜和仪式的书,手抄本不占主导地位,但仍很普遍。^[156]那么我是否可以认为,这里关于从宋到明江南士人文化的结论,最终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适用于直至最近的普通读者的书文化。

最后,手抄本传统不仅通过高度书法化的风格继续影响了雕版印本的面貌,为其扉页和前言增色,同时也影响了这些印本的内容。随便翻开一部中国的传统印本,通常它看起来像是一个混合体。它经常是一个或多个作者诗文或评论的集合,涉及一个或多个主题,讲述一个以上的故事,就好像它被作为一部手抄本组合到一起,内容随作者(们)的意愿而增减。如果这些书中一个甚至多个项目或部分被抽掉(这也发生在许多较长的小说上),那么只有独具慧眼的读者才可能注意到这个变化,即使他或她是在读一个印本而不是抄本。这种文本的流动性,在一个以手抄本为基础的书文化里很好理解,从 13 世纪的私人出版者到今天的国有出版社,长期以来它作为中国的一种印本实践延续下来。总之,我们的图书馆里充栋盈架的印本,可以说承载了一种丰厚的手抄本文化

的印记,它在中国的书籍世界中比我们许多人所想象的要持续得更久、渗透得更深。

附录 2.1

79

781 所中国图书馆中现存非印本书籍的种类:

陈先行等编《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1册,第9页,关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所收录的56787部书的形式,有下列分类数据:

	总数	稿本	抄本	校本	非印本
经	5239	659	1209	1002	2870 (54.78%)
史	15708	1616	5383	1687	8686 (55.3%)
子	12294	666	3559	1362	5587 (45.44%)
集	22294	1906	6970	2813	11689 (51.0%)
丛	622	108	91	51	250 (40.19%)
合计	56787	4955 (8.7%)	17212 (30.3%)	6915 (12.17%)	29082 (51.19%)

附录 2.2

80

国家图书馆(北京)与“中央图书馆”(台北)藏现存1131至1521年印本数量(井上进,“藏書と讀書”,第428页):

	南宋(1131—1279)	元(1271—1367)
经	50	75
史	48	59
子	39	51
集	67	60
合计	204	245

明 (至 1521)					
	1368—1402	1403—1425	1426—1435	1436—1449	1450—1456
经	2	5	4	7	2
史	18	6	5	3	5
子	10	8	6	5	4
集	21	8	12	25	12
合计	51	27	27	40	23

	1457—1464	1465—1487	1488—1505	1506—1521
经	0	7	9	18
史	3	20	25	34
子	6	27	38	36
集	21	82	87	125
合计	30	136	159	213

81 附录 2.3

国家图书馆(北京)与“中央图书馆”(台北)藏现存 1131 至 1521 年每十年印本数量(出处同上):

	1131—1279	1271—1367	1368—1402	1403—1425	1426—1435	1436—1449
经	3.5	6	0.6	2.2	4	5
史	3.3	4.8	5.1	2.6	5	2.1
子	2.7	4.1	2.9	3.5	5	3.6
集	4.7	4.8	6.0	3.5	12	17.9
合计	14.2	19.8	14.6	11.7	27	28.6

	1450—1456	1457—1464	1465—1487	1488—1505	1506—1521
经	2.9	0	3	5	11.3
史	7.1	3.8	8.7	13.9	21.3
子	5.7	7.5	11.7	21.1	22.5
集	17.1	26.3	35.7	48.3	78.1
合计	32.9	37.5	59.1	88.3	133.0

附录 2.4

《中国古籍善本目录》所列中国大陆图书馆藏 1522 年前印本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 181 页):

	1127— 1274	1264— 1367	1368— 1402	1403— 1435	明 初	1368— 1435	1436— 1464	1465— 1487	1488— 1505	1506— 1521
经	117(8.1)	149(12)	2(0.6)	6(1.8)	16	24(3.5)	14(4.8)	13(5.7)	22(12.2)	28(17.5)
史	117(8.1)	99(8)	14(4)	15(4.5)	25	54(7.9)	46(15.9)	90(39.1)	126(70)	164(102.5)
子	181(12.6)	187(15.1)	22(6.3)	61(18.5)	55	138(20.3)	48(16.6)	60(26.1)	89(49.4)	79(49.4)
集	297(14.4)	126(10.2)	19(5.4)	26(7.9)	39	84(12.4)	72(24.8)	98(42.6)	117(65)	159(99.4)
合计	622(43.2)	561(45.2)	57(16.3)	108(32.4)	135	300(44.1)	180(62.1)	261(113.5)	354(196.7)	440(275)

注释:

1. 括号中的数字指该时间段每 10 年的数量。
2. 明初一栏为无法确定具体年代的书,但基本可以肯定是在明代最初的 70 年内所印。
3. 1368—1435 一栏为左侧三栏明代数据之和。

第三章 书籍发行与士人文化

83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记录中,除了道教隐逸和禅宗和尚的传记,哪里又能找到像藏书家群体这么多令人或爱或憎的不寻常人物呢?仅在宋、元、明,我们就找到了痴狂的藏书家邢量,他独自住在苏州三间狭窄破败的房子里,地上图书狼藉,忘情读书的他,顾不上苔藓爬满四壁;极受尊敬的宁波学者丰坊,因其藏书癖而做起有利可图却声名狼藉的伪造古书生意;绍兴士人杨维桢,14世纪初时把通往二楼的梯子撤去,以便独自一人专注地研读家族藏书;永不疲倦的藏书家虞参政,把所有藏书放到一个只有乘船才能到达的岛上,部分原因是为了赶走那些不请自来的读者。^[1]无怪乎诗人陆游——一个狂热的藏书家,他堆满书籍的书房“书巢”名副其实——认为:“人生百病有已时,独有书癖不可医。”^[2]晚明藏书家徐爌的话同样富有洞察力,他说要找一部不寻常的书,你只需找到不寻常的人。^[3]

在这一章以及下面三章中,我想通过从宋至清初这些不寻常的人和与他们同时代的普通人的眼睛,来考察书籍发行和消费方面的重要变化。我的目的不是分析这些藏书家的藏书癖,而是回答困扰他们的两个问题:他们在哪里、如何得到自己想要收藏的书?他们怎样去读和抄自己无法得到的书?如果说第二个问题主要与非物质的阅读行为有关的话,很清楚第一个问题与实体对象的获得有关。所以,这一章聚焦于第一个问题,考察这些藏书家所面临书籍获取问题的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受赠和购买——的演变,以及晚明这一群体社会构成上的变化。如果说晚明见证了印本和商业印刷的崛起,它也见证了在江南一个由书铺、古旧书

84

店、书目、书摊和私人出版者所组成的广泛网络的形成,这个网络大大扩充了许多读者和藏书家获取书籍的手段。这一章的大部分内容,将围绕这种以市场为基础作为解决书籍获取问题的方式的发展进程展开分析。我们特别关注在明朝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七个特异的藏书家——藏书癖胡应麟、出版家毛晋、老板编辑家陈继儒、编辑家兼出版家顾元庆和殷仲春,书商、出版家、藏书家童佩,及私人藏书家徐爌,以便考察从宋到晚明书籍发行的商业渠道如何变化。涉及的话题从书贩、出借图书的藏书楼、书铺、可获得书籍的种类,到这些藏书家社会地位的变化,以及他们中一些人所发现的利用藏书的方法。然而,我们的焦点仍然是当时这些人所关注的问题:一个人如何找到并获得自己想要阅读和拥有的书?

赠 予

很奇怪,在汉学家中间,送礼的历史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中国人普遍用礼物来巩固彼此的关系,为最后开口提要求作准备,但是社会和经济史家选择对更“现代”的发行方式,比如市场网络,投以多得多的关注。在这里,作为对书籍的讨论,我想稍微纠正一下这种平衡,探讨两种获取方式:赠予和购买。近年来,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这两个表面上是对立物的东西某种相互依存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看到在一些商业经济中送礼活动很活跃。因而,在从宋到明江南日益商品化的经济中,送礼并不是边缘化的活动。尤其是书籍,在送给皇帝、父母或官员的礼品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分别将朝廷、家庭和官场卷入意味深长的交换关系。虽然总的来看送礼在宋代和明代的书籍发行中仅仅扮演了次要的角色,但它在特定的领域,在某些情况下对某些读者和某些书来说是重要的。^[4]我们对从宋至明书籍如何发行和消费的研究

究,所要搞清的正是这些细节。

可能史料里提到最多的礼品书,是皇帝赏赐的由朝廷或其他官方机构出版的印刷品。起初,这种方式对于藏书家来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宋代,尤其是北宋,来自皇帝的赐书至少使 16 个大的私人收藏、30 余个宗室收藏(各有书 10000 到 50000 卷)^[5],及一些著名的私家书院和原本贫乏的府学藏书得以建立。^[6]在明代,开头的几个皇帝也这样做,向县学和府学颁赐儒家经典,向全国各地的藩王颁赐皇帝的著作,但规模有所减小。^[7]从 15 世纪中叶开始,明朝的皇家赐书萎缩枯竭了;最后一次值得注意的给私人赐书,可能是向有影响的大学士丘濬(1418—1495)的后人颁赐 10000 卷书。^[8]16 世纪晚期皇帝赐书有所回升时,通常得到皇太后的支持,把她主持刷印的佛典向全国各地的主要寺庙发放。^[9]私人藏书家不在其颁赐之列。

同样靠不住的是那些作为遗产或继承的父辈遗赠,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奇怪。对于幸运地生在一个藏书世家的男人们来说,继承和维持一宗藏书的前景看起来应该是颇有吸引力的。自宋代以来我们至少知道 31 个这样的家族,他们中的 17 个将藏书维持了三代以上。最成功的是四川的孙家,从晚唐到南宋初期,他们把藏书维持了 10 余代;以及山东的韩家,从 11 世纪直到 13 世纪中期,他们的藏书历经火灾、偷盗、战乱和洪水,维持了 10 代。^[10]江南在宋代有几个相当规模的藏书世家,明代更多,但似乎主要集中在清代。例如,叶盛的藏书在他子孙手中维持了近 200 年,一直到 17 世纪中叶。^[11]吴宽(1436—1504)的藏书 16 世纪中叶开始散佚,但直到 17 世纪中叶才最后消失。^[12]文徵明的藏书从万历年间开始被其子孙变卖,但直到 19 世纪晚期仍有许多幸存下来。^[13]祁承燾的藏书大部分在 17 世纪中期散佚,但他的部分藏书直到 1950 年代还保留在其后裔手中。^[14]苏州府常熟县孙家的藏书建立于 16 世纪,直到 19 世纪仍基本上完整无缺。^[15]晚明和清初建立的一些

著名藏书楼——根据最近的一项计算是 12 个——至少到 20 世纪初期仍然幸存。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天一阁。从其建立之初的约 1560 年直到 1950 年代,这一建筑及其藏书都在宁波范家手中。主要是在最后一个半世纪中,外国入侵、后世子孙疏于管理、盗窃和政府没收使其收藏萎缩。但至少在最近 300 年,它被视为中国最著名的私家藏书楼。^[16]

但是,这些例子仅是例外。如果一个将要做藏书家的人继承了这样一宗藏书,他很少能独自继承下来,藏书也很少经历频繁的转手而仍能保持完整。即使一宗藏书躲过了困扰官方藏书的自然灾害、政治动荡、鼠食虫蛀和管理疏漏,中国分割继承的习俗实际上会使得藏书的继承者们很快瓜分藏书,并按其各自的意愿卖掉。从宋到明直至清初的藏书家常常喟叹家族藏书的散亡,一些人甚至说这是“物理之常”。^[17]这种散亡常常意味着继承者难以在几代之后维持同样水平的收入和财富;例如 17 世纪中叶,据说在苏州没有几个富豪之家能够维持其财富超过一个世纪,官宦之家在创立一两代后就衰落了。^[18]而且,正如晚明藏书家徐爌所深知的,父辈或祖辈的藏书是其子孙首先抛弃以维持生活水平的东西:“余见保产业之家多至六七代,而保书籍者不过一二代尔。”19 世纪的大藏书家杨继振也持同样观点,认为极少有家族藏书在两代以后仍是完整无缺的。^[19]

这些看法没有错。有些藏书家的子嗣读不了书(“不文”),对其父辈的藏书毫无兴趣,宁愿卖掉,即便价格低得惊人。^[20]在元代,江南大藏书家庄肃留给子嗣 80000 卷书,而子嗣们对其学问几无兴趣,任凭虫、鼠、盗贼侵蚀其藏书。当他们害怕书中内容会激怒当地官员,危及自身安全时,就焚毁了剩下的一些藏书。庄肃的其余藏书,要么被卖掉以还酒资和赌债,要么被用来糊墙缝。^[21]14 世纪一名南京学者的藏书楼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他家的仆人用他的书页来做鞋底和瓶塞。14 世纪前半期,浙东(即浙江省的大部

分)最大的一宗藏书留给其继承人,他们如此疏忽,以致有一多半书被偷、被管家卖掉,或被女仆和小妾毁掉。^[22]

在明代的南京,顾起元悲哀地写道,大宗藏书往往在子孙手里离析散亡。^[23]在明代江南另一个主要的书业中心苏州,藏书的散亡正如沈周之子所说的那样普遍。沈周最杰出的弟子——文徵明的子嗣,最后卖掉了其父约 60 册的诗文。^[24]杨循吉的重要藏书,其散亡甚至比他自己预测的还要快。这个富有的藏书家写道:“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付不肖子,持去将鬻钱。”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藏书也会应验他给别人的这个忠告:他死后不到数日,藏书被亲戚、仆人和朋友劫掠一空。^[25]著名藏书家王世贞的一个儿子,迫于交税的压力,将父亲的藏书抵押给一个徽州商人。^[26]没有子嗣的钱允治 1620 年代死时整个藏书(包括其父钱穀在早前苏州藏书基础上建立的著名收藏)散佚,据称苏州的伟大藏书传统随之终结。^[27]虽然赵绮美将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藏书扩大了一倍,他在其藏书目录中所列 5000 余部书中的大部分却在他死时归入了著名藏书家钱谦益的名下。^[28]

一些重要的藏书家对藏书的这种散亡听天由命,因而编制了藏书目录清楚地指定每个儿子应得的份额。^[29]另一个藏书家项元汴(1525—1590)在认识到这一难以避免的命运后,据说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步骤,在每件藏品(主要是绘画和书法,也可能有书,因为他也热衷收书)上写下购买的价格,以免子孙出售时忘记其真正的价值(后来的一些学者认为项所标记的价格高于购入价,因为他真正的目的是确保子孙在出售其收藏时获得可观的收入)。^[30]

许多其他的藏书家并不如此相信宿命。15 世纪一个藩王有一枚藏书章,上面的文字要求子嗣“永远”保有和使用其珍稀书籍。^[31]著名苏州文人画家沈周的长子提醒自己的子孙,家里的藏书是传家宝,不能出售。^[32]19 世纪,杨继振有一方印,上面刻有对

其子嗣 252 字的长篇训诫,教导他们如何保护藏书,其中有这样的告诫:“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33]一个稍早的藏书家更加苛刻:他藏书印上的铭文警告子孙,如果他们卖掉他藏书中的任何一部,他们就像猪狗一样,不是人。并发誓将他们逐出宗族,加以鞭挞。^[34]

有些人不断和命运抗争,重建已经散亡的家族藏书。首先来看 12 世纪的士大夫王明清(1145—1207)的家族藏书。11 世纪时,据说其祖父带了几万卷书回家,都是在各地长期为官期间搜集的。在 1120 和 1130 的动乱年代中,为防火而放在两处地方的整个收藏,被一个不去保境安民而热衷于贪赃敛财的知县夺去。由于没办法取回这批藏书,到 12 世纪中期王家又建立了一大宗藏书。但是,它是在奸相秦桧迫害那些被怀疑藏有批评其统治的著作的藏书家时建立的,这宗新藏书的规模只是在招致政治风险。因急于解除这种怀疑(以拯救家族的其余财产),王明清的母亲将大部分新藏书烧掉。“每一思之,”王写道,“痛心疾首。”没被烧掉的书后来被亲戚偷走,或被人借走不还。结果,到 12 世纪末,“遗书十不一存,”王接着哀叹,“每一归展省旧篋,不忍复启,但流涕而已。”^[35]

顾炎武的家族藏书,尽管从明中期到清初跨越了两个世纪的出版繁荣,见证了印本在江南取代抄本成为文人书籍的主要形式,也经历了类似的起伏。1520 年前后,其藏书在 6000 至 7000 卷之间。嘉靖年间(1522—1566),这些藏书度过了顾家严重的经济困难,但没有躲过倭寇的侵扰。此后顾炎武的曾祖父用其薪金节余收集了比先辈们所藏更多的书。但是,由于他死时藏书分别由四个儿子继承,过了三代才有子孙的收藏达到 5000 到 6000 卷。然后,在顾炎武——司马迁之后中国最好的历史学家——这一代,三分之二的藏书毁于 1640 年代清朝对江南的征服。二十多年后,顾炎武承认,利用家族每年 160 盎司白银的田租收入,和 100 到 130

盎司白银的生活费用(由馈赠和编书的收入支持),他在华北游历期间重建了 2000 到 3000 卷藏书,比他的先人在 1640 年、甚至 1520 年的藏书规模还小。^[36]

90 总之,一个家族的藏书如果没被火灾、外族入侵和政治斗争破坏,那么分割继承的普遍习俗会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个结果,只消几代人就使得许多大型收藏规模缩小。藏书建立者会看到留给子孙的遗产更有可能归于散佚,而不是得到保全。如果他的子嗣热衷藏书,显然会受益于其遗产,但他们仍需用自己的努力和资源来重建藏书。皇帝和官方的礼物,正如上面看到的,在北宋会起到、也的确起到了帮助作用。但是,至少在明代,这些赠与很少对建立一个家族的学术声望起到足够大和足够重要的作用。那么一个有抱负的学者和藏书家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呢?

答案取决于他的社会圈子。在官员们中间,印本常常作为礼物成为社会交往的润滑剂,帮助他们建立有利的社会关系。这些书通常包括一个官员自己的著作,或其家庭成员的作品,或仅仅是他所喜欢的一部作品,大部分或完全是在某个政府机构资助下用政府资金出版的。这一做法至少可以追溯至 10 世纪中叶,大官和凝让一个政府机构将他自己的 100 卷诗文集印刷了几百部,作为取悦于人的礼物。^[37]这种自我推销的做法受到一些宋代学者的批评,但最终在一种政治文化中扎下了根,这种政治文化至晚从 12 世纪末开始已经容忍科举士子向考官呈送文学作品。^[38]朱熹批评这种政府出版物是对公共资金的滥用^[39],但他在 1182 年抨击他的一个对手唐仲友时,却明智地把火力集中于其他罪责,如唐浪费时间、金钱和宠爱妾媵。^[40]

宋代和明代的地方官,尤其是明代的巡按御史,常常用政府薪金款项和地方政府资金来印刷书籍,作为给朝廷官员的礼品。^[41]15 世纪晚期,陆容写道:“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42]一个世纪后,藏书家胡应麟证实了官员们中间流行

赠送书籍,并透露了这种做法的其中一个原因:这些礼物通常在官员们获得任命和提升时相互交换。这种做法尤为高级官员所欣赏,他们藏书的主要构成是赠书者的科举程文印本,可以很容易地达到 10000 卷以上。^[43]按照顾炎武的说法,从约 1600 年开始这种习惯在官员中不再流行,官员们更露骨地送银子而不是送书。^[44]但是不少这样的做法还是延续下来。对于给官员送书以获取好处的行为,明末福建藏书家徐爌喟叹道,接受赠书的人从来不读这些书,事实上危及书籍本身,因为他们把书放在架上,只是“膏蚁饲鼠”。^[45]据说明末的一个官员得到一个要缺后,他家得到的赠书越来越多。^[46]即使到晚清,我们从 20 世纪初一个北京的艺术品商人那里得知,地方官经常在北京琉璃厂让书籍和艺术品商人给朝廷官员送书和艺术品,以便在下次任命中得到一个好位置。^[47]

但是,这种做法在明代官员的整个书籍流通模式中有多普遍呢?根据井上进的研究,明初十分普遍,正如我们在杨士奇的藏书行为中所看到的。作为一个出身贫寒做到翰林学士的江西学者、太子的老师,一个做到大学士的人,杨可能是他那一代人里最大的藏书家,给我们留下了 302 篇书跋。从时间来看,这些题跋的四分之三反映了他藏书生活中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48]在他做官之前,即 1399 年前,他至少得到了 48 部书,其中只有两部可以肯定是印本,有 22 部肯定是抄本(1399 年前所得其他 24 部书的类型不清楚)。但杨 1399 年做官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可以确定入藏时间的书增长了三到四倍,至少有 184 部。其中,134 部可以断定为印本或抄本,至少 70% 是印本。几乎所有的印本都是官刻书,是由朋友或熟人送给他,或想办法用北京、四川、江苏、江西、安徽和浙江等地政府机构所藏雕版为他印的。相反,1399 年后他只从私人手里买了 7 部书,其中多数来自离京到外省赴任的官员。^[49]尽管他在南京生活了至少 20 年,他从集市书摊和书店买的书还不到 6 部。^[50]

这样杨的题跋就描绘了一幅明初书文化的图景,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其他明代史料所记载的情况,即皇帝向官员的赐书减少,以及官员圈子中流行赠送书籍、尤其是官员藏书家们中间所流通的印本。有文化的普通人大都阅读和收藏抄本,而高官则会收到通常由官府印刷的印本。而且,这些官员获得印本的渠道,有的是从其他藏书家或政府机构那里直接购买,而更普遍的是接受其他官员、教师、当地人、朋友、书籍作者的子孙以及和国子监有关系的朋友的馈赠。^[51]杨的一个好朋友每次碰到他都会给他送本书,不管与他们上次会面间隔多久。^[52]相反,杨所记载的皇帝赐书,仅是皇帝给他的诰敕,或作为特殊的优渥赐给他的御笔书法。^[53]那么总的来看,在明初的50年(或往前再追溯一段时间)里任何一个藏书家都会耗费大量时间在书铺里搜寻文人书籍,或等待皇帝赐书,因为印本似乎主要只作为礼物在感兴趣的官员中流布。

这一统计分析颇具启发性,但从三个方面来看是有问题的。首先,杨所题跋的书共3000卷,只是他总共估计达23000卷藏书的一部分——可能只是一小部分。^[54]即使我们假定1424年以后杨在他最后的20年里获得的书比这之前25年得到的还要多,这个狂热藏书家的藏书在1424年肯定不止3000卷,或许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多。1408年他声称保留了所有藏书,不管它们的状况如何及是否完整——“余平生于古书遗文,虽残缺不完,未尝不保爱之”。^[55]他自豪地为一部破损的应试指南和他的老师40多年前送给他的书撰写了题跋。^[56]

其次,正如杨在另一篇跋语里说的,当他从朋友和熟人那里得到了书,总是认真地写下题跋,说明书的来源,但不给作为商品(“货”)的书写跋语。^[57]这样,1399年以后所购买的书的总数——从书摊、书铺和个人那里购买了不到13种——所证实的并不是文人书籍发行中赠书的流行,而仅仅是杨已经说过的——朋友们把书作为礼物送给他后,他习惯于记录下书的来源。简言之,如果他

的藏书到 1423 年如我猜测的总数达到 6000 卷以上,其中的大多数应该不会来自赠送。

第三,杨的题跋和许多其他文字,揭示了一个明初藏书家在接受礼物之外,建立藏书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杨关于他如何获取书籍的记载提供了特别有用的信息,因为他的家族藏书在元明之际几乎全部损毁,迫使他不得不事实上白手起家建立自己的藏书。^[58]继承的方式几乎对他没有意义:他年轻时家族里的藏书仅仅是《四书集注》和《易传义》。^[59]他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借书:为了读《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和《左传》,他从别人那里借书抄录。即使书的内容实际上只剩一半(如他十二三岁时从另一个村民那里得到的一部《论语集释》),他仍珍如拱璧。^[60]此后,他一生都在抄书,即使是在坐船出行的时候。^[61]

他一旦被聘为教职有所收入,手中略为充裕,便开始买书,如《易会通》和《易学启蒙》。^[62]当他碰到《史略》和《史略释文》,其价格远远超过他作为乡村教师的收入时,他母亲让他用一种非常古老的办法解决问题:用家里唯一的一只鸡去换书。^[63]他在武昌教书时,得益于另一种古老的馈赠习俗:一个朋友送给他柳宗元的著作,又有人将一部新儒家的书赠与他。^[64]

但是总的来说,继承、借阅、物物交易和抄写所起的作用不如购买。1399 年他一旦做了官,就开始得到很多书——在这里井上用他的统计数字得出的结论是对的——但主要是通过购买: 94

盖吾授徒廿余年,积其勤力,仅得《五经》、《四书》及唐人诗文数家而已,子史皆从人借读。皇上龙飞之初,擢官翰林,俸赐有余,不敢妄费,一以置书,自是简帙始富矣。^[65]

即使杨“丰富”的书籍也仍然有重大缺陷——他没有著名诗人谢玄晖(即谢朓)的作品^[66],《隋书》^[67]、《两汉诏令二集》^[68]、《通典》和《文选》^[69]只有不全的版本——他的题跋显示即使在官

员藏书家中间,赠礼也只是在比较大藏书的形成过程及明初的整个书籍流通中扮演了有限的角色。而且,如果说在明初购买对于朝廷高官获取书籍是一种普遍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方式,那么这一方式在明朝后半期商业出版大大繁荣的时候就变得更加普遍了。^[70]

购 买

一个藏书家到哪里、如何购买书籍?在许多宋、元、明藏书家那里这个问题难有满意的答案。从12世纪的郑樵到18世纪的孙从添,他们更愿意强调买书的各种障碍,尤其是在晚明。^[71]至少从清以前的零散史料来看,选择似乎很少。试想一下没有经验的普通读者试图自己决定去找什么样的书所面临的困难。他们手头会有几种有数的珍贵的入门书可用。至少从11世纪中期开始书商编纂的图书目录就已存在^[72],但直到明末,我们很难知道它们是否被频繁使用,以及以何种方式使用、被谁使用。其他书籍目录,特别是那些正史中的目录,有助于学者们发现书籍。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正史本身直到16世纪末还很难找到。理论上,私家藏书目录会有所帮助,但就算它们出版了,一般也是在编纂好了很久之后。在目前所知宋代编纂的33种私家目录中,只有4种留存下来,并且都不是在宋代出版的。^[73]再者,明代编纂的私家藏书目录不下167种,但只有48种留存至今,而且只有极少印于明代。^[74]最完备的宋代私家目录直到1610年才首次印刷,已经是在它编成3个半世纪之后。^[75]同样,最完备的明代私家藏书目录——其主要价值在于明本的收藏——是以不完整的抄本形式少量流传的,直到帝制中国完结后的1913年才首次印刷。^[76]但是,即便这些目录比较容易获得,这些目录以及更短一些的书目里除

了书名、作者和卷数外，很少有别的内容。结果，它们只对在充斥残本和伪本的市场上海淘书的人有点用处。^[77]

这样对中国读者来说得到书籍的途径最有可能来自商业：书贩、租书铺，以及书摊和书店，它们各自都有很长的历史。对于书贩们的活动，很遗憾我们所知甚少；我们对他们与书坊或书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知道得更少。有一条 13 世纪的史料，是关于驾船往来于江南杭州、湖州和秀州等地城乡的书贩的。书贩们在卖了几个月的书后——这些书主要以女性读者为对象，回来时包袱里的书仍是满满的，利润极少：“舟不减轻，橐不增重，蠹饱而人饥。”^[78]到元代，这种“书船”常常出自江南湖州府。除了船舶生产、藏书家和图书出版，该府还以拥有大量书商闻名，这些书商用船将书发往整个江南地区的藏书之家；此外该府还以工匠闻名，这些工匠不仅在湖州，也在其他地方从事书籍生产。^[79]

96

可以想见，一些定期到同一个地方做生意的书贩会为一些老顾客开设短期的租书铺。他们在大城镇安顿下来后，这些租书铺可能会成为书摊和书铺经营的一种业务。关于租书铺的第一条文字材料，说到约 1370 年在苏州府附郭县常熟开设的一个书摊，以低廉的价格向各种年龄的顾客出租新旧书籍。^[80]这种租书铺可能在很多个世纪以前已经出现，有可能早至东汉（22—220），那时在洛阳出现了现存第一条关于集市书摊的记载。据说这些书摊在 15 世纪早期已很普遍。如果像海南岛琼州府治那样封闭落后的地方也自诩在明初有一个向读者租书的集市书摊，那么在远为接近书籍生产中心的更繁荣的中国东南城镇，也肯定会存在同样的服务。^[81]

然而对于文人读者来说，这些书摊很少能提供什么有趣的读物。这些书摊的书是些面向非文人读者的简单通俗读物，倾向于出租语言浅显易懂的蒙学读物、道德说教故事、小说、历史演义，以及在 15 世纪被称为“俚俗驳杂之说”、到 17 世纪被斥为“淫词艳

说”的消遣文字。^[82]换言之,与这些租书铺的书联系更为密切的,是当地的口头文化和通俗文化,而非文人文化或都市书面文化。

要研究这些书摊的具体活动很难。但是,19世纪3份相对晚些的报告,两份来自华南,一份来自华北,证实了我们的印象:它们为成人读者提供的书籍与学术毫不沾边。1800年前后,在福建省福州城,租书铺上的“淫词艳曲”绝大多数是平话手抄本,尤其得到女性租书者的喜爱。读者不论男女,最多可以借阅25天,按天付费。超过借期按天罚款,并没收押金(具体数额不详)。租书者不能把书给别人看或转借他人,但有人怀疑这些规矩常常遭到破坏,原因是这些禁止条款被明明白白地列在封底。收费可能并不很低,可能是因为在租期——通常是15到25天——里读者可以亲手或请人抄录副本,或许还能将这些副本转卖给他人。这样,租书对出租者和借阅者来说都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83]

稍后,到1830年代中期,广东省广州城的租书铺所服务的是另一性别的顾客,经营的是种类截然不同的书籍(然而书的性质并无多大差别)。在一名西方传教士看来,至少有一些(似乎还是大部分)顾客是男性,他们所读的主要是小说,有时是“坏的”小说。租书铺有些是固定的,有些是流动的,租的书很便宜,租期很短。在一个书贩的2000多册书中,85%是出租给顾客的,其中一些顾客是“仆役和工厂(比如西方人在那里开的公司)的苦力”。^[84]据说该市还有其他很多租书铺,他们可能同样是为城市人口中的下层群体服务的。

另一个对租书铺的活动有相对详细记载的地方是19世纪末的北京,在那里租书铺通常位于普通的街道,是馒头铺的一项副业。租书的范围仅仅比福州略宽一些——鼓词和公案小说集——这对一个有抱负的学者来说又是没什么用处的。像福州一样,这些北京的租书铺也面临读者偷书和毁书的困扰,为此他们在书上印上下列警示,其粗俗难耐为福州的铺子(由于那里的顾客主要

是妇女?)所不及:

本斋出赁抄本公案。言明一天一换,如半月不换,押账作本;一月不换,按天加钱。如有赁去将书哄孩,撕去书皮,撕去书编,撕纸使用,胡写、胡画、胡改字者,是男盗女娼,妓女之子,君子莫怪。

98

至少从宋代开始,对文人学者们更有用处的,是书铺。最晚始于汉代,中国的读者可以去书摊——如果不是书铺的话——借阅书籍。^[85]乍一看,专一做书籍买卖的铺子似乎并不多,许多书铺兼做其他买卖,如文具及葬礼和祭祀祖先用的纸钱。^[86]把书籍印售作为经常和主要业务的书店很可能到6世纪才在华北和华南出现。11世纪后半叶,在成都和建阳,以及宋代都城开封和杭州,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这类书店。^[87]在开封和杭州,一些书摊位于寺庙内(1009年一个杭州寺庙甚至印了著名的诋佛人士韩愈的作品)。^[88]在南宋杭州,据悉城内外超过20家书铺曾印售过书籍。^[89]其他地方也存在很多书铺,这可由印本的书名页上经常把它们列为出版者推断出来。据认为这些店铺拥有或可以使用书版,可以定制刷印,然后就像书铺里的书一样出售。

然而,按照井上进的观点,一个宋代或元代藏书家如果仅靠书铺来累积藏书,很难形成相当规模,比如10000卷的收藏。^[90]相反,像15世纪初的杨士奇和16世纪末的胡应麟一样,他会经常通过从其他藏书家或其子嗣那里购买或抄写得到书籍;或者像李日华那样,从上门的书商(1609至1616年间有超过50个这样的商人拜访了李)那里买书。^[91]我们不妨回想一下12世纪的伟大藏书家郑樵曾列举了获取书籍(应指比较罕见的书)的八种方式,其中并没有提到书铺。^[92]

但是,当看到主要从事卖书的店铺只是在16世纪初才第一次在江南大多数城市变得普遍起来时,可能仍会令人感到奇怪(见

99

图5)。特别是松江,看上去发展非常缓慢。1234年,当知府王雍发现府学的藏书实际上丧失殆尽之后,他令人从苏州一个大姓那里买了诸如《十三经注疏》之类的书,可能是因为没有在松江看到有卖的。^[93]16世纪初,松江藏书家陆深(1477—1544)如想看到大量的书就不得不跑到南京和北京去(即使到那时也只买得起残缺、便宜的书)。^[94]到1530年代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个田产很少的松江医生,在松江府从书贩和书铺那里得到了17000卷书(要知道仅仅在两代人以前,士大夫叶盛的22300卷藏书是江南最大的一宗藏书)。^[95]

到16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类似的变化在长江中下游的各个府治和北京是很明显的。书铺集中的坊区在苏州、杭州、南京、北京和小一些的城市,如开封、南昌(在江西省)和武昌发展起来。^[96]根据一项最近的统计,到1600年前后,南京至少有93家商业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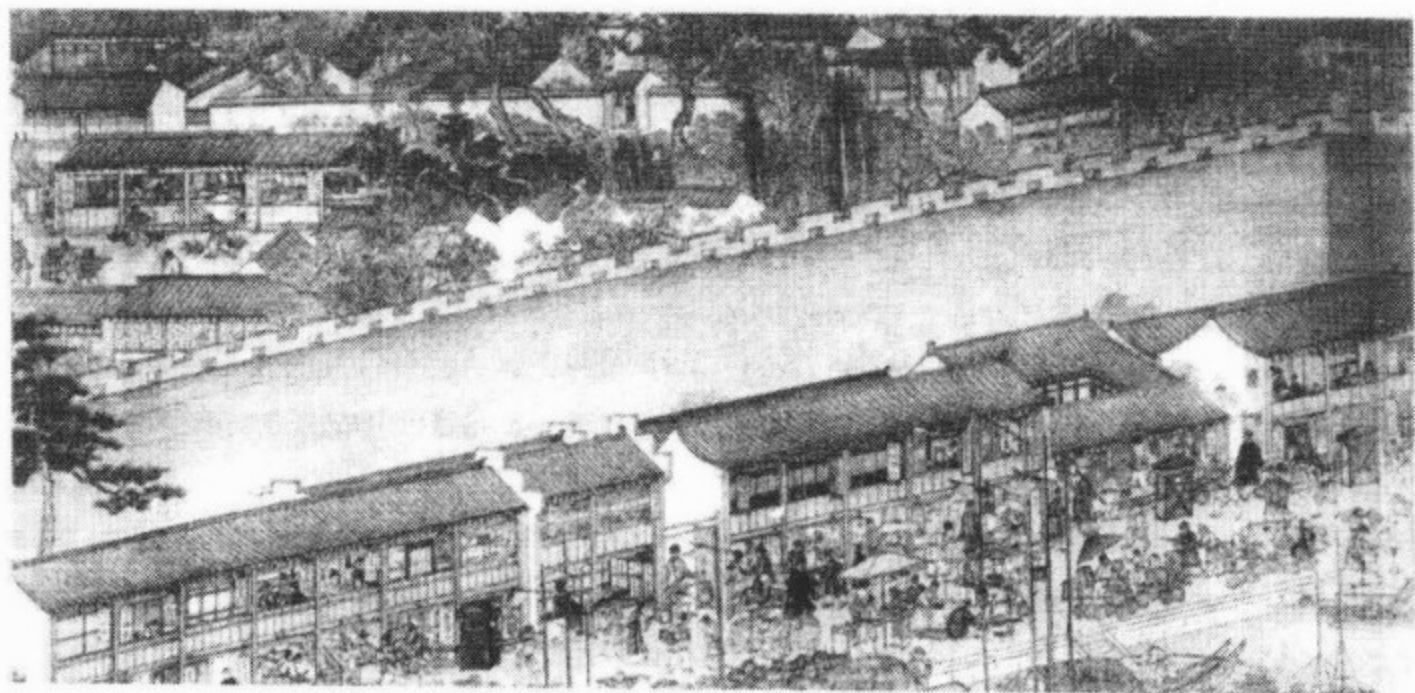


图5 18世纪中叶苏州半截街的书铺,见徐扬《盛世滋生图》(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图版53。

100 机构,苏州有37家,杭州有24家;在以后的40年中,直到明末,至少在苏州这个数字增长了将近3倍。^[97]其中的每一个出版机构,同时也是他们所印书籍的销售点。而且,不晚于1630年代,经营从大的私人藏书那里买来的书的“古书铺”,在苏州、杭州及浙江

其他一些城市,甚至在江西南昌出现。^[98]

要描述 16 世纪晚期这一繁荣的出版市场的构成,没有比胡应麟的观察更具启发意义的了。胡生在浙江南部内陆一个小康的士大夫之家,10 岁时就是个神童,当父亲把他带到北京的书铺时,他就染上了爱书的癖好。^[99] 16 岁时,他首次游历江南的城市,以后又去过多次。从 18 到 23 岁他和父亲在北京生活了 5 年。在随后的二三十年里,他节衣缩食,四处借钱,典当衣物,甚至动用妻子的银簪子,都是为了到运河和长江沿岸的城镇买书。到 30 岁时,他的个人藏书达到约 20000 卷,主要是在北京获得的,比他在江南家乡买的还要多。如果加上他家以前的藏书和他后来所购置的浙江大宗藏书,最后总共超过 42000 卷。虽然这些藏书主要由相对便宜的福建本子组成,其规模仍足以使胡在令人惊讶的年轻年纪跻身于明代藏书家前列,领先于浙江许多学术世家。^[100] 丰富的诗文收藏,也使他自己的作品中充满了比喻和典故,因而在江南的士人潮流引领者——尤其是王世贞和他的弟弟王世懋——那里赢得了不少敬慕者和支持者。颇具影响力的王氏兄弟愉快地充当了胡在江南文人圈子中的支持者。

胡曾取得举人资格,但从未入仕。他似乎从未干过什么营生,而是依靠父亲的薪水和家族的田产过活。^[101] 与官员藏书家相反,在胡所搜集的书中,从官员那里获赠的书,及从旧藏家那里抄来的书相对来说很少。购买甚至计赚,看来是他比较喜欢的途径。^[102] 17 世纪初福建的藏书家谢肇淛称,“求书之法……莫精乎胡元瑞”^[103]。这种技巧在他对 16 世纪图书市场的描述中表露得最为明显。诚然,他的知识可能不如他自称的那样广泛和准确,因为他待在南方书籍生产和发行中心苏州和南京的时间很短,他很少到扬州、武昌和湖州去,根本没去过福建和徽州。特别是他可能严重低估了闽北的生产水平,因为他从未去过那儿,他主要只对以像他这样的精英为读者对象的书籍生产和发行感兴趣。但是,他对江

南主要中心城市繁荣的图书市场的描述,不仅是关于晚明中国书业组织和运作方式的最佳指南,也可以说是明代统治下华北和华中任何一种商品市场的最富信息量的报告。^[104]

胡告诉我们,16世纪晚期有4个城市远远超越所有其他城市成为书籍发行中心,它们是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北京,作为主要的皇家都城,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书商,尤其是在科举考试期间。北京1530年代即有书铺开张,一开始就领先于江南的多数城市。但是,到16世纪最后25年,北京的领导地位衰退了,因为它向消费者提供的书籍仅及苏州的一半。而且,作为出版中心,北京仍是一潭死水。宫廷和政府印刷在继续,但高昂的纸张成本使印刷价格比浙江贵3倍。北京的民间出版到18世纪才真正繁荣起来。

在江南,到16世纪下半叶,情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杭州仍然是“东南的枢纽”。杭州的书铺从南宋的总共二十多个,发展到“大约三十个”。^[105]这些书店集中分布在杭州的四个主要十字路口,以及经过选择的临时地点,以迎合旅游者、科举士子和寺庙(佛教印刷品会把消费者吸引到昭庆寺,在那里卖书的都是和尚)进香者的季节性需求。但是,对胡应麟这样狂热的藏书家来说,杭州的古书市场只是偶尔令他眼前一亮,而在杭州新近的出版物中,出版者常使用易于刊刻的杨木,还没有从该世纪早些时候所记载的刊刻质量的谷底中完全恢复过来。^[106]而且,其市场被从苏州、南京和福建运来的书籍压倒性地占据了。

高质量印刷品的生产和发行中心,无可争议地转移到苏州、南京和常州。这类印刷品数量不断增长。胡估计苏州和南京各自印刷的书籍,比位于华北陕西省的西安和3个江南城市嘉兴、湖州和扬州加起来要多5到10倍。根据一项初步的估算,16世纪的苏州城有超过650个刻工和约37个书坊,主要位于阊门和吴县衙门附近。^[107]其刊刻、印刷和装订质量只有南京可与之匹敌。数量不断增长的印本(包括南京的)吸引了来自整个帝国的书商,类书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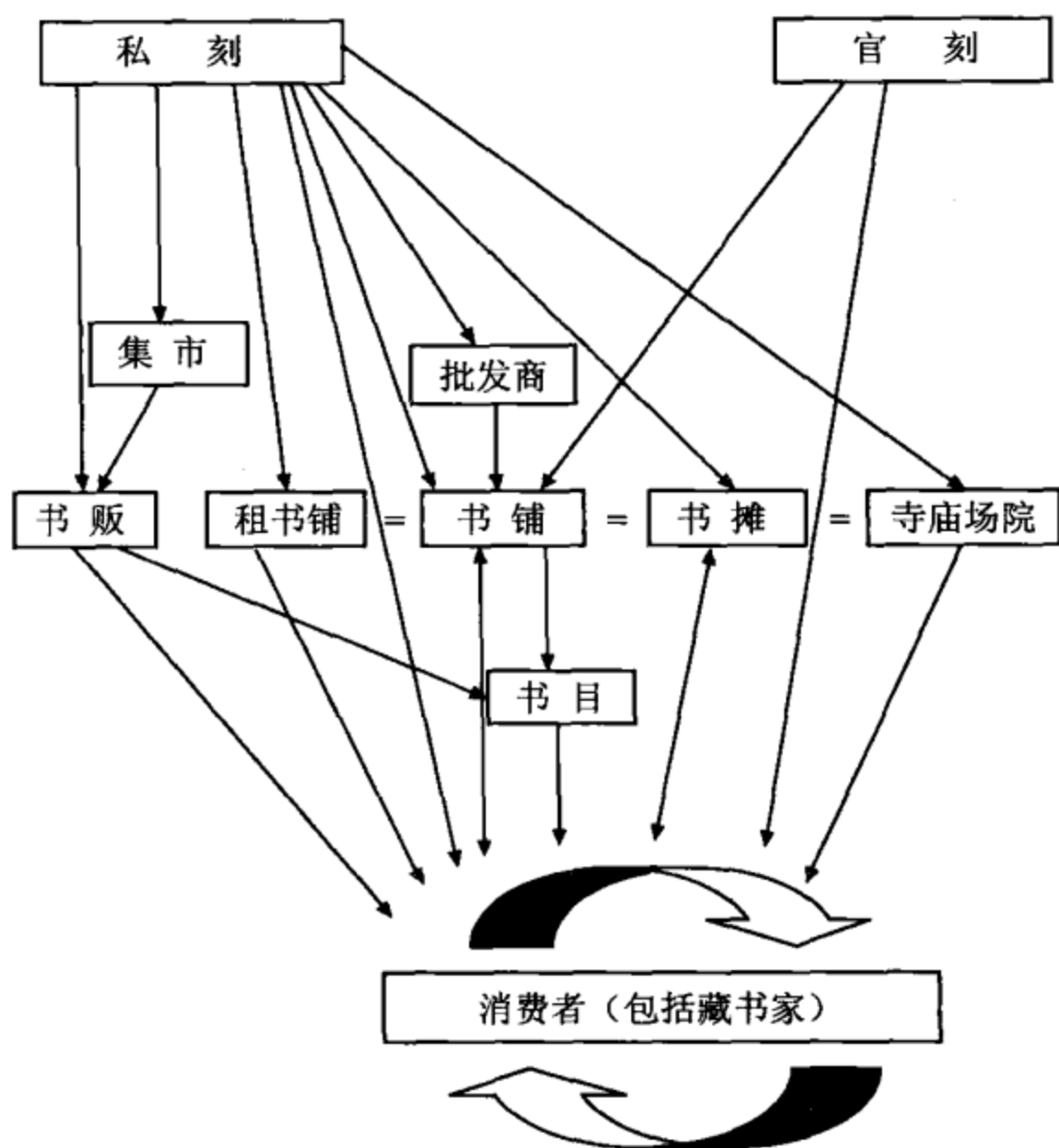
受青睐。事实上,按照胡的计算,苏州和南京两地的书业加起来相当于当时福建所生产书籍的两倍。这个计算可能存在问题。

但是,用胡的话说,这两个城市“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一个来自福建的出版者可能会在南京取得书版并开设书铺,福建的刻工有时会在苏州找到活计。^[108]但是,南京和苏州的书铺里架上的书据说只有不到3%——这个数字绝对是太低估了——来自其他地方。^[109]尽管苏州的书版刊刻成本仅及北京的60%或皇室的20%,这两个出版中心的刊刻成本也还是很高的。它比杭州高出40%,是福建的两倍。结果,苏州和南京的印本,尽管有时依赖来自福建的刻工刊刻,越往南去市场份额越小,但在扬子江流域的其他地区和北京却特别受欢迎。^[110]在著名的南京生活记述者周亮工(1612—1672)看来,这两个城市的繁荣局面一直持续到清初。^[111]到清初出现了两种层次的书铺:小书铺常丛集于城市中集市区的主要路口(如苏州的虎丘和阊门、南京的三山街、杭州的虎林);批发点有时位于寺庙(如南京的承恩寺)场院之中,在那里大书商把书卖给从外省来的游客和商人。^[112]

103

这些书坊的财务、管理、竞争与合作状况,以及它们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仍不清楚。将来的研究无疑将揭示出版者如何买卖书版,如何共享刻工、刷印匠和其他工人;某些书坊如何与某些作者建立和维持关系;它们如何专擅某种特别的出版物;江南的一些书坊如何往国内别的地区发行书籍,甚至可能达成反侵入协议,防止在它们可以进入和主宰的市场上出现同种书的竞争性版本。^[113]并不奇怪,许多出版者只存在过很短的时间,因为技术上允许非常短期的投资行为,另外工匠们并不永久性地依附于单个书坊或出版者。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书的内封上所提到的出版者有时可能仅指可以买到这本书的地方。

然而暂且把这样的推测放到一边,我们可以把我们目前对于17世纪中叶江南书籍批发和零售市场的理解作一个归纳。



104 士 人

在这里对晚明书籍市场的宽泛描述，掩盖了士大夫在中国精英文化再生产中所扮演角色的深层变化。到目前为止，我使用士人(literati)这个词来谈论这样一群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一生花费很多时间来阅读、学习、记忆和传播文本，通常抱有取得进士头衔的目的，不断地出仕或归隐。这些人在从宋代以前直到20世纪中国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是，请注意一个有趣的现象，实际上所有留存下来的宋人文集——及其他文献中占压倒多数的部分——是由拥有进士头衔的士大夫阶层所写作和收藏

的。元代,变化的迹象很明显,儒学的声誉直线下降,因为政府偏爱其他入仕途径,而不仅仅是科举。相对重要的藏书家阶层里就有了两个社会背景非常卑微的人:一个是屠夫之子,另一个是布商的儿子。^[114]

然而,士人社会阶层的变动在明代后半期变得十分普遍。许多从未做过官的人加入了士大夫作家和藏书家阶层,他们现在正创造、消费、传播和增进着士人的书文化。^[115]那些只拥有最低级功名的作者、编辑和藏书家,比如像何良俊、冯舒(1593—约1645)、陆贻典(1617—1683)和钱同爰(1475—1549)这样的生员或贡生,令人意识到,主要士人作者和私人藏书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已经既不是他们自己,也并非来自官员或高级功名拥有者之家,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换言之,士大夫,或进士头衔拥有者的书文化,得到了我想姑且称之为生员和普通人书文化的补充。对这种变化的感觉可能有一部分是错觉,因为这类人的很多出版物可能在此前的世纪里由于偶然因素佚失了。但是它也反映了这类书有了更多的读者,以及士人学问本身特征和内容的变化。

105

当然,仍然有许多通过了乡试和会试的作家和大藏书家。如果没有像胡应麟、黄居中、张萱和文徵明等拥有举人头衔者的记述,我们关于明代书籍收藏的知识将会严重匮乏;同样,如果没有像叶盛、陆深、李开先、杨循吉、王世贞和范钦等进士头衔获得者的实际收藏,我们自己的图书馆会远比现在匮乏。而且,在明朝的最后几十年里,一些举人和进士的孩子和兄弟将生产出100多种高质量的多色套印书,这些书在世界范围内堪称雕版印刷的奇迹。这些书显然是以受过教育、有教养的绅士阶层为消费对象的。^[116]

而且,一些拥有高级功名的人还参与了为盈利而进行的书籍生产,显示出一个明显的迹象——江南的士人世界已经发生变化。在这个更加商业化、竞争激烈和多样化的世界里,一些高级功名拥有者的作品被上市出售,学者们甚至表达了某种原始的保护版权

的愿望。^[117]举人张凤翼(1527—1613)对于考取进士和诱人的仕途是如此绝望,以至于他在苏州的家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宣布售卖他的作品:

“本宅纸笔缺乏,凡有以扇求楷书满面者银一钱,行书八句者三分;特撰寿诗寿文,每抽各若干。”人争求之。自庚辰至今,三十年不改。^[118]

这些作品最终会被编入作者的作品集并出版(有影响的士人归有光(1507—1571)——他也是进士和官员——的文集,最终包括了170篇序,占了其所有散文作品的近四分之一)。

106 艾南英(1583—1646)可能是我们所掌握的财务状况最清楚的士人作者。他1620年代初考取举人时,发现他的观点和批评言论,在当时被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所把持的朝廷圈子里不被欣赏。虽然在过去拥有这样功名的人可能会呆在他位于江西省的家里,靠当地的田产过活,然而艾却无法享受这种舒适的生活。1621年,他和哥哥分割了父亲的财产,总共继承了117亩地(其中一些可能只有租佃权而没有完全的所有权)。由于来自这笔财产的年收入为117蒲式耳谷物,即使在父亲的财产分割之后,他还需要供给50个人衣食,显然艾需要找到其他来源以获得谷物和收入。一个解决办法是购买便宜的谷物;这样,每年的第11个阴历月,他便购买新收获的谷物储藏起来(或许兼作投机?)。但从1628年至1631年,飞涨的米价使这一策略十分脆弱,因为这不仅使他无法买地,而且在1629年还因此损失了大约四亩地。对于艾的财务困境,另一个更好的选择是做官。由于魏的死去,一纸诏令召艾去参加会试,但艾却没有通过。第三个被证明更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写作。艾提倡用一种“古体”来写作,并身体力行,赢得了众多效仿者,大概也有很多忠实的读者,满足他们的需求很可能是艾在这些年里频繁往来于苏州、北京和现在位于湖北省的汉江地区的原因。

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收入如此之少,而这些旅行似乎给他带来了必要的收入,使他最终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天佣集》,并购回了曾属于两个叔叔的田产。^[119]

数量远为庞大的生员的能量,对明代后半期刊印作品范围的极大扩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低级功名只给他们带来繁重赋役的暂时豁免,许多人为了更高功名所带来的稳定性和官位而奋斗。然而,命运却和他们作对。例如,苏州府的8个县有1500个生员名额,却有数万考生参加考试。在他们中间,每三年只有50人能够进而参加举人考试。^[120]1453年乡试的通过率是11%,但到1549年降至3%,1630年降至2%。^[121]下一步全国范围

107

内会试的低通过率,进一步减少了成功的机会,然后可能还要再等上数年,才有可能幸运地得到一个有利可图的职位。这样,即使苏州赢得了会试中产出最多进士的名声^[122],绝大多数士子却从未能参加乡试,遑论会试,更未获得过帝国的一官半职。

这一极高的落榜率,以及作为低级功名拥有者的微薄收入,迫使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靠家族资产或自己的劳动过活。只有极少的人有第一种选择,加上许多人舞文弄墨强于挥舞锄犁,这些具有低级功名的人常常到繁荣的商业出版世界中寻找工作,以获得至少部分收入。一些人为有钱人代笔,不停地撰写碑铭墓志、应酬文字、序文和应景之作以换取报酬(有一部文集因有三分之二的内

容出自枪手而著称)。^[123]这样,与一些没有任何功名的读书人一起,这些具有低级功名的人,为极大扩展的读者群撰著、编写、纂辑、修订、复制、出版和收藏读物。他们的书满足并滋养了一种对于应试、医药、诗文、字典和多种士人爱好等方面的“指南书”的普遍兴趣。他们还编纂著名作家的全集和选本,撰写故事或通俗小说,编写任何主顾们想看的东

西。^[124]作为文人(原文为 men of letters,意为“文人”,也可指男性文人,与下文“女性作者”对举。——译注)(女性作者和藏书家数量仍然很少,而且不公开为

市场写作)^[125]，他们可能会被一些清高的士人鄙视为追逐铜臭的俗人。^[126]但是一些平民收藏家，如姚士舜(1561—1651)——20出头才识字，最终拥有超过20000卷精校本^[127]——为拥有高级功名的人所称誉，而以前这些人是在另一个隔绝的社会圈子里流动的。

108 这些作者从商业出版者那里所得报酬的具体数额还不清楚，仅就图书编纂和撰写而言可能只有极少相关资料留存下来。^[128]但是士人和平民卷入商业出版的范围和程度，可以通过观察士人藏书家在书籍生产的三种不同活动——出版、编纂和销售——中的行为来理解。士人很久以来，至少从11世纪初开始就已参与书业，通常他们是作为家庭出版者和书籍销售者，当时据说所有的书商都是“士”。^[129]即便这是夸大之词，这一观点也显示在宋代和元代，这一社会群体不仅在书籍消费，而且在书籍发行和生产方面处于怎样的中心地位。

我希望引用几个著名宋元士人出版家和书商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11世纪初，知名士人穆修(979—1032)不仅找人刻印了著名士大夫韩愈和柳宗元的文集，还亲自到开封相国寺的书摊上售卖。^[130]著名新儒家学者朱熹对于自己的作品被盗印如此气愤，以至于在孩子和门生们的帮助下，亲自出版了约35种自己的著作(主要是儒家经典和其他名著的注释)拿到市场上出售。^[131]他的对手唐仲友在浙江拥有一家书店，出售他用政府经费出版的书籍。^[132]12世纪的出版家于仁仲，甚至以自己是国学监生作广告宣传。^[133]诗人陆游和他的儿子陆子遯出版了51种书，岳飞之后岳珂出版了两种私史、个人文集和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注释。^[134]杭州书商陈起(活跃于13世纪初)在首都开书店前曾参加会试，他售卖、编辑并出版书籍，并以优雅的谈吐和好酒结交了许多学者。他在政治上遇到麻烦，就是因为印了一首被某些官员认为是批评宰相史弥远统治的诗，因而遭到放逐，但并未使他失去其他官员的尊敬和喜爱，他们尊称他为“士”。^[135]上海藏书家孙道明(1296—

1376)乃一介屠夫之子,手抄了几千卷书,被藏书家和书法收藏家以重价收购。^[136]

晚明卷入出版世界的士人的特别之处,是这些士人的数量和他们为了他人的书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范围,以及他们从科举和官场中脱离出来。晚明最后岁月里最重要的出版家无疑是毛晋。¹⁰⁹作为极有影响力的士大夫钱谦益的学生和追随者,以及一个富绅之子,毛只做到监生,就屡屡在科场败北。1620年代他受母亲资助,建立了一间书坊——汲古阁,在以后的40年中出版了近600种书,其中许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印刷或第一次大批量印刷。起初他印书依靠的是继承和购买的84000卷藏书,随后靠从苏州府常熟县其他同乡那里借书。他出版的书很大程度上致力于使唐、宋、元作家的作品集,史书,儒家经典注疏及以士人为读者对象的小说的宋元珍稀版本,变身为时人易得的当代版本,尽管所用文本并不总是很准确。^[137]他有20名刷印匠——这是一项最近的研究在现今雕版印刷实践的基础上估算出的数字——来从事所有这些工作,这意味着总劳力为大约200名常雇工人。^[138]所有这些工人都住在他家里(刻工住在两个走廊上,靠近储存书版的九个储藏室)。他的儿子继续从事这项工作,只是没他那么成功,他孙子接手后这项事业就终止了。这个孙子不顾祖父的告诫——子孙若不卖书就有辱家声、禽兽不如,据说把刊刻唐诗的书版用来烧火煮茶。^[139]

许多晚明出版家靠外请编辑来纂辑和编写图书出版。当他们以新的形式重印数量惊人的旧籍时,他们需要知识广博、有条件利用各种藏书开展编纂工作的编辑。在江南,这些“老板—编辑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陈继儒,他成功的文学生涯只是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科场上的失败不再能够妨碍一个人在文人圈子里取得很高的地位,并从商业出版中致富。^[140]在取得生员资格后陈多次科场失利,29岁那年他放弃了举子梦,开始了一段漫长而获利颇丰

110 的生涯,用他人提供的资金撰写、尤其是编纂大部头的集子。作为有影响的士大夫画家董其昌的同窗和其他松江士人的密友,他利用在士人和官员中广泛的关系网,利用接近好友们的藏书和关系上的便利,以及他自己所藏的大量珍稀书籍,来纂辑那些江南出版商和读者感兴趣的士人书籍。他将那些被他的名声、关系和酬金吸引而来的江南学者组织起来,从事编辑、抄写和校对。最终,书印出来后编者和纂辑者是他,即便工作被包给了他人,有时甚至是拥有进士头衔的人(这些人很可能把工作转委他们的下属)。一般情况下,他会选择那些关于士人生活、爱好、娱乐和历史方面的作品。他的朋友作序吹捧他的卓越才能,这些书很快在士人、商人,以及渴望学习那种令士大夫精英与地方文人区分开来的文化的人们中间风行起来。^[141]

一些平民收藏家,如苏州热衷于收藏小说的顾元庆和嘉兴医生殷仲春,实际上亲自从事编辑和出版,可能是因为他们所收藏的领域不是那么被人看重。顾住在苏州城的西北郊,在那里他出版了最初出于个人爱好而搜集的珍稀版本。他对“小说”有特别的兴趣,出版了两部大的小说集和多部短篇作品。^[142]殷仲春是嘉兴的一个乡村医生,他把收藏医学书籍的癖好变成了一项出版事业。他年少时就在口袋里揣上零钱,看到残缺破损的医书就用几个铜板买回来。最后,他带着藏书到了江西省,和那里的几个医生一起编辑出版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专科目录之一——《医藏目录》,收入了590多种书。最终他的成就赢得了许多士人的钦佩,作为死后哀荣的顶点,陈继儒为他撰写了墓志。^[143]

藏书家—编辑家—出版家合一在晚明江南是个普遍现象。童佩的经历与众不同,这个平民不仅收藏、编辑和出版书籍,还积极
111 卖书。^[144]不太夸张地说,他甚至可以称作一个书贩。尽管他大量退休时光似乎是在浙江山区龙游县的家中度过的,但童迫于家中田产贫乏,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在外谋生,主要活动于江南地

区。在那里,他不仅说话带上了苏州口音,也继承了他父亲作为一个书商在苏州建立的私人关系和商业关系。他父亲可能养了一个苏州女人作小妾,却缺钱送儿子到当地学校读书。这样,童由他父亲教会读书,又用他父亲书袋里的书自学写作古诗。最后他对作诗的精通和艺术鉴赏力据说引起了一些人的忌妒,同时也赢得了一些人的称许,绅士和官员们争相把自己族中的女子嫁给他,把他引荐给朝廷,给他钱。他拒绝了所有这些好意,既不表示谦卑,也不表示独立,而是为了继承父亲的事业,继续销售和出版书籍。有时他住在家里,有时乘船在江南许多地方旅行(这是许多书贩把书从浙江运到苏州的普遍模式),靠贩卖旧书过活。据说他的25000卷藏书中包括不少珍本,其中有三分之一是猥杂的。这些藏书列在一份目录中,这份目录也可以很容易地变为他的商品库存单(据说他曾把几部古书借给书商,后者按年付给他钱,他又把钱转给他哥哥)。^[145]

在山东和湖南旅行期间,他写了山水和纪游诗,回到江南后和士人朋友们交换。最后,他编辑了家乡县志中的几卷,印刷了几部诗文选(其中一些最后归入天一阁),他自己的诗文集则被一个苏州士人编为6卷。他的商业活动证明很成功,足令他与士人们广为结交(他帮几个人从债务中摆脱出来),并在游历山东和湖南期间与他们中的一些人酬答诗文。有趣的是,他的士人朋友包括了当时江南几个相互竞争的文学流派的头面人物。一方面,他是苏州著名作家归有光的门徒^[146],及苏州另一个商业出版的领袖人物王穉登的密友(童想必卖过他们的书)。但是,他也与另一个龙游藏书家胡应麟过从甚密,死后在江南绅士圈子里得到胡的老师王世贞为他撰写传记的哀荣。这样,在一个仍然需要保护人的社会环境里,用为他作传的人的话说,童“以鬻书为业,而志存儒道,兼有事于诗文,盖隐于贾者也”,他能够跨越迥异的文人圈子,从而左右逢源。^[147]与14世纪末一个武昌学者对自己的售书活动即

使对好友也讳莫如深相比,这种对从事商业出版活动的开放态度与之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反差啊。^[148]但是,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文人藏书家黄丕烈和钱听默不同,童从未作为一个书商在苏州开设书摊或书店,给人指示从私人藏书中冒出的书籍的来源。^[149]

局 限

我不禁想用19世纪初一个英国观察者的评论来结束这份关于晚明商业图书发行的报告。他说,在中国,“书籍贸易是一项有利可图而又最受人尊敬的生意”^[150]。但是,至少在晚明,任何关于商业印刷和图书市场已经战胜和取代所有竞争对手的说法都是非常不恰当的。回想一下已经指出的两点——官员圈子里流行的赠书行为,和16、17世纪大型藏书中许多书籍的短缺,要认识到晚明的书店还很稀少。根据胡应麟的记述,在府城和省城以外只有极少或几乎没有书店存在。直到18世纪,当来自老的和相对较新的生产中心的移民,在江西、湖南、四川和闽南的内陆市镇、甚至乡村地区建立新的商业出版中心时,我们才看到一些书店开始在这些府城、省城以外的地方出现。这些移民的力量甚至可以在北京看到。1769年,刚到过北京琉璃厂书肆的一位客人,列出了一份书铺及店主的详细清单,发现这些老板大部分来自浙江湖州、江苏南部的苏州和江西金溪县。^[151]

但是通过市场发行图书的局限不仅仅是结构性的。明初皇家和政府机构主持的出版活动在明中叶衰微了,不仅被商业出版所超越,也被士人和藏书家等上层绅士所主持的出版活动超越。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明末藏书家和诗人徐爌(1570—1642)。^[152]像胡应麟一样,徐一生沉迷于藏书和读书,以至动用大量的家庭财产来

聚敛藏书。通过在别人家抄书,向他人讨要副本,朋友的赠书,以及经常买书——正如他的书上留存的题跋所显示的,他得到了不少罕见和难找的书。此外,有几年他靠一个福州的吏、同时也是一个藏书同道的帮助,据说买了占他所有藏书中十分之七的书。^[153]其他时间,他到南京、苏州和杭州等江南城市作了至少7次长时间的游历,结交了许多著名藏书家^[154],并到了江西南昌、皖南徽州的歙县和西南边陲的云南省。^[155]据记载他曾在宁波、杭州、南京、南昌和闽北建阳的书店和书肆,以及浙江内陆衢州的寺庙里买书。^[156]他特别喜欢去的两个地方,是1599至1609年间建阳的书店和福州城官贤坊的一个小书店。^[157]他出版了自己和他人的诗文集,以及一些小说(可能还进行出售,尽管他说自己的爱书生涯中唯一商业性的活动是卖旧书)。^[158]

但是真正令研究书籍的社会历史学家对徐感兴趣的,实际上在于他对火爆的商业出版世界没兴趣。如同童佩,他终生只是一介平民,即使报考秀才也屡次败北。但是,与童不同,他来自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父兄拥有功名),他利用家藏70000卷书来与江南的著名藏书家和一群藏书的福州官员,尤其是曹学佺(1574—1646)建立关系。他与福州和江南的其他成员一起成立自己的诗社。^[159]这样,可以理解的是,他一直希望置身于商业世界之外。^[160]他的145篇图书题跋中只有一小部分显示这些书是买的。与此相反,更多带有这类题跋的书来自友人的馈赠,和他自己从别人的藏书那里抄录的珍本。

114

更重要的是,他寻求与那些可能成为他保护人的爱好藏书的官员接近。1639年,他与有影响的士大夫藏书家钱谦益商议共同搜寻书籍,复原历史上两位藏书家的藏书目录,只是由于明朝灭亡及随后局势动荡才使他们的计划破灭。^[161]然而,与他关系最近的保护人无疑是他的藏书家朋友曹学佺。他跑到湖南和云南曹学佺的官署去拜访曹。他和自己的哥哥为曹出版的书写序;在福建他

和曹一起成为诗界领袖；他为曹买了一部唐人著作以供出版⁽¹⁶²⁾；还经常与曹酬答诗文。曹用各种方式施以回报，包括修筑徐的藏书楼以供其藏书。换言之，这个藏书家不是简单地通过继承家族财产来生存，他也从一个更富有的官员保护人那里获得支持，这个官员把他引荐给外地的藏书家，向他提供保管藏书的设施。晚明可能出现了商业印刷的大规模扩展，但士人们依然在市场之外的政治圈子里寻求保护人。然而，不同于王朝早期，保护人不是来自朝廷，而是来自地方高官。

藏书圈子里这种密切的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对急于找到和获得书籍的藏书家来说也是同样如此。即使在某地一本书有许多复本分散在不同的藏书中，但很可能其中最多只有几部能够被人看到。一代到十代人积聚的家族藏书频繁散佚，导致图书易手，但无论是在旧主人还是新主人那里都没人能保证这些书会向他人开放。这样，这种书籍流通并不必然导致观念和信息的迅速传播，或在士人中形成这样的强烈意识——他们作为学者共有的兴趣比他们各自的家庭关系更为重要。这种为获得书籍而进行的努力，及其对“知识共同体”形成的影响，是下一章将要讨论的内容。



第四章 中国学术世界中获取 书籍的难题

一部书、一部手稿及一部印本的诞生，象征着知识从作者个人拥有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最终进入读者手中。与过去师徒口耳相传的方式比较，这种共享学问的方式最终——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在传播和保存知识的过程中倾向于鼓励一定程度的非人格化。书籍的印刷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因为它产生了大量相同的副本，以供广泛传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知识的非人格化，即它与其创造者的分离，上升到主导地位，原因在于印本本身实际上就意味着它最终到达藏书家和其他读者手中时，作者并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彼此之间也互不相识。这些人希望根据自己的目的来利用印本中的观念和信思，完全可以用原作者想象不到的方式把书变成他们自己的。

近年来，有两种书籍流通模式利用这样的思路来阐明西方近代早期人文主义知识传播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一种模式由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提出，关注知识生产与传播中的不同参与者。另一种由托马斯·R. 亚当斯(Thomas R. Adams)和尼科拉斯·巴克(Nicolas Barker)提出，更倾向于研究书籍本身，分析书籍为了读者的使用需要在机构和个人收藏中的流通。这两种模式在承认书籍流通越广，就使得知识非人格化、抽象和自省(self-reflexive)的特性越强的同时，也同意通过民间出版者和书店，以及图书馆、大学等机构的活动，市场越来越便利地向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即使面对书刊审查，也可以通过一种融合了金钱、诡计和勇气的方式来加以克服。⁽¹⁾

116 不幸的是,对于一份关于中国书籍流通的报告,这两种模型存在严重的瑕疵。它们假定书籍在一个没有严重瓶颈的状态下顺畅流通,而无视严苛的状态和昂贵的价格。然而在从宋代到清代的学术世界里,学者和学生们一直在抱怨难以读到他人藏书中的学术著作。书籍一旦被从上一章所描述的商业店铺中买走,往往就被储藏起来,几乎不向非家庭成员展示,直到它们因被转卖或继承而重新现身。

的确,中国的读者通常能够得到科举考试所用的儒家经典、11世纪时由政府和民间机构印刷和发行的医书,以及由佛教和其他宗教团体提供的有时可免费获取的各种(通常是宗教方面的)书籍。^[2]的确,如果是官学师生、官员、有功名者,至少可以读到一些官学里的藏书。^[3]而且的确,不晚于11世纪中叶,一些读者可以从书商为私人读者编纂的目录那里了解到书籍的信息。^[4]

但对于士人文化中的其他著作——比如非官方的注解、史书、诗文集和其他数不清的士人书籍来说,印刷技术和市场发行的解放作用,其渐进性比汉学家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大得多。^[5]直到16世纪之前,这一问题可能主要是由于印本和抄本的短缺,以及我们已经考虑到的出售士人作品的书店和书摊数量相对较少而引起的。但是,即使在印本的崛起和传播使书籍和书店的数量在江南极大增加之后,那里获取书籍的问题依然存在。事实上,当我们重新审视1600年以前的记载,可以看出原因并不简单地是成本和产量的经济因素。其中也包括学术书籍的收藏者一直不愿意让别人读他们的书。这些书的主人倾向于把书视为自己的物品,差不多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创造物,认为拥有这些书有利于通过高度个人化的传递链条控制书中知识的传播。

117 换言之,对书籍使用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帝国晚期国家和市场在满足读者和藏书家需要方面存在相对局限性的许多信息,这些读者和藏书家渴望有能够比市场更好地满足他们需求的机构。

如果像我们在下一章将要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国家最后不得不在创造一个比以市场为基础的知识传播体系更为全面的知识共同体中扮演关键角色的话,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所讨论的7到8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或民间藏书家失去了他们作为学术世界掎客的支配地位。

这样,我希望在本章探讨士人和学者接近藏书这一问题,主要范围是11至17世纪的江南。在对前近代(pre-modern)西欧和中东的这一问题进行简短比较之后,焦点落在中国中央和地方的政府藏书上,尤其是它们的管理问题,而不是严格限制藏书使用的问题。然后集中讨论大型私人藏书,描述了它们对于借阅图书——尤其是珍本和古本——的限制性政策。我的目的与其说是评判这些做法,毋宁说是解释和评估它们在这些世纪中对学术世界,尤其是对在国家机构之外形成和维持广大的“知识共同体”(community of learning)的广泛影响。虽然我对这一问题兴趣的形成部分源于我所读到的伊拉斯谟(Erasmus)所称的“文人共和国”(a republic of letters)在欧洲近代早期的确立^[6],这一论题的选择实际上来自对中国史料的广泛阅读,这些史料不断显示无论是中国的读者还是藏书家,都对于书籍的获取有很深的关切。虽然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对象——与更一般的文人书籍世界相对的学术世界——比前面两章所呈现的更窄,但它所构成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儒学传播的中心,也存在于在精英圈子之外为实践这种学问的观念和价值所作的任何努力。这样它就应当处于讨论新儒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这7个世纪的学术世界的核心。

知识共同体?

将“文人共和国”的概念引入对中国学术实践的研究很可能

看起来有些牵强和误导。但是,其中心观念——一大群受过教育的人在国家和宗教组织所控制的知识参量之外,共同参与一个共享的人文主义知识实体的学习与发展——很难说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史不切题。剥离了它所暗含的宗教与世俗的对立和任何西方的政治理念,改称为“知识共同体”之后的“文人共和国”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框架,用以分析自3世纪以来在中国书写文化的传播中想要承担领先角色的学者们所面临的问题。^[7]有时,学者们的这一主张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处于与帝国朝廷的竞争——如果不是冲突的话——之中,朝廷同样想要扮演学术和艺术的创造者与保护人的中心角色。虽然通常在资金和其他资源方面无法与朝廷匹敌,这些学者——尤其是藏书家——想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包括不晚于17、18世纪提出的一个儒家学术的共享藏书概念——儒藏(a Confucian canon)。

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晚明士大夫曹学佺。我们在上一章结尾曾提到,他是福建省福州府的学术赞助者。曹自己作为一个藏书家,对其他藏书家的封闭式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在他看来,他们将他人拒之门外,减少了这些文献流传下去的机会,因为他们所藏的少量书籍在火、水、盗贼和继承习惯的威胁面前还是显得十分脆弱。为了避免这些灾难,曹号召编纂和散发儒家学术的全部文献,它采用佛藏和道藏的方式,性质远较私人收藏为“公”。他要求有私人藏书的家塾不再只为自己的师生服务。相反,这些教育场所是为了吸引来自远方的师生,他们将学习和传播这一儒家整体文献收藏的学问。在10多年时间里,曹努力完成这一宏愿,但未成功。明朝的陨落导致他的死亡和梦想的破灭。^[8]大约120年后,山东著名藏书家周永年(1730—1791)复活了曹的理想,宣布向其他学者开放自己规模巨大的藏书,倡言需要为他们建立一部核心藏书。虽然他也未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使其收藏真正完整和全面,但他和曹的理想鼓舞了阮元对儒家经典的大规模

编纂,即 1829 年出版的《皇清经解》。^[9]

曹的理想与周的提议之间的不同,在很多方面浓缩了晚明和盛清时期学术世界的差异。曹设想了一个藏书与学术的单一中心,而他——绅士们的庇护人——将在一个知识并未快速传播的世界里,实际上充当帝国的学术保护者。周则寻求利用国家机构来使遍处帝国各地的学者受益,当时有关这些文献的知识正在增长。乾隆皇帝搜集中国所有图书作为其个人收藏的《四库全书》工程取得了成功,受此影响,周要求各县的知县和大族建立一个慈善学校,这个学校拥有捐献的学田和由当地藏书家捐赠的藏书。每个学校要开列其藏书,允许其他学校抄写副本,并制作自己的活字(活版)来出版其中的珍本。^[10] 尽管两人之间存在不同,他们的提议在致力于建立一个非政府机构,以促进某种类型的共享知识在感兴趣和有文化的人中间进行保存和传播方面,都具有非凡的力量。这一“知识共同体”的理想,有助于我们理解直至 18 世纪末那些有学问的中国人在创造一个包容广泛的学者共同体时所面临的问题。那么起初看起来仅仅是一个学者获取书籍的问题,就将被视为社会为了广大得多的读者和受众的利益,在将印本的潜力制度化,以使得知识的拥有非人格化方面所面临的更大困难的象征。印本可能逃脱了个人的牵系和作者的占有,但是它们在摆脱主人的私人占有上肯定会有麻烦。

在这样的情况下,私人藏书的开放问题很容易被简单地看作非黑即白的一类问题,正如从最近一些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一宗特定的藏书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11] 这样一种生硬的方法容易把这一问题当作一个道德事件来看待,其中制度的软弱与个人的贪婪,或个人的苦难与政府的劫夺相对抗,这样它就体现了一种基本假设和道德价值的延续,这些假设和价值长久以来困扰着中国学者和学生对于书籍获取问题的解决。固然要注意到有时政府的审查、迫害和没收所导致的困境^[12],我们

120

仍需把该问题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这一背景与大量变量有关:是谁在向谁提出请求,请求让谁做什么?请求的内容仅仅是指看?读?读和借?或者读和抄?多少书?请求的是什么版本,其稀缺性、内容、状况、字体、纸张和市场价格如何?以及,多少人在提请求?这种更广泛而又更精确的方法有很大的优点,可以把这一问题更多地看作是制度性的,而不是道德性的;同时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私人藏书者如何彼此看待,当时在质和量方面,他们的收藏加起来常常超过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政府机构藏书。这样我们就能够对藏书家和学者阻碍和促进知识交换的行为加以辨别,有人或许会认为这种交换是某种“知识共同体”。

对其他两种文化——阿拉伯和西欧——书籍社会史的简短考察,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作这样一种精细的理解。在中东,早在1493年犹太人在君士坦丁堡首次使用活字印刷希伯来文献之前,至少在一些地方和19世纪前的某些时期,并没有什么地方的书籍获取问题像中华帝国的大部分时间里那样尖锐。尽管直到19世纪初,阿拉伯语种的书籍继续借助于传统的手抄方法^[13],一些规模很大的阿拉伯书籍和其他学问的贮藏所在9世纪和12世纪初建立起来。在开罗和巴格达(以及伊斯兰化的西班牙科尔多瓦),据说图书馆藏有200000至500000册书,由政治和宗教领袖管理,向所有社会阶层的读者开放。到12世纪这些图书馆被关闭后,由于宗教压力和其他因素,阿拉伯书籍主要被收藏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只供研习伊斯兰文献,也向社会谱系非常广泛的伊斯兰读者和信徒开放。总的来看私人藏书似乎要无足轻重得多。它们的藏书要少得多,很少吸引众多学生和读者,虽然他们似乎并不主张许多中国私人藏书家实行的那种排他性。总的来看,迄今为止对阿拉伯书籍社会史的有限研究显示,早期伊斯兰世界的一些世俗和宗教权力把他们的图书馆向阿拉伯的城市读者开放,但最终把开放的范围局限于与伊斯兰教信仰有关的书籍,而且仅限于伊斯兰学

问,不包括希腊学问。^[14]

在西欧,像罗马皇帝和其他人在地中海沿岸为所有识字的公民所建立的图书馆那样的“公共图书馆”,在中世纪并不存在。^[15]因此一个识字的成年男子对公共机构藏书的获取通常受到他的宗教、机构、城市和个人关系的限制。例如,意大利的一些犹太社区把它们的犹太教堂作为公共图书馆,成员们在这些宗教机构里捐赠或存放宗教与世俗书籍,以便其他成员在进行犹太男子传统的系统学习时能够使用。用活跃在11世纪之初的一个拉比(rabbi)的话说:“书籍不是用来储存的,而是用来借的。”^[16]考虑到他们在宗教和语言上的差异,书籍又是被放在犹太人的宗教机构里,以及书籍会被基督教当局没收的合理担心,所有当事人似乎都假设非犹太人或基督徒不会使用这些藏书。中世纪一般的基督徒似乎也不能轻易地利用修道院或教堂里的藏书。13世纪初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他对第六条戒律“不可杀人”的注释中写道:“不借书是一种自杀。”^[17]那时大的修道院“习惯于将书借给非成员甚至是普通信徒”^[18],但是,这种给予普通教徒的特权不会是轻而易举或经常性的。书仍然很少很贵;普通读者,如果识字的话,主要对那些比修道院和教堂里更世俗的书感兴趣;而且,如果修道院借书的话,倾向于把书借给其他修道院抄写。事实上,尽管1212年巴黎市政委员会颁布了法令,许多修道院却反而威胁要将任何出借图书的人逐出教会。^[19]从13世纪开始,当阅读不再是一种仅仅属于修道院的中心活动时,一些大教堂图书馆,尤其是大学图书馆兴盛起来。^[20]它们更多地向学生和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公开他们的藏书。^[21]但是,这些藏书离构建一个无论是收藏宗教还是世俗文献的公共图书馆,还差得很远。^[22]

从15世纪开始,基本上是世俗机构的西方图书馆开始与读者形成一种更复杂多样的关系。1444年,古腾堡发明印刷术前夕,被称作罗马时期之后的第一座西方公共图书馆,即向所有“勤学

的公民”开放的图书馆,在佛罗伦萨建立起来。^[23]一些私人藏书家,包括皇亲王族,逐渐开始为学者或城市读者建立图书馆,其中一些人可能被允许借阅已从枷锁中得到解放的书籍。^[24]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当读者、书籍,特别是珍本的数量在增加,当宗教的纷争愈演愈烈时,像梵蒂冈那样的学术图书馆(关于它,蒙田曾于1580—1581年写道:“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它,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它几乎每天早上都会开放。”^[25])却对读者不那么友好了。^[26]在加布里埃尔·诺代(Gabriel Naudé)写于1627年的关于图书馆的著名著作中,他写道,只有3个重要的欧洲图书馆——米兰的安布罗西亚娜(Ambrosiana)图书馆(始建于1602年)、罗马奥古斯丁派教士的安杰利卡(Angelica)图书馆(始建于1620年)、牛津的波德里安(Bodleian)图书馆(始建于1612年)——允许读者没有阻碍地利用它们的馆藏。相反,诺代所调查的欧洲图书馆中5座最大的图书馆最多只是限制性地开放馆藏。^[27]“从16世纪开始,几乎建立的每所大学都有一个公共图书馆”,但多数大学图书馆“仅向高级教员的研究生和教师们每周开放几小时”,而且书很少可以借阅(偶尔的例外是讲课中要用到的书和教授们写的书)。^[28]根据雷哈德·威特曼(Reinhard Wittmann)的研究,德国的多数大学,及修道院、城镇和宫廷有一项图书馆政策,不遗余力地阻止人们读它们的藏书。^[29]在英国,波德里安图书馆尽管对非牛津的学者相对开放,也禁止所有的读者,包括牛津的教授和国王进入其书库和借阅书籍。^[30]18世纪,如果没有拥有该校文学硕士或民法学士学位的人陪同,波德里安图书馆甚至禁止所有非该校成员在阅览室查阅手抄本。只要这类牛津毕业生坐在或站在到访者旁边,他们就可以查阅手抄本。^[31]

剑桥的一个学院——圣约翰学院的做法,显示了16到18世纪之间无论是欧洲教育机构的内部人员还是外部人员利用图书馆所面临的障碍。它的1530年和1545年的规章规定,仅在学生宿

舍主任(master)和校长的批准下,方允许特别研究生(fellow)和奖学金获得者使用图书馆;特别研究生要将书带出图书馆,则须留下“很多或更好的同一主题的书给图书馆”,并要获得学生宿舍主任、校长或院长的书面同意,还要在当年10月9日前进行借阅登记。1617年,规则变得更为严格,除了特别研究生之外,其他人一概不得进入图书馆;特别研究生如果没有学生宿舍主任和学院委员会的事先许可,不得借书。1639年规定,“一次只能借一本书,限48小时”。1650年规定,没有剑桥文学硕士学位者不得在图书馆研习;可与特别研究生同桌进餐的大学生(fellow-commoner)和文学硕士学位获得者不能借书。1654年后,如果没有学生宿舍主任和学院委员会的同意,任何特别研究生或奖学金获得者均不能将书带出图书馆。到1662年,对书的保护链条抽紧了,从那以后只有经过学生宿舍主任和学院委员会的准许,特别研究生和奖学金获得者才能借书。

这些限制型条款是在纷争扰攘的时期制定的,当时宗教论争导致内战,学说被禁书籍被焚,最后幸存下来的少量书籍只能替代所损失图书的一部分。但是,所有这些争论和规定的结果是,普通学生既不能直接利用图书馆,也不能借书,教师只有在上级的允许下才能借阅图书。无疑,学生可以依靠愿意提供帮助的教师为他们借书,而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这些教师则不得不督促书被如期归还。但直到19世纪中期,据信印刷术的发明改变了欧洲人的学习方式约四百年后,所有学生才可不需经过允许进入图书馆,自己借阅图书(特别研究生似乎到18世纪末就取得了这个权利)。不用说,到这时数量多得、价值高得多的旧书,储存在与学生平时要用的当代新书隔开的另一层楼上。虽然它们可以用于研究,但肯定不能外借。^[32] 仅仅因为它们太旧、太珍贵了。

同时,事实证明在大学之外,一些机构的图书馆更适合于知名和不知名的读者,特别是在像巴黎这样的首都。从1644年开始,

一周两次,一周总共最多十小时,马扎然(Mazarine)图书馆向读者开放。圣维克多修道院(de l'abbaye de Saint-Victor)图书馆从1652年开始,律师(des avocats)图书馆从1708年开始,基督教义(de la Doctrine chrétienne)图书馆从1718年开始,以及其他一些职业和宗教教派图书馆从18世纪中期开始实行类似的做法。^[33]国王(du Roi)图书馆在演变成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的过程中,从1692至1706年、1720年至今对学者甚至普通公众实行相似的政策。^[34]在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1661年向公众开放它的馆藏,维也纳的宫廷图书馆(Hofbibliothek)在1726年也这样做。^[35]在更低的层次上,市立、甚至教区图书馆通过地方权贵的捐赠建立起来。^[36]

在英国,向公众开放程度最高的是大英博物馆,按照其主要创始人汉斯·斯洛恩(Hans Sloane)爵士的说法,它是为了“所有人的进步、知识和信息”而建立的。但是,从1759至1806年,进入其阅览室起初需要理事、后来需要图书馆部门负责人(Principal Librarian)的事先批准。在这半个世纪中,它的读者总共只有160人左右。^[37]直至1803年,一个德国访客对英国为学术书籍提供的公共设施之少表示惊讶:“在联合王国没有一座公共图书馆藏有不同文学门类的最重要著作,这真令人难以置信。”^[38]

相反,资料证实西欧的私人藏书家常常很乐于分享他们的书籍和知识,这是伊拉斯谟“文人共和国”理念持续影响的显著证明。^[39]他们得到劝告与人分享知识和书籍,有时确会这样做。最令人难忘的是让·格罗里埃(Jean Grolier)在他书籍装帧上的轧花:在他的名字后面,印上“与朋友们共享”(et amicorum)。^[40]在都铎王朝及其后的两个世纪,英国的私人学术藏书很少,严肃的学者常常把他们的一些贵族化藏书在乡间的住所作巡回展览,或公开展示,或只给那些同意签署借阅单的人看。^[41]从17世纪开始,正如科学家们经常通过公开演示来分享他们可证实的发现,即使在

宗教战争期间,伊拉斯谟式的人文主义学者也常常在整个西欧相互交换印本、手抄本和信件。许许多多欧洲大学及其图书馆的排外行为,常使它们对于欧洲思想和文化的重大创新越来越不重要,在这样一个时代^[42],学者们在他们的大学和国家之外发展了非常广泛的个人网络。最近一项研究表明:“把书借给朋友似乎是自17世纪初以来文人共和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礼貌地询问一个朋友是否藏有某书,会得到同样礼貌的答复,并用邮政快递把书送来。藏书越多、质量越高,责任就越重。”甚至书主人的好友介绍的陌生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服务。^[43]根据法国学者的两项专门研究,到17世纪晚期,巴黎的私人藏书家日益向持有介绍信的到访学者开放他们的藏书。^[44]但是,当时学术交流方面最宽宏大量的例子可能来自莱布尼茨(1646—1716)。他不仅在整個西欧广泛旅行,会见其他学者,而且还向欧洲内外的一千多人写了15000封学术信件(他甚至和北京的耶稣会士通信,虽然并不常写)。通过自由地散播观念和信
息——这些东西通常在他的著作里找不到,他寻求建立广泛的互惠无私的学术交流网络。^[45]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共和国”成员仍只是这些社区人口中少数有文化的男性。对于一些图书馆来说,访问者的数量和访问者国籍的种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原因是拉丁文作为一种通用语言(*lingua franca*)的衰落和随之而来的民族国家与各个国家图书馆和大学的兴起,以及伊拉斯谟人文主义及其跨越国界的“文人共和国”传统吸引力的下降。但是,即便我们忘却在研究同样问题的欧洲自然科学家中国际交流活动的增长,我们也不会不注意到各种各样的图书馆在欧洲的出现,它们在其政治和社会社区内向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男性甚至女性开放馆藏。皇室藏书演变为国家图书馆,主教和贵族的藏书被遗赠成为市立图书馆,甚至教区牧师的藏书也变成了教区图书馆,所有这些书籍在向当地人开放的同时,也多少向外来者开放。^[46] 借阅图书馆和阅读俱乐部

也在集镇和都市发展起来,把书提供给人们,不管他们在宗教和民族上有何差别。然而,社会等级仍是进入这样一些阅读团体的障碍^[47],而且至少在英格兰,版权法迫使普通读者仅限于经常阅读没有版权限制的书,因为它们比新书和有版权控制的旧书要便宜很多。^[48]

西欧 16、17 世纪以来的经验要比中东远为世俗化,事实证明它对于探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对照 1000 至 1700 年间中国学术世界中藏书家行为的一面镜子是有用的。换言之,西欧高等教育机构的排他性模式,更为“公共”的图书馆的逐渐显现,以及个人之间对学术资料的交换,与中国塑造藏书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该模式似乎远不鼓励制度上的多样性。在中国,政府一般仅为其官员和后备官员(即学生)提供政府藏书,私人藏书家一般限制其他读者利用和共享其藏书。而且,当 18 世纪这些行为发生变化时,这种变化主要是有利于学者和藏书家,而不是社区或行业中所有识字的成员。以下篇幅将描述中国的这些习惯做法,分析其问题,并对私人藏书时常难以利用现象的更深蕴涵加以评估。

127 政府藏书

一个中国读者对政府藏书的利用,因其地位、行政规章和他要看的书的收藏机构的做法而有所不同。作为一项制度,限制最严的是为皇帝及其家族而建立的藏书和关于帝室的藏书。在宋代,这些皇帝私人藏书储存在每朝皇帝的皇家档案库里,或藏在宋朝皇帝们各自搜集或历朝积累的书籍、绘画和手稿库中(后者的最大收藏地太清阁应当藏有所有宫廷藏书的副本供官员们使用)。元代和明代,宫廷里建立了类似的皇家藏书。的确,明初皇家藏书中的许多书籍和书版来自宋代、金代和元代的皇室藏书。^[49]

总之,这些皇室私人藏书只有皇帝和几个皇帝恩准的近臣可以使用。^[50]即便其中的文献有时会离开宫殿的范围(正如许多元代戏剧被带出宫廷,为明代私人藏书家所得并用于商业出版)^[51],但政府对这些皇室库藏远为典型的政策,是对大型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处理。这一大型类书编纂于1406年,用大臣丘濬的话说,它意欲涵盖“举国之书”。永乐皇帝(1402—1425在位)命令制作两部分藏于北京和南京的国子监。但他的命令从未被执行,显然是因为财力的原因。这部书于1421年被运到北京新建成的宫殿,起初被储藏在左顺门附近,从1441年开始入藏文渊阁。将近一个世纪后,与每朝皇帝的实录、宝训一起被移到新修(于1534年)的皇史宬中。这唯一的一部书是不向官员们开放的,即使1557年一场严重的宫廷火灾迫使嘉靖皇帝下令制作两部副本后,这一规定也未被打破。抄写副本的目的看来仅仅是为了未来再发生任何火灾时增加这部百科全书幸存的几率;这样,就决定将每个复本放在不同的地方,正本运回南京,第一个副本藏在北京的文渊阁,第二个副本藏在北京的皇家档案馆。^[52]此后,官员似乎可以看其中任何一部,甚至在1594年得到了皇帝的恩准,但直到明朝寿终正寝事实上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明朝灭亡时北京的第一部《永乐大典》副本毁于火灾,第二部在王朝更迭中受到严重破坏。^[53]

128

士大夫更能实际用到的,是10至17世纪间各种中央机构所建立的政府藏书。^[54]由于我们对宋代和明代情况的了解远多于其他朝代,我的论述将集中于这两个中国王朝。比如在宋代,三馆、特别是史馆的藏书,向皇帝、高级侍从官员及其随从、高级官员或中央政府机构的相关人员,以及特别挑选的神童开放。另外,得到特许使用这些最重要官方藏书的读者还包括,北宋初期秘书省的虚衔和实职低级官员,南宋甚至包括许多在政府中连虚衔也没有的人。事实上在宋代,这些藏书机构往往成为有前途的年轻学者的发祥地,他们在其中读几年书后就会得到正式任命。^[55]

129 其他的首都政府机构也有为自己的官员服务的藏书。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国子监及其在京城管辖的学校为师生们提供书籍，有时还用这些书来为遍布帝国的府学翻印书本（这些学校要用政府提供的资金以成本价购买这些书）。^[56]这些地方官学如果有藏书的话，有时会严禁借阅，比如1266年在位于现今嘉兴的府学，有人甚至声称，“鄂泮官书，带去准盗”。^[57]更普遍的情况是，这些学校允许其学生借书，但是明确提醒他们要按期归还。一个府学所藏的《资治通鉴》里夹了这样一张条子：

关借官书，常加爱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有）司明白登簿，一月一点，毋致久假。或损坏去失，依理追偿。收匿者闻公议罚。^[58]

有些地方学校甚至印书卖给学生和其他人。^[59]

这些总体来说有利于借阅的条款，使那些长期住在宫廷里的藏书家（如苏颂和尤袤）能够亲自或请人大量抄录图书用于个人收藏。^[60]然而，这些阅览条款易于制订，却不易实行，尤其不易坚持。问题并不在于宋代政府通常鼓励闭锁政策（虽然到1061年它把其中一些藏书，如军事和天文学文献列为机密，即使是被指定整理编纂馆藏文献的官员一般也不让阅览）。^[61]藏书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这类限制，但是三馆的书经常丢失。有时火灾是罪魁祸首，比如1015年整个馆藏付之一炬，几十年后才得以恢复。有时是因为糟糕的管理：如1061年，藏书中仍然没有像南北朝七史这样基本文献的完整版本。^[62]即便史馆中的书先用私人手里的本子校过，然后刻版印刷了新版本，像司马光这样显赫的朝廷官员仍在抱怨他从未有机会仔细阅读这些书籍，直到1073年他集中精力进行《资治通鉴》的编纂。^[63]有时问题又来源于兵燹。事实上所有中央政府机构的藏书都毁于入侵的女真人对北宋首都开封的占领。宋廷被迫南逃杭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重建规模大致相当的藏书。^[64]

然而,即便火灾、糟糕的管理和政治的动荡可能会意外地使数代人保藏政府藏书的努力付之东流,对三馆藏书的完整和流传远为频繁和持久的威胁,却来自历代皇帝、宗室、钦差、朝廷高官和其他获准接触藏书的公务人员的劫夺。^[65]999年,政府颁布了针对这一弊端的首个禁令;随后出台了至少7个禁令(在1059、1089、1114、1131、1157、1204和1228年)。^[66]有时,它会在禁令中划出一些例外,如1131年皇宫自身是例外^[67],1157和1204年宫中参与校勘图籍的官员是例外。^[68]但是,禁令一般来说适用于所有官员,它们频繁发布说明经常遭到破坏。例如1204年,据说,“循习既久,士大夫视为文具,宛转而求借者甚众,久假不归”。^[69]

结果,1060年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的藏书,三馆的许多藏书最后落到了士大夫的个人藏书里。受这种“借阅”侵害最少的两所朝廷藏书——昭文馆和集贤院,逃过此劫并非由于格外小心,而是因为“阁上有太宗御容,非具朝服不可上”。^[70]在南宋前半期,盗窃的影响似乎并不怎么严重;1204年时,这些藏书的目录《崇文总目》中开列的所有书籍,只有30%丢失。^[71]但是,稍后的1228年,偷书如此猖獗,据说一些士大夫从宫里把书拿走,盖上他们的私印,并兜售牟利。^[72]

在明代,中央政府机构中为官员和学生所设藏书的状况,只是变得更糟了。在至少6个这样的机构藏书中,南京和北京的文渊阁规模最大,对官员们来说最重要。尽管禁止借书,书还是常常被宫廷太监、官员和其他人拿走不还。^[73]1449年南京宫廷的一场大火把文渊阁的书悉数焚毁之后^[74],北京的文渊阁藏书成为仅存的为官员们所设的主要帝国藏书。但它的命运,却比焚于烈火好不了多少。1492年,据说它所有剩余的藏书被虫鼠啮蚀一空,有人提出了详细的方案以防止更大的破坏。^[75]稍后,档案保管人员和有关官员被认定应负罪责。前者直接把书偷走,后者经常在未被允许的情况下借书,然后不还。^[76]

无论这些记载被如何夸大,16世纪早期和中叶几名官员对这宗藏书遭到持续性破坏如此震惊,他们写下并出版了尖锐抨击时弊的文字:

以内阁诸书,典司者半系赏郎,于四部之旨懵如,且秩卑品下,馆阁之臣借阅者,往往不归原帙。值世庙而后,诸主多不知文,不复留意查核,内阁之储,遂缺佚过半。^[77]

1609年,当文渊阁(这里可视为皇室藏书)据说只存有正统年间编纂的藏书目录所著录图书的不到十分之一时^[78],一个私人藏书家靠熟人关系从阁中拿走一部书,用了将近20天抄录下来。^[79]这个藏书家后来作为一个官员,在文渊阁手自抄录了20多部书。^[80]

17世纪初,王肯堂,一个1589年的进士,作了一个令人特别郁闷的估算:

文渊阁藏书,皆宋元秘阁所遗。虽不甚精,然无不宋板者。因典籍多,赏生既不知爱重,阁老亦漫不检省,往往为人取去。余尝于溧阳马氏楼中见种类甚多,每册皆有文渊阁印记。己丑既入馆阁,师王荆石先生谓余与焦弱侯曰:“君等名为读中秘书,而不读中秘书,何为?吾命典籍以书目来,有欲观者,可列其目以读。”少顷,典籍果以书目来,仅四册,凡余所见马氏书,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则又十无一二存者,又多残缺。讯之,则曰:“丙戌馆中诸公领出未还故也。”时馆长彭肯亭(烺)已予告归,无从覈问,试以讯院吏,院吏曰:“今在库中。”余大喜,亟命出诸库视之,则皆易以时刻。人事非复秘阁之旧矣。余亟令交还典籍,典籍亦复朦胧收入。今所存仅千万之一。然犹日销月耗,无一留心保护者。不过十年,必至于无片纸只字乃已,甚可叹也!^[81]

16、17世纪其他留心观察的士人得出结论说,文渊阁的命运

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藏书数量和质量的下降使之逊色于当时任何一宗大型私人藏书。^[82]福建藏书家谢肇淛禁不住怀疑,一个世纪之后文渊阁的藏书是否还会存在。^[83]而且到明末时,其藏书甚至书版被卖掉,冬季被用于烧火取暖,以及被雨、鼠、虫所侵蚀,损失了三分之二。^[84]这种状况几乎无法提供一个有助于严肃学问或思想成长的环境。

在外省,情况最好的是明代一些藩王的藏书,尤其是周王和晋王。^[85]例如明朝开国皇帝的十七子是一个著名的藏书家,据说其收藏可与文渊阁匹敌。他喜欢抄录别人的善本,据说自己印刷和发行了许多文学和宗教著作。^[86]在其他地方,这些藩府藏书的开放规则有所不同。根据一位18世纪作家的说法,位于四川成都的藩王居所“每日抄书者达数百”^[87],使之在该省受过教育的精英文化中扮演了一个关键性角色(如同其他地区的藩府一样,它在1640和1650年代的满族入侵中被毁)。^[88]但是,至少在17世纪初,省府开封和南昌的藩府藏书是不对外界读者开放的;在开封,据记载藩府藏书腐烂霉蚀,南昌的则残损不全。^[89]

133

其他大的省级官方藏书在官学里,但这些书常常被证明比文渊阁的书还无用。明代以前,官学藏书并不普遍,并几乎总是附设于省城或府城的学校。^[90]据认为江南地区此类官学藏书最多,当14世纪上半叶江南的官员们把这些藏书的目录刻在石头上时,元代爱好学问的官员常借这些藏书来读,部分是因为北京的藏书太过低劣。^[91]明初政府不时将少量图书向府学和县学发放。^[92]但从16世纪开始,这些府学和县学才普遍建立藏书楼。即便到那时,一个像样的府学藏书很少超过2000卷,县学藏书楼则更要少得多(当时即使江南的小藏书家也有超过10000卷藏书)。这些藏书主要由国家颁赐的印本组成(通常免费,但不总是这样),有时会因后来的购买和捐赠而增长,可能经常供学生参考使用。^[93]但是,长期来看,他们的书即使放在锁着的木柜里,也总是被疏忽怠慢,

正如我们已经在北京的文渊阁看到的那样。^[94] 如果问题不在于学校教师的监管漫不经心,那就是学生公然漠视学校的规章,规章规定禁止把书从藏书楼拿走,要求借后归还,并警告对违反者加以惩戒。^[95]

134 总之,在宋、明的不同时期,三馆和文渊阁的藏书在量与质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朝廷官员、皇室成员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人似乎可以进去读书和抄书。虽然按规定这些人不能借书,但他们似乎还是不受惩罚地这样做了。低级官僚机构的藏书也受到图书丢失和被盗的严重困扰。这样,总的来看,这些藏书楼的读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尤其是在明代,是其管理者和其他读者对借阅规则的可恶漠视,以及对书籍的保存漠不关心。在明代,这些弊病被归结为负责管理藏书的是低级官吏和太监,他们无力阻止高级官员的借书行为。但是,无论由于何种原因,中国的政府藏书在宋代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至少是明朝统治的最后两个世纪,决不是学术的主要中心。这一角色,甚至是仅仅为学者和官员接近他们文化的书写遗产提供保证的次要角色,被私人藏书承担起来,而这些藏书的主人会确保这些藏书基本上维持私有状态。在宋代的一段时间和明代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藏书拥有者在作为学术赞助者和知识拥有者方面缺乏来自机构藏书的真正竞争,这种不平衡将严重妨碍文献考据学的发展,进而会影响一般学术的发展。

私人藏书

从 11 世纪到 18 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印本和手抄本不断流入私人手中。相对重要的私人藏书——在宋代不少于 700 家,在短暂得多的元代 170 余家,明代 897 家,及占大多数的清代 2082 家^[96]——共同构成了这 8 个世纪的大部分地区里书本知识最重

要的保有者与社会装置。^[97]但是,事实证明它们对读者远没有大多数政府藏书那么友好,虽然正是这种“手抄本文化”的实践促成了10世纪中叶对儒家经典的最初印刷:

毋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98]

135

但是,至少在后来的8个世纪里,藏书家们仍不断对许多读者希望阅读其藏书,尤其是珍本的请求装聋作哑。12世纪的藏书家郑樵评述说:“藏书之家例有两目录。所以示人者,未尝载异书。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99]17世纪中期,黄宗羲(1610—1695)抱怨道:“藏书之家,不至穷困,故无轻出其书者。”^[100]

其他藏书者,有时对后代献身学术缺乏信心,会运用各种各样的手段防止不受欢迎的读者接近其藏书。最简单的策略是除了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外,不向任何人暴露其藏书。这是邱集(1523—1603)和钱裔肃(1587—1646)的做法^[101],而邱集还要做到万无一失。他有一方27个字的印章,上面有他完整的住址,以防万一某册书从家里开小差溜号。^[102]另一种做法是在藏书楼里或其入口处挂上一块牌匾,上刻对访客和子孙们的告诫,正如15世纪著名苏州藏书家叶盛所说:“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103]其他人,如杭州藏书家张翱(生于1394年)、16世纪初浙江著名藏书家虞参政,采取的策略更绝,把门禁森严的藏书楼建在岛上。前者让访客乘一条船穿过池塘往返于陆地和藏书楼之间(夜间禁止来访);后者是如此反感任何来访,每天晚上都把白天连接藏书楼和陆地的木板抽去。而且无论是否得到邀请,如果有谁来到岛上,来访者都会发现主人的书斋门口挂着一个木牌,上书:“楼不延客,书不借人。”^[104]宋代藏书家晁公武(1105—1180)更进一步,把书

136

的合法主人赶走。晁在 1151 年从他的老朋友井度那里接过 24500 卷颇有价值的藏书，却违背了井的嘱托，并对他说若他儿子对学问有兴趣，就要把书还给他儿子。^[105]

一部分藏书家在控制他人使用其藏书方面取得的成功，从明清时期据称最著名的私人藏书——天一阁——的历史体现出来（见图 6）。天一阁 1560 年前后由富有的宁波官员范钦建立^[106]，很快因其完善的防火设施——部分用砖构筑、以一条特殊的护城河环绕——和防盗措施——对来访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而著名。就这样，这座藏书楼的创始人回绝了自己的侄子看书的请求（这个侄子范大澈进而自己搜集了很多珍本，据说其中一些最后归入天一阁）。^[107]他只允许自己的直系男性后裔接近他的藏书，而且只能在白天。即便如此，也要满足苛刻的条件：他的六支子孙中的每一支都必须带上特别分发的钥匙一起开启藏书楼，这样就可以防止其中任何一支单独控制藏书楼的进出。所有这六个支裔都必须同意方可放行（对于一个 19 世纪的到访者，这一条件意味着须经 102 个具有同等权力的家族成员同意），即使在一个知府介绍一名学者来查阅图书时也是这样。^[108]一个在范钦死后制作、保存至今的牌匾，详细说明了违反这些使用规定的处罚：

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109]

这份罗列的罚则暗示了一段规定屡遭破坏的历史。然而天一阁及其藏书在头一个世纪里基本保存完好，如果不是毫发无损的话。随后在 17 世纪中叶明清易代的乱局中，书籍遭到损失。到 1660 年前后，已损失了最初收藏的五分之一（最明显的是半部《明实录》）。^[110]又过了一个世纪，天一阁仍大部完好无损，直到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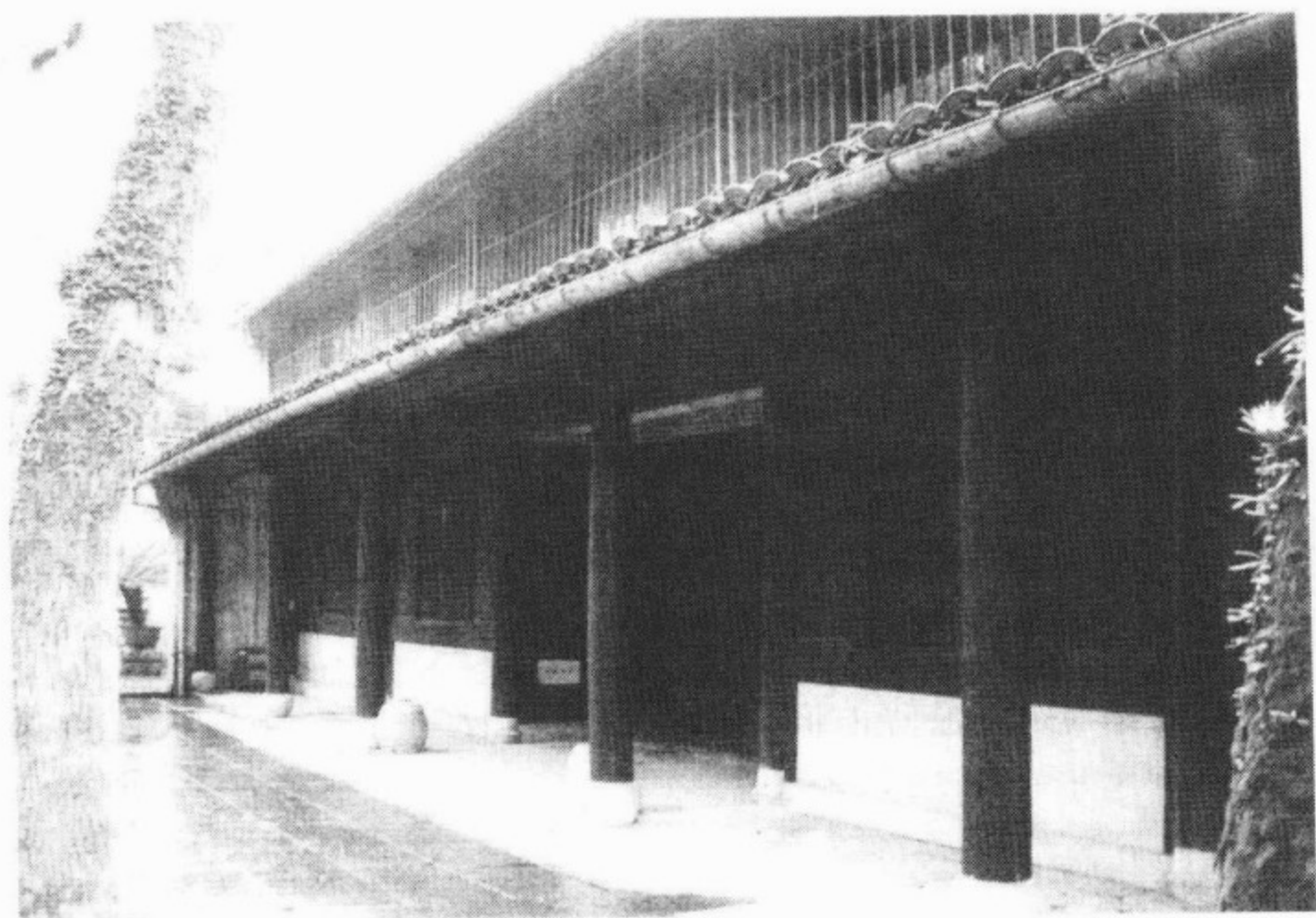


图6 浙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

年代因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工程失去了638部书。19世纪中叶,因战乱爆发藏书遭受严重损失,然后又在1913年遭遇抢劫。家族传统上禁止非本族成员使用藏书,直到1673年对锲而不舍的申请者黄宗羲网开一面。^[111]后来一些学者也享有了这种特权。但是,在清朝统治的头两个世纪这些人的数量十分有限,一份记载说不超过10人,本来是为了显示范氏对宁波本地学者的优待。而且,他们是在多次遭到拒绝,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声望,通常在表达了进行历史研究的兴趣(如万斯同写《明史稿》)之后,才得到允许进入。因此,在它创建之后的最初两个世纪里,这座重要的藏书楼除了印一部20卷的《范氏天一阁藏书》外,对学术界几乎没有什么贡献。而且在第二个世纪,它的藏书没有被翻刻过,尽管一些经过特许的学者曾记述他们造访过天一阁。^[112]

在这两个世纪中,这宗藏书的名气和它的封闭排外一起流传

开来,尽管天一阁首部印刷书目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面世。起初,创建者草拟了一份书单,可能内容太少,无法涵盖所有藏书。两部提到天一阁书目的晚明书目,大约说的是这份原始书单的一个或多个抄本。1673年,黄宗羲草拟了一份珍稀古籍清单,情况开始改观;但是这个目录不完整,6年后范钦的玄孙需要编纂一份补遗。这些书目后来的用途不清楚,但是写于18世纪初的其他两份藏书目录抄本的存在,显示了清初一些藏书家和学者圈子对天一阁藏书内容的了解——如果说还很有限的话——在增长。一些17世纪中晚期的学者藏书家,如邻近的绍兴藏书家祁承燾和苏州昆山县的徐乾学,想使他们自己的藏书像天一阁一样长久,模仿天一阁制订了类似的排外性规章和手续。^[113]乾隆皇帝自己,在18世纪晚期收集他自己的皇室收藏时,模仿天一阁格局和建立藏书库,并宣布除皇帝本人和他的贵客之外,基本禁止他人进入。^[114]事实上,天一阁第一次印刷完整的书目,是在浙江布政使于1803—1804年间访问藏书楼,命一个范氏后裔编纂了一部完整的目录,又让宁波府学的一名教师在1808年校印之后才得以实现的。^[115]

139 同时,当地家族也被这一藏书所困扰,尤其是19世纪初一个家族把女儿嫁到范家,希望女儿能帮他们接近范氏藏书,并得到范家所有的一种特别草药。据当地传闻,天一阁的创建者在湖广行省找到一种草药,可使书免于遭受困扰宁波地区其他藏书的书虫蛀蚀,但他预先禁止其子嗣与他人共享这种草药。令这位新娘沮丧的是,她发现作为一个女人,将被永远禁止进入藏书楼,也就无法得到这种草药。据说她抑郁而终,临死前只要求丈夫把她埋在通往藏书楼的台阶下。^[116]

无论这些不让人接近藏书的做法多么极端,也比不上许许多多藏书家坚拒借书的决心。一句古老的谚语自宋代以来被无数藏书家所引用,简要地概括了中国人对于借书这件事的普遍态度:“借书一痴,还书一痴。”^[117]由于担心后代遗忘这古老的智慧,许

多藏书者都在他们的书上盖上措辞同样直率的印章。唐代藏书家杜暹在他的书上盖了一方著名的印：“鬻及借人为不孝。”^[118]这句话不断被后代藏书家引用，如万历时松江府最大一宗藏书的主人。^[119]16世纪苏州藏书家钱毅的印文走得更远：“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其真愚！”^[120]更加极端的是另外两位藏书家印文中的危言恫吓。吕坤（1536—1618）于1579年刻了一方藏书印，禁止他的儿子出借或毁坏父亲的藏书，如有任何违逆将被逐出宗祠。^[121]两个世纪以后在松江府，藏书家王昶（1725—1806）有这样一方印：“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122]

这些警告，如果不包括鞭打的话，并未被视作无足轻重，这令我们相信17世纪初的观察者王肯堂略带夸张的说法，他说能够注意到唐以前一个著名学者的箴言——借书与人是士大夫所为——的藏书者，百无一人。^[123]一些学者和士大夫的实际行为证实了王的说法。例如，我们知道12世纪无锡非常重要的藏书家尤袤不把书借给他人，他让孩子也不要这样做。^[124]南京的新儒家焦竑（1541—1620），照他女婿的说法，不把书借给任何人。^[125]赵绮美坚决拒绝任何人的借书请求，除了来自苏州常熟县家乡的3个朋友外。^[126]钱谦益（1582—1664）建立了一大宗藏书，据说赶得上帝室收藏，他花了一辈子追逐别人的书，抢下了至少四宗大型藏书。^[127]尽管他对与之分享藏书的人甜言蜜语（如他从李如一（1557—1630）那里借书），却不归还从别人那里借的书；他还阻止所有到他藏书楼的访客借书，甚至还写下一纸告示。^[128]

事实上，正是这个著名的藏书家，也是刻有“借书为不孝”印章的那些士人中的一个，给我们留下了可能最令人郁闷的从爱书人变为惜书癖的例子。钱在华北居住期间，每天都使用江南的藏书家朋友曹溶的六七千卷藏书。既然允许钱阅读和抄录这些书，自然曹认为钱会有所回报。因此，他从北方回江南的时候，写信给已回到苏州的钱，看钱能否借给他两部书，这两部书曹曾准许钱从

他那里抄录。钱答应了,但是当曹到苏州造访他时,钱否认家里有这些书。他把先前的答应说成是“胡话”。出于对一个长者的尊敬,曹没有抗议;他甚至克制自己,不再问钱借过一部书。但是很快,1650年,由于一个仆人的不慎,钱的藏书在一场大火中化为乌有。当曹到他那里表示慰问时,钱哀叹道:“我有惜书癖,畏因借辗转失之。子曾欲得《九国志》、《十国纪年》,我实有之,不以借子。今此书永绝矣。”^[129]

141 难怪这种在雕版印刷发明后盛行了将近千年,书铺出现后盛行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封闭行为,会引发黄宗羲对使用大藏书家的书困难重重发自内心的悲叹,即便他是一位他们所熟知的名人!他的同时代人、兼职作家归庄(1613—1673),对这种封闭性批评更为尖刻:

公私图籍,谨藏箱篋,累月积年,而人不之窥,永隔风日,长谢几案,是曰幽囚。灭绝与流亡,二者之不幸,人皆知之;独所谓幽囚者,今人往往以此为爱惜其书,不知天下有用之物,被其扃锢闭塞而遂为无用,此为不幸之甚也。^[130]

为了证明他们不愿出示和出借书籍是合理的,宋、元、明私人藏书家求助于研究宋明两代政府藏书的历史学家所熟知的各种解释:对书籍的污损和破坏、一再发生的盗窃和丢失、拖延借期、借后不还。^[131]一个宋代人抱怨道:“比来士大夫借人之书,不录、不读、不还,便为已有。又欲使人之无本。”^[132]在杨士奇去世前二十多年,他说已经丢了五部《楚辞》,都是借出去后再没还回来。^[133]这种行为,按照16世纪末、17世纪初一个苏州士人的说法,还在继续:“借书因而不还者多矣,能如《颜氏家训》[像一个好的士大夫那样借书]者百无一二。”^[134]大约同时,杭州官员许相卿(1479—1557)警告其子孙“祖传琴书故物,慎勿轻视奸贪人”^[135]。最臭名昭著的可算是清初藏书家朱彝尊施展的诡计,当他因带抄手到翰

林院抄写档案遭降级处分——被称为“美贬”——后，朱要求看另一个藏书家钱曾藏的一部珍本，钱不愿意，朱很郁闷。于是，朱贿赂钱的仆人打开主人的书箱，又雇了几个衙门书手在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将该书抄录了一部。与此同时，朱则通宵宴请蒙在鼓里的主人和另一位著名学者。^[136]

142

这些诡计和弊端，在其他所有的书文化，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藏书都存在，这一点所有藏书家肯定都会认可。在西欧历史上，我们可以从中世纪用铁链把书和书架绑在一起这种做法说起。对这一习俗，一位现代英国学者作了令人难忘的解释：“中世纪的书很少，诚实也是如此。据说，一部书和一座农庄一样值钱；不像农庄，书是可以随身携带的财物，可以被轻易偷走。在所有的时代，贵重物品都需要保护。这样，书就被用锁和钥匙保管起来。”^[137]波德里安图书馆直到1761年还对1448部旧书采取这一做法。再回想一下教皇西斯笃六世(Pope Sixtus VI)为对付那些从梵蒂冈图书馆偷书的窃贼所颁布的训令(和逐出教会的威胁)，以及19世纪38岁的李希·亨特(Leigh Hunt)关于他已经在借书者手中丢失了6个像样的图书馆的保守估计。如果这还不够让人触目惊心，那么请看一个19世纪的英国藏书家贴在她每本书上的标签：“此书盗自多萝茜·内维尔(Dorothy Nevill)小姐。”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格洛斯特(Gloucester)的汉弗莱公爵(Duke Humphrey)于1439至1444年赠给波德里安图书馆的279部手抄本，如今仅存3部(其中一部上面有这样的铭文：“如果有谁盗窃此书，等待他的将是犹太的绞架和绳索”)。^[138]要说此类不诚信可能最令人难忘的例子，来看仅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由纪尧姆·利布里—卡卢奇伯爵(Guillaume, comte de Libri Carucci, 1803—1869)监管的法国公立图书馆的命运，他是路易·菲利普手下的图书馆总巡视员。这个法国最伟大的偷书贼在履行使命时，按1985年的币值估算，从国有图书馆的馆藏书库里劫掠了价值300万法郎的书。^[139]一个明朝

的太监或官员只能对如此规模的鲸吞蚕食心怀嫉妒，尽管法国图书馆丢书的程度不及宋代和明代的皇家图书馆。

143 那么，中国 1000 至 1700 年的情况有怎样的不同呢？嘉兴平民姚士彝的著作里有一份初步的分析很有用，他在晚明克服了受教育很迟的困难，成为极其狂热的藏书家。他起步很晚只是令他对学者不当行为的观察更敏锐：

吾郡未尝无藏书家，卒无有以藏书闻者。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何者？秘惜则箱囊中有不可知之秦劫，传布则毫楮间有递相传之神理。此传不传之分，不可不察者。

然所谓不知传布之说有四：大抵先正立言，有一时怒而百世与者，则子孙为门户计，而不敢传；斗奇炫博，乐于我知人不知，则宝秘自好而不肯传；卷轴相假，无复补坏刊谬，而独踵还痴一谚，则虑借钞而不乐传；旧刻精整，或手书妍妙，则惧翻摹致损而不忍传。^[140]

姚指出了这套拒绝展示、出借和抄录藏书的理由——家族的声誉、对稀有知识保持占有特权的妄念、对著作的保护以及对书本身的保护，并从他自己和同时代人的经历中举出了此类困扰的生动事例。

144 但是，有几点他忽略了，值得提出。首先，有些藏书几乎肯定会放在房子里非常隐秘的地方，那就是女人的住处；这些藏书就如同主人的女人一样，是不准接近的。其次，虽然缺乏确切的证据，我的印象是从宋代到清初，只有几个著名藏书家同时是大地主，甚或是大的艺术收藏家。换言之，其中非常多的人——如果不占多数的话——看起来会把资金投入他们最了解的东西，即书籍，并且可以预见，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会努力保护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项巨大的——如果不是主要的——投资。书不像土地，不用

课税,使之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方式,尤其是在税重的江南地区。第三,这些藏书家在他们散发霉味的书籍世界里注入了市场竞争精神。这些书籍代表了主人的社会资本、财富,必须通过一种持续性的排他行为来维持和增长。读者不得不通过传言和藏书家的名声,来知道这些藏书的存在和其中的珍稀图籍,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被排斥在外,以免这些书失去其社会和经济价值。最后,我们在这里看到中华帝国晚期学问的中心竞技场——科场——的竞争精神。有些——但远非全部——藏书家是有功名的。再者,人们没法不怀疑,对珍稀图书及其更珍贵的版本的获取,对那些没有举人或进士头衔的藏书家而言,意味着通往士人社会更高等级的通行证。这样,私人藏书中对稀缺图籍的隐匿囤积,就被用以补偿一些藏书家在科场上的屡屡失意(比如项元汴、张应文、钱允治和朱察清)。

这种私人藏书难以接近所造成的后果,远远超乎科场的狭窄范围,其影响也远不只是私人藏书家中间流言蜚语的流传。在宋、元、明的教育活动和精神生活中,它肯定鼓励了通过讲学进行学习的方式,促进了对利用对话来展开分析这种形式的喜好,以及导致对记忆的严重依赖(哪个聪明读者会不努力记住一本他无法抄录、无处购买甚至再也无法看到的书呢?)。^[141]令人吃惊的是直到17世纪,宋、元、明真正成为大藏书家的大思想家如此之少,这种割裂可能是明中期的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及其众多弟子的著述强调实践胜于书本知识的缘由。^[142]它甚至还可能是明代在诸如历史和考证等需要大量参考文献的领域,人所共知地造诣肤浅的原因。145

我们不应对17世纪中叶一个作家这样的控诉感到奇怪,他说书籍的囤积是在阻碍对学问的积极追求:

古书之存于今日者备矣,乃朝廷官府所留意而习睹者,不过一代[即当代]之典籍、兵刑、钱谷,切于时务之书;其号为儒生者,自制科文字之外,稀复经目,问以前代事迹,古人姓

氏,十不一二晓。馆阁书固无阙,藏于人家者,亦非尽灭绝、流亡也,然则不幸而为人所幽囚者,不知其几何矣!^[143]

这种“幽囚”有助于确保知识继续留在个人手中,无论它何时逃逸。虽然可能不像中国一些其他形式的知识那么保密(如道教经文和仪式,木工和其他行业)^[144],这些知识有时会成为家族内部秘不外传的知识。对其他家族,尤其是那些无论在科场成功或失利,能够将藏书维持数代的家族来说,这些藏书甚至有更多意味:没有它们作为表征,他们对社会和文化合法性的拥有将会引起争议。

因此,这些有价值的知识的主要拥有者就成为“文化掮客”。藏书家们总是可以用他们的书作为教师谋生,只因他们的藏书会吸引那些请得起老师但无钱置备一套好的藏书的学生。然而在明代后半期,藏书家们不断有新的方法利用他们的书养活自己,并出版更多的书。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藏书家,如陈继儒,为出版商编纂书籍;还有一些人,如焦竑,为其他学者的著作和研究提供建议;其他人,如王圻(1565年进士),编纂出版他自己的书;少数人,如毛晋,主要致力于出版自己的藏书。^[145]这些人,如果他们愿意,实际上可以扮演整个出版流程的所有角色(除了书籍生产中的实际手工劳动者)。因为具备无限的灵活性,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远比同时代任何一所当地学校或其他机构更为重要的学术中心。事实上,一些明末藏书家占据了一度被政府机构和官方藏书占据的文化空间,正如民间组织主宰了士人文化的发展。书籍,尽管有了商业出版的繁荣,仍然出乎意料地保持着私密性,对书中知识的获取仍持久地取决于人品与私人关系。

现在应该清楚“知识共同体”的概念更多地是在描述一种理想,而不是1000至1700年间中国学术世界的现实。总的来说接近私人藏书是很受限制的,大的私人藏书非常排外,从它们那里借书更加困难。人们不能不注意到,在16世纪后半期前,只有几个

人利用船舶运输和没有国界阻隔之便,从华南到江南去阅读私人藏书。(与之相比这些世纪里的稻米流通史是多么的不同!)江南的藏书数量超过 10000 卷^[146],占了所有明代藏书的至少 40%,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藏书经常易手。但当它们易手时,据记载它们很少在 19 世纪的第二个四分之一前离开江南。^[147]对我们来说,这些江南藏书是中国丰厚的学术传统的强有力象征。但是,对其他地方,湖南、广东甚至江西省来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藏书就像实际上紧紧闭锁的我们过于匆忙地称之为“中国文化”的知识保险库。

然而,这样一种判断可能太草率、太粗糙了。它可能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想当然,今天大的藏书机构一般都愿意向他人开放其馆藏,由此为研究和学习提供了一种替代途径,私人藏书家可以因此而抽身。中国的藏书家无法享受这种美好的假设,所以常常羡慕像天一阁那样有着高墙、护城河和书主人制订的规则保护的藏书。这些保护图书的步骤,不管多么合情合理,都无法轻易平衡其他读者对更加开放和更广传播的诉求,尤其是当有如此多的识字人群要求使用同一宗藏书,而其中一些人又不注意使书免遭损害和盗窃时。

147

因此,也许可以这样认为,随着在整个明代识字水平的提高,这些私人藏书在不断增长的压力下被迫承担起作为公共或机构藏书的职能,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政府不愿作出相关的制度承诺。的确,1579 年政府对民间书院的禁令,有效地阻止了在政府自身不充足的相关机构之外受教育者的集体聚集。一代人之后,许多非正式的文学社团更倾向于出版成员的作品,而不是建立共有的藏书。^[148]那么即使我们抛开他们自己对自私行为的辩解,无怪乎绝大多数藏书家对向有兴趣的读者开放其藏书的建议敬而远之。他们的文化中的“常识”教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的政府的不作为和作为,又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种决定的明智。

第五章 改良的尝试与知识共同体

149 那么,如果一个帝国晚期的学者,渴望在不花费巨资——他们中的多数不可能有这么多钱——的情况下扩展他的知识,怎么才能摆脱通常很糟糕的政府藏书和常常不那么友好的私人藏书所造成的困境呢?本章的焦点是中国学者为对付这些持续性的障碍所发明的各种解决办法,重点放在藏书家中共享藏书的小圈子的形成,以及晚明在书籍获取方面取得的某些进步,这些果实直到18世纪才得以收获。虽然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从宋到明这些学者的努力上面,但他们的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在他们的控制之外,只是到了清代才得以实现,而且主要是在官方和皇帝对精英文化及其载体所采取的政策领域。

解决方案

对某些人来说,最大的希望在于另一个人的死亡和遗产继承。但是,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析产继承制度,以及许多继承人对古书毫无兴趣,常常导致无论大小藏书在形成后一两代人之内就趋于解体。要找到有多少继承人没有传承其父祖对藏书的热爱的显著证据,我们只需看那些著名藏书家的藏书本身。那些书页上布满了众多藏家的印章,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表明大宗藏书在藏书家中频繁转手。自不待言,除了书的新主人外,这种转移并不必然导致其他读者更容易接近这些书。^[1]

150 许多学者不愿等待他人死亡或不幸的消息,积极寻求获取他

人所藏之书。当然,他可能会给主人一些钱,以允许他本人或其仆人抄录一个副本,正如1515年朱良育和两个多世纪之后李文藻的例子。^[2]在北宋首都,宋敏求和王钦臣赢得了允许其他士大夫参考甚至借阅藏书的名声。^[3]几个南宋藏书家,如赵不宇和楼钥(1137—1213),据说把他们的藏书向感兴趣的读者开放。^[4]他们的做法是否真的这么简单或开放,今天已无从查考。杨士奇仔细地把藏书的潜在借阅者划分为“非其人”和那些他所认为的“端人确士”。^[5]但在晚明,有一个藏书家的出名是因为他对前来咨询的读者慷慨有加,他就是李如一。他在科场上屡屡失意,却因实践其“天下好书,当天下人共之”的主张而声名鹊起。这样一种姿态,使这个富有的平民与当时一些最杰出的士大夫建立了联系。他还允许普通读者借阅自己的藏书,这些藏书经由继承而来并通过他自己的收集又得到了扩充。^[6]

在宋代和明代的不同时期,当私人藏书家看到他们的数量在增长,他们藏书的规模在扩大,新印本的价格在下降^[7],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尝试了一种直接得多的办法来解决书籍获取问题。他们把藏书赠给家族之外的人,否则这些人无法通过继承得到这些书。例如,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井度,这个在12世纪的第二个25年逃到四川的华北难民,把所有书籍遗赠给他的藏书家朋友晁公武。^[8]同样,医僧李彦贞(即李延昱——译注)在1697年给了朱彝尊2500多卷书。^[9]较不常见的是在赠书的同时,把家塾变成书院,接纳非直系亲属的有志青年入学。^[10]例如,浙江金华府的郭钦止1198年捐了一宗相当大的藏书给一家书院,这家书院是按照他的意愿在他家族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的。更不寻常的是,仅仅是为了给学生们创建一所藏书楼而捐书,正如1140年著名藏书家叶梦得在南京^[11],以及12世纪末一些人在山西省南部所尝试的那样:

虽家置书楼,人畜文库,尚虑夫草莱贫乏之士,有志而无书,或未免借观手录之勤,不足于采览,无以尽发后生之才分。

吾友承庆先辈，奋为倡首，以购书自任，邑中之豪，从而和之，欢喜施舍，各出金钱，于是得为经之书有若干、史之书有若干、诸子之书有若干，以至类书字学，凡系于文运者，粲然毕备。噫！是举也，不但便于己，盖以便于众；不特用于今，亦将传于后也。^[12]

不幸的是，这些民间主办的藏书楼通常以教人读书做官为目的，数量很少，而且短命。而且，除了江南地区之外的少数几个例外^[13]，它们很少——如果有过的话——藏有足够质量与数量的书籍以支持重要的学术研究。乔炳南所研究过的一所规模很大的私人书院仅有几千卷藏书。^[14]

共 享

对这种两难困境最普遍的解决办法是由学者们共享书籍，即便所共享的只是多余的较次的本子。^[15]民间藏书家并不总是像在前面的章节里提到的警告和拒绝所暗示的那样，对他人的请求绝对地充耳不闻。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他们的反应常常是有条件的。拒人千里的名声不仅可以挡住那些不必要的请求，而且也可以作为一种讨价还价的策略，以确保请求者会有所回报。“谢绝入内”的政策会被大家理解为，用现在的话说，“可以商量”。这样，有时可以看到，那些“绝对禁止”派允许他人利用藏书，抄录书籍，有时甚至出借。且看天一阁创建者范钦与另一个重要藏书家王世贞达成的相互共享藏书的协议^[16]，以及明代学术耆宿南京人焦竑如何打破铁板一块的排他政策。焦成为陈第的好友后，允许这个福建大藏书家在自己的藏书楼里过了一夜，甚至允许他借走了一些书。他让苏州重要的大藏书家赵绮美从他那里借书。他还允许一个徽州人替福州的藏书家朋友徐燊借了一部非常珍贵的宋

本,这部书是焦亲自从皇室藏书那里完整抄录下来的。而且在1609年,他甚至同意与赵绮美和梅鼎祚(1549—1615)组成一个抄书会,每三年碰面一次,抄录彼此所藏的珍本。^[17]更令人惊异的是,钱谦益借了一些书给常熟同乡冯舒和瞿式耜。^[18]他甚至允许黄宗羲成为藏书楼里一同读书的伙伴(黄未能有机会验证一下钱的许诺,因为在他造访之前钱的藏书楼就付之一炬了)。^[19]

什么原因会说服他们用这种方式开放和共享藏书呢?首先,藏书家们倾向于把藏书展示给他们认识的人。血缘关系是很有用的;例如,徽州府歙县潭度的黄姓家族,决定把藏书存放在宗祠里,以便防止它们被借给非家族成员。^[20]12世纪晚期,著名藏书家晁公武是另一个著名藏书家叶梦得的表亲,及大诗人、藏书家陆游的舅父(原文作外甥,据罗凤珠《晁补之及其文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晁氏家族及其姻亲师友”(台北:乐学书局,1998年)改。——译注),这三人都来自官宦之家,世代藏书。^[21]在绍兴府,晚明年轻的藏书家商浚声称,他可以经常在舅舅钮石溪那里翻阅藏书。^[22]而且,在明代苏州,文徵明一半以上的子侄在苏州狭窄的士人精英圈子里通婚^[23],我们可以看到亲戚们之间彼此交换和借阅图书。

友谊是打开那些难以接近的藏书的另一把重要的钥匙,尤其是在明朝的最后一个世纪,当士人们普遍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话语中赋予友谊以更大的重要性时。^[24]有时朋友们一起分享新得到的书^[25],还建立了很多讨论诗歌和政治的团体。^[26]有时,一个藏书家会优待一两个特别可敬或急需的人,如苏颂让叶梦得抄录他珍贵的抄本,郑樵借书给方渐和林霆。^[27]明代的阎起山(1484—1507)无钱买书,派家里唯一的仆人到朋友那里借书来抄,日夜大声朗读^[28];17世纪中叶,顾炎武远在华北,常常从远在苏州和南京的朋友那里收到他们寄来的书。^[29]

但远为普遍的情况是,在有东西可供分享的藏书家们之间产生出了朋友关系。18世纪著名诗人袁枚喟叹一个穷读者在试图

向他人借书时所遭遇的屡次挫折。^[30]他需要的可能只是一瓶酒或一条鱼,这是宋代诗人黄庭坚和苏养直在给主人还书时送的礼物^[31];或者是一件昂贵的毛皮大衣,正如山东藏书家李文藻请求一个神秘的书商允许他抄录一部书时所做的那样。^[32]另一种润滑剂是政治影响力,因而藏书家们易于屈从来自地方官的要求^[33],尽管他们出于恐惧不愿出示最珍贵的藏书。

但是,一个藏书家要想获准使用别人的藏书,他可以使用的可能最有效、而且肯定是最被普遍采用的通货,就是他自己的藏书。一旦通过继承、购买和抄写,使他从一个单纯的读者变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藏书家,他就会发现藏书家们草率无礼的拒绝变成了欢迎信。这些藏书家用书充当了进入彼此藏书的钥匙,他们会同意用各种形式交换书籍。这里引用几个更有名的例子:12世纪,尤袤与杨万里和陆游共享藏书^[34];明代叶盛与刘昌,邵宝、杨循吉与吴宽,李廷相与李开先,柳金与俞弁,赵用贤与黄洪宪,赵绮美与冯梦楨,何大成(卒于1643年)与冯舒共享藏书。^[35]有时,如16世纪初在苏州,动机可能仅仅是炫耀某人新得到的不同寻常的书,以图胜过别的书友。^[36]即便如此,有些像这样相互竞争的藏书家也会彼此交换书籍,正如留存下来的题跋所揭示的那样,比如苏州人唐寅、文嘉、杨循吉和都穆之间。^[37]这种交换常常发生在地位大致相当的藏书家之间:三个17世纪初的苏州藏书家——冯舒、叶树廉和陆貽典——同意相互造访,彼此参考和借阅藏书。^[38]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地位优越的人所能利用的私人藏书的范围在不断扩大。黄宗羲,17世纪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于1613至1679年间获准利用江南至少14宗大型藏书。有两次他依靠的是同宗关系,4次依靠同乡关系,其他则依靠自己及其家族的关系网。^[39]在黄的案例中,他似乎并未与人共享藏书,而是利用了作为一名杰出学者的崇高地位,以及他所具有的对那些满怀期待的藏书家向他展示的珍籍孤本的鉴赏力。

在任何时代我们都未发现藏书家允许他人无条件地检视和抄录他的所有藏书。的确,有时这些交换被仅仅局限于查看或抄录书籍。王钦臣只展示自己或别人从他的藏书里抄录的副本^[40];尤袤从不让他的书离开家^[41];晚明藏书家祁承燾订了一个“约”,允许有文化的子孙进到他收藏宏富的藏书楼里,在那里读书,但明令禁止他们把书带到自己的房间去。祁还允许好友借书去读,但仅仅是在有第二部的情况下;他要确保主要的那一部不离开他的“密园”。^[42]他的儿子祁彪佳,至少对一个喜欢的客人采取了更灵活的政策。1639年,钱谦益问他可否从他那里借书。开始,祁彪佳拒绝了他的请求,原因是他必须在这件事上遵从父亲的愿望,绝对不让任何人借书。4个半月以后,不知为何他收回了自己的决定,并给钱谦益送去了他所需要的书的抄本。^[43]

这些学术惯例无疑使文本得到繁殖,这样就减少了它们因火灾、洪水和其他事故而被毁的机会。但是,当它们被看作一个更大、更正式的书籍共享网络的一部分时,它们从长期来看的重要性就变得更加清楚。有时,这些网络会与师徒关系一起起作用,比如苏州作家归有光请他的一个弟子与一个藏书者商量要看后者收藏的两部书,之前书的主人曾几次回绝了归自己提出的请求。^[44]然而当共享图书的藏书家——如苏颂、尤袤、宋敏求、杨士奇和赵用贤——与宋代、明代的皇室藏书建立了持久联系时,藏书家的关系网就变得最为明显。^[45]这些藏书家通常在宫廷藏书机构、档案部门或翰林院供职,他们会在返回外省的家乡时,与某个或多个当地藏书家分享他们所抄录的宫廷藏书。11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苏颂在朝廷馆阁之职上做了9年,如馆阁校勘、集贤院校理和宫廷藏书主管。按照他孙子的记述,他每天从这些机构的藏书里转抄2000字。他退休回到江南后,向叶梦得展示这些稀有的抄本。这样,即使像叶那样规模的藏书在火灾中受到严重损失,即使这些藏书家的后人拒绝向感兴趣的学者开放藏书,他们抄录的这些宫廷

藏书副本还是跨出了宫廷的界限，最终在民间藏书家中间流通——哪怕是因为它们被子孙卖掉。

共享协议

当共享行为以书面规定的形式正式化时，其社会的、文本的意涵会变得更加清晰。如我们所刚刚看到的，祁承燦与他的子孙订立了一个关于使用他的藏书的协议。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共享不是相互的，他的协议与其说是一个关于书的协议，不如说是古老的中国式家训在一度神秘的藏书家世界中的扩展。影响远为深远、远具启示性的模式，是由非血缘关系的藏书家所实行的正式书面协议。通过这些协议，藏书家们制订了适当的程序以维持相互借书的社团的运转，以便能够相互阅读和抄录藏书。我所知道的首个这样的正式协议，是由两个 11 世纪中叶的士大夫——宋敏求和 156 王钦臣发起的。^[46]两人都继承了著名的藏书；宋的家族藏书特别富于收藏唐人作品集，他让王浏览了一遍，并选了一些书让书吏抄写。两人都曾允许其他一些官员利用他们的藏书。^[47]然而，使这一书面协议与众不同的是它的互惠性。每个藏书家草拟一份所有藏书的目录给对方看，由对方挑选他想抄录的书来丰富自己的收藏。

这一协议在当时影响似乎很小，因为下一份关于书的协议，据我所知，是在将近三个世纪以后，河南藏书家冯梦周（约 1285—？）把他的藏书开放给“里之不能有书者”。这一协议更像是一个慈善之举而非共享协议，它让村民看完书或被催还时把书还回去，缺者随时补足。^[48]又过了两个世纪，约 1570 年，我们看到了第一份已知的江南地区的书籍互借协议。在它出现时，各个社会阶层都在为范围十分广泛的群体活动制订协议。^[49]它让我们看到家族藏

书如何在特殊条件下向经过选择的非本族藏书家开放。王世贞可能是他那一代人里最著名的文人,他向天一阁的创建者范钦提议交换图书,条款清楚明确:“欲彼此各出书目,互补其阙失。”^[50]由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藏书之间相隔几百英里,这一协议大概是要求他们派自己的抄手和仆人前去抄录想要的书;尽管如此,仍然不可以随便进入对方的藏书楼看书、借书和自己抄录书籍。如同宋代的先例(其条款很可能对它有影响),这一协议基本上是两个大藏书家之间的协议,没有其他人参与。目的主要是增进他们彼此的藏书,而不是广泛共享,甚至也不是为了确保彼此书籍的保存。

不久以后,图书交换协议变得更为普遍。大约1600年,戏剧家、收藏家梅鼎祚和另外两个著名藏书家——焦竑和赵琦美——订立了一个协议,约定每三年在南京会面一次,展示、分享他们各自所藏的珍本和古本,以供阅读和传抄(大概主要是他们在过去三年里的新发现)。^[51]虽然这一协议没有实行,明末三个苏州藏书家——冯舒、何大成和吴翌凤——订立的一个类似协议,却是真正实行了的。该协议约定每个成员把新买的书让其他成员借阅一段时间,然后归还主人(大概此前拥有的藏书不包括在内)。^[52]冯舒还和朋友叶树廉和张拱端交换书籍,虽然没有看到他们订立书面协议的材料。^[53]

157

17世纪中叶的两份协议,保留了大范围的书籍交换协议的细节。这两份协议的幸存可能是很偶然的,但其制订却不是偶然的,是在其他士人交换协议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二份协议还是从其中一个成员以前的一个交换协议发展而来的,又把彼此已经认识的家族包括进来。这样,这些协议的条款认可了以前积累的经验,它们是为可以看作友朋家族的熟人而起草的。

两份协议中较早的一份,是由当时江南的一个大藏书家——曹溶起草的。^[54]曹和姚士舜一样是嘉兴府人,他被明清易代之际国家众多文献的遗失所警醒。^[55]17世纪中叶,他拟定了一套书籍

交换的规则,成为后来藏书家们交换协议的范本:

158

予今酌一简便法,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注,次史逸,次文集,次杂说,视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贲所钞互换。此法有数善:好书不出户庭也;有功于古人也;己所藏日以富也;楚南燕北皆可行也。警告同志,鉴而听许。或曰:此贫者事也,有力者不然,但节讌游玩好诸费,可以成就古人,与之续命,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枣梨,始小本,讫钜编,渐次恢扩,四方必有闻风接响,以表章散帙为身任者。^[56]

在四个原则——安全、平等、利己和利于书籍保存——的基础上,形成了这一协议的条款。所有的书都将以副本的形式从主人那里借出,然后还给主人。这样,主人永远不必出示原本,副本中抄录内容的多少根据主人意愿而定,没人知道是否是全本(后来的藏书家批评曹所藏的抄本里有很多抄写错误)。^[57]其次,主人以对等的数量出借藏书。第三,很清楚其基本原则是增进自己的藏书、名声和财富——注意主人在借书的同时实际上也为自己制作了一个副本(借书的人读了这个副本,如果愿意的话大概也会抄录一份,但他要自己承担费用)。第四,协议的有效期似乎很短,每一方用于抄录的时间只有一两个月。第五,目的在于延长书的寿命,因为书多制作了一个副本,就增加了长期留存的机会。这份协议中其他一方或几方的身份并不清楚,但是后来与曹达成协议相互抄书的两个藏书家是嘉兴的朱彝尊和苏州的陆澹(1644—?)。^[58]

同样在17世纪中叶,另一份著名的图书交换协议是由丁雄飞(1605—?)和另一个南京藏书家黄虞稷(1629—1691)起草的。这份协议并不是自发地来自一般人对藏书的痴迷,认识到这一点很

重要。两个藏书家都出自移民到南京的家庭，丁家来自南京长江对岸的一个县，黄家来自遥远的福建省的福州。^[59] 两人的父亲在科场上都很成功，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也把他们和自己的儿子带进了有影响的士大夫圈子，染上了士大夫们奢侈的爱好。两个家族都利用他们的书来拓展关系，提升了他们在这个城市里的形象，这个城市以富于艺术、书籍、悠闲的官员和多彩的人物著称。两人都认识钱谦益，并在顾炎武远在华北时帮他获得书籍。黄甚至还收藏了三部丁雄飞的先人丁毅写的医书，以及丁自己编的家族藏书目录。^[60] 这样，这一协议是拥有长期友谊的家族之间在广泛深交的基础上慢慢达成的结果，这样的关系很可能是协议里包含借书条款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在曹溶那里，这样的条款对于不熟识的参与者是明确排除在外的。

至少从 14 世纪起，丁家就以医术著称。^[61] 他们居住的那个县地理位置离南京很近，在文化上却与之相去甚远：

[江]浦业诗书者，环邑不百余家。乡镇穷闾，则户无一二焉。岂皆无可教子弟哉？贫家苦于力，不能为子弟延师；富则吝于财，又不能为子弟延良师。无良师，安有贤子弟出乎？^[62]

到 16 世纪末，江浦的政府设施几乎没有为学问提供什么支持：事实上明初县学从朝廷接收的所有书籍都已丢失了，当地方志的编纂者怀疑新得到的书在几十年后是否也会遭到相同的命运。^[63] 但那时丁家已离开这潭死水，搬到长江对岸的南京。丁雄飞，或为他写传的人，把南京看作丁的家。^[64]

在南京，以及后来在福建省的泉州，当他父亲 1620 年代在本地当法官时，丁雄飞对书发生了兴趣。19 岁那年，在他从福建回南京的路上，这种兴趣发展成一种痴迷：“一至虎林[杭州的一座山]虎丘[在苏州]，见书肆栉比，典册山积，五内震动，大叫欲狂，

尽倾所蓄以易之。”他的妻子与他同样嗜书成癖。他们结婚不到十天，她从装嫁妆的箱子里拿出四包书给他，后来又典卖了大概是嫁妆里剩下的首饰衣物，都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爱好”。^[65]他们的藏书很快达到近 20000 卷。把这些书和他不久后将继承下来的大量藏书加在一起，丁氏藏书成为南京最大的收藏之一。^[66]

黄氏家族藏书规模更大，更壮观。黄居中是个受到普遍赞誉的藏书家，黄宗羲和其他许多人多次拜访他，喜欢在他那里看书、借书。^[67]他自己藏有书约 60000 卷，其子黄虞稷又增加了 20000 卷，合起来珍贵明版书的收藏实力很强。^[68]他的儿子很快就因向其他官员和士人出借和展示图书而闻名。他加入了一个经史读书会，借书给自己和父亲的朋友，还在 1639 年与来访的福建藏书家徐渤达成协议，相互开放藏书。^[69]这样，他在清初和丁雄飞签订的协议实际上用书面形式使他长期以来的愿望和实践正式化，并且与之订立协议的是一个黄家已经认识和打过交道、已确证有学术兴趣的宦宦之家。^[70]而且在 1654 年，也就是黄订立协议的那一年，住在南京的一个苏州人汤濩加入了他们的协议，接受了下列条件：^[71]

1. 每月十三日丁至黄，二十六日黄至丁。为日已订，先期不约。
2. 要务有妨则预辞。
3. 不入他友，恐涉应酬，兼妨检阅。
4. 到时[主人要提供]果核六器，茶不计。
5. 午后饭，一荤一蔬，不及酒，逾额者夺异书示罚。
6. 舆徒每名给钱三十文，不过三人。
7. 借书不得逾半月。
8. 还书不得托人转致。^[72]

不像曹溶的协议,丁和黄的协议允许彼此借书,并把书带走,但也规定必须本人亲自还书(这一规定无疑得益于他们在南京住得很近)。此外,它还明确禁止其他人参加。不到一年另一个南京的藏书家加入协议,这一事实显示该条款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任何“搭便车的人”享用这些书,尤其是如果他没有东西可以回报。换言之,任何其他参加者必须承诺遵守和承担协议确定的所有规定和责任。

但是,请注意这份协议中缺少什么。它写于1654年,没有提及政治,可能是因为清初的政府与晚明政府不同,已经禁止任何与政治有关的读书社团,极大地压缩了其数量。^[73]这一协议也没有提及学术,虽然它(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晚明协议)最终为清代更具群体性的学术活动树立了一个模式。^[74]

此外,我们期待在一份书籍交换协议里找到的东西这份协议都没怎么提。这份协议要实行多长时间(其中一方想终结它怎么办)?他们如何选择书籍(两部藏书都有目录,但只字未提)?可以借多少书、什么样的书?这些书可以抄录吗?每个藏书家每月拜访对方一次,并在半个月内亲自把书还回去,但是他什么时候还书呢——是对方下次到他家里来的时候吗?如果是这样,丁有13天的借期,黄有16天,而协议则明确规定借期不超过半个月。我们如何理解这种明显的不对等和违反协议的情况?最后,这些藏书家如何利用、或被允许利用别人的藏书?这些细节可能被认为是细枝末节,对一个慷慨大度、愿意发起这样一种自由交换的人来说不值一提。的确,拜访看起来主要是一种社交活动,唯一提到的罚款是因为提供的食物不够量,而不是因为书。

总之,这两个藏书家似乎对他们藏书的实际用途甚或学术用途不感兴趣;看起来他们是士人藏书家,纯粹而简单,具有良好教养,被晚明士人文化所欣赏,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年轻一代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以及考证与历史研究的影响。晚明印本的崛

起——它的化身千百，它远为低廉的价格，它的广泛题材，以及它在民间收藏中远为巨大的规模——鼓励了一些大的藏书家，主要是江南地区的，来相互共享藏书，即便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就图书借阅来说，无论实行这些书面协议多么标新立异、前景多么光明，其中没有一个参加者在三人以上。似乎没有哪一个引发了任何重要的集体写作或研究，以及学术上的进步，甚至说是可能保证了这些文献的长久流传或集体拥有的藏书或藏书楼的制度创新（现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仅仅在儒藏的讨论中可见端倪，要在几个世纪后才真正出现）。^[75] 这样，它们最好被视为士人藏书家圈子采取的短期改进措施，这些藏书家面对的是残缺不全的政府藏书，和他们不熟识的人所拥有的常常不友好的私人藏书。如此，受规模和范围的局限，这些协议只是具有一种历史意义，这种意义主要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这就是即便在明末，在他们所处的世界里，一个广大的学术上的“知识共同体”仍然是一个远未实现的理想。我们最多有这样一些凝聚力不同的小圈子，其成员享受着借
163 阅尊长或朋友藏书的程度不同的权利。这些圈子以血缘、朋友和同乡为中心，这样就有助于我们确定晚明男性士人为共享其藏书和知识而秉持的、作为行动依据的“公共”观念的局限性了。

其他知识库

除了这些如此将书本知识置于优先地位的“文化寡头”外，还同时存在着各种知识传统，它们从未被写或印在书页上，也不奉某部古代文献为其主要正统。这类知识最容易想到的例子，或许是在工匠和农民中间世代流传的技艺。在晚明，这些实践知识吸引了一些学者和士人，使他们写下关于从园艺、烹调到武器、机械等题材新颖的著作。那时有文化的人中一个特别流行的话题是医

学,这种兴趣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医学协会——一体堂宅仁医会的形成。它由徽州大夫徐春甫于约1566年在北京成立,其成员有共同分享和增进医学知识的义务。徐对“国朝医学,坏于不会讲,不推求”感到沮丧。^[76]除了对古老医典《黄帝内经》的研讨之外,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作为从医者的研究和经验。

尽管该会唯一幸存下来的不完整记载既不包括其规章,也不包括任何讨论报告,但对于这些人来说,对医学的共同兴趣似乎比通常把中国人彼此区分开来的同姓、同乡和同一社会等级的义务更重要,后者的情形我们已经在学者藏书家那里看到了。例如,1568年时该会的46个成员来自8个省(只有两个是北京人),包括32个不同的姓,既有朝廷高官,也有地方县学生员(其中许多是业余爱好者而不是职业医生)。^[77]但是,作为成员他们同意秉持一般被认为是具有新儒家特征的心态、公共实践和个人价值:诚实、努力、仁爱,众生一体。徐春甫告诫他们,只知道医书的大夫不如那些同时懂得儒家经典的人。事实上,他直言不讳地声称不相信那些不读书的大夫,不相信那些只把知识建立在经验之上的大夫。他也对斥逐作为危险庸医的巫师更为坚决,他们与像他这样继承古代圣人医学知识的人不可同日而语。^[78]

164

尽管徐进行了种种自我拔高,他还是把重点特别放在成员们需要去实践善行,摒弃自私上。

医乃仁术也。圣人著书立法,救民疾苦,欲俾仁人君子得而知之。而颛测明察,推以及其不明者,皆自仁心一念也。初非为利而设,至于后世人心不古,习以网利,而竟不传后世。或一时寸长,则自秘不与人知……或有所短,则自掩而耻问于人,诚恐见其学浅。自秘者固不仁,自掩者尤不仁也。^[79]

医学知识通过演讲和讨论来传播,其中真诚的动机,或诚实,是关键性的。^[80]此外,这一协会的成员要为穷人看病:“贫者尤当

尽心以施剂，而急救其疾苦，是则仁心仁术之本事也。”成员们通过多收富裕病人的钱来为这种慈善工作筹集经费。^[81]

165 这种医学知识显然与掌握关键性医学文献相联系，但其功效也来自经验。因此，它的方法在晚明获得了一种新型知识——西方自然科学——的支持。由16世纪末及17世纪的耶稣会士引进的欧洲天文学、数学、光学、观相术、炮术和其他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知识，在一些中国人中间培育了对于物质和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如学者方以智（1611—1671），部分地因为受到这种西方学问的启发，把《大学》中的关键用语“格物”的意义扩展到传统新儒家的人伦关系和道德原则之外，把儒家经典中并不一定包含的物质的“物”包括进来。^[82]对于徐光启——一个天主教的著名皈依者来说，这种耶稣会士学问的一个引人之处是它的“公”。耶稣会士不仅慷慨地与他人分享知识，而且他们关于世界的论断整体来说也是可行的、客观的。^[83]即使在谢和耐（Jacques Gernet）看来，耶稣会士对于西方科学的介绍没有“带上现代科学的印记，或传达其精神”^[84]，它至少介绍了一种追求科学知识的方法，这种方法并不主要基于书籍，即便是《圣经》。事实上，这种西方学问遭到一些中国人的批评，因为它与他们自己儒家经典里的教诲有分歧。^[85]

长远的解决办法

在清代，这种更便于获取书籍和知识的更有希望的趋势，最初只表现为一种暗流。按照清代中叶苏州伟大的藏书家黄丕烈（1763—1835）的说法，康熙（1662—1722）和雍正（1723—1735）时的许多苏州藏书家，如苏州城里的顾氏和蒋氏，与文人学者交往，但“特深自韬晦，故世鲜知为藏书家耳”^[86]。然而最后，开放这些藏书以及其他重要民间藏书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果，却并不仅仅

是因为藏书被继承人们所瓜分拆散。皇帝和官员们发起了搜集书籍的工程,剥夺了书主人们对许多珍贵版本的控制权,这些非常封闭的私人收藏形成于明末清初。更具积极意义的是,皇权成为创建向所有学者开放的政府藏书及使之制度化的工具。当一些学者在17世纪末仍对“无字书者,天地万物是也”感兴趣时^[87],多数学者坚持强调文献在中国学问中的优先地位。江南一些学者组成的团体所采取的共享书籍的实践不断增加,并将他们对经义的讨论付印成书,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这一信念。事实上,17世纪出现以文献学方法对书籍进行研究(以考据学派著称),及其在18世纪的繁荣,显示了与此前数个世纪相比书籍获取方面的极大改善和文本考证学在学者们中间更广泛的传播。正如包筠雅所精彩描述的那样,清代的普通读者享受着书籍在社会和地理层面上不仅是更广泛,而且是更深入的传播^[88];清代的学者则受益于文献与文献学的更广传播。版本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关注的核心,不仅对藏书家如此,对于致力于此的学者也是这样。而且,如果说到该世纪末,有志于学的学生即便有钱也经常不能得到解释经典的当代著作的话,他们仍然可以用“极其便宜”的价格从书商那里买到几百卷宋人著作。^[89]

166

这种获取学术知识的进步,在清初和清中叶的四类学术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首先,许多清代学者喜欢与其他学者广泛进行长距离的通信。在当时的社会,学术信件的流通所起的作用就像当时西欧的学术期刊,写信使学者们能够传达自己的思想和信息,而不必过多担心官方是否认可及对这种交流的监视。这种书信艺术最多产的学者是钱大昕(1728—1804),据说他一生与2000个朋友和弟子通信,是莱布尼茨的两倍。^[90]一些长信因为可能的确曾在学者们中间传阅,可被视为学术文章的手稿。

第二个进步是书籍共享行为的扩展,这种行为在晚明的学者个人和团体中已经出现。像朱彝尊那样的藏书家做了官之后,得

167

以成功地利用史馆的藏书。朱在 1684 年因带一个私自雇佣的抄手进入翰林院替他抄录官藏典籍被解职后,回到了位于江南嘉兴府的家中,很快就能利用江南至少 7 家最重要的私人藏书。^[91] 通过获准抄录所有这些藏书中的珍本,他建立了超过 80000 卷的庞大个人藏书,并编纂了一部 300 卷的关于散佚和现存儒家经典文献的总览性著作(即《经义考》)。

不迟于 18 世纪中叶,这些个人行为发展为集体交换。晚明的学者团体大多偏好诗词酬唱和组织政治社团,而清中期的学者则喜欢建立和参加读书和借书社团。例如在杭州城,不只是两三个、而是七个藏书家,用一种相对随意的方式彼此分享藏书。他们经常聚会,讨论各自所藏的珍稀抄本和印本,彼此允许读书、抄书和借书。他们相互为彼此的书写跋语,校对各人所藏不同版本间的差异,经常相互展示藏书以增进彼此的收藏。^[92] 随后这样一种行为至少被一个大的私人藏书家所推广,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他在苏州开始向不请自来的陌生学者和藏书家开放自己的藏书。虽然他的书仍旧拒绝出借,但他让这些来访者在藏书楼的一个阅览室里参观他的藏书。^[93] 这样我们就离人们今天看到的像静嘉堂文库这样的东亚私人藏书,甚至今天中国的前私立图书馆以及更小一点的地方图书馆阅览室的学术世界相差不远了。

168 第三和第四类学术活动的组织要好得多,并不奇怪,它们得到了官方甚至是皇帝的支持。第三种类型,在清朝头一个半世纪里在皇室,尤其是乾隆皇帝(1736—1796 在位)支持的 150 多个编纂工程中显示出来。^[94] 这些活动的中心目的可能是为了皇帝对书面文献的获取、审查和保存,但文献收集和编纂的过程为参与编纂工作的学者们发掘和揭示出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虽然参与这些编纂工程中最重要的一個——《四库全书》——的学者们最后被禁止抄录和借阅这些文献,他们当然还是被允许因工作需要而阅读经过选择的文献,一些珍本的副本甚至被泄漏出去印刷出来。^[95]

然后,在18世纪的最后20年,政府建立了机构,采取了措施,以大得多的力度支持以文献为基础的个人学术研究。^[96]1792年,政府允许持有适当证明的官员和士人利用收藏在江南扬州、镇江和杭州三个城市专门建造的藏书楼里的整部四库文献。它还允许这些读者进行抄录,从1794年开始还可以借阅。这种开门政策是由比宋明时代有效力得多的藏书管理部门所采取的,它使这些读者得以利用皇家藏书开展编纂工作,甚至将其中的一些书出版。这些书的公开流通范围超出了江南地区,一些学者得以编纂和出版关于四库全书的详细目录和评注,中国学者对于古代文化的知识得到极大地丰富。用20世纪一位博学的中国学者的话说:“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钜矣,用亦弘矣。”^[97]

官方的保护对于18世纪学术协作的成长同样重要。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晚明,富裕的官绅为一两个他们喜欢的学者提供物质支持。清中期,强有力的官方保护人常常是像毕沅、朱筠,最后是阮元这样的省级学政,他们在一个大得多的范围里这样做。他们利用官位、关系、收入和其他资金,支持了一系列编纂项目,雇佣了数百名学者和官员,最终为学者们出版了许多古书的有影响的版本。^[98]这些为学术协作而作的至少是暂时性的制度安排,其形成背后有国家权力和个人兴趣的推动,显示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如此彰显的私人 and 公共藏书利益的不平衡,在18世纪晚期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然而,这一学者们和学术总体上的收获,无疑伴随着一些私人藏书家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一些与清朝统治集团的意志相违背的书籍的永久丧失。

即便如此,书籍利用和借阅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尤其是在学者之间的互动方面。正如亚历山大·伍德塞(Alexander Woodside)提醒我们的,许多地方的学生缺乏金钱、关系和空闲来获得可靠的文献;购买一宗够用的藏书对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

的。^[99]这样,到19世纪初,一个杭州诗人在他的《借书诗》序里仍然会持与一个半世纪前的黄宗羲同样的观点:“藏书家每得秘册,不轻示人,传之子孙,未能尽守,或守而鼠伤虫蚀,往往残缺,无怪古本之日就湮没也。”^[100]到这时,这段话里最重要的字眼可能已经变成了“秘”而非“册”。事实上,正如苏州藏书家黄丕烈所指出,及苏州出生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所断言的,对四库馆藏的利用似乎很快使这些一度珍稀的本子变成“寻常习见之本”。从此民间藏书家把他们的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搜寻旧版本的激烈竞争,尤其是宋版和元版书,以及“《四库》未经采辑者”。^[101]这样,学术书籍、尤其是由政府管理的学术书籍利用上的全面进步,并没有终结竞争的火药味和民间藏书家中的封闭行为,即便他们是多年的好友。

要了解这种收藏的本能影响之深,我们只需看看黄丕烈本人的例子。在黄积极藏书和买书的40年中,他曾经打过交道的有不下30个苏州藏书家,以及同代人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献学家和书商。许多记载表明,他经常从他们手里借书,有时抄录副本,有时仅仅是阅读。^[102]在这些杰出人物中间,有黄最亲密的藏书家朋友,他们与黄组成了“藏书四友”——这是杭州著名艺术家陈鸿寿为他们所作画像的标题。据说黄与这些人之间经常相互展示、分享和交换书籍。^[103]

170 但是,当黄从这些朋友中的一个——苏州藏书家周锡瓚手中买到宋版《太平御览》时,他把整部类书锁起来,谁也不让看。周自己愿意出让这部著名类书的这一非常稀有的版本,据说是因为他被纷至沓来要求看这部书的人搞得精疲力竭。黄以藏书癖为辞,从未把它展示给周或其他任何朋友。^[104]同样,黄长期克制自己不去查问别人手中所藏的珍本。虽然他知道苏州藏书家程世铨得到了一部宋版《鉴诫录》,但他很清楚这个朋友不愿把它给别人看。直到二十年后黄攒够了买它的钱才提出要求查看,避免了遭

到拒绝的羞辱(或失去程的友谊)。^[105] 这些事件——还不只这些——在四库工程完成和开放在江南三个城市的三部《四库全书》之后发生,凸显了学术藏书利用问题的持续存在。



第六章 士人著述与钱近仁的案例

171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本书叙述过程中,所讨论的读者类型有微妙的变化。第一章设想雕版印刷品是为多种类型的读者出版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涉及各种士人读者和作者,其中一些人对于娱乐远比学术关心;第四和第五章把范围缩得更窄,集中讨论学者藏书家和想要成为学者的人渴望利用藏有珍稀或贵重典籍的重要藏书。这一焦点的收缩,伴随着对江南士人学者在获取甚至接近书籍方面所面临困难的强调。对这些读者来说这样的障碍持续存在,直到晚明印本书的数量变得更多,直到清代一些重要的政府和私人藏书变得更易于利用。

但是,传播士人知识和扩展其读者群的问题远未解决。一些晚明士人“屈就市场”,参与商业性的写作和出版。他们撰写和编纂的书,无论是由政府、书坊或别的民间机构出版,都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把平民、甚至工匠,拉“升”为可以泛泛地称为“士人作品”的读者。即使这些晚明和清代读者经常阅读的范围比前面几章所讨论的要窄,识字人群的扩大,正如最近一部关于清代教育的书的编者所作的谨慎判断,“是难以置疑的”。^[1]

172 从表面上看,这一识字率的增长在士人阶层以外极大地扩充了士人知识的读者面。当然,识字的人还包括一些和尚、道士、军官、武师、郎中、风水师、算命者、商人、伶人、师爷、书吏、教师、抄手、旅店老板、讼棍、店主和作坊主。^[2]早在12世纪中叶,连江南东部一些生活上还过得去的佃户也让他们的孩子学习读书;17世纪初,那里“乡野小民”的孩子也获得了同样的阅读技能。^[3]另外,我们还认识到一些社会和地域差异,例如在帝国晚期,读写能力在男

人中间比在女人中间远为普遍^[4]，华南比华北普遍^[5]，城市比乡村普遍。^[6]

但是，一旦试图哪怕用一个大致的近似值对这些类别中的任何一个进行量化，读写能力的概念就会变得如此模糊，社会史学家进行分析时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变得如此棘手。中国学者一般认为读写能力是指能认一定数量的字。^[7]但是他们在识字的数量标准上分歧严重，少则 984 字，多则 3000 字以上。^[8]而且，对成年男子识字率的估算差异如此之大，从 10% 到 45% 甚至更高^[9]，以至于使人不得不认为这些数字只是“盲人摸象”，它们所讨论和评估的似乎是完全不同的技能。

换言之，读写能力的概念，需要分解为更有效的类别。罗友枝 (Evelyn Rawski) 和伊维德 (Wilt Idema) 已经提出了读写能力的不同层次，很有帮助：初级读写能力、中级读写能力、充分读写能力和高级读写能力。^[10]对于后两者，本杰明·艾尔曼 (Benjamin Elman) 提出了文言文读写能力的层次，比如具有以下能力：“阅读、阐发并记忆科举考试制度中用到的经典文献；用古典文体写作诗文——无论他们是否曾通过科举考试”。^[11]与牟复礼 (F. W. Mote) 所提出的清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数目相一致，艾尔曼提出清代大约 10% 的成年男子具备文言文读写能力。^[12]

但是对中国识字率的估算，正如罗友枝和其他学者已经认识到的^[13]，需要在划定这些水平分级的能力层次之外，将分别具有这些技能的人群累加起来。正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 (W. A. P. Martin, 1827—1916) 所观察到的，对于有书写能力的中国人，他们173还需要考虑同时存在着一些某种程度上无法转换的功能性读写能力，其中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文字和用语，同样的文字和用语意义也有区别：

在西方各国的字母语言中，读和写的的能力意味着用笔表达思想的能力，以及理解他人用笔表达的思想。而对于中文，

尤其是文言和书面语言,其意味则完全不同。一个店主可能除了会写数和记账之外,写不了其他任何东西;一个读过几年书的小伙子能够准确地读出一本书上的字,但却连一句话也理解不了。^[14]

丁韪良的观察报告写于北京,但是得到南方福建省的英国传教士爱德华·约书亚·杜克斯(Edward Joshua Dukes)的附和:“当我向这些[有学问的]人中的一个表示,我对他读不懂我自己能一目了然的一本小册子感到惊讶时,他答道:‘我为什么非得懂?我又没见过这本书!’”^[15]

中国的识字阶层不仅包括许多忙碌、柔弱、短视、不用功、忘记了很多年少时所学字的人,还包括许多成年读者,他们看不懂别的成年读者所写的书。这样就造成了西方对“中国识字率”估算的巨大差异,以及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远为复杂的工作——对这些功能类型和“识字率”水平加以量化、精确地标示它们在帝国不同社区中的社会分布——所遭遇的障碍。^[16]

那么,与对不同读者群的关系进行直接的社会学分析不同,本章通过聚焦于读写能力、书籍和藏书活动对清代初、中期的识字人群与不识字人群都意味着什么,间接地探究读写能力的问题。这一章从回顾对读写能力、书籍和藏书活动的一般经济、道德、社会和宗教认识开始,然后考察钱近仁的极端例子。在本书的开头已对钱作过介绍,他作为一个藏书的鞋匠,最终被葬于虎丘。钱作为一个读者和藏书者,很容易在18世纪苏州士人学者的文化关切和活动中显得边缘化。他出身贫寒,很小就成了孤儿。他不是从老师那里学会认字,而是从其他读者那里,每认一个字都要给他们钱。他能看到的不是学校或私人藏书,而主要是通过工作,看苏州的书店、寺庙和神祠里的书。他因此得到了少量藏书以及关于儒家经典的知识,足以让他以对学问的热爱,给苏州的一小群文人学者,如彭绍升、汪缙、王丙和薛起凤等,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正如

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看到的,钱对其识字能力的运用不仅与他那个时代的一些普遍观念相左,而且也与他的士人敬慕者们,尤其是彭绍升远为广阔的思想抱负背道而驰。最后,这一边缘化角色的案例提供了一个有用、或许是间接的方式,来考察晚期帝国文化中不同层次与类型的读写能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对读写能力和书籍功用的认识

中华帝国晚期对于读写能力和书籍的流行认识是相当正面的。诚然,在16世纪,王阳明的一些追随者低估了读写能力和书籍对于人必须追求圣贤境界的重要性,声称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仅仅需要“行‘愚夫愚妇’之道,做百姓日用之事”。^[17]但是到17世纪,这一新儒学泰州学派的影响已大大衰微,在整个18世纪,读书和学问再一次受到广泛——如果不是全面地——赞赏和称誉。读书和学问赢得重视,不仅是由于它们对品味和鉴别力的培养,而可能更多地是因为它们能够给一个人的事业带来机会,尤其是在科举考试和做官方面。这些考试中的优胜者,借用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不朽名句:“洋溢智慧的微笑,满载充盈的财富。”

随着时间流逝,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越来越不认为成功只限于科场。尽管做官仍然具有吸引力,但科举考试的高落榜率,以及通过其他职业获得财富的前景,使许多人在著述中谈到识字在学习和科场之外的其他用处。士人像这样表达对识字的非士人用途的欣赏,至少可以追溯到12世纪,当时袁采极力主张士大夫家庭教育子弟从事官员以外的职业,比如经商。^[18]华北从13世纪、江南从不晚于17世纪起,一些儒家学者发展了一种话语,认为“治生”以养家糊口在道德上优先于读书,尤其是当一个受教育的人得不

175

到一官半职时。^[19]虽然这些学者很少指明他们头脑中做官之外的职业类型,而且他们的观点在当时只代表一种很小的声音,何炳棣却注意到许多清代学者从事了“有损[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工作。^[20]按照18世纪末一个南京学者的说法,经济上的困难迫使十分之九的学者像平民那样生活,在保留士人身份的同时充当商人和吏员。^[21]

读写能力和商业活动之间的这种联结,最终渗透进了清中期珍稀善本鉴赏的清雅世界,那时,知名的书痴和藏书家在善本书业内是全职的商人。在上一章末尾所讨论的有影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书商黄丕烈,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他在1825年开了自己的书铺。另外两个有影响的书业人士,钱听默(1750?—1802)和瞿中容(1769—1842),在苏州虎丘附近开始了经营活动。到18世纪末,钱听默从湖州搬到苏州,开了一家善本书店,起了个优雅的名字“萃古斋”,吸引了许多苏州文人学者。^[22]1829年,常熟县的一个著名藏书家瞿中容也在六十岁时搬到虎丘,作起了经营书和古董的买卖以养家糊口。^[23]

商业对学术领域不断进行渗透,反之亦然。正如士人参与商业活动,商人及其家庭成员也参与士人生活,沉溺于士人的爱好,比如收集珍善本书。14世纪几个商人子弟,包括一个屠夫之子,成为著名的藏书家^[24];而且从16世纪以后,商人自己(不仅是书商)也成为重要的藏书家,出现了像项元汴这样爱好艺术和书籍的商人。而项的哥哥是进士,也爱好收藏。^[25]这样,除了徽州和书业本身之外,出自商人家庭的第一个重要藏书家可能迟至清代才出现。在叶瑞宝最近对苏州藏书家的考察中,最早成为藏书家的商人——即商人(但不是书商)与其家庭成员均无科举身份——无疑是宋宾文(1690—1760)。^[26]根据一份记载,这个狂热的藏书家做的是熔银的生意,以他的藏书和这方面的丰富知识代替了进入精英藏书家圈子的传统要求——受到良好教育和/或拥有科举

身份。通过购买,他建立了珍稀宋元版文集抄本的高质量收藏,具有职业水准的善本书鉴赏力,赢得了士人和官员藏书家的赞赏。^[27]

把士人文化之外广泛知识的读写能力和书籍包括进来,理论上可能会形成更多书写和印刷出来的实用知识。但是这样的好处、甚至是这种读写能力中包含的经济因素,在我们所掌握的帝国晚期关于识字益处的讨论中只代表一种微弱的声音。的确,在17世纪的道德教化书《省心宝训》(1694年序)对这一问题最详尽的讨论中,与其他许多关于读写能力讨论的典型方式一样,事实上忽略了识字在经济上的益处,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道德和社会益处方面。^[28]其通俗易懂的行文风格显示,它是为像钱近仁这样不熟练的中等水平读者,即不追求具备全面的古文读写能力的中等阅读水平的青年男子所写的。作者费尽心机地选择措辞,其对象不是那些穷得读不起书的人,而是那些“可读而不读者”。对他来说,这些人“如面墙而立,如蒙头而卧,如灭烛而行,目盲心塞,无识无知”。这些愚笨的人,“安得与三才[天地人]共称。吾谓是人。其去禽兽也几希”。同样尖刻的讥讽还落到那些不教他们的子弟读书的父兄们头上。

177

为了清楚地说明识字与不识字之间鲜明的道德和社会差别,该书详列了识字的10个好处和不识字的5个坏处。首先,它强调了获得一般读写能力的重要性,那将使人能读懂道德教化之书。这种识字能力据说可使一个人理解道德,按道德行事(“不知书者,蚩蚩然犯伦者多;知书者畏名义,犯伦者必少”)。识字还会提高一个人清晰地推究道德原理的能力,这样就会按道德办事(“不知书者,聩聩然背理者多;知书者认识顺逆,背理者必少”)。它教人们如何控制身体的动作,这样就会采取适当的礼节和礼仪,这些礼节和礼仪不识字的人是不会做的。它还教人廉耻,一种对“君子小人之别”(“小人不知书,故怀无耻之心;君子知书,能行有耻

之事”)的辨识力。而且,它灌输自我控制,使一个人能够抑制他的情感,喜怒不形于色,无论荣辱。

这一识字能力有益于道德的观点,十分切合新儒学思想的广泛关切和价值观,它主要来自12世纪的思想家朱熹关于学问的观点。朱提出读书对于“观圣贤之意”是关键性的^[29],强调了阅读在道德自我完善中的中心作用:“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30]

178 阅读的能力,按照《省心宝训》的说法,也在社会上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益处,在五个方面确保识字者及其家庭和后代获得愉悦和幸福。首先,识字让一个人通过“证古裁今”增长知识;书里喜欢讲述的成败故事充斥了中国的书籍,它们教人怎样获得成功、避免失败。其次,识字是一种赢得身后名的手段。形骸易于腐朽,写下来的文字却能长久地保存和记录一个人的名声和成就。

对我们来说,归因于识字的其他三个实际益处可能是最有趣的。因为依照这种观点,识字使一个人远离庸俗、愚蠢和失败。它所带来的差别不只是道德教化方面的,这些区别也是社会的、可见的:

不知书者,形状猥,语言鄙,面目可憎,不可近也;知书者,秀聚眉锋,俊生口角,神清度雅,真可亲也。

如果那还不足以令一个年轻人对识字动心,那么对于愚蠢——或更糟的是被人认为愚蠢——的恐惧,就应该显得更有说服力:

不知书者,交朋接友,踟躇难容,语言往来,缄默无对,土形木偶,块然一物;知书者,揖让雍容,应酬次第。

最后,读书会带来富贵。十年寒窗将换来成功和财富,带来平和与愉悦,为家族带来荣耀,为子孙带来头衔。这里作者似乎是在指科考成功和做官的结果。但是总的来看,他并没怎么提及读书

的这一实用目标及其带来的回报。

《省心宝训》所列举的识字可以避免的危险,强化了从其他实用和物质维度对识字的提倡。识字有助于确保一个富裕体面的家族永远不会丧失“家风”。学问有传统,财富会留传,经典被诵读。其次,儿子们有文化就不会为照料自己父母的事争吵,就会使自己的身体得到休息,精神得到安宁。识字也使他们免于为衣食所困扰。识字带给他们无数机会,得以求教于良师和众多同窗。而且,识字还将使他们在长满各种新鲜名贵植物的纯净自然中拥有静谧的居所。

179

识字的这些实用的道德和社会动因将带来道德秩序和社会稳定,包筠雅已正确地指出这是清初道德教化书的压倒性主题。^[31] 尽管《省心宝训》呼吁个人的道德完善,它也与这些书一样,都保守地拒斥社会变化和转型。它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财富、地位、寿命和好运皆可归因于上天可以加以改变的命数,但——荒谬而关键的是——仅仅是在一个人转变了他或她的思想,了解和接受命运的主宰之后。并不奇怪,在他们呼吁更高的识字率时,这些文献进一步坚定了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信念,即文化最高的人——学者们——正当地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尤其是那些又在官府做官的人。^[32] 不顾对其他类型读写能力的需要以及这些能力所能带来回报的所有迹象,许多中国人仍然把识字——即辨识古文——与学习儒家经典、科举考试和政府官位联系起来。^[33] 引用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关于文盲的话,即便一个人只能读懂一般的古文,也是“社会等级的一个指标、趋炎附势的一个目标……”^[34] 一个家庭可能会让家里一半男子不去参加以做官为目的的科举考试,让他们去谋职营生^[35],但是,用清初一个苏州学者的话说,这些男子仍必须接受教育以阅读儒家经典:“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36]

许多从明末数十年乱局和清初几十年统治中幸存下来的人,

180 怀着特殊的信念抱持这一观点。对于他们来说,识字能力——这里我们说的是识读古文的能力——带来了与《省心宝训》所作阐发相一致的道德优越和社会声望。晚明广东士大夫张萱曾提到有些受过教育的人“满足习于下流”,浪费其识字能力——“首要的谋生手段”。^[37](此处未见张氏原文,译自英文。——译注)对于绍兴府的著名新儒学思想家刘宗周(1578—1645)来说,他那个时代无忧无虑、“不好读书”的年轻人,是“天地间下流人也”。^[38]一两代人之后,嘉兴学者陆陇其(1630—1693)写给儿子的信用了这样语重心长的话:“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39]他的同时代人、苏州的张习孔告诫说:“书香一绝,则家声渐夷于卑贱。”^[40]

不久以后,长江中游的一个湖北人涂天相,在越来越关注识字学术层面意义的局面下,更进一步强调识字作为一种社会标杆的角色:

子弟一日不读书,即近小人矣。矧终岁乎?读书者,绝小人之根也;不读书者,近小人之媒也。且终岁读书,则虽偶近小人,尚有愧悔之日;终岁不读书,则日与小人相狎,陷于比匪而不知矣。^[41]

对于那些不知道什么是小人的人,涂天相的另一段话把他们的特征说得很清楚:“吾家子弟,能读书者,则为儒;不能读书者,则务农。安分守己,以承天庥。切勿妄冀非分,以远天谴。”^[42]

181 这种对于识字、识字者及其高尚生活方式的极度推崇,伴随着对印本这一作为识字能力及其社会地位关键将征的敬意的提升。比起明代的家族,清代的家族更经常地得到告诫要保有他们的藏书,以确保他们能够作为一个学术家族继续延续下去。似乎拥有和累积书籍的目的是释放一种紧张,许多官宦之家的家长确实感到无力阻止家族地位的下滑和沦丧。正如第三章所提到的,即使

儿孙们常常不顾父辈的嘱托把书卖掉,以维持家庭的生活水平,像赵民献这样的清初士人必定还是向读者极力鼓吹保有一部旧的家族藏书理想:“若代代不绝书香,此即门第大幸,亦足为世家旧家也。”^[43]张履祥,同时代一个来自嘉兴府的新儒家重要人物,甚至赋予书籍更大的重要性:

坟墓、祖居、田产、书籍四者,子孙守之,效死勿去,斯为贤矣。必不得已,田产犹可量弃,书籍必不可无。无产止于饥寒,无书人不知义理,与禽兽何异?^[44]

一个世纪后,苏州藏书家孙从添(1692—1767)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把书称为“国家最宝贵的财富”。这个秀才通过行医来补足用度,重复了张氏的主张,即仅仅是拥有书就可以使一个人有别于动物:“夫天地间之有书籍也,犹人身之有性灵也。人身无性灵,则与禽兽何异?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45]那么又有什么人,即便是一个卑微的工匠,能够无视书籍对于道德和社会的重要性呢?

除了把书作为一种社会和道德标杆来尊重之外,对书还有一种虔诚的、实际上带有宗教性的认识,认为书是神圣的东西,这种认识在清代的著述中比以往各朝受到更多的注意。例如孙从添对书的神圣性提出他的观点,认为书在宇宙秩序中扮演重要角色:“天地无书籍,则与草昧何异?”^[46]在清代学术圈子里,这种宗教冲动在对书给予高度礼遇的仪式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47],尤其是一个以黄丕烈为中心的苏州藏书团体的仪式。黄知道一些士人曾在唐代祭诗,1650年代曾有人祭墨,他决定用类似的方式来表达对书的尊崇。^[48]在1801、1803、1805、1811、1816年,可能还有1818年的岁末,他特地在书斋里,举行了自己设计的对善本书的祭祀和膜拜仪式。这一活动称为“祭书”、“祭书之会”,由特别邀请的藏书家朋友参加,其中一些人还为这一仪式绘图作画。^[49]不幸

的是,这些描述现在都找不到了,但黄似乎展示了他的宋元版本以及藏书中的其他重要书籍,然后他献上酒水食物表示敬意,剩下的当晚宴请宾客——所有这些都是由这个学者藏书家完成的,他在私下经营书籍多年后,最终在1825年开张了自己的书铺。^[50]可以想象,整个过程是一种高贵的仪式,在精神上与更为人所知的日本茶道没有太大不同,只是没那么正式。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傅增湘(1873—1949)可说是中国当代最大的民间藏书家,据说他曾与朋友一起举行过黄氏的“祭书”仪式。^[51]

就我们所能确知的来看,这些礼仪活动当时在苏州的其他圈子里没怎么引起注意。学者和平民圈子的想象力和热情被其他两个民间宗教团体——惜字会和文昌崇拜——所吸引,它们提倡尊重书写和印刷的文字。这些团体的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6世纪,当时有文化的中国人得到告诫,要特别小心地对待书和任何一片带有儒家圣贤名字、五经字句或儒经注释的字纸。到15世纪中叶,学者们对字纸的尊重被视为一种值得称赏的行为,据记述明代学者有时会收集被人用过丢弃的废纸片,放入专门的砖炉里焚化。^[52]学者们这种一般来说私下的习惯,正如梁其姿(Angela Ki Che Leung)所敏锐指出的,在不迟于17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转变为公共行为,学者和其他人都卷入对书写和印刷文字的尊崇。^[53]惜字会最初在苏州地区形成,随后在整个江南和中国其他地区流行。他们的目的是收集所发现的任何带有中国文字的纸片,用水漂洗,然后焚烧,把灰放进一个陶制容器,再倒入溪流或大海(见图7)。^[54]

某些情况下这类团体最初是在清代早期由和尚建立,受到了某些使用符咒和宗教文书的宗教崇拜的影响。^[55]然而即使是这些团体,很快就被纳入到当地儒家学者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他们急于做好事,以便增加自己和子孙在科举考试中成功的机会。一些团体承担了广泛的社会事务,如帮助政府实施对淫秽出版物的禁令,



图7 宁波惜字会的拾字纸者，见 R. H. Cobbold, *Pictures of the Chinese, as Drawn by Themselves* (London: John Murray, 1860), p. 48。

销毁淫秽书版，举办为穷人提供棺材和食物之类的慈善活动。^[56]虽然这些团体所包括的各种社会阶层远比黄丕烈的书籍崇拜圈子多，对于著述与知识他们与藏书家们却有着一些共同的文化认同。尤其是他们再三把学者用的纸——暗指学者——置于所有其他各种纸的社会地位之上。在这些屡屡宣扬的学术正当性面前最脆弱的是工匠，例如惜字会要求全面禁止工匠回收废纸来做烛芯、雨伞、扇子、陶器、鞋及其他东西。^[57]至少最初在会费并不便宜时，那些被认为可能是这些自发团体的经办者的穷人和富人，显然是想把像钱鞋匠这样的手工业工人包括进去的，主要是让他们收集废纸片。尽管如此，尊重文字著述的习惯在这些团体内外广为传播。到19世纪末，一个遍游整个清帝国的“中国通”看到：“……中国各个阶层是多么小心翼翼地避免亵渎或污损写过或印过字的

184

纸。”^[58]

惜字会与一个据说能根据士子所积累的善行(比如惜字)决定其科举考试命运的流行崇拜有关联。这一对文昌帝君的崇拜始于宋代,1488年被明朝政府作为异端禁止,但在学者中仍很流行,特别是在科举士子和他们的父亲中间。这个神祇的力量主要在于促成科场上的成功,因此至少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它的崇拜还主要局限于学生和官员。^[59]1801年,该神被重新纳入正统的帝国神祇,大概是因为这一崇拜的广为流行使得政府认为接纳它比反对它更安全。到1849年,在文昌帝生日那天,“众庶纷集”于苏州一个供奉它的庙里,烧香表达他们的恭敬。^[60]这样到了18世纪末,这个神不再被学者们所垄断。19世纪,文昌帝甚至被看作与识字有关的平民职业,比如书版刻工和书商的神。^[61]

185 在这些宗教活动中,平民把识字当作一种个人目标和一套价值取向,这引出了三个结论。首先,虽然一些清代学者和官员对于“真正的读写能力在中华帝国所具有的能够改变地位的性质”^[62]助长的社会不稳定感到忧虑,更多的人鼓励对识字的尊重,即使说仅仅是为了发扬正统儒家价值观,以及对抗令人棘手的宗教崇拜的潜在诱惑。除了建立和管理这些惜字会和文昌祠,这些绅士学者还在江南为平民开办了许多慈善学校。^[63]诚然,这些捐助者的子嗣常常不再继续他们父辈的慈善事业,但是这种选择是出于财务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其次,事实上在所有这些对识字能力和各种活动的讨论中,焦点都在于个人及其家庭。文昌崇拜和书籍祭祀礼仪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学者,但第一个案例中所关注的是个人、而非群体的成功,第二个案例中关注的是学术书籍和藏书家。没有体现出对任何“想象的民族共同体”(imagined national community)的关注,这一共同体即一种帝国范围的书写文化的成长,甚至只是书面语言作为把读者和作者纳入一种公共——暂且不论全国性——意识的工具的成长。像惜字会

和文昌崇拜成员这样的读者,考虑的是他与古代圣贤的关系,而不是与其他读者之间的关系。这些团体与崇拜的参与者们之间形成的关系,可能会引发改革当地风俗的群体努力,但是并没有打算或希望产生任何政治上的东西。最后,没有人意识到这些提高识字率的努力——如在大众中普及识字能力——的成功对于书面语言和社会秩序的影响。这种洞见,就像民族主义本身一样,只有在19世纪的政治悲剧和20世纪的文化危机之后才能出现。

钱近仁与他的资助者

清代所有这些在社会、经济、道德和宗教上对于识字、书籍和著述的欣赏,自然也同时被个人所相信和提倡。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在钱近仁对其识字能力和藏书行为的认识中,他对于多数中国人所期待的识字能力将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甚至可能是社会地位的改变,是多么漠不关心。虽然可能有必要对我们所掌握的史料中对钱的理想化描述抱些怀疑主义,但似乎科举考试的成功、社会地位的改善、更多的钱财和更好的工作对他的确没有什么吸引力。在四五十年时间里,他读书藏书,但还是雷打不动地当着修鞋匠。这份工作没有地位:清代修鞋的职业与做鞋和卖鞋不同,“在大众眼里是低贱的”。^[64]像钱这样的从业者,每天都要辛苦地走街串巷寻找不固定的活计,等着被人从街上叫去修鞋。^[65]

186

鞋匠……一条街一条街地走,发出咔嗒咔嗒的特殊声响宣布他的到来。在他背上的篮子里,装着这一行所需的所有工具;一大块皮革——更多地是用于修鞋而非做鞋,一把粗笨的剪刀,一个大刀片,一块磨刀石,腊、线、针、小锥子,以及其他需要用到的工具。^[66]

钱工作的巡回性质,可能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似乎从未结婚建立自己的家庭,尽管他极为认同儒家价值观,比如孝顺——这在道德实践的家庭关系中占有中心地位。

而且,这一工作所得甚少,比其他多数工作要少得多。按照1870年前后一个到过广东的英国人的说法,一个鞋匠的月收入——我想像钱这样的修鞋匠挣得不会比这多,可能还会更少——只有一流象牙雕刻师的三分之一、铁匠的四分之三、(房屋)油漆匠的五分之四,和一个熟练刺绣工的收入差不多。^[67]简言之,他在地位和收入上只比没有特长的劳动大众高一点点。

187 尽管他的职业存在这些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利条件,据记载钱非常不愿意利用他的识字能力来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提高他的社会地位。他在苏州的书铺和寺庙里做了一些记载不详的工作,有时会应邻里常常多达二三十个孩子的要求,教他们认字。但他这样做时并不情愿,对长期教书没有什么兴趣,就更不用说靠它挣钱了(虽然他自己接受教育时是按字付钱的):“不问修脯……不加督责,任之而已。以故久辄散去,散则补履如故。”^[68]与钱一直努力把他的学识与其工作和收入分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更可想见与钱同时代的苏州人曹炳的选择。他像钱一样自学儒家经典,“性朴野,足迹不接于贵人之门,故世无有知之者”。曹对俗世成功无动于衷是出了名的,但却并不妨碍他舍弃经营服装的家族生意,转而去作一名乡村教师。^[69]

与之相反,钱并未积极利用他的书和关于书的知识来进入更高层的社会圈子。他没有参与任何书籍共享团体,没有拜访过藏书之家,没有向士人那样给自己起任何字号,没有举行过任何聚会来讨论他的诗歌或思想,似乎也并未染上士人们为自己的书写跋语的习惯。^[70]他最后在一些苏州学者眼里所取得的广为人知的成功,主要是他们的创造,而非他自己的创造。

钱也不是一个藏书家。即便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20世纪有

关传统藏书家的书中,根本没有证据表明他是、或想成为任何 18 世纪藏书圈子中的一员。他缺乏成为这些团体的成员通常所必需的家族血统、科举头衔和钱财。而且,他的藏书很“破”^[71],是些“杂色旧物”,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块长约三到四英尺的白色木板上,他窄小的屋子里又“多古书”。这些书一共只有“万卷”,这对于一个平民藏书家来说,可能是很大一笔收藏,但以当时苏州藏书家的标准衡量则很少。而且其中除了一部元代所印的苏轼作品集之外,没有我们所知的古本或善本。^[72]

并且,正如对他赞誉有加的传记作者汪缙所承认的那样,他不是一个人“思想者”:

其读书,略观大意,未能深造也。然一言感触,辄黽勉服膺。^[73]

与此相似,苏州府方志中钱的传记作者注意到钱浏览了大量种类繁多的书籍。^[74]他对书的兴趣主要是传统而又正统的:《论语》、《孝经》,以及不那么传统和正统的一些不知名的道教文献。尤其《论语》、《孝经》,通常是一个学生在熟读一部或多部标准初级读本之后所要学习的(虽然清代的一些教育家觉得《孝经》太简单,其他人则认为它对年轻读者来说太难)。^[75]钱对儒家典籍的阅读似乎只是试探性地超出此类中级读物的范围,他对常常被引用的 12 世纪新儒家选集《近思录》很熟悉。他选择这一日益受到排斥的宋学传统的经典著作,显示他对所有事物都追求正统,热衷科举考试科目,对于汉学以及苏州学术圈子里正在流行的东西毫无兴趣。^[76]总之,他通晓几部经典文献及其注疏,能够成段地引用这些话,可能还有其他书里的话。他用的书基本上是背记下来的,他的学问仍然是那种既不藏有很多书也无法看到很多书的人的学问。在 18 世纪苏州的藏书、读书圈子里,这意味着他会被认为对这些书既不够博学,也不够深刻,无法作为一个“学者”博得喝彩。

结果,当钱的士人景慕者说他“独”,奉承他为“士”或“处士”时,他们的意思是他读书,单纯,没有让工作和经济上的顾虑玷污他通过阅读完善道德的努力。他们把他的书和识字能力看作是他修炼精神、接近圣贤、尊崇圣贤之书的手段。因而,他常常到宋代新儒家运动的创始人周敦颐(1017—1073)在苏州的祠“焚香肃拜”,周曾经“重新找回了孟子之后失传的道,把它传给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7)兄弟”。^[78]并不奇怪,那些曾认为毫无道理佩服钱的藏书或学问的人——但他们很清楚在那个时代学术理想已经贬值——会受到打动而尊敬他。他对儒家学问的执著是如此特异不群,足以令他区别于其他工匠而成为一个榜样。这样他死时所受到的礼遇,与其说是对他本人的敬意,毋宁说是对他身上所体现的、不再体现在普通学者身上的道德价值——勤奋、诚实、敬畏学问以及专心读书的敬意。

然而,当我们考察钱在苏州的崇拜者的著述时,显然他们对书籍和识字益处的认识仅勉强企及我们所了解的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他们位于钱所处的社会等级的另一端,享有识读古文的能力,比钱所获得的识字能力更广更深。同样,他们对识字和书籍的欣赏,包含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对于识字和书籍的所有认识。他们年轻的时候,曾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学习,有些人甚至获得了举人或进士头衔。当他们人到中年,抛却曾一度抱有的仕宦成功的希望时,像彭绍升和汪缙这样的人就开始强调从经济与社会之外的其他方面欣赏识字能力,这样就体现了他们精神趣味的折衷性质。与钱一样,他们对藏书与写作怀有敬畏之心。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是他们而不是钱热情投入和强烈认同苏州流行的惜字会和尊崇写作与学问的文昌崇拜。这样在钱最后的日子他们对他的同情,就不是来自一种共同的对儒家正统的专一信奉,而是来自于他们多边的精神信仰,和他们对于书和人的宗教认识。

试看惜字会的例子。钱在苏州走街串巷讨生活,但从未与惜

字会任何收集纸张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收集破书是为了收藏而非焚烧。但彭绍升家族几代人与这些团体的建立和运转联系密切,据说在整个 18 世纪比其他任何苏州家族都联系得更紧密。他的曾祖父彭定球(1645—1719)写下了目前所留存的关于惜字会活动(包括禁止将用过的字纸回收用于手工业生产)的最早文章。彭家对“惜字”是如此投入,以至于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雍正皇帝对彭绍升的父亲彭启丰(1701—1784)的意外提拔显得合情合理,他在 1727 年的殿试中被从第十名提到第一名。^[79]后来在 18 世纪,彭绍升延续了家族传统,写了一篇文章支持该团体的筹款活动,并为它捐了一些地:

190

字者,孳也,言其相生无穷者,天之心也,人之道也。字之作,以正德也,以达情也,以章往而察来也。故夫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莫字若矣。宝而惜之,天之心也,人之道也。毁而弃之,逆天心,悖人道,利之所不属,而害且随之。^[80]

彭绍升极力主张普天下的人共同珍视文字、创作文字,对他及其家庭来说并非空洞辞藻。他的曾祖父彭定球退休之后,18 世纪初得到了两个吴县藏书家顾氏和高氏的书籍,萌发了他的家族在儒学方面的兴趣。^[81]彭绍升的父亲在其成功的仕宦生涯中,1740 年劝说乾隆皇帝分发当时皇帝下令收集和印刷的书籍,致力于书籍的更广泛流通。更重要的是,1773 年他在朝廷设于苏州的一个职位上供职一年,说服当地藏书家把珍善本借给乾隆皇帝的《四库全书》工程,在该项目显露出图书审查迹象之前使皇帝得到了 1800 多部书。^[82]彭绍升还印刷发行了自己撰著、编写或纂辑的各种各样的书。^[83]

彭氏对识字的推崇在他们对文昌帝君的崇拜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对这一保佑科举士子的神的崇信,至少可追溯至 17 世纪中叶,当时苏州城重修文昌庙的钱主要是他们捐的。1752 年他们

在修理这座神祠时又作了重要的捐献。约于1775年,彭绍升在排解儒家人士关于对文昌帝君的崇拜受到其道教起源和关联玷污的忧虑时,承认他的家族从这个神祇那里得到了慷慨的关照。^[84]最后,在其妻子和父亲死后,1785年他搬进了他家出资重建的文昌阁。^[85]汪缙也对这一崇拜感兴趣,为一部与该神祇关系最密切的书作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86]

彭绍升和汪缙不仅对书写和印刷文字的保存感兴趣,也对其流传感兴趣,这源于他们对那个时代与学校和科举紧密联系的儒家学说的拒斥。两人都不喜欢科举考试中朱熹正统注解的狭隘理解。他们对当时寻求通过还原原始文字,以恢复儒家经典原始含义的汉学也没什么兴趣。他们更喜欢融合儒家与佛家的远为折衷包容的思想。他们在承认朱熹正统思想的正当性的同时,也对王阳明更为内省和注重实践的学说表现出至少是同样的认同。这种新儒家思想两个主要学派的融合,至少在彭的案例中可以追溯到晚明士大夫高攀龙(1566—1620)的影响。作为彭绍升曾祖父的老师,高创造性地利用了像“空”和“独”这样在晚明学者圈子中流行的佛学概念。他还支持朱熹的主张,反对王阳明的一些追随者“不道德的放肆”。彭绍升的祖父把晚明这种开阔的世界观带进了清代远为经验主义和世俗的知识分子圈中,为他自己及其家族赢得了精通朱熹学说和王阳明学派行动主义的名声。^[87]之后这个家族继续支持王的主张,即道德原则可以在人心中找到,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实行。即使在讨论文昌崇拜的核心文献时,彭也反对任何需要“外吾心”寻找忠、孝原理的观点,在他看来该文献是支持这一观点的。^[88]

这种对于儒家经典更个人化、更内省的解读,与一种至少给佛教以同等地位的折衷主义结合起来。彭自与汪缙在约1770年进行讨论之后,就对佛教发生了兴趣。他特别喜欢净土宗及其主要经典《无量寿经》。虽然该经的两个现存版本极力主张所有生灵

都要努力在净土重生,篇幅长一些的版本——彭所偏爱并于1775年用来印刷的版本——强调了行善和信仰阿弥陀佛在所有生灵得道觉悟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89]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与王阳明的核心学说相类似的一套信仰,王阳明认为所有人都能获得圣贤之道,行动、而不仅仅是内心反省,对于道德生活来说是必需的;我们还看到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即作为虔诚的佛教居士帮助穷人和受苦人。孝是基本的,慈悲亦然。因而要向他人的苦难敞开怀抱,这一点是这部经文关于众生平等的主张所强调的,这种平等不仅在于从精神上摒弃心智、佛陀与众生之间的传统区分,也在于净土欢乐的广为传播。1775年,彭出版了他对这部经文的观点,在这两部作品中他提出了自己的信念,即拯救众生在于富有同情心的行动。^[90]

汪缙达到类似认识的道路,既不是基于家族背景,也与过去的传统没有什么联系。他那一代只是他的家族在苏州生活的第三代,由于父亲过早去世,他和母亲、弟弟陷于贫困(有很多年他穷得雇不起人帮他抄书)。^[91]他很晚才开始学习阅读和背诵,但他的学问、尤其是他对写作的精通,开启了他作为一个苏州士人的光明前景。但是,他做官的努力基本上流于失败,考举人五次落榜。他在自述中对自己致力于写作作了表白:“因文见道”。^[92]像彭一样,他把佛教和儒教看作彼此联系紧密的思想,两者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对他来说通往净土的主要途径是行孝,佛等同于心。^[93]他对阿弥陀佛的信奉,使他最后成为一个比彭还要虔诚的净土宗及《无量寿经》的信仰者。对他来说,众生最初都是佛,应将净土视为他们的归宿。^[94]汪的著作并没有对这种包容给出清晰的社会维度,但它预示了一种开放,这种开放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愿意为一个不认识的人树碑立传,他认为这个人赋予“因文见道”以意义。

193

儒家和佛家这一同情的范围有助于解释钱的士人崇拜者们在他们最后的日子给予他的支持。虽然留存下来的中文记载对钱在

被援救时的状况描述不一致,但它们的确强调了他人对衰弱的钱所体现的关心和照顾。我们读到,彭绍升和他的另一个朋友薛起凤经常向朋友们,如儒医王丙说起钱令人钦佩的品质。所以,当钱因双脚溃烂被迫停止工作(或在饥荒中被饥饿击倒),王丙说服了族中其他男性成员;“召之家,礼待甚厚,遂移书籍以往,老于其家”,得到了这个行医之家不辞辛苦的照顾。^[95]

把钱的书和它们生病的主人一道搬到王的家里,表明在钱和他的士人崇拜者共同基础的形成过程中,书籍基本上扮演了中心角色。彭绍升早年痛失一只眼,汪缙直到快20岁还是个迟钝的学生,王丙在科场上屡屡失意,钱近仁必须克服贫困和家庭冷漠以学习认字。^[96]他们在获得识字能力的道路上的苦难和牺牲,无论是何种层次和类型,都绝没有动摇他们各自对书籍的热爱,以及他们对儒家圣贤书中教导的敬畏。这些书被他们视作道德智慧的神圣载体而加以礼敬,这些智慧使所有读到这些书的人受益。

但是,认识到钱的崇拜者们对儒家和佛家的信奉,导致他们对识字、书籍和学问的评价较钱远为包容和博学是很重要的。钱与这些人之间的鸿沟也许可以从他们社会互动的有限性中表现出来。一些崇拜者只是在钱搬到王家去后才与他说话;其他人在与他碰面时,并不交谈。王丙自己承认,虽然为钱写了传,但只见过钱一次,根本没和他说过话。而且,那些和他说过话、拜访过他的苏州学者,如彭绍升和薛起凤,据1883年苏州府志的记载是“折节与交”^[97],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强烈的兴趣和深厚的友谊。

这样,虽然王丙的确把因足部溃疡而卧病的年老的钱从他家里搬了出来,但他把钱救到王家却是一项善举,并不表示他家把钱视为社会地位相同的人加以接受,或对他的学问有兴趣。钱只是在他死时才进入苏州的学者和士人阶层,他被安葬在了苏州郊区虎丘士人坟茔所在的地方。这一作为学者的葬礼是他生命的顶峰,保证了钱的名声在身后比在他有生之年将获得大得多的象征

力量。但是,它不能被理解为存在一种社会和文化统一的确证,这种统一将这些不同类型的识字能力编织为一种对识字能力的广泛认同,并把它们整合为对书文化的一种共同承担。识字人群的历史、他们的阅读能力和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太过复杂、难以预知,不允许有这样一种单调沉闷的“皆大欢喜的结局”。



注 释

195

引 言

- [1] 汪缙,《汪子文录》(《续修四库全书》本),卷十,5a-6a;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77),卷五〇二,第13,882页;何时希,《中国历代医家传录》(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上,第22—23页;徐维新,“虎丘有座鞋匠墓”,第95—96页,见徐刚毅,《七里山塘》(上海:古籍,2003),第95—96页。
- [2] 陆肇域,任兆麟编,《虎阜志》(1792)(苏州:古吴轩出版社,1995),卷三,第260页;这些慈善墓地多数建于1735至1743年间。
- [3] 《苏州府志》(1883),卷八九,14b-15a;徐刚毅,第95—96页。
- [4] 井上进,“藏书と讀書”,《東方學報》62(1990),第425—426页。
- [5] Paul J. Smith, “Family, *Landsmann*, and Status-Group Affinity in Refugee Mobility Strategies: The Mongol Invasions and the Diaspora of Sichuanese Elites, 1230-133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2.2 (1992), pp. 668-672.
- [6] 这一问题在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n Center, 2002) 中有详细的讨论。
- [7] 与建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江南值得夸耀的是拥有数量格外多的大藏书家,这在最近许多关于中国藏书家的研究中十分明显(例如李玉安、陈传艺编《中国藏书家辞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中宋、元、明藏书家的条目)。

196

第 1 章

- [1] 张树栋编,《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第55页。

- [2] Timothy H. Barrett, "Woodblock Dyeing and Printing: The Innovations of Ms. Liu and Other Evidenc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4. 2 (June 2001), pp. 240-247. 在西方, 正如 Thomas Hobbes 所注意到的, 这种无知掩盖了那些发明我们字母的人: "印刷术的发明, 虽然具有独创性, 但与字母的发明比起来,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谁第一个发现了字母的用处, 并不为人所知。" (David McKitterick, *Print, Manuscript and the Search for Order, 1450-18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7)
- [3] Francis Bacon, *Novum Organum, with Other Parts of the Great Instauration*, trans. and ed. by Peter Urbach, John Gibson (Chicago and 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94), Bk. 1, aphorism 129, p. 131.
- [4] 沈括,《梦溪笔谈》(香港:中华书局,1975),卷一八,第184页;叶梦得,《石林燕语》(《丛书集成》本),卷八,第74页。
- [5] 张泽咸,《唐代工商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201—203页;妹尾达彦,“唐代長安東市の印刷業”,第200—238页,见唐代史研究会報告,《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东京:刀水書房,1999),提供了关于唐代,尤其是长安印刷业文献和实物方面证据的严谨概括。这项出色的研究同时有英文版,“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Chang'an's Eastern Market in the Tang dynasty”, in *Memoirs of the Toyō Bunko* (2004), 第1—42页。
- [6]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13—14页,第21—22页。
- [7] 李致忠、周少川、张木早编,《典籍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00卷本丛书《中华文化通志》“艺文”第8卷),第226—227页。
- [8] Tsien, Tsuen-hsuei, *Paper and Printing*, 见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v. 5,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pt.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hereafter Tsien], p. 149.
- [9] Timothy H. Barrett, *The Rise and Spread of Printing: A New Account of Religious Factor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Working Paper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s, 2001), esp. p. 11.
- [10] Seo, p. 228-231.
- [11] Denis Twitchett,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London: The Wynkyn de Worde Society, 1983), pp. 13-22; and Tsien, pp. 146-154.

- [12] 庄绰,《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上,第5页。
- [13] Tsien, pp. 194-195. 又见 Jean-Pierre Drège, “Des effe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sous la dynastie des Song,” *Journal Asiatique* 282. 2 (1994), pp. 409-442, esp. 415, 认为 1947 年的这次访谈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中文对雕版印刷生产方式的详细讨论。
- [14] 钱存训,“中国雕版印刷技术杂谈”第 139—152 页,见他的《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最近一部在今川西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寺拍摄的影片,记录了过去用来刊刻《大藏经》270000 块书版的传统雕版方法 (Jun’ichi Nakanishi, “The Dege Printing House and the Local People Who Support It: Hand Printing the Buddhist Canon from Woodblocks,” *The Toyota Foundation Occasional Report* 31 [August 2001], pp. 3-6)。
- [15] 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 [16] 赵与时,《宾退录》(上海:古籍,1983),卷四,第 44 页;沈括,卷一八,第 178 页。
- [17] 如张彦远在他的《历代名画记》中所记 (Robert van Gulik, *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stremo Oriente, 1958], pp. 148-ff); and Edward Martinique, *Traditional Chinese Binding* (San Francisco, CA: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1983), p. 29.
- [18] Klaas Ruitenbeek, *Carpentry and Build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u Ban jing, a Study of the Fifteenth-Century Carpenter’s Manual* (Leiden: E. J. Brill, 1993), pp. 25-26, 31-32, and 134; also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 4, Physics and Physical Engineering, pt. 3,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81-84, 128 and 141; 沈括,卷一八,第 177 页。
- [19] 苏易简,《文房四谱》(《丛书集成》本),卷四,第 52—54 页; and Sung Ying-hsing, *T’ien-kung k’ ai-wu, 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ns. E-tu Zen Sun and Shiou-chuan Sun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223-232.
- [20] 沈括,卷一八,第 184 页; Tsien, pp. 201-211, 很好地介绍了这些史料。R. C.

Rudolph, *A Chinese Printing Manual, 1776* (Los Angeles, CA: Typophiles, 1954), 亦有 18 世纪为朝廷制作木活字的中文报道的译文。这些留存下来的史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关于中国书籍技术的中文报道压倒性地集中于活字——这一对整个中国印刷史最不重要的类型。 198

- [21] 李元复,《常谈丛录》(味经堂本),卷一. 13a-b。
- [22] Bacon, p. 114.
- [23]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第 222—287 页, 组成了第十七章。在第 254 页, 米怜说他在 1819 年写下了这段文字, 然而整个这一章直到 1820 年才完成(并出版)(Robert Morrison, comp., *Memoirs of the Rev. William Milne, D. D.* [Malacca: Mission Press, 1824], p. 85)。在 14 世纪早期, 波斯学者、官员拉施都丁(Rashid-eddin)记载了中国印刷术, 但在技术和经济方面比米怜的记述要简略得多(Edward G. Browne, *A History of Persian Literature Under Tartar Dominion (A. D. 1265-150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pp. 102-103)约三个世纪后, 利玛窦写了一篇类似的关于中国印刷术的简短报道, 如今常被学者引用(*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 1583-1610*, trans. Louis J. Gallagh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2, 1953, pp. 20-21)。钱最近在“中国雕版印刷技术杂谈”, 及 Tsien, pp. 194-251 中的记述, 显然更为具体, 信息更为丰富。
- [24] Jean-Pierre Drège, “Les aventures de la typographie et les missionnaires protestants en Chine au XIXe siècle,” *Journal Asiatique* 280 (1992), pp. 279-305; and “Poirier et Jujubier: La Technique de la Xylographie en Chine,” pp. 85-93, in Frédéric Barbier, et al., eds., *Le livre et l'historien: Etudes offertes en l'honneur du Professeur Henri-Jean Martin*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97).
- [25] Richard Lovett,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London: Henry Frowde, 1899), v. 2, p. 431. 他也困扰于方言的复杂: “……当我们去到人们中间时, 第一家的人说的话基本能听懂; 第二家, 听懂一半; 第三家, 只听懂几句。在向十五或二十人发表演讲时, 通晓两种方言在很多情况下是必要的, 以便有效地把教义传授给所有的人。”(Robert Philip, *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he Reverend William Milne, D. D.* [London: John

Snow, 1840], p. 206)

[26] Morrison, pp. 41-42 and 44-45.

[27] A.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台北: 成文出版公司, 1967 年影印), 第 12—13 页。不管出于何种原因, 在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London: Smith and Elder, 1899) 第 38 卷第 9 页米怜的传记中, 只提到他作为一名牧师的工作。他自己的自传体回忆录仅把这一工作看作是为一个家族服务。

[28] Philip, p. 264; and Milne, p. 140. 印刷工人包括广东人梁阿发(音译)(1789—1855), 他作为米怜的第一个皈依者更为西方人所知(Lovett, v. 2, p. 434); 他的第二个皈依者是梁丘冈(音译)(*ibid.*, v. 2, pp. 426-427)的一个助手。米怜还从广东带去一些印刷用的纸和一名中文教师(Milne, p. 140)。

[29] Wylie, pp. 25, 44. Cecil K. Byrd, *Early Printing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06-1858* (Singapore: Singapore National Library, 1970), 对传教团所经营的由英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出版社, 提供了一份简短而令人着迷的报告。1815 年在米怜到达马六甲的三个月内, 他就建立了这家出版社, 并印出了第一份出版物——一份期刊。正如这家出版社 1842 年前的多数出版物一样, 它是用雕版和中文印刷的, 尽管从 1816 年 11 月开始该出版社也拥有一台从孟加拉弄来的印刷机。在第二年六月, 麦都思来到马六甲, 并担任了该出版社所有业务的负责人(*ibid.*, pp. 9-13)。

[30] Ching Su, *The Printing Presses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Am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Ph. D dissertation, 1996), pp. 51 and 119. 米怜甚至让他的孩子每天学习阅读中文(Morrison, p. 116), 并让他的教会学校教孩子们如何按中国礼节向他们的尊长、父母、老师以及相互鞠躬(Philip, 第 191 页)。但是, 他自己的著述显示, 他远非一个盲目的亲华者(例如, 米怜, 第 280 页)。

[31] *ibid.*, p. 239.

[32] 石井研堂,《錦絵の彫と摺》(东京: 芸艸堂, 1929 年原本, 1994 年重印)。正如其书名所示, 该书主要是关于木刻插图的; 但是它所描述的技术, 除了没有誊写的工序外, 都是用来刊刻和刷印雕版的技术。它提到两部更早的

对这些技术的日文报道:[日本]《製品圖說》(高锐一编,1877年首次印刷)中的一册,和《文藝類纂》(榊原芳野编,1878年首次印刷)中的一份简短报告(同前,第2页)。这两篇文献都非常有趣,但所提供的细节和说明远较石井的著作少,后者将在不久的将来译为英文。还应该补充的是我所找到的对雕版印刷——即刊刻、刷印和装订——的最早的中文说明,是《阴鹭文图注》(收入罗树宝编《中国古代印刷史图册》,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第57页),显然是清代的出版物。

200

- [33] Milne, pp. 223-224. 人们不禁想到,这一方法与有数千年历史、纸出现前在竹简和其他木片上书写的习惯相联系。
- [34] 同前,第223页;张秀民,第566—567页。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and Co., 1885), 第216页,告诉我们街头叫卖者所宣称的它们在除政治批评之外的各种新闻中的应用。正如书中其他地方一样,他在这里写的是19世纪中期的广东。Roswell Sessom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3), 第4—5页,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技术“以易读性和好的外观为代价,节约了时间和成本。”
- [35] 庄绰,上,第5页。
- [36] Milne, p. 223.
- [37] Milne, p. 226. Hunter, p. 213,证实了对梨木的偏好是因为“其纹理和纤维的均匀”。
- [38] *Ibid.*, pp. 227-228.
- [39] *Ibid.*, p. 246.
- [40] *Ibid.*, pp. 226 and 227.
- [41] Tsien, pp. 196-200,提供了关于使用这些工具和方法的有益细节。Hunter, p. 214,提到使用“一种精巧的三角形的锐利工具”。亦见于Eugene Cooper, *The Wood-carvers of Hong Kong, Craft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Capitalist Periphe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第36—41页,该书中有对于刊刻工具的有趣评论。不幸的是,明代用来刊刻木板的刀具没有存留至今,但是最近制作的样本在安徽徽州和江苏扬州幸存下来(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苏人民,2000,第303页)。
- [42] William Henry Medhurst, *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London: John Snow, 1838), pp. 104-105.

- [43] 18 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 P. du Halde 对于印刷者使用刷子的远为详细的注解,值得在此一提:“……他们有两把刷子,其中一把稍硬。刷子握在手中,有时装在把手的两端使用。他们将一把刷子在墨汁里蘸一下,用它来刷书版,既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如果太湿,字就会出现污斑;如果太干,字就印不出来。书版一旦就绪,可以印三四张纸,而不需再用刷子蘸墨。”另一把刷子必须轻柔地刷过纸面,把它微微向下压,以使之吸墨。这很容易做到,因为没浸过明矾,它很快就吸墨了。你必须根据书版上墨的多少用刷子在纸上多刷或少刷几遍,并相应地按压纸张。这把刷子必须是长方形的、柔软的(P. du Halde, *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J. Watts, 1741, 3rd ed.], v. 2, 第 436—437 页)。硬的刷子,按照 Hunter, 第 214 页的说法,“用椰子或其他木头的纤维制成”。
- [44] Milne, p. 228. Hunter, p. 214. 书印完后让一个专业写手在每册装订好的书根上写上书名,如果一部书有两册以上还要写上序号。然而,书名常常是写在封面上。
- [45] Ibid., pp. 228-229. 到宋代,所有生产上的四道工序及其专门工匠都已明确划分(张秀民,第 731 页)。
- [46] Su Ching, p. 108.
- [47] 杨绳信,“从碇砂藏刻印看宋元印刷工人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 1, 第 41—58 页,尤其是第 45—47 页;又张秀民,第 734 页(还提到佛教僧侣通常是佛经的刊刻者)。
- [48] Milne, pp. 123 and 252.
- [49] Ibid., p. 258.
- [50] 然而,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 19 世纪初期的活字,正如 1833 年一个活字印刷的倡导者赛缪尔·戴尔(Samuel Dyer)承认的那样:“虽然我们最近的试验证明很成功,但还是伴随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副持续使用的活字可能使用五到七年时间,然后就必须重铸。如今得到一副新活字的难度和费用是非常巨大的,除非我们有办法在印度铸造。”(*Chinese Repository*, v. 1 [1833], p. 417)
- [51] Milne, p. 241.
- [52] Ibid., pp. 241-242. 直到 1819 年底,米怜自己的 13 部雕版中文书印数已达到 1900 到 9000;他于 1816 年印制的最早的出版物,到 1820 年第一次印刷印了 5800 部。米怜关于其出版物的数字显示,首次印刷的数量在 700 到

- 6000 之间（印数最大的书是对付赌博这个恶魔的）（*ibid.*, pp. 269-271）。
- [53] *Chinese Repository*, v. 14 (1845), p. 129. 这一篇似为麦都思所写。
- [54] 西欧的印数——15 世纪约为 500 部, 16 世纪 600 部, 17 世纪的法文书为 1200 到 1800 部——可能比中国少很多, 那里的出版者不得不平衡严酷的
202
竞争压力: “出于减少单位成本的需要显然要求有大的印数, 以使用大量的
印数来分摊固定的费用——特别是那些排字和雕刻插图的成本。然而,
不要印得太多是很重要的, 以免占用购买纸张所需的资金时间过长, 这些
资金是一项重要的支出。”（Henri-Jean Martin, *The French Book, Religion,
Absolutism, and Readership, 1585-1715*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
niversity Press, 1996], p. 3）中国印刷业由于依赖雕版, 很可能压力和风险
要小一些。
- [55] 基于他在广州和澳门的短暂停留, 米怜声称中国的“活字一般用木头制
成。广州的日报称为《辕门钞》, 包括大约 500 个单音节字, 是用这些木活
字印刷的。但印得如此笨拙, 以至几乎无法辨认”（Milne, p. 224）。他还
报告说: “至于活字, 准备好字坯后, 字被反写在字坯顶上, 这是一项比在
木板上写字困难的工作。之后, 活字用两个小木片固定在榫眼里, 用楔子
连接, 再刻字; 然后它被取出, 将字面轻轻在油石上摩擦, 以去除刻刀可能
留下的任何毛边。”（同前, 第 226 页）一份更全面的报道, 包括关于毕昇的
简略资料, 见 Tsien, pp. 201-222。
- [56] 袁逸, “清代的书籍交易及书价考”, 《四川图书馆学报》1992. 1, 第 73—74
页。我要感谢包筠雅 (Cynthia J. Brokaw) 提供这条文献线索。同样, 19 世
纪早期访问广州的美国人 W. W. Wood 注意到, “书价很低, 在所有主要大
街上都有很多书铺和书摊”（*Sketches of China* [Philadelphia: Carey and
Lea, 1830], p. 124）。
- [57] Martin J. Heijdra, “Technology, Culture, and Economics: Moveable Type Versus
Woodblock Printing in East Asia,” pp. 223-240 (esp. 230-233 and 236), 见磯
部彰编, 《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にわたずみ》（东京: 二玄社, 2004）。
注意这种成本分析仅聚焦于不同的印刷技术。但是, 中国的商业出版者,
因急于赢得消费者, 知道我们在本书讨论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
话——时间里, 他们在书籍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 是古老而十分廉价
的手抄“技术”。对于这些出版者而言, 他们的消费者购买和收藏了手抄本,
印数很少的木活字印刷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吸引力。

- 203 [58] 利用 1700 前在荷兰 (Netherlands) 发明的铅版技术,印刷者为每付框架的活字制作了一个石膏模具。通过这样保存书上每页纸的整个页面,所有用活字进行重印的巨大成本(即排字、编辑和校对)都被省掉了。到 1839 年,由于法国和英格兰的技术进步,每付模具可以印超过 100000——如果小心的话可以超过 1000000——一个页面。对于那些需求量一直很大的书,如《圣经》,这一技术可以节省大量资金。但它需要首先使用活字 (William St Clair,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83-185)。
- [59] 米怜对于平版印刷的省略是可以理解的。在 1819—1820 年,当米怜在遥远的马六甲写作时,平版印刷仅在欧洲慕尼黑一个城市是被人接受的印刷方法。而且,直到 19 世纪后半叶,它的产量可能最多只是凸版印刷者所用的铁板印压机的一半(在速度上它不能与整个 19 世纪用于大量报纸印刷的凸版轮转印刷机 (letter-press rotary machines) 竞争) (Michael Twyman, *Breaking the Mould: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f Lithography*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01], pp. 24 and 45-46)。
- [60] Milne, p. 246.
- [61] Ibid., pp. 246-249 and 251.
- [62] Ibid., p. 253. 关于管理活字印刷财务的恰当建议来自伦敦 Hogarth 出版社的创始人:“通向破产的道路是由日常开支,以及卖不动的书铺就的。” (Leonard Woolf, *The Journey, Not the Arrival Matters, An Autobiography of the Years 1939-1969*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69], p. 110)
- [63] Morrison, pp. 97-98, n. 8. 米怜对中国文字多样性的强调(即把它们看作是不同的图画),被一个极有经验的印刷技术、特别是平版印刷专家的观点所证实:“从古腾堡时代以来,凸版印刷者显示了对于文字讯息的偏好,而凹版印刷者,即使在商业生产时,也倾向于关注图画和装饰工作。” (Twyman, p. 63)
- [64] Milne, pp. 259-260. 19 世纪晚些时候北京的盲人印刷工人据说有同样的情况:“[传教士][William H.] Murray 先生一直教[盲人]学生在印书时独立做每件事,甚至直到用铅版印刷 (stereotyping)。通过他自己的一个很聪明的发明,他们可以如此迅速、如此准确地完成这道工序,以至于这些小伙子谁都可以每天轻松地印上十页。在伦敦一个盲人用手持框架 (hand frame) 每天只能生产四到五块版 (plates),英国和外国盲人协会 (British

and Foreign Blind Association) 雇佣的最好的盲人铅版工人使用一种机器, 一天的工作量达到八页就被认为很好了。中国的小伙子们比我们本土的同行干活准确性更高, 并且价格便宜得多。” Constance F. Gordon Cumming, *The Inventor of the Numeral-Type for China* (London: Downey and Co., 1899), p. 42; 同样, 在第 43 页, Murray 先生对此作了确认, 说道, “北京的 [盲] 小伙一天可以轻松地完成一个使用手持框架 (hand frame) 的英格兰盲人两倍的工作, 并且工作质量更加完美”。

- [65] Ricci, p. 21. 19 世纪早期的传教士 Charles Gutzlaff 甚至断言: “对于所有一般的工作, 中国的木版印刷或凸版印刷 (stereotyping) 模式似乎是最便宜的, 很大程度上是首选的方式。” (*China Opened*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v. 2, 第 149 页)。但是, 在 Adriano de las Cortes, S. J., *Le Voyage en Chine d'Adriano de las Cortes, S. J.*, trans. Pascale Girard and Juliette Monbeig (Paris: Chandeigne, 2001), pp. 194-195, 可以看到这个耶稣会士对他在广东省东北部沿海地区碰到的纸张和刻工“总是”低劣的中国雕版印刷的轻蔑评价。
- [66] Milne, p. 240. Hunter, p. 216, 证实了这种观点: “工人的熟练和聪明, 使他们能够非常迅速而整洁地完成一件工作。”
- [67] Medhurst, p. 105; and, Wood, p. 214. 这两个估算, 米怜的“一天 2000 张”和麦都思的 3000 张, 很可能是英国人现在的估算“一个工人一天可以印 2000 到 3000 [张]”的来源 (William B. Langdon, *Ten Thousand Things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London: 1842], p. 163)。16 世纪晚期利玛窦估计一个熟练的印刷者的产量“一天可多至一千五百张” (Ricci, p. 21), 更显示了这些数字的随意性。但是请注意, 实际的生产需求似乎滑落得如此之低, 以至于这些理想化的估算, 即使我们忽略它们之间的差别,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们所声称的正确性, 以及对既往实践的广泛适用性。例如, 一名现代学者声称, 一部印本首印只印 30 部 (Tsiens, p. 370); Drège (1994), 第 427 页, 提到一次印 600 到 1000 部。一组最近的关于每天产量的数据实际上极大地降低了生产水平: 100 个字一天 (工人们的前辈 150 到 200 字一天)、500 叶 (7 到 8 小时内), 而据说 1377 年刻印的一部文集由一个人完成, 速度是 235 字一天 (缪咏禾, 第 305、307 页)。显然, 在这些数字中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数字无异于盲人摸象。
- [68] Medhurst, p. 113. 麦都思的刻工据说每 100 字挣 6 便士, 一般一页有 500 字。

- 205 [69] Ibid., p. 235. 在这里提到的 Haechang 寺大概是现在中国的海幢寺,该佛寺印刷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马礼逊专藏中的许多佛教印刷品(Andrew C. West, comp.,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London: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 e. g., pp. 168-208, passim)。Hunter, p. 216, 认为这一寺庙座落于“广州旧工厂区对面”,并赞美其书版储藏室的“完美制度和整洁”。
- [70] Milne, pp. 234-235.
- [71] Ibid., pp. 247-248; Medhurst, p. 563. 澳门的耶稣会士首选活字,因为它比雕版更容易躲过中国警察的检查(Drège [1992], 第 284 页)。Medhurst, p. 562, 也发现“刻活字的工人让人头疼,很难维持秩序,如果他们被禁止离开故土,我们的工作就要停止”。
- [72] 见 Samuel Dyer 在 *Chinese Repository*, v. 2 (Feb. 1834), 第 477—478 页的讨论。
- [73] 李致忠,《肩朴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第 321—324 页。
- [74] Martinique, p. 38.
- [75] 缪咏禾,第 310—311 页注意到,对每个印刷者来说,蝴蝶装需要 5 个装订工,而线装只需要 3 个。
- [76] Christian Daniels, “16—17 世紀福建の竹紙製造技術:《天工開物》に詳述された製紙技術の時代考証”,《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48—9, 別冊(1995),第 243—279 页。我这里的讨论关注的是单色墨印。晚明著名的多色印刷,需要每种颜色分别将纸张在版上刷印一次,操作的复杂性必然驱高成本。
- [77] 井上进,“藏書”,第 424—425 页。
- [78] 同前,第 424 页。又见 Jonathan M. Bloom, *Paper Before Print,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Paper in the Islamic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0-71, 谈到 10 到 15 世纪间,中国纸在波斯价格与名声俱高。
- [79]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第 110—111 页,第 114—118 页。
- [80] 黄宗羲,《明文海》(北京:中华书局,1989),第 1 册,第 1034 页。更多关于纸张的使用和价格的变化信息,参见我的“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China”, pp. 55-104, in Cynthia J. Brokaw and Kai-Wing Chow, eds.,
- 206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81]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1),第223—224页;Milne, pp. 234 and 251; Medhurst, pp. 559-560。参见附录1.1。
- [82] 杨绳信,第42页;张秀民,第730,745页;缪咏禾,第302页。
- [83] Milne, p. 226.
- [84] Ibid., p. 223.
- [85] Frederick W. Mote and Hung-lam Chu, *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n Book* (Boston, MA: Shambhala, 1989), p. 169. 在这一点上我想感谢 Martin Heijdra 博士具有启发性的建议。
- [86] 书籍手抄本模式转变的迟滞在西方也同样明显,并且比近年来所公认的还要显著。这样,Curt Bühler 关于早期西方印刷的评论在应用到中国雕版印刷的这一关键方面时,就有了更多的重要性:“学习最早印刷术的人最好像第一个印刷者那样,把这种新发明简单地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书写。”正如 David McKitterick 后来提到早期西方的印本和手抄本时说,“两者仅仅是制作书籍的不同方式而已。对于绝大多数印本书而言,事实上非常重要、可以一眼而见的变化是,(例如在一个很基本的层次上)平直成行的字体及其更加规整的分栏的空间布局。当然,页面的设计要依据字模和压印机的机械限度进行调整,但是书籍的基本特征仍保留着:共有的属性、外观和(很大程度上共同的)材料”(McKitterick, pp. 35-37)。
- [87] 竹村真一,《明朝体の歴史》(京都:思文閣出版,1986),远非全面;对这一问题更新的介绍是林昆範,“元朝体と明朝体の形成”,(东京:朗文堂,2002;作为凸版印刷杂志 Vignette 2002年8月6日号发行)。除了有趣的插图外,两者对书法字体因印刷而发生的关键性变化的论述都不令人满意。又见缪咏禾,第280页;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79),上,12,第323页,提到明代中期直到19世纪一种方笔的使用及其对印本书法质量的恶劣影响。
- [88]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p. 11, 39 and 197. 这一观点与 Wood 第207 123页的看法相左,Wood 是基于个人观察:“雕版的成本完全取决于字的尺寸和精细程度,价格随着字体[即刊刻的文字]的细小程度而增加。”
- [89] 任中奇,“古书价格漫谈”,《藏书家》2(2000),第125页。
- [90] Lo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6-18, 139-161 论及活字印刷。

- [91] Lucille Chia 对早些时候字体简化的观察值得提及：“事实上，为书版印刷而进行的文字书写和雕刻的简化发生得更早。甚至在唐代，廉价的日历等临时印刷品（printed ephemera）就用了一种十分简化的字体。在建阳的印本中，元代连环画形式的历史小说所用的字体在使用上极为经济。”（Lucille Chia, “*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from the Song Through the Ming*,” p. 202, in Paul Jakob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但是，这些元代的字体还不及 15 世纪后期以后匠体字那样标准和划一。
- [92] Christopher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1850-1950*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17 世纪时，据说刻工的刻刀根据地区——如福建、江浙、南京和旌德—徽州——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张秀民，第 534 页）。
- [93] 缪咏禾，第 307 页。
- [94] 長沢規矩也，“刻工と出版者との关系”，《長沢規矩也著作集》（东京：汲古書院，1984），第 3 卷，第 215—218 页。
- [95] 根据 Cynthia J. Brokaw 教授提供的信息，1998 年安徽省南部徽州府歙县博物馆馆长曾向她回忆道，那里的书版刻工在 1950 年以前还进行着这种劳动分工（来自与 Cynthia J. Brokaw 的个人交流）。
- [96] 佐久間重男，“明代の陶磁と歴史的背景”，第 145—146 页，《世界陶磁全集·明》（东京：小学館，1976），v. 14，藤岡了一等编；宋应星，第 146—154 页。
- [97] 正如我们在 Harry Garner, *Chinese Lacquer*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9), 第 134 页有见识的评论中所看到的：“一般来说，16 世纪器具的一个特征是雕刻中节省劳力的设备的使用。在刻画细节时，15 世纪的正规用具大量使用刀……在 16 世纪刀被凿所取代，它只需一个动作和少得多的技巧。凿子的使用在 16 世纪皇室的器具中特别明显。”
- [98] Francesca Bray,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Ming China (1368-1644)* (Washington, DC: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2000), p. 65. 当然，一些晚明的精英出版物显示了改进的技艺，但它们只代表了当时的一小部分出版物。

- [99] 杨绳信,第41—58页;张秀民,第747页;井上,《中国》,第222—226页。
- [100] 正如 Sören Edgren(艾思仁)所注意到的,宋代这些数字忽略了佛经版本的已知刻工姓名,这样就低估了已知刻工姓名的数量(Sören Edgren, “Southern Song Printing at Hangzhou”,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1 [1989], p. 46)。
- [101] 张秀民,第745页。
- [102] 同前。
- [103] 同前,第735,737—738,751—752页;张树栋,第113—117页;关于胡贸,见注释145。
- [104] Ming Sun Poon (Pan Mingshen)(潘铭樂), *Books and Printing in Sung China (960-1279)* (University of Chicago, Ph. D., 1979), p. 1.
- [105] 林昆範,第6—17页。
- [106] Edgren, p. 51-2;张秀民,第733,746页。一些人甚至移民到日本(同前,第742—743页)。
- [107] 同前,第733页。
- [108] 瞿冕良,《版刻质疑》(济南:齐鲁书社,1987),第44页;缪咏禾,第316页。
- [109]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06页。
- [110] 张秀民,第732,742页。
- [111] 比如,瞿冕良,《版刻质疑》,第58页;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4,第80页。
- [112] 张秀民,第744页。
- [113] 同前,第746页。
- [114] 王河,《宋代图书史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第77页。
- [115] 北村高,“元代杭州蔵の刻工について”,《龍谷大学論集》438(1991年7月),第120—136页;Lucille Chia, “Commercial Printing”, pp. 319-325。
- [116] 缪咏禾,第314页。不用说,这种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和书版的供应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力成本和书价的一致,因为不同质量出版物所带来的市场分层会使得这些地区的价格肯定会出现巨大差异,即便是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
- [117] 任继愈编,《中国藏书楼》(沈阳:辽宁人民,2000),第1册,第928页。
- [118] 沈榜,《宛署杂记》(1593)(北京:北京古籍,1983),卷13,第108页。

- [119] 段本洛,张圻福,《苏州手工业史》(南京:江苏古籍,1986),第131页。
- [120] 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上海古籍,1990),第387页;缪咏禾,第130页。
- [121] 長沢規矩也,第215—216页; Michela Bussotti, *Gravures de Hui, Étude du livre illustré chinois (fin du XVIe siècle-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2001), pp. 284-290, 令人信服地指出至少1609年在常州两种做法同时存在,宋代旧的做法不再居于统治地位。Bussotti提到的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工匠连着做好几叶。
- [122] Ibid., p. 286.
- [123] 王河,第30页;在酷暑或寒冬这个日产量降至2000。遗憾的是,这里没有给出原始出处,但这些数字,根据上面米怜和麦都思给出的数字,在一年中,一个人一天可书写的字数,是其可刊刻字数的十三至二十五倍。
- [124] 张秀民,第747页。明代最著名的誊录者,苏州府长洲县的徐普,活动于1570至1626年间,誊录了不下384部、约2200卷书。这56年中的40年,他至少有部分时间为嘉兴藏工作。这些数据支持了一个粗略的估计,他平均每年抄写600叶;实际的数字肯定更高,因为他所誊写的图书清单是不完整的(李国庆,“书工徐普缮写书版小录”《文献》1992年第4期,第143页)。
- [125] 李国庆编,《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上海古籍,1998),第551—614页,从15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按姓名列举了1300人。注意此前周芜,《徽派版画史论集》(合肥:安徽人民,1984),第7页,只列出了300人。新近对徽州印本的详尽论述,特别是对黄氏的讨论,见 Bussotti, pp. 275-279。
- 210 [126] 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扬州:广陵书社,2003),第176页。在收获季节结束后,黄氏谱匠三五成群,带着一箱箱活字,在徽州走村串巷,为村子里的宗族排印宗谱。据说他们有20000到30000个三种不同字号的活字。
- [127] 小林宏光,“明清人物版画的特质と发展状况”,第41—49页(尤其是41—43页),《中国古代版画展》(町田:町田市立国際版画美術館,1988); Bussotti, p. 280。
- [128] 刘尚恒,第176—177页。
- [129] 元代已有这样的事例,一个刻工据说来自儒学之家(张秀民,第742页)。

- 同样,关于明代工匠,见 Joseph P. McDermott, "The Art of Making a Living in Sixteenth Century China", *Kaikodo Journal V* (Autumn 1997), pp. 73-75.
- [130] 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0),第 146—147 页。
- [131] 张秀民,第 749 页。清代,两个刊刻其自己作品的刻工是丘金生(音译)和梁阿发(音译),米怜最初的基督教皈依者(同前)。
- [132] 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济南:齐鲁书社,1999),第 535 和 540 页。
- [133] 同前,第 528—529 页;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 531 页;张秀民,第 748 页。
- [134] 同前,第 748—749 页;Bussotti,第 279 页。
- [135] 同前,第 280 页;Zhou Wu,第 24 页;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 528 页。
- [136] 周芜,第 22—23 页;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 521—540 页。一明黄氏刻工刊刻的书籍在北京、福建、江苏和浙江出版(刘尚恒,第 161 页)。
- [137] 周芜,第 24 页。
- [138] 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第 529 页;周芜,第 24 页;张秀民,第 748 页;张树栋,第 174 页。
- [139] 刘尚恒,第 184 页。
- [140] 小林宏光,“明清人物版画の特质と发展状况”,第 41—50 (尤其是 41—43) 页。
- [141]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 222—226 页。
- [142] 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奴隶農奴法·家族村落法》(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62),第 780—782 页;陈继儒辑,《捷用云笈》(《四库未收书辑刊》本),卷 6. 16a。
- [143] Milne, p. 234; and Medhurst, p. 559.
- [144] 张秀民,第 747 页。
- [145] 唐顺之,《荆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一二,40b-42a。
- [146]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中华书局,1958),卷四,第 56、58 页。
- [147] 狂欢、烂醉的工匠,特别是刻工的形象,已在 12 世纪出现,见洪迈,《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1),丙,卷一二,第 464 页。
- [148] 苏州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1981),

第 89、95 页。

- [149] McDermott, "The Art of Making a Living," pp. 73-74.
- [150] 张秀民,第 751 页。
- [151] 缪咏禾,第 129—130 页。
- [152] 周肇祥(1880—1954),《琉璃厂杂记》(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第 79 页,认为宋代以后书法家和刻石匠之间存在类似的社会分化。他认为,虽然在宋代以前刻石工与士大夫相联系,并理解书法的原理,但在以后各代他们各自独立,极少互动。结果,刻石工用钻子和凿子替代了小刀,使他们的工作水准大打折扣。然后刻石工就降到了类似吏员和工匠的位置,士大夫不再把他们视为同道。
- [153] 李国庆,“漫谈古书的刻工”,《藏书家》1(2000),第 123—124 页。插图画家可能比其他印刷工匠教育程度更高,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上缺乏史料以作出任何可靠的概括。
- [154] 小林宏光,「中国の版画」(东京:東信堂,1995),第 121—128 页;Robert E. Hegel, *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55] 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第 614 页,所列名单止于 1830 年代初。虽然这个终点是人为设置的,但无疑,根据李所据黄氏 1826 年族谱,1850 和 1860 年代太平天国叛乱对徽州的巨大破坏宣示了这一地区独特印刷文化的终结。

第 2 章

- [1] 新增的数据来自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北京:线装书局,2005)。但遗憾的是,它并未指明这些新增款目中有多少是手写本而不是印本。
- [2] 吉文辉,王大妹,《中医古籍版本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第 106 页。
- 212 [3] 李玫,《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 3 页。
- [4] 井上进,“藏書と讀書”,第 428 页;《中国出版文化史》,第 181 页。井上的数据,尽管我对之持保留态度,为制作表格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基础,如今其

余中国藏书里的其他早期印本也需要制作这样的表格。

- [5] 勝山稔,“明代における坊刻本の出版状況について——明代全般の出版数から見る建陽坊刻本について”,第83—101页,见磯部彰编,《東北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 [6]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139—142页。
- [7] Erik Zürcher,“Buddhism and Education in T'ang Times”, p. 55,见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John W. Chaffee, eds., *Neo-Confucian Education: The Formative Stag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8] 曾巩,《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上册,第179页。
- [9] Glen Dudbridge, *Lost Books of Medieval China*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00) 对宋初编印丛书的项目有很多论述。又见 Peter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52-153。
- [10] 永亨,《搜采异闻录》(《丛书集成》本),卷五,第24页。
- [11] 会谷佳光,《宋代书籍聚散考:新唐书芸文志积氏类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4),第241页。
- [12] 王明清,《挥麈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余话,卷二,第310页。
- [13] 例如,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第106页。
- [14] 胡应麟,卷四,第60页;徐焞,《笔精》(福州:福建人民,1997),卷七,第239页。
- [15] 潘铭桀,“宋代私家藏书考”,《华国学报》第6卷(1971年),第215—218页; Susan Cherniack, “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4. 1 (1994), p. 33; and Jean-Pierre Drège, 213 *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au Xe siècl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991), pp. 266-268. 李瑞良,《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上海:上海人民,2000),第268页似乎表达了大体上的赞同,如果不是完全赞同的话。
- [16] 困扰北宋皇家藏书的火灾显然使这种比较变得困难,因为1015年该藏书的破坏使得相当数量的私人藏书至少暂时比皇家藏书要多(张邦基[死于1109年],《墨庄漫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五,第142页)。范凤书的《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第88—89页,也提到一

个藏书家王钦臣(1034—1101),他的藏书(43000卷,不包括类书)据说在巅峰时期超过了皇家藏书。但是,北宋和南宋皇家藏书巅峰时的数据都是当时包括私家藏书和公家藏书在内的所有藏书中最多或接近最多的。

- [17] John H. Winkelman, *The Imperial Librar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1127-1279: A Study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Scholarly Agencie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 s. 64. 8 [1974]), pp. 10 and 37.
- [18] Ibid., pp. 8-9 (esp. n. 21) 认为安禄山叛乱前的唐代朝廷藏书有书 82384 卷,根据周密的说法,梁元帝时朝廷有书 140000 卷;隋(589—617)时嘉则殿有 370000 卷书;在唐代(618—907)的两个首都,共有 70000 卷(周密,《齐东野语》,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一二,第 216—217 页)。关于隋代和唐代,有更多细节保留下来。隋的宫廷藏书至少有 89666 卷,这是从扬州运往唐代都城的隋代政府藏书的数目;但是在运输过程中,只有 10% 到 20% 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卷三二,第 908 页)。唐代,皇室藏书和集贤院藏书两个宫廷藏书保留了重要的细节。约 720 年,唐代皇室藏书的权威目录罗列了 2655 部书,48169 卷(即比 705—706 年的目录多出 6000 卷)。在遭到 755 年安禄山叛乱的巨大损失后,藏书缓慢恢复,到 836 年藏书升至 54476 卷(David McMullen,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21-223, and 235-237)。集贤院藏书更多,使之成为至少自 555 年梁代宫廷藏书毁于火灾以来最大的一部藏书。731 年,那里有书 89000 卷,多数是新印之书;但它同样在安禄山叛乱对首都的破坏中遭到损失,其后来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ibid.*, p. 222; Denis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6, n. 85)。
- [19] 五代早期的皇家藏书仅有 10000 卷藏书(McMullen, p. 237)。
- [20]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上海古籍,1981),第 1 册,第 393 页。
- [21] 同前。
- [22] Winkelman, pp. 36, Table 7. Winkelman 提醒我们这个数字可能包含一些未完成著作、复本和无关的书(同前)。但是,即使这个数字也比集贤院的 731 部书要少。
- [23] 傅璇琮、谢灼华编,《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第 1 册,第

526—527 页。

- [24] 任继愈,第2册,第914—915页。
- [25] 颜之推,《颜氏家训》(《丛书集成》本),卷三,第51页。
- [26] 王明清,前录,卷一,第10页。他又提到他们的藏书中包含许多错误。
- [27] Jean-Pierre Drège, *Les bibliothèques*, pp. 172-3. 这些数字可能太高了:蒋父(747—811)在江南宜兴县仅以15000卷就获得了藏书家之名(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1],第214页)。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p. 109,说到8世纪末,苏弁的20000卷藏书据说规模比除了皇室藏书和集贤院藏书之外的所有藏书都要大。
- [28] 范凤书,第30,36—37,46,57,62—82页。
- [29] 井上,“藏书”,第414页。
- [30] 赵宗绰据说有70000卷书(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1978],第2册,四笔,卷一三,第772页),但因为他是皇室成员,享有接近政府和皇家藏书的特权才得到许多书籍。管理档案的官员王钦臣也有几乎同样的便利条件,他和他父亲王洙(997—1057)一起获得了超过43000卷藏书(范凤书,第88—89页)。
- [31] 同前,第102页。
- [32] 叶瑞宝编,《苏州藏书史》(南京:江苏古籍,2001),第133页。 215
- [33] 同前,第76、102页;井上进,“藏书と讀書”,第412页;吴晗,《江浙》,第134、208页。
- [34] 胡应麟,卷四,第53页,明确地从他的数字中减去了藏书中的复本和零杂书籍。李瑞良,第317页,列出了几宗宋代的大型藏书,都不超过40000卷。
- [35] 周密,卷一二,第217—218页,提到大型的私人收藏,每家藏书的规模都不超过宫廷藏书。周密把陈氏藏书的超大规模归因于抄录了许多福建省莆田县郑氏、方氏、林氏和吴氏家族藏书中的旧本。还需注意由于陈氏列出了据说已失传的书,显然表明他的目录并不是他自己的藏书目录,而是他看过或听说过的书的目录(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173页)。这样,这里的数字看起来不能全信。
- [36] 同前。
- [37] 胡应麟,卷一,第17—18页。

- [38] 在13世纪的华北,大的私人藏书是很少的,但一个高官张炤(1225—88)在今山东济南,据说得到了一笔规模大得异乎寻常的80000卷藏书(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第337页)。
- [39] 胡应麟,卷一,第18—19页;吴晓明,“明代的上海藏书家”,《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19卷(1984年第1期),第102页;李玉安、陈传艺,第106页;丁申,《武林藏书录》(《丛书集成》本),中,第40—41页;郑元祐,《侨吴集》(影印本,台北:“中央图书馆”,1970),卷十,1b;《毗陵志》(1484),卷二二,10a,谈及宜兴人岳浚的著名藏书;井上,“藏书”,第414页;范凤书,第138—145页,称45个藏书家的共20000卷藏书,占了藏书数量可考的61个元代藏书家藏书的74%。
- [40] 黄潘,《金华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一七,3b,有苏州人陆友的材料;郎瑛,《七修类稿》(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四〇,第584页,有松江人孙道明的材料。
- [41] 李玉安、陈传艺,第134页。
- [42] 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第30页。
- [43]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第21页。
- [44] Chia, “Commercial Publishing,” pp. 302-306, in Smith and von Glahn, eds. *Transition*.
- 216 [45] 范凤书,第174,175,177,179页。明初在苏州有“近1000卷古书”和“几千卷”的士人可列为藏书家(叶瑞宝,第144—145页)。
- [46] 寺田隆信,“紹興祁氏「澹生堂」について”,第533—548页,见《東方學會創立四十周年記念東方學論集》(东京:東方學會,1987)。
- [47]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44—245页。
- [48] 于慎行,《谷山笔麈》(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七,第82页。
- [49] 胡应麟,卷四,第53—54页。这一观点可能夸大了正史的作用。
- [50] 范凤书,第89页;任继愈,第1册,第766页。
- [51]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171页。
- [52] 叶梦得,《避暑录话》(《丛书集成》本),上,第2页。
- [53] 任继愈,第1册,第812、814页。
- [54] Winkelman, “Imperial Library,” p. 32.
- [55] 井上,“藏书,”第416页。这一说法的确切时间不清楚,但我猜是指15世

纪的某个时候,而不是在之后明朝的某个时候,那时藏书已急剧衰落了(见第4章)。

[56] 叶瑞宝,第148页。

[57] 杨循吉,《吴中故语》(《广百川学海》本),11a-14a;学生们成功地顶住了这些压力。印本的短缺可能也是此前朝廷对苏州士人提出要求的原因。1465年,苏州士人李应楨因拒绝为成化皇帝制作一部佛经的手抄本而受到斥责,而其他人,包括1512年的翰林官员,遵从皇帝的命令抄录了这些佛经(焦竑,《国朝献征录》[台北:学生书局,1965],卷七二,75b;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5],第1册,卷十,第256页)。

[58] 范凤书,第76(王正功),112(楼钥)页。

[59] 井上,“藏书,”第419页。

[60] 叶昌炽,卷二,第159页。

[61] 钮石溪,会稽钮氏世学楼珍藏图书目,第1559—1570页,冯惠民,李万健编,《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第2册。然而,注意商浚声称钮的所有藏书都是手写的(范凤书,第200页)。

[62] 叶梦得,《石林居士建康集》(晚明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卷四,1a-2b。 217

[63] 《宋史》,卷三三三,第10690页。

[64] 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台北:学海,1980),第185页。

[65] 同前,第177页。成都府路普州人刘仪凤(1110—75)在朝廷任官十年,如宫廷藏书助理,这无疑使他更容易接近皇家藏书及其在12世纪中叶重建的善本藏书,其中有许多来自华南私人藏书家的赠送。换言之,他可能把大部分薪水都花在抄录公共藏书上,而不是从杭州书店里买书。

[66] Poon, *Books and Printing*, p. 24. 潘美月,第162—163,165页关于南宋时四川宋本的留存情况提供了更多信息。五代时对藏书的广泛破坏,使宋代初年只有四川和江南还保留着比较多的书。宋初政府对四川藏书的掠夺只是推迟了这一地区藏书的发展(江少虞,第1册,第393页)。然而,我们对这些藏书所知甚少,因为它们们在13世纪后半期受到频繁入侵和动乱的强烈破坏。到14世纪,风向完全变了,一个四川人到江南旅行,在四五年的时间里收集了大量的书(胡应麟,卷一,第17页)。

[67] 陈振孙,卷五,第133页。

[68] Poon, *Books and Printing*, pp. 1, 11, 468-474 (注意北宋的两浙路和利州在南宋大部分时间里被分为东西两部分);又张秀民,第59页。即使在一度遥

远的沿海府治潮州(位于今广东省),到13世纪、至迟14世纪初,政府衙门和学校还拥有总共10,865块书版(《潮州三阳图志辑稿》、《潮州三阳志辑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卷十,第55—56页)。

- 218
- [69] 宿白,第86—87(表1,2,3),106页。
- [70] 同前,第84—110页,特别是第106页。只是在1622年,古腾堡发明印刷机近两个世纪后,Rigault的法国皇家图书馆的目录中才把手抄本和印本区分开来。从17世纪晚期开始,这种做法才因此变得普遍(McKitterick, pp. 12-5)。
- [71] 永瑤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卷三七,第4135—4136页。又见Cherniack, pp. 70-71, on the fate of this text in the Song.
- [72] 陈振孙,卷八,第237页。按照Paul U. Unschuld,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Pharmaceutic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45-46)的说法,南宋时期政府仅在1249年印过一部新的药书,并将一部1108年的书重印了三次(1185、1195和1211年)。注意政府最终是如何永久性地从药书的印刷中抽身的:“从7世纪到宋末,药书的编纂、修改和出版在中国由政府发起和支持,这是20世纪前出现这种现象的唯一一段时期。后来,据记载仅在明代和清代各有一次皇帝下令编纂药书。然而后来这些下令编纂的著作,并不是给大众看的,这样就不能作为上述命题的特例。”
- [73] 袁楠,《清容居士集》(《丛书集成》本),卷二二,第397页。
- [74] 黄震,《黄氏日抄》(《四库全书珍本》本),卷九三,1a-2a。
- [75] 李玉安、陈传艺,第92页。
- [76] 胡应麟,卷一,第17页;危素,《危太朴集》(影印本,台北:新文丰,1985),卷十,16a-b。
- [77] 杜範,《清献集》(《四库全书珍本》本),卷十,11a。又见我在即出《剑桥中国史·宋代卷》关于宋代经济转变一章中的讨论。
- [78] Paul J. Smith, “Family, *Landsmann*, and Status-Group Affinity in Refugee Mobility Strategies: the Mongol Invasions and the Diaspora of Sichuanese Elites, 1230-133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2. 2 (1992), pp. 668-672. 但是,陆深,《金台纪闻》(《丛书集成》本),第8页说,明初时蜀地仍有雕版。
- [79] Shiba Yoshinobu, “The Economy of the Lower Yangzi Delta, 1300-1800”

- (forthcoming in Joseph P. McDermott, ed., *Commercial Growth and Urban Life in Jiangnan, 1000-1850*); Richard von Glahn, "Towns and Temples: Market Town Growth and Decline in the Yangzi Delta 1200-1500," pp. 176-211, in Smith and von Glahn, eds. *Transition*.
- [80] Chia, "Commercial Publishing," pp. 297, 306, in *ibid*.
- [81] 陆容,《菽园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十,第128—129页。
- [82]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重印1959年版),卷二, 219 第29页。
- [83] 陆容,卷四,第39—40页。
- [84] 大内白月,《支那典籍史谈》(东京:昭森社,1944),第61页。
- [85] 杨士奇,《东里续集》(《四库全书珍本》本),卷一七,15b。
- [86] 陆容,卷十,第129页。
- [87] 杨士奇,《东里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十,第143页;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12—213页。
- [88] 叶盛,《水东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二〇,第204页;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八,16b。
- [89]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附补正,王欣夫编(上海:上海古籍,1999与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合印),卷2,第117—118页。
- [90]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17—218页。
- [91] 杨士奇,《东里续集》《东里续集》,卷一八,13a。
- [92] 井上,“藏书”,第417—418页。
- [93] 同前,第417页;叶昌炽,卷2,第136页。完成一部书时需要匹配几部不同的残本的例子,亦见同前,第157页。
- [94] 井上,“藏书,”第417—418页。
- [95] 楼钥,《攻媿集》(《丛书集成》本),拾遗,第3页;寺田隆信,“士人の史的教養について——あるいは「資治通鑑」の流布について”,《歴史》(东北大学)82(1994),第1—17页。1086年杭州版的原始书版似乎在1129年女真人入侵杭州和江南其他地方时被掠到华北。1099年朝鲜人要了一部(开始被礼部拒绝,后来得到一部,后又从明朝第一个皇帝那里得到一部)。蒙古人在1281年译成用畏兀字母写成的蒙古文出版(中文版在华北仍少见)。日本人直到1849年才出版了第一个完整的版本(虽然他们很早就知道它的存在)。一部13世纪中叶的元版刻于杭州附近,明初被

政府移藏于南京国子监。明初时似乎很少重印。

- [96] 井上,“藏書”,第417页。
- 220 [97] 同前,第418页;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15—217页。
- [98] Kwang Tsing Wu,“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 (February 1943), p. 224;叶昌炽,卷二,第129页。
- [99]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15—217页。井上推测1514年的建宁本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 197 曾提到)可能是个重印本。即便如此,其他版本很快在1530、1534和1537年出现。
- [100]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七,23a。
- [101] 冀淑英,“辛勤抄书的藏书家钱穀父子”,《历史文献研究》新系列,第2辑(1991年),第76页。
- [102]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卷18,第642—643页。《旧唐书》在南宋早期初印后,过了三个世纪的1538年才再次印刷,到18世纪存世仍很少(李瑞良,第272页)。
- [103] 曹溶,《流通古书约》(《知不足斋丛书》本),1a。
- [104] 井上,“藏書”,第429—440页,提供了下一节中的大部分信息。
- [105]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107页。
- [106] 同前,第134—138页。
- [107] 同前,第131页。
- [108] 同前,第120—123,124,125—126,128,133页。
- [109] 陆容,卷十,第129页。
- [110]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二,第29页。
- [111]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06—207,241页。
- [112] Chia,“Commercial Printing”, p. 303.
- [113] 叶昌炽,卷二,第142页。
- [114] 井上,“藏書”,第434页。
- [115] 范凤书,第120—127,163—164,251—264页。目前所知的明代目录中有大约四分之一,即48种,幸存下来。
- [116] 大内白月,第68页。
- [117] 黄宗羲编,《明文海》,第1册,卷八八,第860—861页。这种观点是士人不喜欢商业的、非儒家出版物的一种极端化表达,此前他们会认为这些书不值得真正的学者去读,应该丢掉——没说要把它们烧掉(例如,14世

- 纪吴海的《闻过斋集》[影印本,台北:新文丰,1985],卷四,1a-2a)。又见 Anne E. McLaren,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d Ming Chantefables* (Leiden: E. J. Brill, 1998), pp. 1 and 279.
- [118] 郎瑛,卷 24,第 370 页。
- [119] 黄宗羲,《明文海》,第 1 册,卷 105,第 1034 页。关于明代出版繁荣这一关键因素的更多信息,见井上,「書肆・書賈・文人」第 323—326,328 221 页;金文京,「湯賓尹と明末の商業出版」,见荒井健,第 339—385 页。
- [120] 韩锡铎、王清原,《小说书坊录》(沈阳:春风文艺,1987)。
- [121] 韩锡铎、牟仁隆、王清原编,《小说书坊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 [122] 范凤书,第 197 页。
- [123]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第 181 页。
- [124] 井上,“藏書,”第 426—429 页。不幸的是,只有一个馆藏有这些元代和明代印本的数据,即台北的“国家图书馆”。
- [125]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 169 页。
- [126] 勝山稔,第 2—4 页。
- [127]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 159—161,204—205 页。
- [128] Twitchett,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p. 64; 井上,“藏書”,第 422—427 页,及《書肆・書賈・文人》第 312—315 页。
- [129] 胡应麟,卷四,第 57 页。
- [130] 这个数字有两个来源。Tsien, p. 367, n. c, 引用西方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在 1450 至 1500 年间,欧洲大约印刷了 2 千万册书(10000 到 15000 部不同的书或 30000 到 35000 个版本)。但是,他所用的资料来源之一——Lucien Febvre and Henri-Jean Martin, trans. David Gerard, *The Coming of the Book,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 (London: Verso Editions, 1984)——在第 248 页声称在这半个世纪里出版了 2 千万册书之后,在第 350 页注 343,承认了 1 千 2 百万这一大大降低的数字的可能性。16 世纪 1 亿册书的数字来自 Michael H. Harris,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The Scarecrow Press, 4th ed., 1995), p. 131. 它也是基于某种推测,只是一种基于生产规模的粗略估算,而不是确切的计量:“估计在 16 世纪仅在欧洲就有超过 100000 种不同的书出版,假设每种书平均

印 1000 册,那就意味着在该世纪欧洲人拥有 1 亿册书。”并不只是中国人才需要在这些数字上碰运气。

[131] St Clair, p. 22.

[132] James Raven, Helen Small, and Naomi Tadmor, eds., *The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ading i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 and 7. McKitterick, p. 11, 用更多在西方一些地方手抄本文化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的例子确认了这一结论:“对于希伯来语、希腊语和乐谱来说,它们所需要的活字或其他印刷材料并不总能方便地得到,或者其需求量不足以使之常备,手抄本的传统就在印刷术发明以后长期延续下来。19 世纪东欧的犹太社区、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制作和使用了许多手抄本。在爱尔兰,手抄本传统由于多种原因直到 19 世纪还对印刷本占据上风。在教育社区,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北美,抄写课本和作笔记的习惯,意味着印刷之外手抄本文化还在延续。在整个欧洲,17 和 18 世纪的新闻以手抄本和印刷两种形式出版。”

[133] 李伯重,第 172—177 页。

[134] 大木康,“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 50 卷第 1 期(1991 年 1 月),特輯号,第 48—61 页;胡应麟,卷四,第 57 页。

[135] 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第 24 页。

[136] 叶昌炽,卷二,第 136 页;卷四,第 307,353 页;李玉安、陈传艺,第 125—126 页。

[137] 李诒,《戒菴老人漫筆》(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八,第 334 页。

[138] 胡应麟,卷四,第 59 页;井上进,“藏書と讀書”,第 419—420 页。

[139] 胡应麟,卷四,第 54 页。

[140] 叶瑞宝,第 210 页。

[141] 叶昌炽,卷二,第 161—162 页。

[142] 同前,卷二,第 131 页。至少今天为止,这后一部书据说并不是在明代印刷的。

[143] 叶瑞宝,第 233 页。

[144] 郑伟章、李万健,第 42 页。

[145] 徐焘,《红雨楼》,卷一,30b。

- [146] 同前,卷一,13a-b。
- [147]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2册,卷二〇,第601页。李瑞良,第333页,声称,至少到18世纪,《永乐大典》中7000到8000部书中80%到90%的文字只在这部大类书中留存下来(这部书的三个复本只在两个城市有存,两部在北京,一部在南京)。如果这样,这些书仍在私人藏书家接触范围之外,因为这一藏书不向非皇室成员开放,明代只有几种书泄漏出去。
- [148] 刘玉才,“朱彝尊与曝书亭”,《藏书家》第2辑(2000年),第43页。 223
- [149] 任继愈,第1册,第129页列了一些,方便使用。
- [150] 李玉安、陈传艺,第90页。
- [151] 何孟春,《燕泉何先生余冬序录》(1584年版),卷三五,10a-b。
- [152]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二,第30页。
- [153] 归庄,《归庄集》(上海:上海古籍,1984),卷十,第516页。据说他的妻子为他抄了一些书(吴庆坻,《蕉廊脞录》[北京:中华书局,1990],第131—132页)。
- [154] 汪琬,《尧峰文钞》(《四部丛刊》本),卷一五,5b-6b。
- [155] 孙殿起编,《琉璃厂小志》(北京:北京古籍,1982),第100—102页。
- [156] James Hayes, “Specialists and Written Materials in the Village World”,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78-107.

第3章

- [1] 范凤书,第159—160页;黄姬水,《贫士传》(《丛书集成》本),下,第26页;任继愈,第2册,第1035页;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杭州:浙江人民,1987),第119页。
- [2] 祁承燦,《澹生堂藏书约》(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聚书训,第12页;范凤书,第100页。
- [3] 徐渤,《笔精》,卷七,第242页。
- [4] 我此处的论述得益于阅读 Natalie Zemon Davis, *The Gift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5] 范凤书,第 117—120,127—128 页;应该注意到,据载有两次,许多藏书家捐出他们的部分藏书给政府,或允许政府抄录(同前,第 128—131 页)。
- [6] 王河,第 69 页。
- [7] 任继愈,第 2 册,第 938—939,944 页;张秀民,第 402,405—406 页。
- [8] 任继愈,第 1 册,第 97 页。
- [9] 例如,江盈科,《江盈科集》(长沙:岳麓书社,1997),第 382—383 页;《黄山志定本》(1686 年序),卷三,艺文志,上,21a-b。
- 224 [10] 傅璇琮、谢灼华,第 1 册,第 360—376 页;任继愈,第 1 册,第 771 页。
- [11] 范凤书,第 193 页;任继愈,第 2 册,第 961 页。这个家族对至少是一部分叶氏藏书的保留,有赖于一个孙子的顽强努力(郑伟章、李万健,第 31 页;叶昌炽,卷 2,第 116—117 页)。
- [12] 同前,第 2 册,第 963 页。
- [13] 同前,第 2 册,第 983 页。
- [14] 范凤书,第 223 页。
- [15] 任继愈,第 2 册,第 1059 页。
- [16] 柳和城、宋路霞、郑宁,《藏书世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 58—363 页。
- [17] 例如,周密,卷一二,第 216 页;及与任桂全的个人访谈(绍兴,2004 年 9 月)。徐焯,《笔精》,卷七,第 240 页;刘玉才,“朱彝尊与曝书亭”,《藏书家》第 2 辑(2000 年),第 44 页。
- [18] 归有光,《归有光全集》(香港:广智书局,1959),卷二五,第 308 页。
- [19] 范景中,“藏书铭印记”《藏书家》第 3 辑(2001 年),第 150 页。藏书家因财务上的原因被迫出售书籍的一个例子,见张慧剑,第 375 页。
- [20] 徐焯,《红雨楼题跋》,见冯惠民、李万健等,第 2 册,卷 1.36b。
- [21] 范凤书,第 152 页。
- [22] 孔齐,《至正直记》(上海:上海古籍,1987),卷二,第 39—40 页。
- [23] 顾起元,《客座赘语》(北京:中华书局,1987),卷八,第 253 页。
- [24]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一六四,5a。他还谈及继承人在把藏书作为家庭财产的一部分进行瓜分时对藏书的毁坏。
- [25] 李诩,卷五,第 200—201 页;范凤书,第 196 页。这个故事让人想起中世纪英国著名藏书家理查德·德·伯里(Richard de Bury)的命运:他“负债累

累,在他死时,仆人偷走了所有能搬走的东西(包括他的书)。他赤条条地躺在床上,除了一个男仆甩给他的一件汗衫外一无所有”(Ernest A. Savage, *Old English Libraries, the Making, Collection, and Use of Books During the Middle Ages* [London: Methuen and Co., Ltd., 1911], p. 179)。

- [26] 叶瑞宝,第220页。同样,有影响的苏州作家归有光之子归子宁,把他父亲尚待出版的著作卖给一个书商;他后来发现不是这些手稿,而是以这些文字刊刻的书版,能够控制他父亲著作的出版并能够用来营利(同前,第208页)。
- [27] 范凤书,第237页。
- [28] 叶瑞宝,第233页。
- [29] 黄宗羲编,《明文海》,卷四七九,第5158页。 225
- [30] 外山軍治,《中国の書と人》(大阪市:創元社,1971),第238—239页。然而,项的藏书似乎一直保持到17世纪中叶满洲人入侵江南时,被汪六水和他的部下劫掠了(范凤书,第212—213页)。
- [31] 同前,卷2,第100页。
- [32] 李玉安、陈传艺,第119页。
- [33] 范景中,第150页。他在这里引证的是湖州大画家和藏书家赵孟頫(1254—1322)。
- [34] 同前,第152页。
- [35] 王明清,《后录》,卷七,第173—174页。陆游关于这场不幸的记述虽然略有不同,但也强调了 this 家族与其藏书的依存关系:“[其父王性之]既卒,[1147年]秦熺方恃其父[秦桧]气餒熏灼,手书移郡,将欲取其所藏书,且许以官其子。长子仲信,名廉清,苦学有志,号泣拒之曰:‘愿守此书以死,不愿官也。’郡将以祸福诱胁之,皆不听。熺亦不能夺而止。”(陆游,《老学庵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二,第20页)。
- [36]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二,第31—32页;井上进,“張氏顧亭林先生年譜補正”,第431页,注释1,见岩見宏、谷口規矩雄编,《明末清初期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
- [37]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109页。
- [38] 黄震,卷七〇,18b;方回编,《瀛奎律髓》(《四库全书珍本》本),卷二〇,49a。
- [39] Wing-tsit Chan, *Chu Hsi, New Tex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 78.

- [40]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本),卷一八,17a-32a,卷九,1-27a。
- [41] 大内白月,第62—63页;K. T. Wu, pp. 249-50;王河,第73—77页;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1999年第4次印刷),卷七,第180页。
- [42]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p. 183;陆深,第8页,批评了这些书的印刷质量,认为次于书坊所印的书。
- 226 [43] 胡应麟,卷四,第54页。为避免使这种行为显得为中国所特有,请注意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也存在送书以换取好处的现象(Savage, pp. 180-181; Davis, *passim*)。
- [44]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一八,第644页。
- [45] 徐燊,《笔精》,卷七,第242页。
- [46] 丁申,中,第50页。
- [47] 赵汝珍,古玩指南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第12页。这种礼物无疑是比钱更为保险的“贿赂”,更容易躲过政府清除腐败的运动。而且,许多官员收藏书籍和艺术品,经常交换和买卖以增进他们的收藏;许多书商常给客户送礼,尤其是在拜访客户向他们展示最新的卖品时(任继愈,第册1,第253页)。
- [48]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10—214页。
- [49] 例如,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七,15a-b。他有两部书是通过亲自找到它们的持有者——一个村民和一个仆人——而买到的(同前,卷一七,7b、12b)。
- [50]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11页,提到两部;其他三部见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七,15a-b,卷一九,3a,卷二〇,2a。
- [51] 同前,卷一七,3b,4a,5a,5b,8a,13a,19a,23b-24a;卷一八,24b,25a,30b;卷一九,13b。
- [52] 同前,卷一八,5a。
- [53] 同前,卷一六,1a-ff。
- [54]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14页。
- [55]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七,25b。
- [56] 同前,卷一七,23b-24a;卷一八,15b。

- [57] 同前,卷一九,1a-b。
- [58] 同前,卷一七,6a。
- [59] 同前,卷一六,16a。
- [60] 同前,卷一七,1b-2a。这里他解释道,只是在搬到武昌后他才得到全本,因为“余少贫,得书甚难”。
- [61] 同前,卷一六,21b。
- [62] 同前,卷一六,14b-15a。
- [63] 同前,卷一七,12a-b,19b-21a。
- [64] 同前,卷一八,5b,13b-14a。
- [65] 同前,卷一七,15b。又见徐焯《笔精》,卷七,第238—239页。
- [66]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九,4a,15a。
- [67] 同前,卷一七,13a。
- [68] 同前,卷一七,20b-21a。
- [69] 同前,卷一七,23a-b。他对《史记》的抄录只是在意外地得到一位官员朋友的帮助后才得以完成(同前,卷一七,18b-19a)。
- [70] 当时一个同样官居高位的士大夫和藏书家陈济(1364—1457)的经历,似乎支持了这个结论,因为陈据说“生平购书甚多”(叶瑞宝,第147页)。 227
- [71] 谢肇淛,卷一三,第379—380页;徐焯,《笔精》,卷七,第238—239,240页;顾起元,卷八,第253页。
- [72] 佚名,《道山清话》(《丛书集成》本),第6页。一个13世纪的书贩的目录前有一篇著名文人写的序言(许棐,《猷醜集》[《丛书集成》版],第4页)。
- [73] 潘美月,第14—17页。
- [74] 范凤书,第251—263页。只有不到一半出版了,很多只是到20世纪才出版。
- [75]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1987),第1,3页。
- [76]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1990),第3页。
- [77] 潘铭燊,“书业恶风始于南宋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12卷(1981年),第271—276页;叶权,贤博编,《明史资料丛刊》,第1册(南京:江苏人民,1981),第165页,提到南京、北京和苏州的造假;又顾志兴,《浙江藏书家》,第98页提到丰坊的作伪案。关于明清私人出版,见叶树声,余敏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胡应麟,卷三二,“四部正

讹”，下，第 423 页，注意到数量最多的伪书依次是：子部书（尤其是道教和各种兵家学派著作），其次是经部书（尤其是《易经》和占卜书），然后是史部书（尤其是杂传记和五花八门的故事），最后是文学作品集。这个顺序大概反映了这些书的相对需求、市场价值和 16 世纪士人的阅读情况（除了小说）。吴晗，“胡应麟年谱”，见北京市历史学会编，《吴晗史学论著选集》（北京：人民，1984），第 1 册，第 401—404 页，有关于伪书的很多有趣的信息。

[78] 许棐，第 4 页。

[79] 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第 301—305 页；叶昌炽，卷六，第 604—605 页。

228 [80] 李诩，卷三，第 106—107 页。这些商店可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相关服务，包括出售文具（关于宋代的情况见井上《中国》第 146 页）。中国这样做的时间如此之早，试将之与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抱怨作一个对比：1725 年，伦敦还没有租书的地方（St Clair，第 239 页）。

[81] 《琼州府志》（1619），卷一一，26b。

[82] 同前，卷一一，26b-29b；余治，《得一录》（1869 年版；影印，台北：华文书局，1968），卷一一，1.5b-6a。

[83] 村上公一，“中国の書籍流通と貸本屋（2）”，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 106（1990），第 229—243 页。这些女人似乎能够通过大声朗读她们认识的字来“读”这些书，以便帮助她们记住所有谱以流行曲调的歌词。Li En-soku，“Chōsen goki no seisatsu（Lending libraries in the late Chōsen period）”，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ublishing Culture in East Asia, Sendai, November 2003，显示自 18 世纪朝鲜可以借书的藏书机构出现以来，主要的读者群是女性，特别是使用韩文（Han'gŭl）以手抄本形式出现的小说。

[84] *Chinese Repository* 4（1835-1836），p. 190.

[85] 徐雁，“书铺说”《藏书家》第 5 辑（2002 年），第 168—178 页，特别是第 169—171 页。

[86]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 146 页。

[87] 同前，第 78—79，148—149 页。注意在开封，许多书摊只在最大的佛寺——相国寺每六天举行一次的定期集市上经营。而在它东门外就是专门的书铺（同前《中国》第 145 页；熊伯履，《相国寺考》[郑州：中州古籍

- 出版社,1985],第90—92页)。
- [88]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110—111,130页。1072年,11世纪末访问中国的日本僧人成寻说,在位于今江苏省北部的一个佛寺门口买过佛教和非佛教书籍(同前,第111页)。
- [89] 王河,第80—83页;顾志兴编,《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杭州:浙江人民,1991),第16—17页;《南宋京城杭州》(杭州:浙江人民,1988;《杭州历史丛编》第4册),第124—127页。据载迟至1948年,“中国的许多大书店也是印刷所”(Rudolph,p. xi)。
- [90]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09页;叶昌炽,卷三,第309、311页。 229
- [91] 谢肇淛,卷一三,第265页;任继愈,第1册,第245页。在晚明,像钱谦益那样的大藏书家可能会从这种外地来的书商那里买下其他藏书家的整部藏书(叶昌炽,卷四,第335页);19世纪,按照赫伯特·吉尔斯(Herbert Giles)的说法,威妥玛(Thomas Wade)爵士1842至1882年间在中国所得到的藏书,“并不是直接在市场上买的——事实上这样一宗藏书是不可能拿到市场上去的……”(Herbert A. Giles, *China and the Chines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02], p. 39)我认为吉尔斯的意思是,书商按威妥玛的要求把他们所找到的书运到他所在的英国领事馆,或者他们想把这些书推销给他。无论何种方式,他并不是在书店里通过一次性购买获得了他藏书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 [92]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148页。
- [93] 《松江府志》(1817),卷三〇,10b。
- [94]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34页。
- [95] 同前,第234—235页;第48页,上文注40。
- [96] 井上,《書肆·書賈·文人》第316—317页;吴晓明,第102—103页。
- [97] 张秀民,第343—348,365—366,369—372页。又见沈振辉,“明代江浙地区的商品经济与藏品市场”,《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3辑(2003年),第282—288页。叶瑞宝,“苏州书坊刻书考”,《江苏出版史》1992.3,第78—149页,列出了1600年以前31个明代商业书坊,和接下来45年里的96个书坊。仅在1601至1610年间,就出现了41个新书坊。然而,许多书坊看起来只是偶尔出书。
- [98] 井上,《書肆·書賈·文人》第316—319页。蒋镜寰,13a,说到晚明时座落于苏州城中心城隍庙右侧的一个经营旧书的书店。17世纪初的南昌,有

两个书商对最近的商业出版物并不在意,他们只靠专门经营旧书过活,这些旧书是从这一地区的世家大族那里收来的(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45—246页)。

- [99] 吴晗,“胡应麟”,是迄今关于胡生平和藏书活动的最好研究成果。任继愈,第2册,第1087—1092页,也很有用。
- [100] 胡把几千卷佛教和道教文献包括进来(附在他的目录后面,与类书和他所着迷的作伪古书作为一个单独的目录放在一起),使胡有别于当时比较保守的藏书家(任继愈,第2册,第1091—1092页)。
- 230 [101] 1588年,遵照父亲让他参加会试的命令,胡向北走到杭州,他在那里病倒了,不得不回家(吴晗,“胡应麟,”第406页)。
- [102] 谢肇淛,卷一三,第265页,讲述了胡如何用计谋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从当地一个大藏书家无知的后代那里买到一大批藏书,这是又一个迹象,表明这个16世纪的书业大师很有可能经营着某种规模的珍善本书。
- [103] 任继愈,第2册,第1088—1089页。
- [104] 胡应麟,卷四,第65页以下。由于在胡自己的藏书中福建出版物有着人所共知的重要性,他对福建印刷生产水平的低估就显得十分古怪。
- [105] 傅璇琮,第1册,第523页;又见上文注释87。
- [106] 陆深,第7页。根据陆深的说法,只有苏州的书业工匠稍稍达到过去书籍生产的标准(同前)。到17世纪初,邻近的湖州府取代杭州成为高质量印刷品的生产中心,但还不是发行中心(陈学文,第303—304页)。
- [107] 冀淑英,“谈谈明刻本及刻工——附明代中期苏州地区刻工表”,《文献》第7卷(1981年第1期),第211—231页。但是,叶瑞宝,“苏州书坊”,第85—94页,只列出了27个(加上5个直到1600年才有出版记录的书坊)。
- [108]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51页。
- [109] 胡的估计已受到 Lucille Chia 的有力辩驳,她认为南京和建阳之间在所有书籍生产和发行层次上存在着大量交流(Lucille Chia,“Of Three Mountains Stree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Ming Nanjing,” pp. 107-51, in Brokaw and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 [110] 这一时期它们顺着长江流域上溯多远并不清楚。18世纪末洪亮吉在贵州省任职时,说到书籍匮乏并下令到江浙购买许多著名著作,包括十四经、二十一史,《文选》和《资治通鉴》(洪亮吉,《北江诗话》[《丛书集成》

- 版],5,第61页)。
- [111] 周亮工,《书影》(上海:上海古籍,1981),卷一,第8页。
- [112]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43页。
- [113] 沿着这些思路不断深化认识,正如贾晋珠在三山街所发现的,将最终使对书业实践进行可靠的总结成为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前面一章所讨论的书的数量和可获得性,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一个开放的市场只对已经认识到的需求作出反应,而不是根据出版者之间达成的谁能在何时何地刊印何种书籍的私下协议。这个假设可能是错误的。清代位于福建西南的四堡的这种协议(得自与 Cynthia J. Brokaw 的个人交流)显示,一种类似的实践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存在于某个特定区域的商业出版者中间。显然,对书业的这一关键问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 [114] 黄潜,卷一七,3b;郎瑛,卷四〇,第584页。
- [115] 根据张秀民的说法,明代多数状元只享有虚名,因为他们之中只有两人——杨慎和焦竑,被证明是有学问的。明中期的大思想家王阳明,只有进士头衔,而他父亲是状元,但学问和见识上却赶不上他儿子(张秀民,“明代的刻书”,见张树栋,第156页)。
- [116]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52—253页。同样,进士陈仁锡出版了10到20部古书和当时非常流行的非正统著作(如李贽的著作)(同前,第254页)。
- [117] 同前,第255—261页。
- [118]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2),第9册见《郑振铎全集》(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第354页。
- [119] 艾南英,《天佣子集》(1699年版;影印,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特别是卷四,63a-64a,附有一个生平年谱。
- [120] 文徵明,《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1987),第584—585页。
- [121]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61, Table 3.3.
- [122] 《苏州状元》(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全书各处。
- [123] 沢田雅弘,“晚明文人の苦悶——作文依頼の対応にみる”,《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第26卷(1987年3月),第41—55页。
- [124] McDermott, “The Art of Making a Living”, pp. 63-81; 范凤书,第242—251页,讨论了晚明的10个藏书家兼出版家。

- [125] 这种一般情况的例外,见 Dorothy Ko, *Teachers of the Inner Chamber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26] 胡应麟,卷四,第 64 页。
- [127] 叶昌炽,卷三,第 274 页。
- 232 [128]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晚至浪漫主义时期,一个像沃兹沃斯(Wordsworth) 这样受到高度评价的诗人(对于流行得多的拜伦来说,情况有所不同),发现靠写作谋生很难。在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从写作中赚得的收入一周只有 5 英镑,“他轻易买不起自己的书”(St Clair, p. 202)。
- [129] 佚名,《道山清话》,第 6 页。
- [130] 王河,第 79—80 页。
- [131] Wing-tsit Chan, pp. 77-81;高令印,《朱熹事迹考》(上海:人民,1987),第 30—31 页;朱熹,《朱子大全》(《四部备要》本),别集,卷五,4a。
- [132] 同前,卷一八,17a-32a。17 世纪一名士人建立了自己的书店(他的后代继续经营),见 Jonathan D. Spence, *Treason by the Book*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1), p. 55。
- [133]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 154,350 页(注释 51)。
- [134] 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第 164—192,194—206 页。这种态度与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多么不同:“我曾几乎同时从事两种职业,书商和作者。我曾从事写作,也曾几度自己出版著作。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没有什么比学者沉静的生活与商人躁动的生活更不协调。由于我们在无休止的琐事面前无能,一百个想要销售他们自己著作的作者当中,有 99 个会感到痛苦和厌烦。”(Roger Chartier, “Property and Privilege i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Daedalus* 131. 2 [Spring 2002], pp. 60-66, esp. 64)
- [135] 丁申,中,第 34—35 页。
- [136] 范凤书,第 158 页;叶瑞宝,第 137 页。关于宋代士人出版者的其他资料,见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第 31—8,157—160,163—192,192—206 页;王河,第 94—104 页。同前,第 95 页,认为以家族为基础的出版者一般专注于出版士人文集和正史,而忽略实践或技术方面的书籍。但是这种明显的偏向可能只是简单地反映了他们出版的不同类型书籍的偶然幸存比率。
- [137] 大内白月,第 78 页,提到清代学者对毛的批评,说他的文本校对是草率的,以充斥错误的宋元版本为基础。
- [138] 缪咏禾,第 124—130 页。但是,请看 16 世纪初无锡的雕版印刷生产过程

中,3个刷印匠、24个刻工、3个装订匠和数量不详的抄写匠之间的比例。(冀淑英,“谈谈版刻中的刻工问题”,《文物》1959年第3期,第4—10页,特别是第5页)。

[139] 任继愈,第2册,第1127—1130页;缪咏禾,第111—132页;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251页。 233

[140] 大木康,“山人陈继儒とその出版活动”,第1233—1252页,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东京:汲古書院,1990),第2册。

[141] 另一个老板编辑家汤宾尹,显示这种出版物如何在政治和实用方面得到繁荣。他来自江西,1596年殿试中榜眼,在北京政治圈中迅速发迹。由于主要因科举题目和文字技巧方面的知识起家,他经常考试各种层次的学生,尤其是担任会试考官。很快,北京各部衙门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都把他看作自己的恩主和导师,汤的影响力大大扩展,不仅为他赢得了17世纪初激烈的宫廷政治斗争的胜利,同时也为他招致了仇敌。他被认为是应为在会试中录取一个不合格的门生,以及试图强迫一个学生的妻子作他的小妾承担罪责,因而被迫离开北京的政治前沿。他最初退隐至江南,后又至皖南,着手培植那些在科举考试中奉他为导师的人。依靠政治、佛教和出版圈子里的朋友,从1614至1629年至少有39部书出自他的名下。所有这些书的编纂工作,又一次转包给了他的广众门徒。其中有些是科举失意者,乐于和他的名字靠上边,但有些是非常成功的官员,他们仍对录取他们、或教会他们跨越考试障碍的那个人心存感激。似乎汤的恶名和长期退隐并没有怎么减少学生们对他的应试书籍的需求,据说这些书籍比市面上其他作者写的同类书籍多赚了十倍的钱。金文京,“湯賓尹と明末の商業出版”第339—385页,见荒井健《中華文人の生活》。

[142] 蒋镜寰,《吴中藏书先哲考略》(苏州:苏州图书馆,1935),8b。

[143] 李玉安、陈传艺,第142页。另外两个收藏医学处方书籍的苏州藏书家是卢观(1298—1362)和蒋初(1544—?) (叶瑞宝,第137,228—229页)。

[144] 叶昌炽,卷七,第737—739页;例如,杜信孚,卷五,4b。

[145] 叶昌炽,卷七,第737—739页;胡应麟,卷四,第65—66页。这种“借阅图书馆”可能比我们所能见到的稀少史料所揭示的要普遍。

[146] 归富有鉴别力的论断,见其《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1981),卷九,第208—209页;黄虞稷编,《千顷堂书目》(上海:上海古籍,1990), 234

第 611 页。

- [147] 俞宪辑,《盛明百家诗》(1571年序),第79册,童贾集,1a。一代人之后,著名的绍兴藏书家祁承燾注意到这样一种联系的存在,他观察到:“市中卖药翁,晚年未有不谈医者,而书肆老贾,往往多哆口言文字。盖近朱近墨,强作解事,自是恒情。”(祁承燾,《藏书训略》,第16页)
- [148] 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八,6a。
- [149] 蒋镜寰,22a。又见罗继祖,《枫窗胜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146—148页。钱的后代从事了同样的工作;尽管也颇有见识,但被认为能力不及其父(同前,第148页)。
- [150] Langdon, p. 50.
- [151] 孙殿起,第100—102页。琉璃厂的江西商人从18世纪中叶至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的20世纪早期仍很活跃;前揭书第16、48页提到,18、19世纪的琉璃厂有一个来自江西(可能主要是金溪县)的书商集团。
- [152] 在市原亨吉,“徐焞年谱稿略”,第635—650页中有关于他的生平的一份有用、可能不全的年表,收入《入矢教授·小川教授退休記念中国文学語学論集》(京都:筑摩書房,1974)。
- [153] 谢肇淛,卷一三,第267页。
- [154] 即1592、1595、1601年(叶昌炽,卷三,第294页;张慧剑,第352页)。但他还据说1598在苏州(叶昌炽,卷三,第295页),1606在南京(张慧剑,第339页),1609和1638在苏州淘书(叶昌炽,卷三,第312页;and张慧剑,第410页)。
- [155] 徐焞,《红雨楼》,卷一,6a,12a(他在那儿的一个旧铺子里买了一部200年前的手抄本),48b。
- [156] 同前,卷一,2b,3a,3a-b,8a,12a,12b,18b-19a,27b,36b,41b;叶昌炽,卷四,第399页。
- [157] 徐焞,《红雨楼》,卷一,26b-27a,27b-28a and 44a。
- [158] 傅璇琮、谢灼华,第1册,第365页。
- [159] 市原亨吉,第642页。
- [160] 这种倾向并不妨碍他进行编辑工作,比如他编过明初访问过福建的无锡士大夫浦源的文集,但不清楚这项工作是否有报酬(张慧剑,第552页)。
- [161] 傅璇琮、谢灼华,第1册,第634页。
- 235 [162] 张慧剑,第399页。

第 4 章

- [1]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111.3 (1982), pp. 65-83; and Thomas R. Adams and Nicolas Barker, "A New Model for the Study of the Book", pp. 5-43, in Nicolas Barker, ed., *A Potencie of Life: Books in Society*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93).
- [2] Paul U. Unschuld, p. 55; 顾鼎臣,《昆山顾公医眼论并方》(1540年跋; 内阁文库藏朝鲜印本), 1b; John Kieschnick, *The Impact of Buddhism on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84-185; and Cynthia J. Brokaw,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216-217, 220-221, and 224. 徐焞,《红雨楼》,卷一,10a-b,与此相关的是晚明一个福州出版者的例子,他故意把一部重刊宋代方志的书版放在一个禅寺里,以免它们被一家私塾藏匿起来。他不仅叫寺主保护它们,还要印出一部,给那些感兴趣的人看。这种赠予,正如徐焞所认识到的,让人联想到晚唐诗人白居易把他的全集藏在三座寺庙里(相映成趣的是他只把它给了两个亲戚),条件是让他们不得让这些书离开寺庙,不能借给寺外的人(同前; 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第102—103页)。
- [3] Winkelman, pp. 9-10; and Thomas Lee,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s in Sung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11-112.
- [4] 道山先生,第6页。又见许棐,第4页,有一篇为一个书商的书目写的序言,这个书目里大概列了书商所要售卖的书。我怀疑许多书目是由书的主人编纂的,至少部分目的是告诉子孙们究竟继承了多少书;然后它们可能被用来将藏书卖掉(例如,叶昌炽,卷三,第281页,为晚明福建人陈第所作)。然后所有人就会认为这份书单是藏书家遗嘱的一部分。
- [5] 请注意我这里的讨论忽略了晚明出版业繁荣中的两种主要出版物——娱乐文学和科举考试用书,以便更好地关注学术性的品种。因此,我所说的做法可能并不适用于这类文学出版物。
- [6] 例如, Marc Fumaroli,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Diogenes* 143 (Fall 1988),

pp. 129-152.

- 236 [7] 参见 Michael Nylan, "Calligraphy, the Sacred Text and Test of Culture", 中对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这种认识逐渐成长的精辟论断, pp. 16-77, in Cary Y. Liu, Dora C. Y. Ching, and Judith G. Smith, eds., *Character and Context in Chinese Calligraphy* (Princeton, NJ: The Museum of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9).
- [8] 曹学佺,《石仓文稿》,见《曹大理集》(内阁文库藏明刊本),第10册,17a-18a;叶昌炽,卷三,第271—272页。
- [9] 李希泌、张椒华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47—52页;李玉安、陈传艺,第211—212页;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 ien-lung Er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pp. 59-60; and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p. 154.
- [10] 刘墨,“清代藏书家三传”,《藏书家》第3辑(2001年),第70—71页。周通过从书商那里购买一些旧家藏书,收藏了50000卷书(同前,第70页)。他还得到了一个朋友的全部藏书。但他死前开始卖掉一些书,随后在他的后嗣手中消散尽净。
- [11] 袁逸,“试论中国古代民间借书活动”,见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藏书楼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360—385页,声称很容易列出一份不愿借书的人的“长长的‘黑名单’”(第363页)。
- [12] 关于宋代的审查制度,见仁井田陞,“慶元条法事類と宋代の出版法”和“宋會要と宋代の出版法,”见他的《中国法制史研究》,第4卷,法と慣習,法と道德,第445—465,466—491页。这些法律在宋代并未被整齐划一地执行,而且到明代不复存在。但是,明初对江南官吏的清洗和对大地主家族的惩罚却不能轻易忘掉;可以引以为据的是,1540年一个苏州作者由于惧怕他的文章冒犯了一些地方官员,烧掉了自己的手稿(张慧剑,第209页)。
- 237 [13] Eva Hanebutt-Benz, Dagmar Glass, and Geoffrey Roper, eds., *Middle Eastern Languages and the Print Revolution, a Cross Cultural Encounter* (Westhofen: WVA-Verlag Skulima, 2002), p. 56. 正如已经被注意到的,中东的印刷史因为不同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而被大大地复杂化了;最初使用活字来印刷阿

拉伯书籍,是1610年北黎巴嫩大马士革的主教记载的,但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广泛使用这项技术来印刷阿拉伯文献则是在两个世纪以后 (ibid., p. 177)。

- [14] Johannes Pedersen, *The Arabic Boo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esp. pp. 114-21; and Bloom, pp. 116-122, 为赋予这些大型藏书的很高的藏书量进行了辩护。我对于中国藏书数量的经验,使我十分怀疑这些数字,虽然这些阿拉伯图书馆极有可能比同时期欧洲的图书馆要大得多。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Bloom 写道 8 世纪后半叶在伊拉克第一所公共藏书的建立,以及 9 世纪在那里及摩苏尔、巴士拉、霍尔木兹和拉维 (Ravy) 向所有国家的所有学者开放的图书馆的形成。其他大型图书馆在开罗以及 10 世纪末在科尔多瓦 (Córdoba) 建立。
- [15] Guglielmo Cavallo, "Between Volumes and Codex: Reading in the Roman World," p. 70, in Guglielmo Cavallo and Roger Chartier, eds.,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9).
- [16] Robert Bonfill, "Reading in the Jewish Communities of Western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pp. 162-6, in Cavallo and Chartier. 同样,一部 12 世纪的犹太文献《虔者书》(*Book of the Pious*) 告诫:"如果 A 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不愿出借书籍而另一个欣然出借,父亲应该毫不迟疑地把所有藏书留给第二个儿子,即便他不是长子。" (James Westfall Thompson, *The Medieval Library*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1957; reprt. of the 1939 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345)。
- [17] Peter L. Lucas, "Borrowing and Reference: Access to Libraries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p. 246, in Elisabeth Leedham-Green and Teresa Webber,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braries in Britain and Ireland, v. 1, to 16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8] Montague Rhodes James, *The Ancient Libraries of Canterbury and Dov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3), p. xlv, 考察了英国 13、14 世纪的情况; Savage, pp. 115-116, 谈到 15 世纪后半叶英格兰伍斯特大教堂 (Worcester Cathedral) 的一个图书馆,除周末外它向识字的俗众,或"公众"每天开放四小时。
- [19] Thompson, pp. 627-628. 甚至还向其他国家的修道院提供了一些馆际互借。
- [20] Ibid., p. 637; and, Jacqueline Hamesse, "The Scholastic Model of Reading",

pp. 103-119, in Cavallo and Chartier.

- 238 [21] 14 世纪巴黎的穷学生可以从巴黎圣母院 (Cathedral of Notre Dame) 借出与课程有关的书籍, 如果交纳押金的话, 还可从索邦学院 (the Sorbonne) 借书 (Paul Saenger, "Reading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p. 133, in Cavallo and Chartier)。但是, Savage, pp. 168-169, 对中世纪牛津的学院的保护性措施很感兴趣: 对图书馆和书柜重重锁扃, 对钥匙分开保管, 以及包括剥夺奖学金在内对违反极其严格的书籍阅览和流通规定的各种惩罚措施。
- [22] Lucas, "Borrowing and Reference," pp. 242-262, 是关于这一问题极好的入门读物。
- [23] Berthold L. Ullman and Philip A. Stadter, *The Public Library of Renaissance Florence, Niccolò Niccoli, Cosimo de' Medici and the Library of San Marco* (Padova: Editrice Antenore, 1972)。
- [24] Claude Jolly, et al., *Histoire des bibliothèques françaises, v. 2, Les bibliothèques sous l'Ancien Régime, 1530-1789* (Paris: Promodis, 1988), pp. 391-411 (其作者 Louis Desgraves 注意到 1429 年前后在阿尔萨斯的色列斯塔 (Sélestat) 一个教区图书馆的建立, 随后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 法国其他地方的藏书向专业人士或感兴趣的人开放); Thompson, pp. 551-552, 555-556, 559, and 562-567 (on the Vatican Library); and, Anthony Grafton, *Rome Reborn: The Vatican Library and Renaissance Culture* (Washington, D. C.: Library of Congress, 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8。
- [25] Michel de Montaigne, *Diary of Montaigne's Journey to Italy*, trans., E. J. Trechmann (London: L. and Virginia Woolf, 1929), p. 144。
- [26] Ibid, pp. 39, 42. McKitterick, p. 17, notes. 然而, 多数意大利藏书家不愿意与别人分享他们的收藏, 他们对其藏书私密性的顾虑不下于对其安全性的顾虑。
- [27] Peter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 178; Jonathan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1; and, Jolly, v. 2, p. xii。
- [28] Hilde de Ridder-Symoens, "Management and Resources", pp. 155-209 (especially 195, 201), in Hilde de Ridder-Symoens, ed.,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v. 2, Univers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500-1800)* (Cam-

-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9] Reinhard Wittmann, "Was There a Reading Revolution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 306, in Cavallo and Chartier.
- [30] Ian Philip, *The Bodleian Librar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 p. 64. 1645年大学的领导者们可能对被围攻的查理一世有着政治上的同情,但他们并不阻止波德里安图书馆(Bodleian)的主持者阻挠国王借阅该馆所藏西奥多·阿格里帕·多比涅(Théodore Agrippa d'Aubigné)的《世界史》(*Histoire universelle*);这个馆长还拒绝了由克伦威尔转达的来自葡萄牙大使的一个类似请求。
- [31] Philip, p. 36. 作为一项规定,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大学本科生才能进入波德里安图书馆的阅览室。即便如此,1613年规定这些享有特权的“本科生和所有低等级的研究生”,如有大学里地位较高的人索取他们正在阅读的书,他们必须交出,而且在书柜和长椅旁相遇时要让这些高级成员优先通过。 239
- [32] Elisabeth Leedham-Gree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Book Sellers", pp. 316-353, in Lotte Hellinga and J. B. Trapp,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v. 3, 1400-154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19-327; and, *The Eagle* (St John's College, Cambridge), XXIV, no. 10 (March 1903), pp. 11-17. 剑桥大学图书馆内的情形也同样严格。其馆长在1581—1583年间要将所有的历史和数学书籍锁上,要向大学校长报告所有书籍上需要维修的链条、搭扣和凸饰(bosses),任何时候都要将读者总数限制在10个以内,其中包括文学硕士、法律或物理学学士以及拥有更高学位的人士:“如果有其他人要使用同一部书,任何人使用一部书一次都不能超过一小时。”没有校方的特别许可,书不得出借。后又规定只有在“支付了相当于出借或离馆的书籍或器具三倍价值的抵押金(foreiture)的条件下……”方可借阅(J. C. T. Oates, "The Libraries of Cambridge, 1570-1700", pp. 213-235 [esp. 227-228], in Francis Wormald and C. E. Wright, eds., *The English Library Before 1700*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8]) 1659年图书馆的新规定只允许普通书被借阅,但必须“在谨慎的前提下,相当于其价值两倍的押金要存入一个用几把钥匙才能打开的特殊柜子内,手抄本和其他特别重要的书必须经摄政院(Regent House)同意,并具备充分的安全和慎重措施后方可出借。任何学位低

于文学硕士、法学或物理学学士者不得借阅……”校外读者只有在有资格的校内读者愿意“为他们担保,并不毁坏书籍”的情况下才被允许使用图书馆。1675年据说校外读者必须得到大学校长的允许才能入馆;在其他一些方面,规定则不是那么严格。书的获取宽松了,但允许入馆者的范围被进一步限制为住在大学里的硕士学位拥有者和那些得到校长特别准许的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规定太容易被忽略了(J. C. T. O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a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Copyright Act of Queen An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82, 122, 295-297, 300, 457, and 458-459).

- [33] Simone Balayé,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s origines à 1800* (Genève: Librairie Droz, 1988), pp. 70, 229; and, Jolly, v. 2, passim, esp. p. 143 on the Mazarine.
- [34] Ibid., v. 2, pp. 213, 224 and 226; and, Peter Burke, “Erasmus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European Review* 7.1 (1999), p. 10.
- 240 [35]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p. 178; and, Dominique Varry, “Libraries,” pp. 401-402, in Alan C. Kors, ed., *Encyclopedia of the Enlighte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36] Ibid., p. 402; Jolly, v. 2, pp. 391-411.
- [37] David M. Wilson, *The British Museum: A History*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2), pp. 35-40.
- [38] St Clair, p. 237.
- [39] Lisa Jardine, *Worldly Goods: A New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 (London: Macmillan, 1996), p. 154: “15和16世纪在越来越多地为人所知的‘文人共和国’(精神追求者们的地球村)中,学者们之间进行了大量通信,谈论如何追踪和获得最新的出版物。” See also David S. Lux and Harold J. Cook, “Closed Circles or Open Networks? Commenting at a Distance During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History of Science* 36.2 (1998), pp. 172-211.
- [40] G. D. Hobson, “‘Et Amicorum’,” *The Library* 5th series, 4.2 (September 1949), pp. 87-99.
- [41] Robert Cotton 爵士把他的图书向所有提出合理要求的人开放。从1631年至1707年,他的两个后续继承人施加更多的限制,但他们只是要求借阅者在一张便条上签字,以确认他们曾从这里借过书(Colin G. C. Tite, *The*

- Manuscript Library of Sir Robert Cotton*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4], pp. 20, 25-26, and 110-111)。Robert 爵士似乎从牛津学院和其他藏书家那里偷过手抄本 (*ibid.*, pp. 106-107), 说明他能够进入这些藏书而不受严格的管束, 但却不能从正规渠道借书。又见 St Clair, p. 237。
- [42] Burke,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pp. 35, and 39-48. 但是, Roy Porter,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Universities”, pp. 531-562, in Hilde de Ridder-Symoens, v. 2, 对 17、18 世纪西方大学中知识分子的生活作了更有帮助的评价。
- [43] L. W. B. Brockliss, *Calvet’s Web, Enlightenment and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12-323; and, Dena Goodman, *The Republic of Letters: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French Enlightenmen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4] Henri-Jean Martin, *Print, Power, and People in 17th Century France*, trans. David Gerard (London: Scarecrow Press, 1993), p. 608; and, Louis Desgraves, “Vers la bibliothèque publique,” pp. 391-413, in Jolly, v. 2.
- [45] Paul Lodge, ed., *Leibnitz and His Correspond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esp. p. 1. 笛卡儿是又一个例子, 他留下了 500 多封信, 据认为这只是他实际通信的一小部分。即使像托马斯·菲利普斯 (Thomas Phillipps) 那样的狂热收藏者, 也经常与古文物收藏同行和学者们分享他的收藏 (A. N. L. Munby, *Portrait of an Obsession: The Life of Sir Thomas Phillipps, the World’s Greatest Book Collector*, adapted by Nicolas Barker [London: Constable, 1967], pp. 249-250)。
- [46] Varry, p. 402.
- [47] Wittmann, pp. 306-312; and Jonathan Rose,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8] William St Clair’s *magnum opus*, *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 作了非常有力的论述。
- [49] 傅璇琮、谢灼华, 第 1 册, 第 526—527 页。
- [50] 同前, 第 1 册, 第 337—338 页。不消说几乎没有妇女获得接近任何政府藏书的特权。
- [51] Stephen H. West, “Text and Ideology: Ming Editors and Northern Drama,” pp.

- 343-344, in Smith and von Glahn, eds., Transition.
- [52] 傅璇琮、谢灼华, 第1册, 第532—533, 538页。
- [53] 同前, 第540—541页; 沈德符, 第2册, 卷二五, 第637页。第二部复本的残余部分, 在清代被保管在翰林院中。
- [54] 金、辽和元代类似宫廷藏书管理方面的资料似乎很少留存下来。傅与谢合编的书中作了最好的简短论述, 第1册, 第417—419, 449—452, 464—470页。
- [55] 同前, 第1册, 第337—338页。范景中, “藏书铭印集”, 《藏书家》第3辑(2001年), 第147—148页, 提到崇文馆要求政府藏书的借阅者“必须爱护”。如还书时有任何损坏, 负责保管书籍的人不能接收。
- [56] 陈师道, 《后山居士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 1984), 第2册, 卷一一, 9b-10a, 说到直到北宋末年在国子监书价一直上涨。明初还有个类似的例子, 杨士奇通过一个亲戚用国子监的书版为自己印了一部书。(杨士奇, 《东里续集》, 卷一七, 17a)。这些情况好于五代, 当时国子监所印的儒家经典只卖给或赠给高级官员, 其中一名官员通过转卖这些书赚了很多钱(井上进, 《中国出版文化史》, 第109页)。
- [57] Lee, pp. 111-2; 范景中, 第143—144页; 大内白月, 第40页。
- [58] 同前。
- [59] 同前, 第40—41, 56—57页(讨论了元代学校靠出租学田获得的经费, 在政府许可下被用来刊印书籍; 井上进, “藏書と讀書”, 第427—428页; 陆深, 第8页。明代的学校没有此类出版经费。
- 242 [60] 范凤书, 第95—96页; 傅璇琮、谢灼华, 第1册, 第812页。
- [61] 李焘, 卷193, 第4666页。
- [62] 同前, 卷194, 第4699页。
- [63] 井上进, 《中国出版文化史》, 第164—165页; 江少虞, 第1册, 第397页。
- [64] 傅璇琮、谢灼华, 第1册, 第306—309页。
- [65] 江少虞, 第1册, 第401页。
- [66] 陈騄, 《南宋馆阁录·续录》(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第21, 22, 175, 191—2页; 程俱, 《麟台故事校证》(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第270, 274, 276—277页; 傅璇琮、谢灼华, 第1册, 第338—340页。
- [67] 陈騄, 第21页。
- [68] 同前, 第22页; 《续录》, 第175页。

- [69] 同前。
- [70] 龚鼎臣,《东原录》(《丛书集成》本),第17页。
- [71] 陈騏,《续录》,第175页。
- [72] 同前,《续录》,第191—192页。
- [73] 李玉安、陈传艺,第117页。
- [74] 顾起元,第193页。
- [75] 余继登,《典故纪闻》(北京:中华书局,1981),卷16,第284页;傅璇琮、谢灼华,第1册,第537页。
- [76] 沈德符,第1册,卷一,第28页;松見弘道,《図書館と漢籍》(东京:明星大学,1989),第212页。丘濬1493年声称原先的内阁藏书中幸存下来的连10%都不到。随后1515年的检查发现大学士与东阁藏书之间的巨大差距。在那里工作的大臣们带走了很多书(同前,第211—212页)。
- [77] 王美英,“试论明代私人藏书”,《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117页。另一种解释把问题归咎于1380年将藏书置于翰林院管理之下的决定,翰林院官员的官阶比藏书阁精简的管理员高得多,他们滥用职权,肆意掠夺藏书而不受惩罚。(傅璇琮、谢灼华,第1册,第526页)
- [78] 孙能传、张萱,《内阁藏书目录》(《适园丛书》本),1a。但是请注意,这宗皇室藏书正统年间(1436—1449)所编的目录中,在1604年时还存书稍多——有百分之二三十(龙文彬,《明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7,第2版],第1册,第422页)。
- [79] 郑伟章、李万健,第63页;叶昌炽,卷三,第269页。
- [80] 郑伟章、李万健,第63页。
- [81] 王肯堂,《郁冈斋笔麈》(1602年序),卷二,43a-44a。
- [82] 例如,谢肇淛,第2册,卷一三,第379页;于慎行,卷七,第82页;沈德符,第1册,第28页。在此值得回想一下一个现代历史学家对16世纪英格兰书籍命运的精辟论断:“在[修道院]解散后的许多年里,人们认为书籍在私人手里比在公共机构的图书馆里安全,所以人们不是把书遗赠给大学或学院图书馆,而是遗赠给他们的朋友,或分给无钱的学者。”(O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pp. 85-6)这些图书馆中图书的数量很少,显示私人藏书家对这些机构不信任的程度不亚于这些机构中书籍的匮乏。
- [83] 谢肇淛,第2册,卷一三,第379页;沈德符,第1册,卷一,第28页。

- [84] 刘若愚,《酌中志》。正如向功宴,“明代经厂本浅析”,《故宫博物院月刊》第28卷(1985年第2期),第41—45页,特别是第42页所提到的。值得注意的是,清初规定远未严格执行:1685年,翰林院学者朱彝尊因被控带抄书匠进入翰林院为他抄写官府文书而被降职。(Arthur Hummel, 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p. 183)。然而到19世纪晚期,长期的疏漏、每年晒书的时候官员们的偷窃和将书版用作烧柴,极大地减少了皇宫中武英殿所藏书籍和书版的数量(罗继祖,第141页)。
- [85] 叶昌炽,卷二,第100页。
- [86] 同前,卷二,第98—99页。
- [87] Yu Li, “Social Change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and the Decline of Sichuan’s Classical Learning in the Early Qing,” *Late Imperial China* 19. 1 (June 1998), pp. 26-55, esp. 34.
- [88]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1996),第2册,卷二六,第994—996页。
- [89] 谢肇淛,第1册,卷一三,第265页。
- [90] Timothy Brook, “Edifying Knowledge: The Building of School Libraries in Ming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17. 1 (June 1996), pp. 93-119, esp. 94.
- [91] Wei Su, 10. 16a-b.
- [92] Timothy Brook,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pp. 667-670, in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 Mote, ed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 8,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 part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93] 例如,《松江府志》(1817),卷三〇,10b。
- [94] Brook, “Edifying Knowledge,” pp. 109-110.
- [95]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八,第222—224页。
- [96] 范凤书,第60,137,166,269页。
- 244 [97] 这里《永乐大典》是个大的例外,但它禁止所有官员使用,在明代对朝廷内外的学术影响极小。
- [98] 王明清,《后录》,第309—310页。这里王的观点成为后来的一些中国作者宣称儒家经典的印刷代表了印刷术的发明的错误观点的基础之一。任继愈,第2册,第1369—1370页。

- [99]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53页。
- [100]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1985),第1册,第389页。
- [101] 李玉安、陈传艺,第135—136,154页。
- [102] 叶昌炽,卷三,第254页。
- [103] 同前,卷二,第117页。
- [104] 谢肇淛,第2册,卷一三,第381页;顾志兴,《浙江藏书家》,第119页。
- [105] 叶昌炽,卷一,第48—50页。
- [106] 蔡佩玲,《范氏天一阁研究》(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1),是迄今为止对这一著名藏书的历史的最好研究成果。
- [107] 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南京: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2),第24—27页;柳和城、宋路霞、郑宁,《藏书世家》(上海:上海人民,2002),第65页。
- [108] 陈登原,第35—36页。
- [109] 骆兆平,《天一阁丛谈》(北京:中华书局,1993),第34—35页。
- [110] 李致忠等,第357页。
- [111] 骆兆平,第68—69页。
- [112] 柳和城,第71—72页;黄虞稷,类书类,第400页;蔡佩玲,第222—223页。
- [113] 陈登原,第37页。至少还有两个宁波的私人藏书家也这样做(任继愈,第1册,第128页)。
- [114]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第158—159页。
- [115] 骆兆平,第41—46页。
- [116] 陈登原,第33—34页。
- [117] 王楙,《野客丛书》(上海:上海古籍,1991),卷一,第160页。看起来,这个谚语出自3世纪以前。
- [118] 周焯,《清波杂志》(《丛书集成》本),卷四,第29页。
- [119] 吴晓明,“明代的上海藏书家”,《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第9卷(1984年第1期),第104页;大木康,第10页;吴晗,《江浙》,第159页。
- [120] 同前,第217页。
- [121] 范景中,第148页。
- [122]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卷三,第85页。这种将售书的子孙比作畜生的做法毫不新奇(例如,元代赵孟頫声称任何

- 售卖其书的子孙都将鸟兽不如〔范景中,第146页〕)。
- [123] 王肯堂,卷三,5a。
- [124] 袁逸,第364页。
- [125] 陈弘绪,《石庄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卷六,4b-5a;任继愈,第1册,第129页。
- [126] 叶昌炽,卷三,第256页。钱谦益在赵绮美死时得到了他的所有藏书(李玉安、陈传艺,第148页)。
- [127] 吴晗,《江浙》,第220页;叶瑞宝,第248页。
- [128] 郑伟章、李万健,第59,78页;李希泌、张椒华,第33页;任继愈,第1册,第129—130页;张慧剑,第444,452页。
- [129] 叶昌炽,卷四,第399页;郑伟章、李万健,第77—78页。据记载钱曾说:“天能烧我屋内书,不能烧我腹内书。”(同前,第79页)然而钱的藏书以前在清军攻克常熟县城时曾遭到严重损毁,那里是他藏书的地方。正如叶瑞宝,第248页,所注意到的,钱及后来的学者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更愿意把藏书的损毁归咎于笨拙的仆人,而不是征服王朝的军队。
- [130] 归庄,第2册,第494页。又见郑伟章、李万健,第64页,说到谢肇淛表达了类似感受。
- [131] 例如,袁逸,第368—377页。
- [132] 赵令時,《侯鯖录》(《丛书集成》本),卷七,第63页。
- [133] 杨士奇,卷一七,11b。
- [134] 王肯堂,《郁冈斋笔麈》,卷三,5a。著名苏州文人何大成(1574—1633)借了一部《玉台集》二十年不还(叶瑞宝,第219页)。
- [135] 许相卿,《许云邨贻谋》(《丛书集成》本),第9页。
- [136] 顾志兴,《浙江藏书家》,第168—169页。
- [137] Burnett Hillman Streeter, *The Chained Library* (London: Macmillan, 1931), p. 3.
- [138] Holbrook Jackson, *The Anatomy of Bibliomania* (London: The Soncino Press, 1932), pp. 446-447, 460, 467, and 469. 另一部中世纪波德里安图书馆的书上写有警告:“君若窃此书,下场钩上吊。君若起此念,心冷如冰窖。伸手必被捉,祈祷也无效。”(He that steals this book / Shall be hanged on a hooke. / He that this book stelle wolde, / Sone be his herte colde. / That it may so be, / Seith Amen for charite) (ibid., p. 469). Ian Philip, pp. 5 and

93. William Dunn Macray, *Annals of the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0, 2nd ed.), pp. 6-13, 提到 1439 至 1444 年间捐赠的约 600 部手抄本, 但许多承诺捐赠的手抄本却从未兑现。Streeter, pp. 234-239, 提到直到 1781 年, 牛津的女王学院 (Queen's College) 图书馆的 5717 部书上仍保留有链子。Macray, p. 121, n. 1, 把波德里安图书馆撤除书上链子的时间定在 1761 年, 但 Arthur Waley,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3), p. 19, 提到在 1762 年 1 月 17 日, 一部罕见的波斯文献《辟邪经》(Vendidad) 上还装有链子。在剑桥学院图书馆, 从 1627 年开始给书撤去锁链; 剑桥国王学院 (King's College) 图书馆, 直到 18 世纪末才将锁链从书上撤除 (J. C. T. Oates, "The Libraries of Cambridge," p. 217, in Francis Wormald and C. E. Wright)。
- [139] Dominique Varry, et al., *Histoire des bibliothèques françaises, v. 3, Les bibliothèques de la Revolution et du XIXe siècle* (Paris: Promodis, 1991), pp. 267-270, 对这一丑闻有简明的报道。
- [140] 叶昌炽, 卷三, 第 272—273 页。
- [141]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pp. 260-270; and Jonathan D. Spence,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5)。
- [142] Joanna F. Handlin, *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 The Reorientation of Lü Kun and Other Scholar Official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esp. pp. 74-77 and 84-88; and Wm. Theodore de Bary, "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 pp. 145-248, in Wm. Theodore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43] 归庄, 第 2 册, 第 494 页。又见郑伟章、李万健, 第 64 页, 说到谢肇淛表达了类似感受; 高濂《遵生八笺》(成都: 巴蜀书社, 1988), 第 467—469 页, 中提到富裕的藏书家们拒绝展示他们的藏书。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局限于江南地区, 明代位于中国西北部西安地区的藏书家也受到以下诟病: "关中非无积书, 往往束置度阁, 以饱蠹鱼。既不假人, 又不触目, 至界之灶下, 以代爇薪。"(吴恺, 《读书十六观补》[《丛书集成》本], 第 2 页)
- [144] Kristopher Schipper, "Vernacular and Classical Ritual in Taois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5 (1985), pp. 21-57; Cooper, pp. 23-24; Isabelle Robinet, *Taoism, Growth of a Relig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6-8; Kieschnick, p. 184; William Eamon, "From the Secrets of Nature to Public Knowledge," pp. 333-365, in David C. Lindberg and Robert S. Westman, eds., *Reappraisals of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45] 顾志兴,《浙江藏书家》,第128—130页;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ang Chaoyi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22-624 and 1,355-356; and Hummel, pp. 565-566.
- [146] 范凤书,第168—187页。另一个估算,见于傅璇琮、谢灼华,第册1,第559—560页,大约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达到80%,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县加起来占了王河所编《中国历代藏书家词典》中所列358个“明代著名藏书家”的275个(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1)。这样范的数字可能只是一个最低的估计。
- [147] 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6年),第31页。
- 247 [148] 这种社团出版物的一个例子是王光美的《白鹿社草》(明刊本,藏内阁文库),由浙江沿海温州的一个士人社团出版。

第5章

- [1] 井上,《書肆·書買·文人》,第316—317页;吴晓明,第102—103页。
- [2] 蒋镜寰,9a-b,说到一个明代藏书家朱良育,给了同在苏州的一个藏书家袁翼50两银子,让朱的一个仆人在半年时间里,利用数十次造访袁的机会为他抄了一本书。山东藏书家李文藻送了一件昂贵的毛皮大衣给一个书商,让书商允许他抄录一部一直试图向他人隐瞒的书(李勇慧,“北方之朴学,岭南之循吏”,《藏书家》第3辑[2001年],第76页)。
- [3] 任继愈,第2册,第766、769页。
- [4] 李玉安、陈传艺,第92页。赵把藏书向当地的学生开放,并专门设立了一批藏书供来宾阅览(同前)。同样,吕祖谦编,《欧公本末》(1212年刻,元印;静嘉堂文库藏),卷一,1a,谈到欧阳修年少时通过向其他村民借书学到了

知识。

- [5] 杨士奇,卷一八,11a。
- [6] 郑伟章、李万健,第58—60页;李玉安、陈传艺,第145页。然而李如一的名声十分好,因为据说他从苏州藏书家钱允治那里借了一部书(显然是抄本),而还给钱一部他自己抄的副本,把原来的本子据为己有(冀淑英,第78页)。
- [7] 焦竑,《焦氏笔乘续集》(上海:上海古籍,1980),卷七,第379页;Joseph McDermott,“The Ascendance of the Imprint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Culture”, pp. 55-104 (esp. 76 and 80) in Brokaw and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注意有些书仍然很贵,大概是因为精美的刻工和纸张。这些成本以及价格地区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6世纪晚期来自松江的一名成功官员,买一部新印的苏轼诗文集要比买一个年轻的家奴花更多的钱。他还买了一部印制的《文选》,估计其价格在5匹马、6头牛或10个年轻家奴的价格以上。许多想成为藏书家甚至学者的识字中国人,没有钱买这样的书(缪咏禾,第398—400页)。
- [8] 晁公武,第1264—1265页。宋代的其他例子,有宋绶获得他的朋友毕士安和他没有子嗣的外公的遗赠(任继愈,第1册,第764—765页;范凤书,第86页)。
- [9] 刘玉才,第43页。 248
- [10] Linda A. Walton, *Academies and Societ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pp. 129, 136-137 and 141.
- [11] 任继愈,第1册,第796页。
- [12] 张金吾编,《金文最》(北京:中华书局,1990),上,卷二八,第385页。
- [13] 范凤书,第405页。
- [14] 喬炳南,“宋代の書院制度について”,《帝塚山大学論集》第14卷(1977年4月),第64—89页。
- [15] 晚明藏书家陈与郊,引用唐代的著名家训,建议其后人一部书保留三个副本:纸墨精良的一部收藏起来,第二部用于阅览,第三部传给子孙(范景中,第145页)。我把那些主人借书收钱、甚至收年费的例子排除在外。(试与第3章对童佩的讨论相比较)。
- [16] 王世贞,卷一七五,19b。
- [17] 李玉安、陈传艺,第141页;叶昌炽,卷三,第257、282页;徐爌,《红雨楼》,

- 卷一,16a-b;张慧剑,第409、413页。
- [18] 叶瑞宝,第235、251页。
- [19] 李希泌、张椒华,第37页。应该注意到,黄宗羲似乎把他的书借给朋友,并让人为他们抄录副本(罗友松、萧林来,“黄宗羲藏书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第30卷[1980年第4期],第85—89页),即便并不是他所有的熟人都愿意向他展示贵重的藏书(叶昌炽,卷三,第301页)。
- [20] 《潭度孝里黄氏宗谱》(1731年序),卷四,8a。
- [21] 晁公武,第1253—1254页;范凤书,第85页。
- [22] 同前,第200页。
- [23] 沢田雅弘,“明代苏州文氏の姻籍—吴中文苑考察への手掛カリ”,大东文化大学纪要(人文科学)第22卷(1984年3月),第55—71页;陈冠至,《明代的苏州藏书》(台北:明史研究小组,2002),第138—145页;Marc F. Wilson and Kwan S. Wong, *Friends of Wen Cheng-ming, a View from the Crawford Collection*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74), pp. 20-21, 对这个圈子的排他性有一些富有洞察力的评论。
- [24] Joseph P. McDermott, “Friendship and Its Friends,” pp. 67-96, in *Family Process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Nanka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2), v. 1.
- [25] 叶瑞宝,第232页。
- 249 [26]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全书各处。
- [27] 任继愈,第1册,第773、781页;范凤书,第96页。
- [28] 李玉安、陈传艺,第125—126页;蒋镜寰,6a。
- [29]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221页;张慧剑,第640页。
- [30] 袁枚,《袁枚全集》(南京:江苏古籍,1993),第2册,第378—379页。
- [31] 大内白月,第147页。
- [32] 李勇慧,第76页。
- [33] 王明清,后录,卷七,第171页。
- [34] 任继愈,第1册,第813页。
- [35] 同前,第2册,第973—974,989—990,1038,1064,1065,1081页;李玉安、陈传艺,第118页;蒋镜寰,7b。
- [36] 同前,5b。
- [37] 叶瑞宝,第171,173,178,214页。

- [38] 李玉安、陈传艺,第156—157页。另一个这样的三人组合似乎包括冯舒、叶树廉和张拱端,他们彼此借书抄录(蒋镜寰,13a)。
- [39] 李希泌、张椒华,第37—38页;李玉安、陈传艺,第149页。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9册,第4213页,给出了其中八个人的名字。
- [40] 任继愈,第1册,第769页。
- [41] 同前,第1册,第814页。
- [42] 祁承燦,第4页。祁承燦还有一方印,显示他希望保持其藏书完整无缺:“子孙永珍”(叶昌炽,卷三,第278页)。
- [43] 寺田隆信,“紹興祁氏「澹生堂」について”,第544页。
- [44] 王士禛,《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册,卷13,第318页。
- [45] 范凤书,第86,88,95页;任继愈,第1册,第772—773,812页,第2册,第1063页。
- [46]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二九一,第9736—9737页,卷二九四,第9817页;范凤书,第86—89页。
- [47] 《宋史》,卷二九一,第9737页。宋的家族藏书允许外借,赢得了声誉,以致据说许多士大夫住到附近,使周围的房子价格上涨。宋的爷爷从他无子的外公杨徽那里继承了这批藏书。由于他和他的儿子(即宋敏求的父亲)也在朝廷的馆阁供职过一段时间,皇帝赏赐给这些机构大臣的书他们都免费得到了两份。(范凤书,第86—89页;宋继郊编,《东京志略》[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第395页。)
- [48] 田建平,第347页。
- [49] 例如,见仁井田陞,“元明時代の村の規約と小作證書など(3)”,第671—693页,见《中国法制史研究》,法と慣習,法と道德。
- [50] 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七五,19b。
- [51] 张慧剑,第409页。李玉安、陈传艺,第142页,把冯梦楨包括进这一协议,但冯死于在协议达成十多年前的1595年。
- [52] 同前,第153页;王美英,第118页。
- [53] 蒋镜寰,13a;叶昌炽,卷四,第370—371页;吴晗,第180页。
- [54] 《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四八四,第13,326—327页;叶昌炽,卷三,第354页;《嘉兴府志》(1872),卷五二,49a-b;谢正光,《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181—300页,对曹与顾炎

武及其他 17 世纪中期学者的关系有进一步的讨论。

- [55] 曹对损失的估计是宋代以来编纂的十余部书目所列全部书籍(按书名计算)的 50% 到 60%，“古人诗文”的 70% 到 80% (叶昌炽,卷三,第 352,354 页)。这些数字似乎包括手抄本和印本。尽管很显然这些都是猜测,但它们很好地反映了曹和他的同时代人深深的失落感,正是这种失落感促使他们打破先辈们的排外做法,以保存那些留存太少的书籍。
- [56] 李希泌、张椒华,第 31—32 页。注意叶昌炽,卷三,第 353 页,声称曹与一位朋友达成了这个协议,彼此找人抄录对方想看的书。
- [57] 同前,卷三,第 354 页。
- [58] 顾志兴,《浙江藏书家》,第 168 页;李玉安、陈传艺,第 179 页(陆澹还和何焯、顾维岳互换书籍抄录)。
- [59] 范凤书,第 186,223—224 页;张慧剑,第 584,627,640 页。我们所知第一个“喜欢读书”的丁氏生活在 15 世纪下半叶(《江浦县志》[1579],卷一二,6b-7a),因此丁氏藏书可能可以追溯至 15 世纪,即在他们最初以医术成名一个世纪以后。
- 251 [60] 黄虞稷,第 380,383,384 页。在这部分中丁毅的传记在所有提到的医儒中是最长的;范凤书,第 186,223—224 页;张慧剑,第 584,627,640 页。
- [61] 李经纬等,《中医人物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第 1—4 页;丁雄飞,《行医八事图》(《檀几丛书》本),1a-b。
- [62] 《江浦县志》(1641),卷八,33b。
- [63] 同前,卷八,30b。
- [64] 丁雄飞,《古人居家居乡法》,1a,3a-b。
- [65] 李希泌、张椒华,第 46—47 页。
- [66] 任继愈,第 2 册,第 1101—1110 页;李玉安、陈传艺,第 147,172 页。
- [67]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 1 册,第 363 页;叶昌炽,卷三,第 264—265 页。
- [68] 李玉安、陈传艺,第 147,172 页。
- [69] 张慧剑,第 627,640 页;范凤书,第 223—224 页;徐[焯],《徐氏笔精》(台北:学生书局,1971),现代学者刘兆祐作的序,第 1 页。
- [70] 郑伟章、李万健,第 84—86 页;叶昌炽,卷 3,第 264 页。
- [71] 张慧剑,第 660 页。
- [72] 李希泌、张椒华,第 45—47 页。
- [73] 谢国桢,第 1—80 页;Frederic Wakeman, *The Great Enterpris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v. 2, p. 941。
- [74] 如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所论述的。
- [75] 关于与之相对照的英格兰从阅读团体演进到公共图书馆,见 St. Clair, pp. 246-ff。
- [76] 徐春甫,《一体堂宅仁医会录》,第 1197 页,见其《古今医统大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现代学者项长生就这一问题作了两篇短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组织——‘宅仁医会’”,《中华医史杂志》第 11 卷第 3 期(1981 年),第 144—146 页,“我国最早的医学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中国科技史料》,第 12 卷第 3 期(1991 年),第 61—69 页。
- [77] 徐春甫,第 1184—1185 页。
- [78] 同前,第 1195—1196 页。他说,这些庸医在北方通常是女性;言下之意,男方的庸医通常是男性。
- [79] 同前,第 1191 页。
- [80] 同前,第 1189,1190 页。
- [81] 同前,第 1192 页。
- [82] Willard J. Peterson, “Fang I-chih: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pp. 370-411, in Wm. Theodore de Bary, ed., *The Unfolding of Neo-Confucia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252
- [83] John D. Young,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The First Encount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7-48. 特别参见徐光启,《徐光启集》(上海:上海古籍,1984),第 2 册,卷一一,第 505—508 页,讨论了对徐来说“公”的重要性,虽然在这里他并未将之与基督教联系起来。更详细的解释,见 Willard Peterson, “Why Did They Become Christians? Yang T’ing-yün, Li Chih-tsao, and Hsü Kuang-ch’i,” pp. 129-152 (esp. 142), in Charles E. Ronan, S. J. and Bonnie B. C. Oh, eds., *East Meets West, The Jesuits in China, 1582-1773* (Chicago, IL: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84] Jacques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51, n. 22. Gernet 接着说,“[耶稣会士的]说教总是与库伊布雷(Coimbra)和罗马的神学院里灌输的一致。无论哥白尼还是伽利略,在中国都不是真正合法的”。
- [85] Young, pp. 85-91.
- [86] 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南京:江苏古籍,1987),第 185—186 页。

- [87] 廖燕,《二十七松堂集》(台北:“中研院”,1995),第9册,第383—384页。
- [88] Cynthia J. Brokaw,“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 pp. 3-54, esp. 30, in Brokaw and Chow, eds,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89] 李国钧编,《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第3册,第456页,引用了苏州府吴江县张海珊(1781—1831)的话。书籍市场上能买到宋代作品无疑反映了当时汉学的统治地位(和可能较高的价格)。
- [90] Alexander Woodside,“The Divorce between the Political Center and Educational Creativ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458-492 (esp. 464), in Benjamin A. Elman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and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p. 203.
- [91] 吴晗,《江浙》,第19页;任继愈,第2册,第1399—1400页;Hummel, pp. 182-5.
- [92] Nancy Lee Swann,“Seven Intimate Library Owner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 (1936), pp. 363-390. Swann, 虽然她强调共同阅读和借书的做法,也提到几个藏书家不愿出借他们的书(第374,381,383页)。
- 253 [93] 仲伟行,吴雍安,曾康编,《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上海:上海古籍,1997),第111—112页。注意到19世纪士人们开放藏书的努力可能受阻于管理不善和偷盗的老问题(李雪梅《中国近代藏书文化》(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第38页)。然而,在江南以外的一些地方,印本数量的充足似乎极大地缓解了这些问题。例如,1872年大约20个家族在偏僻的浙江省瑞安县建立了一个书社:“邑既鲜藏书家,非雅有故者,又不易借。”这些读者每人拿出十五千作为购书基金,所购之书每人均可借阅。后来,该会买了两亩地,和近旁的一座庙一起盖了一所学校,学校里的藏书向全县开放。此事进一步的细节似乎并不清楚,但该会存在了20多年(同前,第33页)。
- [94]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p. 104.
- [95] Guy, pp. 93-95.
- [96]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p. 159.
- [97] As adapted from Guy, p. 105. 又见叶德辉,卷八,第224页。
- [98]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pp. 100-112.
- [99] Alexander Woodside,“State, Scholars, and Orthodoxy: The Ch’ing Academies,

1736-1839,” pp. 158-184, esp. 175, in Kwang-ching Liu, ed., *Orth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100] 任继愈,第1册,第126页。
 [101] 顾颉刚,第186页。
 [102] 江标撰,王大隆补,《黄丕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全书各处。
 [103] 姚伯岳,《黄丕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83—112页,特别是第84—86页。
 [104] 任继愈,第1册,第133—134页。
 [105] 同前,第1册,第130页。

第6章

- [1] Alexander Woodside and Benjamin A. Elman, “Afterward: The Expansion of Education in Ch’ing China,” p. 530, in Elman and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 [2] Hayes, pp. 76 and 92-111; and Wilt Idema, review of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 in *T’oung Pao* LXVI. 4-5 (1980), pp. 314-324, esp. 323. 根据 Hayes 富有经验的论断,这些人做了很多工作,作为有文化的人他们用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为不识字的村民服务,把中华帝国书写下来的传统传播到村民的生活当中。 254
- [3] 《松江府志》(1629),卷七,2b(引用许克昌,一个12世纪中期来自今上海地区的人的话),5b。
- [4] John Henry Gray, *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8), v. 1, p. 167, 注意到中国妇女识字率的南北分野,北方妇女教育几乎完全被忽视,而在南方有许多寄宿机构和私人教师教育妇女。
- [5] 张师载,《课子随笔》(上海:文端楼书局,1918;影印1873年本,此书初版于1745年),卷六,8a。但是,Edward Joshua Dukes, *Everyday in China, Scenes along River and Road in Fuh-kien* (London: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885), p. 164, 声称“在北方省份……读者的比例高于南方”,这一观点大概

今天多数中国社会史学家都不会同意。

- [6] Idema, p. 322.
- [7] 张志公,《张志公文集》,第4册,《传统语文教学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第19—56页;又,关于当代中国,参见 Glen Peterson, *The Power of Words, Literacy and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1949-1965*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7), pp. 50-51.
- [8] Alexander Woodside, "Real and Imagined Continuities in the Chinese Struggle for Literacy," pp. 22-45 (esp. 22 and 31), in Ruth Hayhoe, ed.,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2).
- [9]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p. 23; 中村哲夫,“科举体制の崩壊”,第115—143页,见:野沢豊、田中正俊編集,《講座中国近現代史》第3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 Medhurst, pp. 171 and 178; and *Chinese Repository* 2 (1833), p. 252, and 6. 5 (Sept. 1837), pp. 229-244.
- [10]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p. 140; and Idema, p. 321.
- [11] Philip A. 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4-15.
- 255 [12]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p. 247:“虽然进入官僚机构的竞争理论上向所有人开放,但在语言上竞争的内容甚至从成功的一个阶梯开始,就把90%以上的中国人排斥在外。”F. W. Mote, “China's Past in the Study of China Today — Some Comments on the Recent Work of Richard Solom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2. 1 (1972), pp. 107-120, 把成年男子的这个数字下限定为不低于10%,因为参加19世纪的考试大约是这个比例。W. A. P. Martin, *Hanlin Papers, or Essays on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 Chinese* (London: Trübner and Co., 1880), p. 98, 把成年男子的文言文识字率仅定在5%。
- [13]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p. 2.
- [14] Ibid., pp. 97-98.
- [15] Dukes, pp. 163-164 and 165-166, as in 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pp. 2-3. 20世纪,1938年 Cornelius Osgood 在云南乡村的一份报告,确认了官方估计的识字率与 Martin 和 Dukes 所说的真正的阅读识字率之间的差异。 *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63), pp.

95-6. 在 126 个被认为识字的村民中,只有几个人能读懂一般的书,许多人只认识很少的几个字。

- [16] David Johnson, "Communication, 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34-72, in Johnson, Nathan, and Rawski. 可能这么说比较合理,中国人更清楚这样做的困难,因而在传统上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个人的读写水平上,事实上他们更喜欢通过考察一个人的书法来评判他的学问和品性,而不是他能认能写多少个字。
- [17] De Bary, "Individualism and Humanitarianism in Late Ming Thought," pp. 145-248 (esp. 168), in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 [18] Patricia Buckley Ebrey, trans. and introd., *Family and Property in Sung China, Yuan Ts' ai's "Precepts for Social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67-268.
- [19] 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五,第 158—159 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1987),第 521—579 页。唐甄,《潜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 次印刷),上编,下,第 91 页,谈到他在苏州的工作,先是一个商人,后成为一个掮客,不管别人说这些工作有多低贱。
- [20]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Wiley and Sons, 1962), pp. 36-37 and 122-124.
- [21] 李国钧,《清代前期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第 3 册,第 446 页,南京学者管同(1780—1831)所写的一段。作为对这种不当行为的指责的回应,政府在 1793 和 1812 年颁布法令禁止有功名者充当簿书、水利工程吏丞、掮客,甚至衙门差役 (Ho Ping-ti, p. 37). 256
- [22] 叶昌炽,卷四,第 742—744 页;罗继祖,第 146—148 页。
- [23] 瞿中溶,《瞿木夫先生自订年谱》(民国《嘉业堂丛书》版;北京:北京图书馆,1999 重印),61a-b。
- [24] 黄潛,卷一七,3b;郎瑛,卷四〇,第 584 页。
- [25] 范凤书,第 212 页。
- [26] 正如这里所提到的,明代徽州商人藏书家可以作为这种一般性论断的一个例外。他们通常来自拥有功名的大家族。
- [27] 叶昌炽,卷四,第 444—447 页;叶瑞宝,第 346 页。扬州和杭州的商人藏书家,如马氏兄弟,是这种文化转变的其他重要代表 (Ginger Cheng-chi Hsü, *A Bushel of Pearls, Painting for Sale in Eighteenth-Century Yangchow* [Stan-

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4-27).

- [28] 我藏有这部书,是一册印本,印于1941年,印数是3000部,由一个只知道叫悟声的上海商人发行。这部书有一篇1694年写于河南文城书院的序言。它何时以及如何到达江南不清楚。在这里讨论和翻译的段落出自第8a—12a页。
- [29] Daniel K. Gardner, *Chu Hsi, Learning to Be a Sage*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8-129.
- [30] 关槐,《士林彝训》,(1789年序)(《四库未收书辑刊》本),卷一,敬业,10b。
- [31] Cynthia J. Brokaw,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7-228.
- [32] E. g., Philip Kuhn, "Chinese Conception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pp. 16-28, in James E. Watson, e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33] 归庄,第2册,卷十,第515页,讲述了一个关于已故大学士徐阶的一个曾孙的奇特故事,他不识字,靠世袭得到一个官职。他靠妻子为他处理所有文牍书信,妻子死了以后,他的仆人劝他退休,说:"爷今做不得官矣。"他接受了这个建议。
- [34] Donald Sutton, "Shamanism in the Eyes of the Ming and Qing Elites," p. 227, in Kwang-Ching Liu and Richard Shek, eds., *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关于这一点, Woodside, "Real and Imagined Continuities," p. 32, 写道一位清代著名学者哀叹学生的文化水平下降,从唐代认识10000个字到十八世纪末只认识2000字:"对于孙[星衍]和其他像他这样的人来,识字水平理论的目标不是搞清农民的孩子能在季节性学校里轻松地掌握多少字,而是如何为精英分子重获征服世界的深奥读写能力,通过这种能力尝试对中国式生活进行某种道德上的再封建化。"
- [35] 张习孔,《家训》,卷18,7b(《檀几丛书》本)。
- [36] 张师载,卷三,13a,引朱用纯语。
- [37] 沈起潜,《菟园杂说》,上,15a-b。
- [38] 关槐,卷一,敬业,11a。

- [39] 张师载,卷五,2a。
- [40] 张习孔,卷一八,7a。
- [41] 张师载,卷五,10a。
- [42] 同前,卷五,10b,这段话之前,曾说到他的家庭延续了不曾中断的读书传统,直到他科举得第并进入翰林院。
- [43] 张师载,卷四,11a。
- [44] 张履祥,第3册,卷四八,第1375页。
- [45] 孙从添,《藏书纪要》(上海:古典文学,1957),第33—34页。
- [46] 同前,第34页。
- [47] Kai-wing Chow, *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48] Kim Hongnam, *The Life of a Patron, Zhou Lianggong (1612-1672) and the Painters of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6), p. 71; and Qu Zhongrong, 16a。
- [49] 江标、王大隆,第116,118,122,131,141,145页;袁以新,《苏州古城平江历史街区》(上海:三联书店,2004),第179页;叶昌炽,卷五,第574—575页,有1801至1811年间和1816年每年举行仪式的时间的史料。
- [50]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340-1;任继愈,第1册,第242页。
- [51] 柳和城等,第284页。
- [52] Tsien, p. 109. 尤其是注释d。
- [53] 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172—203页。
- [54] 《续纂淮关统志》(1816),卷九,18b,还提到把灰埋入纯净的土中的做法, 258
遗憾的是没有说明源于何时。
- [55] Susan Naquin,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0-21。
- [56] 在这些组织中儒家学者占支配地位,但这并未妨碍他们的许多总部仍设在佛寺、道观甚至神祠中(例如,《武进阳湖县志》[1879],卷三,12b-13a)。
- [57] 余治,《得一录》,卷一二,1a-b。至少有一段时间,一个当地官员甚至禁止景德镇的制陶工人在碗底上写字。
- [58] E. H. Parker, *Chinese Customs* (Shanghai: Kelley and Walsh, Ltd., 1899), p. 35。

- [59] 梁其姿,第 192—200 页;酒井忠夫,《中国善書の研究》(东京:1960),第 430—431 页。
- [60] 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南京:江苏古籍,1998),卷二,第 63 页。对 1820 年代苏州这个节日的一个稍早描述强调包括了穷人,但没有明确是否包括平民(庶)(顾禄,《清嘉录》[南京:江苏古籍,1986],卷二,第 48—49 页;Terry L. Kleeman, *A God's Own Tale, The Book of Transformations of Wenchang, the Divine of Zitong*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4], p. 81)。
- [61] 李乔,《中国行业神崇拜》(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0),第 144—147 页。
- [62] Woodside, "Real and Imagined Continuities," pp. 32-38.
- [63] Angela Ki Che Leung, "Elementary Education in the Lower Yangtze Region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pp. 381-416, in Elman and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 [64] Rev. R. H. Cobbold, *Pictures of the Chinese, Drawn by Themselves* (London: John Murray, 1860), p. 191; 顾禄,《桐桥倚棹录》(上海:上海古籍,1981), 5, 第 73 页。理论上,这一工作之所以低贱可能是因为与皮革打交道。钱和他的养父母一样,被称作“攻皮家”。但是,皮匠在中国并不像在东亚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受到制度化的社会歧视或排斥 (Anders Hansson, *Chinese Outcasts, Discrimination and Emancip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rill: Leiden, 1996], pp. 51 and 176)。
- [65] Rudolf P. Hummel, *China at Work* (Cambridge: MIT Press, 1969; reprinted of 1937 ed.), pp. 204-205, 212, 216, 218 报告了 1920 年代他在长江流域和中国中部其他地方观察到的前工业化工作状况。见 William Alexander and George Henry Mason, *Views of 18th Century China, Costumes: History: Customs* (London: Studio Editions, 1988; reprinted of each author's separate *The Costume of China*, 1804 and 1805 respectively), pp. 78-79, 有对广州郊区一个鞋匠的评论和逼真画像,这证实了 Hummel 对修鞋匠的刻画,虽然他们所描述的地区是不同的。
- [66] Cobbold, pp. 196-197. 雨靴“全由皮革制成,由教堂大门上的大钮钉似的铁钉撑离地面至少半英寸。在雨天,穷人们经常穿一种有一英寸厚的木底鞋,像极我们撑开的木底鞋。因为只有鞋底是木头的,上面的部分则是一些柔软的材料做的,它比荷兰水手们穿的木鞋要优越得多”(同前,第 195 页)。

- [67] John Thomso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Indo-China, and China; or, Ten Years' Travels, Adventures, and Residence Abroad* (New York: Harpers and Brothers, 1875), pp. 252.
- [68] 汪缙,卷十,5b。
- [69] 《吴县志》(1933),卷六八,上.24a-b。
- [70] 在所知他目前留存的一部藏书上,他只是以中国画师装饰他们作品的方式盖上了三个印章,而没有使用诗文或签名(叶瑞宝,第362页)。这让人觉得之所以钱使用印章,部分是因为他在书法和写作上都缺乏天赋。
- [71] 《苏州府志》,卷八九,14a。
- [72] 叶瑞宝,第362页。这一印本最后归于清末民初湖州府南浔镇一个丝绸商人建立的著名藏书楼嘉业堂。正如叶瑞宝所注意到的,苏轼的著作是11世纪晚期至16世纪中期最流行和印刷最多的士人出版物。又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1册,第401—468页,在第434—450页讨论了钱的特别收藏,并在第446—448页讨论了其中比较特别的版本。
- [73] 汪缙,卷十,5b。
- [74] 《苏州府志》(1883),卷八九,14b。联绵词“浏览”也有“广泛地看”的意思,但据罗竹风等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第5册,第1278页的例子,上述翻译也是适宜的。然而,不管哪种翻译,都意味着钱是一个肤浅的读者(中文用词“浏览”,是这篇苏州方志里的传记中一个绝妙的同形异义联绵词)。
- [75] Leung, “Elementary Education” pp. 394-395, in Elman and 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 [76] 可以想见他买了一些宋人的著作,因为18世纪宋学的衰落使宋代的作品在该世纪末的苏州“出奇地便宜”(李国钧,第3册,第456页)。
- [77] 汪缙,卷十,5b;顾禄,《桐桥倚棹录》,卷五,第73页;《苏州府志》(1883),卷八九,14a。
- [78] 汪缙,卷十,5b;Bol, p. 28。
- [79]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p. 318;梁其姿,第180—181页。
- [80] 彭绍升,《二林居集》(《续修四库全书》本),卷七,9b-10a。
- [81] [瞿]铤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上海:上海书店,1988),第250页。

- [82] 叶瑞宝,第 355—356 页;Guy,pp. 162-163。
- [83] 例如,牧田諦亮,“居士仏教における彭際清の地位”,第 231—252 页,特别是 244、245 页,见其《中国近世仏教史研究》,(京都:平楽寺書店,1957);West,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pp. 44 and 175。
- [84] 彭绍升,卷十,1a-2a。
- [85] 江洪、朱子南等,《苏州词典》(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第 1142—1143 页;Makita, p. 241。
- [86] 汪缙,卷二,4a-5a。
- [87] 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北:广文书局,1983),第 197—220 页,对彭及其文章中对佛教的兴趣怀有浓厚的兴趣。陆强调了朱熹,而不是王阳明对彭绍升思想的影响;然而我认为正确的是, *Hummel, Eminent Chinese*, pp. 617-8,从王经过高攀龙和汤斌(1627—1687)到彭氏家族,画了一条思想递相影响的路线。又见彭绍升,卷二,13b-14a,有彭自己对他和汪缙致力于继续进行融合晚明佛教和儒学的讨论。
- [88] 彭绍升,卷九,b-10a,有 Kleeman 所证实的观点,第 51—56 页。
- [89] Stanley Weinstein, *Buddhism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7; and Kenneth K. S. Ch' en, *Buddhism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338; and Makita, pp. 244 and 249.
- [90] *Ibid.*, p. 244.
- [91] 汪缙,卷六,15a;彭绍升,卷二二,14a-b;《苏州府志》(1883),卷八三,18a-b。
- [92] 彭绍升,卷二二,15a。
- [93] 陆宝千,第 201,212 页。
- 261 [94] 汪缙,卷二,3a-4a。
- [95] 徐维新,第 96 页。
- [96] 彭绍升,卷二二,14a-b,16b。
- [97] 徐维新,第 96 页。

本书所涉及相关书目的说明

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的目录学家们不断地展现出理解自己国家书籍起源和历史的卓越能力。他们以令人钦佩的准确性编纂了详尽的公私藏书目录;他们对地方文献作了广泛调查,为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发展出了区别纸张、墨色和印工微妙差别的超凡技能,因而在中国书史上揭示了复杂的文本和技术传播史。在许多方面,这些学术传统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达到了高峰,那时它们与中国其他的文化传统一起,被认为面临着来自这个国家内外的前所未有的威胁。那时写作的关于中国书史的经典著作,如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1999 年第 4 次印刷),是在缺乏现代学者习以为常的图书情报设施的条件下完成的。但直到今天,在初版一个世纪之后,它们仍然是所有认真学习中国书史的人首先想到的重要参考著作。幸运的是,它们在东亚被屡次重印。 263

今天,这种学术传统的延续和对书目记录的掌握,在像《文献》和《文史》这样的中国刊物和当代图书馆出版的目录上表现得很明显。现代出版的善本书目已达到五十种以上。那些大型图书馆的目录代表了最完善的范例,尤其是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编的 5 卷本《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以及全国性的汇集了 781 所图书馆馆藏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1986—1996)。这部目录的更新版本,翁连溪编的七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北京:线装书局, 264

2005),增加了15%的款目,每条记录包含有更多的信息。^①在数个世纪扎实的目录学研究的基础上,这些目录为将来大量进行关于东亚历史上的印本和手写本传播的目录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台湾也做了类似的工作,把“国家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的馆藏善本编成了《台湾公藏善本书名索引》(台北:“中央图书馆”,1971)。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编成了《静嘉堂汉籍分类目录》(东京,1930),其中宋元印本扩充为详细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东京:汲古书院,1992;2册)。不幸的是,其他两个位于东京的重要收藏单位尊经阁文库和内阁文库,除了各印出一部《尊经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东京,1934和1935)和《内阁文库汉籍分类目录》(东京,1956;1971修订本)之外,对于其中珍贵的明版书,还几乎没有做什么系统的工作。在西方,哈佛燕京学社最近有了自己所藏善本书的极具专业水准的目录,即由该馆善本部主任沈津撰写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如今技术上的进步,意味着编纂一个包括中国、其他东亚国家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所藏的中国古籍善本的全面的网上目录成为可能。在艾思仁(Sören Edgren)领导下,以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Gest Library of East Asian Books)为基地的“中国善本书项目”(Chinese Rare Books Project),致力于编纂一部包括中国内外每一部善本的尽可能完整的目录,并提供在线服务。该项目过去十五年的显著进展,使人们相信它一定会为中国书籍的研究带来一个“大跃进”,人们期待着这个项目,以及关于东亚语种文献收藏目录和数据发布的其他类似项目的成功。虽然我们最后或许不

^① 关于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参见沈津“一部剽窃、篡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伪劣图书——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台湾《书目季刊》第四十卷第二期(2007年)。

能获得足够精确的数据和时间断限,来与最近几十年西欧印刷史研究所取得的数据和时间断限相比较,但这样的数据对于未来中国目录学和书史的研究来说仍是不可或缺的。

上一世纪,当西方和中国学者认识到各自文化的独立成就时,他们常常把研究专注于中国印刷的起源,尤其是雕版和活字印刷技术。托马斯·卡特(Thomas Carter)的开拓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5; second rev. ed., L. C. Goodrich ed., 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5),使我们对于古腾堡之前印刷技术的一般性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虽然它出版于将近一个世纪前,但它所包含的大量信息,仍是讨论这些发明的技术特性的基础。伯希和(Paul Pelliot)的《中国印刷术的初兴》(*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3)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这部著作许多意味深长的论断仍有待于仔细探讨。更新、更全面的是钱存训(Tsien Tsuen-hsuei)的大作、李约瑟(Joseph Needham)著名的系列著作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第一分册纸和印刷》(*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 V, Part 1: Paper and Prin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这本书是作者一生研究和整理中国书籍的结晶,其内容大大超越了书名所标示的讨论印刷技术本身。它涵盖了从墙纸和礼仪用纸,到制墨技术和中国书籍形制和装帧的方方面面。在这部令人肃然起敬的书中,雕版印刷方面谈得最少的可能是书法。关于书法在中国印刷中的地位,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和朱鸿林(Hung-lam Chu)的《书法与东亚书籍》(*Calligraphy and the East Asian Book* (Boston, MA: Shambhala, Inc., 1989))中有可靠的论述。关于古籍修复和装裱的详细图解,没有比杜伟生的《中国古籍修复与装裱技术图解》(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更好

的著作了。

266 要想全面获得关于雕版书籍生产的许多技术特性的详细历史资料,可以参考瞿冕良编的《中国古籍版刻辞典》(济南:齐鲁书社,1999)。目前已知宋、元、明雕版工匠(主要是刻工)的最全名录,可见于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和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这些著作是东亚文献学者多年来辛勤工作的结晶,他们把零散的资料汇集起来,这些资料单独看来用处不大,但汇集在一起,就成为反映这些朝代参与印本生产的许多个人的基本信息的宝库。事实上它们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书业工匠的全部名录,为重构早期的印刷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帮助,在今后很长时间内仍将为中国书籍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同样,没有哪部印刷术语辞典比得上大卫·巴克(David Barker)的《英中对照印刷术语词表》(*An English-Chinese Glossary of Printmaking Terms*, Belfast: University of Ulster Press, 1995)。

在过去几十年中,有一大批中国印刷史的综述性著作出版了。其中,张秀民里程碑式的《中国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以其学识的广博和深度脱颖而出。这一领域中几乎没有哪部著作能像这本书一样包含如此广阔的论题和丰富的材料,它显然是一个杰出学者的毕生心血之作。这部书经过韩琦非常到位的修订和扩充,2008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再版。杨绳信的《中国版刻综录》(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是一部综论印刷的新颖著作,首次列出了从唐代到清末所有朝代出版的书籍。该书分别按朝代、出版者类型、出版者名称、出版时间排序,构成了1912年前的出版物目录,范围涉及国家图书馆的三部目录、其他大型图书馆的十一部目录和以前已经出版过的三部书目或论著。虽然在今天的数字时代已显得不够用,但它仍然是唯一一部已出版的、试图对整个帝国内的出版记录进行总体编年排序的目录学著作。

在中国之外,长久以来日本就是目录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许多学者精通中国书籍的研究。从1930直到1970年代,著名的书目学家长泽规矩也事实上研究了所有历史时期中国和日本的中文书籍生产,其十卷本的详尽目录学研究著作《长泽规矩也著作集》(东京:汲古书院,1984),对于藏书家和社会史家同样有用。另一部主要用日文撰写的关于中国书籍研究的综论性文集,是最近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東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 にわらずみ》(东京:二玄社,2004)。它的二十六篇文章分别用日语、中文和英语撰写,涵盖了从唐代到20世纪的所有时期,是体现过去二十年中国书籍研究广泛化和国际化的极好例证。 267

至于单个作者用日语写作的综论性著作,大内白月的《支那典籍史谈》(东京:昭森社,1944)是一部有用的中国书史介绍性著作,可能知之者不多。它所引用的资料在当时看来很了不起,现在看来仍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最重要的日文综论性著作无疑是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2),这是一部论述从周代到清初中国书文化的出色著作。作者的主要兴趣,是印本如何在宋、元、明三代在精英圈子的阅读中取代手写本。但是,井上对史料的驾驭、对新旧论题的洞见以及所讨论的问题范围之广,都使这本书成为任何一个哪怕只是稍想了解这些世纪里中国印刷文化和精神生活的读者的基本读物。包筠雅对此书富有洞察力的书评刊于《国际亚洲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January 2005, pp. 135-165),很好地揭示了井上的发现。人们读完了这部书就会嫌它写得太短,只希望有一天井上能够继续完成他的研究,写出一部关于清代出版物的姐妹篇。

部分归功于这些优秀的综论性著作的刺激,我们不断增多的关于印刷和书籍的知识,很自然地导致了研究的更加专门化,通常是按照朝代和地域来划分的。关于印刷的早期历史,可以看两部著名的中文文集,宿白的《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

社,1999)和李致忠的《肩朴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在过去几十年中,可能是在卡特和伯希和开创性研究的影响下,西方学者继续对中国印刷早期历史的研究作出重要的贡献。二十年前,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他的《中古中国的印刷与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London: The Wynkyn de Worde Society, 1983)一书中对唐宋印刷的考察,巧妙地引介了许多以前没有被西文著作提到的中文和日文著作。他的机敏评述和广阔的关注点,使这部书对于那些对中国书籍生产的头6个世纪特别感兴趣的读者来说十分重要。在过去10年中,蒂莫西·巴雷特(Timothy Barrett)发表了一系列很有趣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刷的兴起和传播:宗教因素新探”(“The Rise and Spread of Printing: A New Account of Religious Factors”,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Working Papers in the Study of Religions, 2001),这篇文章讨论了中国印刷起源的诸维度。他的著作常常从各种角度来集中探讨中国雕版印刷的起源和发展,包括宗教和手工业生产——这是被许多学者所忽略的,因此对于印刷术在除书籍以外的媒体(如符咒、织物、纸币)的应用特别具有启发意义。他最近出版的书《发现印刷术的女人》(*The Woman Who Discovered Print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先是从唐代中国的政治和宗教背景,然后从更广的欧亚大陆的视角来大胆地探讨这些问题。还有一篇很好的用英文写作的论文“长安东市的印刷业”(“The Printing Industry in Chang'an's Eastern Market,” *Memoirs of the Tōyō Bunko*, 2004, pp. 1-42),作者是日本学者妹尾达彦。这篇文章是关于这个唐朝首都所出版的书籍和其他印刷品的重要研究的发轫之作,它还对宋代以前东亚以外其他地方留存的印刷品作了一个很好的概述。宇文所安(Steven Owen)的“唐代的手写本遗产:以文学为例”(“The Manuscript Legacy of the Tang: The Case of Literat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7.2, December 2007, pp. 295-326), 对 10 至 11 世纪的手写本世界作了深入的探讨。

综论性的关于断代出版的有用著作,宋代有王河《宋代图书史论》(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元代有田建平《元代出版考》(石家庄:河北出版社,2003),明代有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这三部著作汇集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引入了过去一般讨论中国印刷的著作经常忽略的问题(如道教与佛教印刷、外文语种印刷、印刷对外国的影响、装订方式的变化)。宫纪子的《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是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蒙古统治时期中国文化的著作,聚焦于有关出版的各个方面,其中含有元代多种书籍出版的大量信息。

关于这三个朝代出版活动更深入的研究著作,近年来关注点在地域方面,通常是在省或府一级。用中文撰写、论述早期印刷史的最值得注意的著作是顾志兴的《浙江出版史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涵盖了从 9 到 13 世纪浙江的出版史。李致忠的《宋版书叙录》(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4)以一个著名目录学家的眼光对六十部宋刻本作了详细描述,其中多数收藏于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用西文撰著、同时也是诸语种论著中最好的对 12、13 世纪杭州印刷的全景式论述,当推艾思仁(Sören Edgren)的“南宋杭州的印刷”(“Southern Song Printing at Hangzhou,”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61, 1989, pp. 1-212)。宋代以来(直至 20 世纪)山西的出版记录及其评注,有李晋林、畅引婷编《山西古籍印刷出版史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贾晋珠(Lucille Chia)关于宋代(以及元明)福建出版业的重要著作,下面将会论及。

关于明代,综论性和深入的区域研究论著要多得多。明代印本书搜集最全面的仍属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尽管还有缺漏。明代书籍发行和贸易最富信

息量的史料应属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中华书局,1958)中的一系列记述,本书中曾多次引用。在过去二十年中,大木康和井上进两位日本学者的著作引起了很大的关注。1991年,大木的长篇论文“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出版文化の研究”(《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第50卷第1期,1991年1月,特輯号,第1—176页),提出了大量新课题,刺激了研究明代文化的日本学者和他国学者开展类似的研究。他的这篇文章以及其他几篇文章后来结集为专书《明末江南の出版文化》(东京:研文出版,2004)。同样,井上进写下了研究明代印刷的开创性论文,著名的“藏書と讀書”(《東方學報》62 [1990],第409—445页)和“書肆・書賈・文人”(荒井健编《中華文人の生活》,东京:平凡社,1994,第304—338页),这些论文构成了他2002出版的综论性著作的基础。这些论文的成果虽然有许多后来都收入他的著作,但仍包含着他处无法见到的重要信息,值得仔细研读。他的近期论文被收入他的《書林の眺望、伝統中国の書物世界》(东京:平凡社,2006),继续展现他对于从方志、插图书籍,到冷僻学问和爱好的书目提要等许多论题富有想象力和启发性的论述。

很长一段时间,唯一用英文写作的研究明代印刷的成果是吴光清(Kwang Tsing Wu)的“明代的印刷与印刷者”(“Ming Printing and Printer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7.3, February 1943, pp. 203-260)。幸运的是,大量新著作的出现正在改变这种状况。包筠雅和周启荣(Kai-wing Chow)编辑的会议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印刷与书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收入了明清两代书籍社会史研究的许多优秀范例。南京的书坊、小说戏曲的印刷、畅销书的范围、北京的满语出版物,聊举几个这本书里提出的新课题,它们指明了这一领域今后一两个阶段所将要探讨的问题。

明代不同地区或府的出版活动也得到了细致的研究。最近，周启荣的《中国近代早期的出版、文化与权力》(*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汇集了有关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书文化，尤其是关于出版和写作圈子的大量资料。该书对于江南晚明士人中商业印刷文化的形成与运转的论述尤其有用。更具体的以府为单位的研究，包括叶瑞宝关于苏州府的几篇文章，最著名的是他对商业书坊的里程碑式研究“苏州书坊刻书考”(《江苏出版史》1992年第3期，第78—149页)。曹正元的“苏州官家刻书考略”(《江苏出版史》1992年第3期，第44—61页)概述了官方的出版机构，使苏州的出版图景完整起来。魏爱莲(Ellen Widmer)的“杭州和苏州的还读斋：十七世纪出版活动研究”(“The Huangduzhai of Hangzhou and Suzhou: A Stud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Publish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1, June 1996, pp. 77-122)关注的是杭州和苏州的书坊，她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今后会日趋流行。安徽南部的徽州府也因其印刷传统吸引了很多注意力。介绍和讨论当地出版活动和出版机构的著作有刘尚恒的《徽州刻书与藏书》(扬州：广陵书社，2003)，以及更全面、更深入的米盖拉·巴索蒂(Michela Bussotti)的著作《徽派版画——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中国插图书籍研究》(*Gravures de Hui, Étude du livre illustré chinois [de la fin du XVIe siècle à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VIIe siècl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2001)。

271

关于福建，有谢水顺、李铤的《福建古代刻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这部综述福建多个出版地点印刷活动史的书，时间跨度从宋初至清末，将近1000年，重点放在从宋至明闽北的建阳地区。近年，贾晋珠和包筠雅两位美国学者，为我们理解福建印刷史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她们充分利用了近年来中国研究条件的进步，到图书馆查阅善本古籍，到历史上的出版中心从事田

野调查。这样她们全面掌握了现存的书目资料,又获得了当地图书印刷文化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克服了福建印刷史研究中手写本和印本记录不足的诸多障碍——这种资料上的缺乏曾使过去从社会经济史角度来撰写福建书籍史举步维艰。她们这样做的结果,促使学者们的兴趣从印刷的技术问题转移开来——在中国由于资料的匮乏探讨这些问题是如此困难,转而探究书籍的发行、阅读趣味和阅读行为。

贾晋珠的《为利而印: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11至17世纪)》(*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是一部研究宋代印刷的里程碑式著作。它对这个“出版流行书籍”的中心现存印本资料的掌握是无与伦比的,是用西文撰写的致力于研究中国一个地区的书籍生产的首部著作。作者的论述详尽周密,辅之以敏锐的历史分析,使她能得出超越以往研究宋代出版的历史学家的论断。在这个研究领域,通常极易陷于琐碎的细节描述或缺乏根基的宏观叙述,而她事实上能够高屋建瓴地把握这一地区出版历史的基本数据,同时在写作中又入木三分。她的一些发现浓缩在她的论文“麻沙本:从宋至明建阳的商业出版”(“*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Jianya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pp. 284-328, in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u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中。

对于福建的一个偏远农村地区,包筠雅作了开拓性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调查工作,形成了她细致入微的研究著作《文化中的商业: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四堡书业》(*Commerce in Culture: The Sibao Book in the Q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这部令人叹为观止的著作描述了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福建四堡地区,以及广东、广西和江西南

部的图书出版和发行活动。她在书中的发现将会在下一阶段形成对清代和民国“民间”和地域出版的讨论,同时彰显了田野调查对于深入研究地方书文化的必要性。

明代印刷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单张的黑白或彩色版画,在目前最好的单卷本中国版画集《中国古代版画展》(町田: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1988)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现。小林宏光关于中国版画的研究优秀著作《中国の版画》(东京:东信堂,1995)对所有中国书籍的研究者来说都是有益的读物,而不仅仅是对艺术史家有用。

关于清代出版,上面提到的包筠雅的著作,以及她与周启荣编的论文集,是目前西方学术界的主要成果。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综论性著作,部分由于他们关注高端的出版物和善本,常常低估这一时期出版的重要性。他们的研究通常集中于政府审查制度,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系列优秀论著中,岡本さえ的《清代禁書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6)因其对史料的掌握和论述的深度脱颖而出。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文章“中国十八世纪的审查制度:来自书业的角度”(“Censorship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A View from the Book Trade”,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22.2, August 1988, pp. 177-196),透过通常浅表描述书业和政府审查制度的清代史料,探讨了其运作中的若干细节(该文经过修改,加入了明代政府审查制度的材料,收入氏著《明代社会中的国家》*The Chinese State in Ming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5)。何谷理(Robert Hegel)的《中国帝国晚期插图小说的阅读》(*Reading Illustrated Fic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是研究清代小说的上佳之作。关于清代的地方书文化,迄今为止最详尽的中文著作是孙殿起的《琉璃厂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书中大部分内容是北京著名书肆琉璃厂的资料汇集。

两千多年来藏书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定义自我身份的一种活动。最近,在经历 20 世纪上半叶几十年很大程度上由于政府压制的休眠状态后,这个话题似乎作为一种反弹而苏醒了。关于这一论题的大量著作得到重印,最著名的是叶昌炽(1847—1917)的《藏书纪事诗》(初版于 190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是关于 10 世纪至 20 世纪初 100 多位藏书家极其丰富的传记资料汇编(该书的续作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收入了民国时期 155 位藏书家的资料)。一般认为叶氏这部便于利用的概览性著作是关于中国藏书家最可靠、资料最丰富的书,这一领域的所有学者都会怀着感激之心经常翻阅它。关于中国藏书楼的一些重要史料,收录于李希泌、张树华的《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北京:中华书局,1982),使用方便。

中国学者对私人藏书楼的研究总是关注其创建者和楼主。在这方面李玉安和陈传艺的《中国藏书家辞典》(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是一部简明而又特别实用的藏书家传记辞典。它的时间跨度从秦代(公元前 221—前 202 年)直至 20 世纪末,其内容不仅仅是对以往出版过的传记辞典的重复——这种做法在中国出版界司空见惯。最近出版的两部关于中国藏书家和藏书活动的引人瞩目的著作,是傅璇琮和谢灼华的两卷本《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和任继愈主编的三卷本全景式著作《中国藏书楼》(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加上范凤书的《中国私家藏书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1),这些多卷本著作不仅详细而全面地考察了每个朝代的大小藏书家,而且在中文著作中首次讨论了诸如藏书家与商人的关系,对皇室宗藩的研究,直至藏书家所受到 16 世纪倭寇入侵和明清之际动荡局势的影响等问题。这些著作所收到的热烈欢迎,以及新创办的《藏书家》杂志(1999 年四月至今)的风靡一时,都是可喜的迹象,表明中国的藏书家和书文化学者将来会继续带来富于想象力的成果。

关于宋代的政府藏书,一些现代新版的基本史料,如陈骙《南宋馆阁录》及佚名《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8)、程俱《麟台故事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中有丰富的记述。约翰·H.温克尔曼(John H. Winkelman)《南宋的皇室藏书,1127—1279》(*The Imperial Library in Southern Sung China*, Philadelphia, P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74;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 s. 64. 8)仍是关于宋代政府藏书及其历史的最好著作。关于明代,我们有顾力仁研究《永乐大典》的著作《〈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关于皇室藏书,《中国藏书楼》第一册和《中国藏书通史》第一册的论述是目前最完备的。

宋代的重要民间藏书家,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台北:学海出版社,1980)中的介绍很有用。遗憾的是,关于以后各朝的藏书家都还没有类似的综述性著作。总的来说,单个藏书的具体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状态。两部现存的宋代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丛书集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有很好的现代版本。最近刘焕阳研究晁公武及其家族的著作《宋代晁氏家族及其文献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提供了关于其藏书活动的许多信息。明代民间藏书的现存目录,以及一些藏书家的题跋,汇编于冯惠民、李万健《明代书目题跋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方便利用。遗憾的是,这部书没有收入15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私人藏书家杨士奇为他自己的书所作的题跋,这些题跋收在《东里续集》(《四库全书珍本》本)中。

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所吸引的学者的注意力比其他任何私人藏书楼都要多,主要是因为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和私人藏书。汇集这一藏书楼及其藏书资料最丰富的著作或许是蔡佩玲《范氏天一阁研究》(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1),同时天一

阁有自己的优秀网站(tianyige.com.cn),上面有大量研究论文、照片和公告。柳和城等《藏书世家》中有关于范氏和其他十二宗明清家族藏书的丰富资料。仲伟行《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汇集了关于清代和民国初年著名的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的有用史料和评注。

中国学者长久以来就关注地域藏书传统的研究。20世纪上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丁申在其《武林藏书录》(《丛书集成》本,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中研究了杭州府藏书,蒋镜寰的《吴中先哲藏书考略》(苏州:苏州图书馆,1937)研究了苏州府藏书,郑元庆的《吴兴藏书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研究了湖州府藏书,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研究了浙江藏书,吴晗《江浙藏书家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1)研究了江苏、浙江两省藏书。更近一些,叶瑞宝《苏州藏书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汇编了关于苏州藏书史的资料,其体例值得借鉴。其重点虽放在私人藏书家(不同于一般著作,该书很好地利用了藏书家的题跋)上,但该书也少见地包含了寺庙和官学藏书的资料。张慧剑编年体的《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中,有关于江苏阅读和出版活动的十分全面丰富的有用资料。

如果你对一个天津富商直至1960年代前如何累积藏书的详细过程(细到每本书的价格)感兴趣的话,没有比李国庆为周叔弢(即周明扬,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之父)所作的藏书活动编年史《弢翁藏书年谱》(合肥:黄山书社,2000)更好的了。该书的出版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表明在今天高度商业化的中国,对书籍和藏书的传统兴趣毫无疑问在复兴。虽然它不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处于精英文化的中心,但它继续在一些都市圈子里盛行,构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网络,值得无论是研究今天还是过去的中国文化的学者关注。

遗憾的是研究中国藏书史以及中国文献传播的西文著作,还相当少。最近,杜德桥(Glen Dudbridge)引人入胜的《中古中国的失落典籍》(*Lost Books of Medieval China*, London: British Museum, 2000),描述了在帝国历史的头一千年里中国书写和印刷文化遗产的散佚。戴仁(Jean-Pierre Drège)的《手写本时代的中国藏书(十世纪前)》(*Les bibliothèques en Chine au temps des manuscrits (jusqu'au Xe siècle)*),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1991),利用了宏富的史料来描述10世纪前政府、寺庙和私人藏书的发展。关于宋代,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的《宋代藏书中的道教文献》(*Taoist Books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Sung Period*, London: Ithaca Press, 1984)中有对道教机构藏书的独一无二的介绍,其中南宋的一些道教机构在宋代皇室的支持下藏有数量巨大的手写和印刷宗教文献。若想从宏观上了解整个清代的藏书发展状况,读者就要去看七十年前谭卓垣(Tan Cho-yüan)关于这一问题的著作《中国清代藏书的发展,1644—1911》(*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under the Ch'ing Dynasty, 1644-1911*,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这部书今天仍很有用。关于17和18世纪,本杰明·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与社会变化诸面向》(*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second revised ed., Los Angeles: UCLA Asian Pacific Monograph Series, 2001)和盖博坚(R. Kent Guy)的《乾隆晚期皇帝的四库、学者与国家》(*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仍然是在清代社会和政治史领域研究民间藏书作用的重要著作。

277

当然,西方的图书馆与藏书家对中国书籍的兴趣至少已经延

续了四个世纪。其中介绍这些宝藏的两部优秀著作作为艾思仁等编《美国所藏的中国善本》(*Chinese Rare Books in American Collections*, New York: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ese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4), 和郭恩(Monique Cohen)、蒙曦(Nathalie Monnet)编《中国印刷》(*Impressions de Chin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92)。《美国所藏的中国善本》对于体现中国出版和藏书精英传统的一些珍贵载体的流传史作了学术性的评论,《中国印刷》中有许多中国印刷品的专业说明和精彩图版,其中一些出版物是与耶稣会士和其他西方人合作完成的。

中国识字率的历史课题,西方学者比东亚学者的讨论深入得多。罗友枝(Evelyn Rawski)的《清代的教育与大众识字率》(*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是一项前卫而引人争议的研究,该书从19和20世纪的史料中搜集了中国和西方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重要材料。她对中国清代识字率估计很高,对此伊维德在《通报》(*T'oung Pao* LXVI. 4-5 (1980), pp. 314-324)上有一篇很有深度的书评,应与罗友枝的书一起看。亚历山大·伍德塞德(Alexander Woodside)写了一系列关于识字率的充满争议的探索性文章,其中包括“为识字而奋斗的中国人真实和想象的共同体”,收入许美德(Ruth Hayhoe)编《教育与现代化:中国经验》(“Real and Imagined Communities in the Chinese Struggle for Literacy,” pp. 22-45, in Ruth Hayhoe, ed., *Education and Modernization, the Chinese Experience*,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92)。他和本杰明·艾尔曼编的会议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教育与社会, 1600—1900》(*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也包含了研究识字率的学者感兴趣的多个维度的信息。梁其姿的《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对于

推动和尊崇识字率的民间崇拜进行了许多非常有益的讨论。关于对阅读现象和民间文献的睿智把握,马兰安(Ann McLaren)的《中国民间文化与明代说唱》(*Chinese Popular Culture and Ming Chantefables*, Leiden: E. J. Brill, 2001)是一部非常好的指南。

书史的所有这些层面,从目录学到对于藏书和阅读的最新研究,在精心编辑的《东亚图书馆杂志》(*The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以前叫《葛思德图书馆杂志》(*The Gest Library Journal*))中都兼收并蓄。这本杂志里有许多关于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手写本和印本资料的文章,为日益增长的东亚书文化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园地。它值得任何一个想追踪当今这一领域中一些最优秀成果的学者的注意。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书籍的历史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维度和事件开启了多种富有成果的研究路径。

最后,关于中国书史原始和二手资料的完备目录,可参见钱存训为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撰写的《纸和印刷》所附参考书目,以及他在“中国印刷史简目”(《“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第23卷第1期(1990年6月),第179—199页)中对上述书目的补充;王余光编的《藏书四记》(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8)中带有说明文字的书单;以及包筠雅在《国际亚洲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1 (January 2005), pp. 135-165)上为井上进的《中国出版文化史》所撰写的书评的正文和注释。哈特马特·沃尔拉文斯(Hartmut Walravens)的《中华帝国以及中亚、朝鲜和日本的书籍和印刷:带注释的目录》(*Buch- und Druckwesen im kaiserlichen China sowie in Zentralasien, Korea und Japan: eine annotierte Bibliographie*, Stuttgart: Hiersemann, 2007)是一部信息量极大、并加上注释的关于东亚、尤其是中国书籍的各种论题的论著目录。

索引*

- academies, private 书院 见 *shuyuan*
- Adams, Thomas R. 托马斯·R.·亚当斯 115
- Ai Nanying 艾南英 105-106
- almanacs 历书 6, 48, 58, 62
- Ambrosiana Library 安布罗西亚娜图书馆 122
- An family, Wuxi county 无锡安氏 71-72
- An Lushan rebellion 安禄山叛乱 50, 213 注 16
- Analects, The《论语》 见 *Lunyu*
- Angelica Library 安杰利卡图书馆 122
- Anglo-Chinese Press 英国人和中国人组成的出版社 198 注 28
- archives, Ming Imperial 皇史宬 见 *Huangshi cheng*
- artisan households 工匠家庭 12, 16, 31-39
- artisanal characters 匠体字 见 *scripts* 字体
- Bacon, Francis 弗朗西斯·培根 10, 13
- Baghdad 巴格达 120
- Bai Juyi 白居易 59, 235 注 2
- Bailu she cao*《白鹿社草》 247 注 145
- banben* 板本 151
- baoxun* 宝训 127
- Barker, Nicholas 尼科拉斯·巴克 116
- Barrett, Timothy 蒂莫西·巴雷特 11, 268
- Beijing 北京 12, 46, 50, 54, 56, 59, 60, 62, 64, 77, 91, 97, 99-102, 106, 112, 125, 127, 128, 130, 133, 163, 167, 203 注 62, 210 注 134, 222 注 144, 227 注 77, 233 注 141; nineteenth-century lending library practices in 十九世纪的租书铺, 97-98; printing methods used in 印刷方式, 12, 16; as sixteenth-century book distribution center 作为十六世纪的书籍发行中心, 101; woodblock carvers in 刻工, 33-34
- (Beijing 北京) National Library 国家图书馆 44, 62, 68, 79-80, 263

* 索引据英文原版译出,页码均指边码。因作者对中文版正文及注释进行了少量修改,索引中所标识的注释号码可能与实际情况稍有出入。此外译成中文时译者对原书的一些错误作了订正,恕不一一注出。

- Beijing University Library 北京大学图书馆 170
- Beixi ziyi* 北溪字义 64
- belle-lettres, 集部 45 63, 64, 79, 80
- ben* 本 141
- Bi Sheng 毕昇 21
- Bi Shian 毕士安 247 注 8
- Bi Yuan 毕沅 168
- Bible, translation of, 《圣经》的翻译 14-521, 24, 42
- bibliography 版本目录学 3, 66, 166
- binding 装订 19, 25, 32; binders 装订工, 32, 34, 37-38, 205 注 73; wrapped back 包背装, butterfly 蝴蝶装, stitched 线装, 25
- block carvers 刻工 25-39; apprentices 学徒, 26, 31; blind carvers 盲人工人, 203 注 64; division of labor 分工, 26-28, 31, 200 注 121; as journeymen 流动工人, 29; level of expertise 技艺水平, 21, 27; literati carvers 文人刻工, 31-33, 35-6; range in pay and work load 报酬与工作量, 21, 33, 36-37, 204 注 67; records of, 28-29, 208 注 100; regional exchange 地区间交流, 29, 32, 33, 51, 98; regional origins 来源地区, 29-30, 32; social status of 社会地位, 31-36, 211 注 147 and 注 152; wages for 工资, 21-22, 25, 27-28, 33-35, 36-37, 204 注 68; women and children 妇女儿童, 17, 21
- block carving 刊版, Chinese account 中文史料 9, 12-13, 197 注 12 and 注 13; contemporary methods 现代方法, 12; falling cost of 成本降低, 25-31; four stages 四个环节 (transcription 写样, carving 刊刻, printing 刷印, binding 装订), 16-19; methods 方法, 16-25; Ming government labor duty on 明代政府劳役, 33; guilds for 行会, 34; in sixteenth-century Suzhou 十六世纪的苏州, 102; tools for 工具, 18, 200 注 39 and 注 41, 207 注 90
- Bodleian Library,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波德里安图书馆 122, 142, 238 注 27 and 注 28, 245 注 35
- book collecting/collections 藏书 83-170, 181, 190; as alternative to examination success 举业成功的替代物, 144; Arabic 阿拉伯, 120-121, 237 注 13; efforts to open up 开放的努力, 149-170; Jurchen invaders' impact on 女真入侵的影响, 50, 51, 55, 219 注 92; imperial collections 皇家藏书, 25, 127-132; imperial princes' collections 宗室藏书, 57, 85, 133; literati's access to private collections 士人对私人藏书的利用, 134-147; literati's dominant position as collectors 藏书家大都为士人, 104-114; private 私家藏书, 134-170; sixteenth-century increase in private collections 十六世纪私家藏书的生长, 145-146; size over time 历代藏书规模, 49-53, 187; as

- social capital and investment 作为社会资本和投资, 143-144
- book collectors 藏书家 6, 75-77, 83-170; shifting social composition 社会结构变迁, 104-114, 173-176, 179-181
- book-copying clubs 书籍互抄组织 155-163
- book gifts 书作为礼品 84-94, 226 注 43 and 注 48; from collectors to government 藏书家给予政府, 223 注 5; colophons as records of 有关题跋, 91-93, 113; imperial book presentation 皇帝赠书, 85, 92, 249 注 46; inheritance and bequests 遗产和馈赠, 85-90; printed with official funds 用政府资金印刷, 90-91
- book-lending 借书 95-98, 228 注 80 and 注 83
- book peddlers 书贩 95-96, 111, 227 注 72
- book-sharing 书籍共享 151-155, 169-170; sharing pacts 共享协议, 154-163
- book worship ritual 祭书仪式 181-182
- books, access to 书籍的获取 115-170; catalogues 目录, 54, 66, 88, 95, 138, 215 注 33, 220 注 112; counterfeit 作伪, 63, 95, 227 注 77; distribution 发行, 84-103; first-printed 初印, 9-12; four traditional categories 四部, 45, 62-66; price 价格, 19-20, 22-31, 36, 40-42, 69-74, 166, 200 注 33, 202 注 54, 260 注 76
- bookstalls 书摊 84, 93, 95, 96, 98, 103, 108, 113, 228 注 87
- bookstores 书铺 2, 38, 43, 56, 67, 69, 91, 95; bookstore quarters 书铺集中区域, 77, 99, 102, 228 注 87; first appearance of 首次出现, 98-100; at temples 寺庙附近, 98, 101, 108, 205 注 67; establishment in Yangzi delta 江南地区的书铺, 98-99 又见 Liulichang 琉璃厂
- Bray, Francesca 弗朗西斯卡·布雷 31
- British Museum (Library) 大英博物馆 (图书馆) 124
- Brokaw, Cynthia 包筠雅 166, 179, 202 注 54, 207 注 93, 267, 270, 271, 272, 278
- brushes 毛笔 17, 200 注 41
- bu 部 44, 256
- Buddhism 佛教, Pure Land, 净土宗 191-192
- Buddhist charms 佛教符咒, from Japan and Korea 发现于日本和韩国 11; from Sichuan Province 发现与四川, 11
- Buddhist establishments 佛教寺庙, role in protecting woodblocks 承担保护雕版的角色 205 注 67, 235 注 2; role in spreading woodblock printing methods 承担传播雕版印刷术的角色, 48; as site of bookstalls and distribution 作为书铺和发行图书的地点, 98, 101, 108, 116, 205 注 67, 228 注 87 and 注 88; use of woodblock printing 使用雕版印刷, 11, 39, 48

- Buddhist texts 佛教典籍 25, 33, 36, 37, 48, 62, 116, 192, 229 注 100; imperial sponsorship of publication of 皇室对佛经出版的支持, 85
- buwen* 不文 87
- Cai Xiang 蔡襄 75
- Caidiao* 才调集 75
- Cairo 开罗 120
- calligraphic styles 书法风格 见 *scripts* 字体
-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 剑桥大学图书馆 239 注 29, 243 注 79
- Canton 广州 15, 16, 23, 24, 41, 97, 186, 199 注 27, 200 注 33, 202 注 53 and 注 54, 205 注 67
- Cao An 曹安 60
- Cao Bing 曹炳 187
- Cao Rong 曹溶 61, 140, 157, 158, 159, 161, 250 注 53, 注 54 and 注 55
- Cao Xuequan 曹学佺 113-114, 118-119
- carvers 刻工 见 *block carvers*
- carving 刊版 见 *block carving*
- ce* 册 50, 54, 97
- ensorship of books, government 政府对图书的审查 24, 62, 63, 115, 168, 183, 190, 236 注 12
- chang* 娼 98
- Chang'an 长安 10, 49, 268
- changchang de "hei mingdan"* 长长的“黑名单” 236
- Changshu county, Suzhou 苏州常熟县 86, 96, 109, 152, 245 注 126
- Changzhou prefecture 常州 52, 54, 66, 72, 209 注 119; as center for book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by second half of sixteenth century 到十六世纪后半叶成为书籍生产和发行中心, 102
- chanye* 产业 87
- Chao Gongwu 晁公武 136, 150, 152
- Chaozhou 潮州 217 注 65
- Charles I, King 238 注 27
- Chen Chun 陈淳 64
- Chen Di 陈第 152, 235 注 4
- Chen Hongshou 陈鸿寿 169
- Chen Ji 陈济 227 注 70
- Chen Jimo 陈季模 52
- Chen Jiru 陈继儒 84, 109-110, 145
- Chen Qi 陈起 108
- Chen Renxi 陈仁锡 231 注 116
- Chen Shidao 陈师道 241 注 53
- Chen Yujiao 陈与郊 248 注 14
- Chen Zhensun 陈振孙 51, 52, 215 注 33
- Cheng Hao 程颢 188
- Cheng Shiquan 程世铨 170
- Cheng Yi 程颐 188
- Chengdu 成都 (Sichuan Province 四川省) 11, 133; first bookstores in 最早的书铺, 98, 107-108; Mongol conquests' destruction of book trade in 蒙古征服对书业的破坏, 5, 57; as Song dynasty printing center and rival to Hangzhou and Jianyang 作为宋代的印刷中心与杭州、建阳相颉颃, 5, 32,

- 48, 56
- Cheng' en si 承恩寺 102
- Cherishing Characters Association 惜字会
182-185, 189
- Cherniack, Susan 苏珊·彻尼亚克 48
- Chia, Lucille 贾晋珠 28, 57, 66, 198
注 89, 230 注 109
- Chongwen zongmu 崇文总目 130
- Chuci 楚辞 141
- Chunqiu 春秋 93
- Chunqiu fanlu 春秋繁露 65
- chushi 处士 188
- ci 慈 192
- Classic of Filial Piety 《孝经》 见
Xiaojing
- classics, Confucian 儒家经典 2, 9,
45, 48, 53, 55, 56, 58, 63, 65, 66,
68, 79-81, 85, 99, 108, 109, 116,
119, 134, 135, 151, 157, 160, 164,
166, 167, 174, 179, 182, 187, 191,
228 注 77, 241 注 53, 244 注 95 又见
sishu, wujing 《四书》、《五经》
- collectanea 丛书 5, 53, 107, 110
- colophons 题跋 91-93, 113-114, 154,
167, 187
- "community of learning," "知识共同体"
4, 114, 117-126, 145-147, 149-170
- Confucian canon 儒藏 见 Ruzang
- congshu 丛书 见 collectanea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120
- Copernicus 哥白尼 252 注 83
- Córdoba 科尔多瓦 120
- Cotton, Sir Robert 240 注 38
- d' Aubigné, Théodore Agrippa 西奥
多·阿格里帕·多比涅 238 注 27
- Da Tang liudian 《大唐六典》 65
- Da xue 大学 165
- Daoxue 道学(neo-Confucianism 新儒家)
63
- Darnton, Robert 罗伯特·达恩顿 116
- de Bury, Richard 理查德·德·伯里
224 注 25
- Descartes 笛卡儿 240 注 42
- Diamond Sutra 《金刚经》 11
- dictionaries, printed 印本辞书 10, 63,
107, 151
- Diderot, Denis 德尼·狄德罗 232 注 134
- Ding Shen 丁申 275
- Ding Xiongfei 丁雄飞 158-162
- Ding Yi 丁毅 159, 250 注 59
- Directorate of Ceremonial 礼部 33
- Dong Qichang 董其昌 110
- drama 戏剧 63, 67, 127
- Drège, Jean-Pierre 戴仁 14, 48
- du 独 188
- Du Fu 杜甫 63, 64
- du Halde, P. 200 注 41
- Du Mu 都穆 154
- Du Xian 杜暹 139
- Du Xinfu 杜信孚 45
- Duduan 独断 64
- Dunhuang 敦煌 48
- Dyer, Samuel 赛缪尔·戴尔 201 注 48

- Elman, Benjamin A. 本杰明·艾尔曼
172
- encyclopedias 类书 63, 102, 213 注
14, 229 注 100
- entertainment writing 娱乐读物 67, 235
注 5; influence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imprint and commercial publishing 对
印本扩张与商业出版的影响, 67-68;
as offered by lending libraries 租书铺
所提供的, 96 又见 drama 戏剧, "sto-
ries" 小说
- ephemera 即时印刷品 6, 9, 10, 16,
21
- Er Cheng quanshu* 《二程全书》 64
- Erasmus 伊拉斯谟 117, 124, 125-126
- Europe, early imprint runs as compared
with China 欧洲早期出版印数, 与中
国相比较 201 注 52, 221 注 127;
institutional libraries 机构藏书, 121-
124, 126; non-institutional libraries 非
机构藏书, 114, 117, 124-125, 142
- examination, manuals 举业用书 45,
67, 74, 93, 233 注 141, 235 注 5
- examinations, government 科举考试,
high failure rate 高淘汰率 104, 106-
107, 109; imperial student and district
degree 监生与生员, 104, 106-107;
increase in demand for cribs 应试书需
求的增长, 56, 67; metropolitan de-
gree and provincial degree 进士与举
人, 104-106; popularity of during the
Song 宋代的普及, 45; presentation of
writing compositions 行卷, 90; publi-
cation of results and successful essays
科试录与程文的出版, 48; success as
indicator of class 科举功名作为社会
等级的指征, 104
- Exposition of the Epistle of Paul to the
Ephesians, On the* 《论解说保罗的以
弗所书》 22
- Fan Dache 范大澈 136
- Fan Qin 范钦 53, 54, 105, 136, 138,
152, 156
- Fan Qin Tianyige cangshu* 《范钦天一阁
藏书》 138
- Fang Jian 方渐 153
- Fang Yizhi 方以智 165
- fangke* 坊刻 69
- Feng Fang 丰坊 83, 227 注 77
- Feng Mengzhen 冯梦楨 153, 250 注 50
- Feng Mengzhou 冯梦周 156
- Feng Shu 冯舒 104, 152, 153, 154,
249 注 37
- Five Classics 五经 见 wujing
- Five Dynasties 五代 49, 214 注 17, 217
注 63, 228 注 89, 241 注 53
- Four Books 四书 见 sishu
- "Four Collecting Friends," "藏书四友"
169
- Four Treasuries Project 四库全书 73,
119, 137, 168, 169, 170, 190
- French Royal Library 法国皇家图书馆

- 17 注 67
- Fu Zengxiang 傅增湘 182
- fugui* 富贵 178
- Fujian Province 福建省 32, 33, 48, 56, 57, 58, 60, 66, 67, 91, 100, 101, 102, 113, 114, 132, 207 注 90, 210 注 134, 215 注 33, 230 注 104, 231 注 113, 234 注 160 又见 Fuzhou 福州 Jianyang 建阳
- Fuzhou 福州 (Fujian Province 福建省) 75, 97-98, 113, 118, 159, 235 注 2
- Galileo 252 注 83
- Gao Panlong 高攀龙 191
- gazetteers 方志 56
- ge* 格 68
- ge er buxing* 阁而不行 68
- Ge family of Yangzhou 扬州葛氏 52
- gewu* 格物 165
- Geng Yu 耿裕 59
- Gernet, Jacques 谢和耐 165, 252 注 83
- Giles, Herbert 赫伯特·吉尔斯 229 注 91
- gong* 公 118, 165, 252
- Gong Cheng 龚橙 76
- gongpijia* 攻皮家 258
- gongsheng* 贡生 104
- Great Learning* 大学 165
- Grolier, Jean 让·格罗里埃 124
- Gu (Suzhou family) 苏州顾氏 165
- Gu Qiyuan 顾起元 87
- Gu Weiyue 顾维岳 250 注 57
- Gu Yanwu 顾炎武 57, 60, 66, 89, 91, 153, 159, 250 注 53
- Gu Yuanqing 顾元庆 84, 110
- Guan Tong 管同 256 注 21
- Guanxian quarter, Fuzhou 福州官贤区 113
- Guanxiu 贯休 62
- Guangdong 广东 32, 97, 146
- Gui Youguang 归有光 105, 111, 155, 224 注 26
- Gui Zhuang 归庄 141
- Guillaume, comte de Libri Carucci 纪尧姆·利布里—卡卢奇伯爵 142
- Guo Qinzhi 郭钦止 150
- Guoxue* 国学 108
- Guozi jian* 国子监 127-128
- Gutenberg 古腾堡 21
- Haechang temple 海幢寺 (Canton 广州) 23, 205 注 67
- Han family of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韩氏 85-86
- Han Learning 汉学 168, 188, 191
- Hangzhou 杭州 92, 95, 220 注 101, 220 注 101; bookstores 书铺, 6, 95-98, 99, 100, 101-102, 113, 160; collectors 藏书家, 52, 113, 135, 141, 167, 168, 169, 217 注 62, 256 注 27; commercial base for journeymen 流动书商的基地, 95; Ming publishing center 明代出版中心, 6, 33, 35, 36, 54,

- 67; post-Sung decline 宋以后的衰落, 52, 56-57, 230 注 106; Song publishing center 宋代出版中心, 5, 32, 48, 56, 57, 98, 108, 219 注 92; Southern Sung book shortages 南宋书籍短缺, 55, 56, 61, 129; Yuan publishing center 元代出版中心, 56-57
- Hanji* 《汉记》 65
- Hanlin Academy 翰林院 91, 94, 141, 155, 167, 216 注 55, 241 注 50, 242 注 74, 243 注 81, 257 注 42
- Hanshu* 《汉书》 55
- Han Yu 韩愈 56, 64, 98, 108
- hao 号 36, 187
- Hayes, Dr James 詹姆斯·海耶斯 77
- He Dacheng 何大成 153, 157, 245 注 131
- He Liangjun 何良俊 53, 104
- He Ning 何凝 90
- He Zhuo 何焯 250 注 57
- Heijdra, Matrin J. 何义壮 21
- histories, dynastic 正史 55, 68; book lists in 艺文(经籍)志, 95; in early Ming private libraries 明初民间所藏, 58-59, 63; publishing of in Ming dynasty 明代的出版, 45, 63-64, 65, 69; in libraries of scholar officials 士大夫所藏, 53, 60, 116; neglected by publishers 不为出版者所重, 60; of Southern dynasties 南朝正史, 129
-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史馆 128, 129
- Henan 河南 59, 256 注 28
- Hofbibliothek (维也纳) 宫廷图书馆 124
- Hong Kong 香港 24, 77
- Hong Liangji 洪亮吉 230 注 110
- Hong Mai 洪迈 76
- honorific writing 应酬文字 67, 105, 107
- Hou Hanshu* 《后汉书》 55
- Houshan ji* 《后山集》 59
- HuGuang 湖广 138
- Hu Mao 胡贸 37, 38, 39
- Huqiu 虎丘 见 Tiger Hill
- Hu Yinglin 胡应麟 48, 51, 53, 54, 70, 74, 84, 90, 98, 100-102, 112, 113, 229 注 100 and 注 101, 230 注 102 and 注 104
- Hua family of Wuxi county 无锡华氏 71-72
- Huainan 淮南 10
- Huainanzi* 淮南子 64
- Huang family of Tandu in She county 歙县潭度黄氏, Huizhou prefecture 徽州府, book collection of 藏书 152
- Huang family "literati carvers," 黄氏“文人刻工” 35-36, 209 注 123, 210 注 124 and 注 134
- Huang Daozhou 黄道周 77
- Huang Hongxian 黄洪宪 153
- Huang Juzhong 黄居中 105, 160
- Huang Ming kaiguo gongchen lu* 《皇明开国功臣录》 65
- Huang Pilie 黄丕烈 112, 165, 169,

- 175, 181, 184
- Huang Qing jingjie* 《皇清经解》 119
- Huang Quan 黄铨 36
- Huang Yingcheng 黄应澄 36
- Huang Yuji 黄虞稷 158-162
- Huang Zhen 黄震 56, 61
- Huang Zongxi 黄宗羲 135, 137, 138, 140, 152, 154, 160, 169, 248 注 18
- Huangdi neijing* 《黄帝内经》 163
- Huangshi cheng 皇史宬 127
- Hubei Province 湖北省 32, 106, 180
- huhua* 胡话 140
- huike* 绘刻 36
- Huizhou prefecture 徽州府 (Anhui Province 安徽省) 30, 35-36, 88, 101, 113, 152, 163, 176, 200 注 39, 207 注 90 and 注 93, 209 注 123, 210 注 124, 256 注 26, 211 注 153
- Hulin 虎林 见 Tiger Grove
- Humphrey, Duke, of Gloucester 格洛斯特特的汉弗莱公爵 142
- Hunt, Leigh 李希·亨特 142
- huo* 货 93
- huoban* 活版 见 moveable type
- Huzhou 湖州 95-96, 101, 102, 113, 225 注 33, 259 注 72; place of origin of traveling book salesmen 流动书商发源地, 95; said to replace Hangzhou as a center for quality imprint production 据说取代杭州成为高质量生产中心, 230 注 106
- Idema, Wilt 伊维德 172, 265
- imprint 印本 (woodblock 雕版) 3-5; adoption 采用, 3, 4; ascendance 崛起, 39-78; distribution 发行, 82-103; early spread 早期传播, 9-11, 48; fall in price 价格下降, 21, 71-74; first detailed description 最早的详细记录, 14-25; four stages of production 四个生产环节, 12, 16-19, 201 注 43; imprint share of all books 所有书籍中的印本比例, 44, 53-54, 77-81
- imprint production 印本生产, artisans 工匠 31-39; early flourishing 早期繁荣, 62-66; first Chinese account of 最早的中文记述, 12-13; first East Asian account of 最早的东亚记述, 16, 199 注 31; government funding 政府资助, 68-69, 90; invention of 发明, 9-11; methods 方式, 16-31; oldest extant Chinese example of 现存最早实物, 9-12; private 民间生产, 69; soft surface variety, 使用蜡版等 16; wooden strip variety 使用小木片为版材, 16 又见 block carvers, block carving
- India 印度 11, 201 注 48
- inheritance 遗产 85-90, 93, 94, 136, 153, 156, 160, 235 注 4, 248 注 14, 249 注 46; danger to book collections 藏书的风险, 118; role in book circulation 书籍流通中的作用, 116, 149, 150
- Inoue Susumu 井上进 44-45, 46, 47,

- 48, 56, 62, 69, 79-81, 91, 94, 98, 212 注 3, 267, 269, 278
- Jesuits 耶稣会士 125, 165, 200 注 41, 204 注 63, 205 注 69, 252 注 83
- Jews 犹太人 120, 121
- ji 集部 45
- jiafeng 家风 179
- jiake 家刻 69
- Jiang Chu 蒋初 233 注 143
- Jiang Yi 蒋义 214 注 25
- Jiang Zhe 江浙 252
- Jiangnan 江南 197
- Jiangpu county 江浦县 (Anhui Province 安徽省) 159
- jiangti zi 匠体字 26
- jiangxue 讲学 (lecture) 144
- Jiangyin 江阴 (Jiangsu Province 江苏省) 73
- Jiangxi Province 江西省 10, 26, 33, 51, 56, 58, 64, 75, 91, 92, 99, 100, 106, 110, 112, 113, 146, 233 注 141, 234 注 151
- Jianjie lu 《鉴诫录》 170
- Jiayang 建阳 (Fujian Province 福建省), book production during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元、明时期的书籍生产 57, 69, 98, 113, 230 注 109; during Song dynasty 宋代, 5, 32, 56, 195 注 7, 207 注 89; first bookstores in 最早的书铺, 98
- jianyue 检阅 161
- Jiao Hong 焦竑 132, 140, 145, 152, 156, 231 注 115
- jiaxun 家训 155
- Jigu ge 汲古阁 34, 38, 109
- Jigu lu 《稽古录》 59
- Jin Junming 金俊明 77
- Jin Pei 金培 53
- Jin Wenjing gong beizheng lu 《金文靖公北征录》 65
- Jin Youzi 金幼孜 65
- Ji'nan 济南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省)
- jing 经部 45
- Jing Du 井度 150
- Jingdezhen 景德镇 (Jiangxi Province 江西省) 30, 258 注 57
- jingshu 经书 179
- Jingyi kao 《经义考》 167
- Jinhua prefecture 金华府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省) 150
- jinshi 进士 55
- Jinsi lu 《近思录》 75, 188
- jinü 妓女 98
- Jinxi county 金溪县 (Jiangxi Province 江西省) 113, 234 注 151
- jishu (zhi hui) 祭书之会 182
- Jiu Tangshu 《旧唐书》 220 注 99
- Jiuguo zhi 《九国志》 140
- Jixian yuan 集贤院 见 Library of the Academy of the Assembled Worthies
- Johnson, David 大卫·约翰逊 173

- J-ojin 成寻 228 注 88
- juan 卷 49
- jujube, for woodblocks 用来雕版的枣木
16
- Jurchen invasion, impact on Song book
production 女真人入侵对宋代书籍生产
的影响 50, 51, 55, 129, 219 注 92
- juren 举人 60
- Kaifeng 开封 51, 54, 63, 98, 99,
108, 129, 133, 150, 228 注 87
- kaishu 楷书 29
- kanzi hang 刊字行 34
- kaozheng 考证 166
- Katsuyama Minoru 胜山稔 45-46, 69
- Kew-Ageng 199 注 27
- Kong Yanjin 孔彦缙 58
- Kunshan county 昆山县 (s. Jiangsu Prov-
ince 江苏省) 138
- Kyongju (Korea 朝鲜) 见 Buddhist
charms 佛教符咒
- Leang A-fa 梁阿发 199 注 27
- Ledderose, Lothar 雷德侯 29
- Leibnitz 莱布尼兹 125, 166
- leishu 类书 244
- lending libraries 租书铺 95-98, 126,
228 注 80 and 注 83
- Leung, Angela Ki Che (即 Liang Qizi)
梁其姿 182
- Li family of Ji'nan prefecture 济南府李
氏 (Shandong Province 山东省) 52
- li 李 40
- Li Ao 李翱 56
- Li Bai 李白 63, 64
- Li ji 《礼记》 93
- Li Kaixian 李开先 68, 105, 153
- Li Lian 李廉 67
- Li Rihua 李日华 98
- Li Ruyi 李如一 140, 150, 247 注 6
- Li Tingxiang 李廷相 153
- Li Wenzao 李文藻 150, 153, 247 注 2
- Li Xu 李诩 73
- Li Yanzhen 李彦真 150
- Li Yingzhen 李应祜 216 注 55
- Li Yu 李渔 68
- Li Zhi 李贽 231 注 116
- Liang dynasty 213 注 16
- Liang Han zhaoling erji 《两汉诏令二
集》 94
- Liang Qizi 梁其姿 182
- libraries, government 政府藏书 47-48;
access to 利用, 127-134; Liang dynas-
ty 梁朝, 49, 213 注 16; Liao, Jin,
and Yuan dynasties 辽、金、元代, 50,
57, 127, 241 注 51; Ming 明代, 50,
53, 54, 127, 128, 130-134; Qing 清
代, 167-168, 241 注 50, 243 注 81;
Song 宋代, 49-50, 54, 127, 129,
130, 213 注 14, 217 注 62; Sui 隋代,
49, 213 注 16; Tang 唐代, 49-50,
213 注 16; Western 西方, 124 又见
Four Treasuries Project 四库全书,
schools 学校

- libraries, private 民间藏书 134; access to 利用, 134-170; changes in size 规模的变化, 50-53, 150; decline in overall size in early Ming 明初的总体萎缩, 50, 52; in Song 宋代, 47, 57, 123, 128 ff; Western 西方, 121-126, 142 又见 books 书籍, access to 获取, sharing 共享; "community of learning" "知识共同体"
- Library of the Academy of the Assembled Worthies 集贤殿书院 50, 130, 155, 213 注 16, 214 注 20 and 注 25
- Lin family 林氏 215 注 33
- Lin Ting 林霆 153
- literacy 读写能力 107, 121, 126, 131, 147, 156, 163; complexity in China 中国的复杂情况, 172-173; early Qing appreciation 清初的重视, 174-178; perceptions of 概念, 171-172, 174 ff, 243 注 4 和注 5, 244 注 15
- literary collections 文集 见 *wenji*
- "literati artisans," "文人工匠" 35-36, 39, 210 注 127 and 注 129
- literati focus 以士人为焦点 5-6; social composition 社会结构 38-39, 49, 104-112, 173 ff 又见 literacy
- lithography 石印 21, 24, 29, 41, 42, 203 注 57
- Liu Chang 刘昌 153
- Liu Gongquan 柳公权 26
- Liu Qian 柳金 153
- Liu Yifeng 刘仪凤 217 注 62
- Liu Zongyuan 柳宗元 64, 93, 108
- Liu Zongzhou 刘宗周 180
- Liuli chang 琉璃厂 (Beijing 北京) 77, 91, 112, 234 注 151
-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布道会 14-15, 24
- Longyou county 龙游县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省) 37, 111, 112
- Lou Fang 楼昉 55
- Lou Yue 楼钥 150, 216 注 56
- Louis Philippe 路易·菲利普 142
- Lu Guan 卢观 233 注 143
- Lu Guimeng 陆龟蒙 64
- Lu Jiuyuan 陆九渊 64
- Lu Liao 陆澹 158
- Lu Longqi 陆陇其 180
- Lu Rong 陆容 58, 65, 90
- Lu Shen 陆深 99, 105, 230 注 106
- Lu Yidian 陆贻典 104, 154
- Lu You 陆游 55, 83, 108, 152, 153, 225 注 35
- Lu You 陆友 (Yuan collector) 215 注 38
- Lu Zhi 陆治 64
- Lu Ziyu 陆子遯 108
- Lunyu* 论语 188
- Lunyu jishi* 《论语集释》 93
- Luoyang 洛阳 8, 96
- Luoyang qielan ji* 《洛阳伽蓝记》 75
- Lü Kun 吕坤 139
- Lü Zuqian 吕祖谦 75

- Malacca 马六甲 14, 15, 16, 24, 29
- Manchu invasion 满族入侵 133, 137, 157, 225 注 30, 245 注 126, 250 注 54
- mantou, shops* 馒头铺 97
- manuscript 手抄本 3, 4, 5, 6, 26, 29, 47, 50, 54, 55, 58, 74, 76, 77, 115, 133, 134, 138, 153, 155, 158, 166, 167, 184, 202, 224 注 26; fate in Western Europe 在西欧的命运, 70-71, 123, 125, 142, 222 注 129; 246 注 135, increasing emphasis on calligraphic element 不断注重书法因素, 74; influence on content and appearance of woodblock imprints 对印本内容与形式的影响, 78, 206 注 84; labor and production costs 劳动力和生产成本, 49, 59, 70, 72, 73-74; manuscript share of all books 所有书籍中的稿抄本比例, 43, 44, 45, 49, 54, 56, 58, 62, 74, 77-78, 89, 91, 217 注 67
- Mao Jin 毛晋 34, 38, 84, 109, 145, 232 注 137
- Martin, W. A. P. 丁韪良 173
- Medhurst, Walter Henry, report on printing 沃尔特·亨利·麦都思关于印刷的报告 16, 18, 23, 29, 199 注 28, 201 注 51, 204 注 65 and 注 66, 209 注 121
- medical texts 医学文献 44, 62, 63, 159, 163-165, 172; government printing of 政府印刷, 48, 212 注 9; 218 注 69, pharmaceutical 本草, 52, 103; popularity among educated readers 流行于有教养的读者中, 63, 69, 74, 107, 110, 116, 181, 193, 233 注 143, 234 注 147
- Mei Dingzuo 梅鼎祚 152, 156
- mendi* 门第 181
- Middle East, pre-modern library access 古代中东的藏书利用 120-121, 126, 237 注 13 and 注 14
- Milne, William 米怜 14-25, 26, 29, 39, 198 注 22, 注 24, and 注 26, 199 注 27, 注 28, and 注 29, 201 注 50, 202 注 53, 209 注 21; account of Chinese woodblock printing 对中国雕版印刷的报道, 16-19, 26, 210 注 129
- Ming shi gao* 《明史稿》 138
- Ming shilu* 《明实录》 127, 137
- Mingdai keben zongmu* 《明代刻本总目》 45
- Mishu sheng 秘书省 128
- missionary activities 传教士活动 14-15 又见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伦敦布道会, Jesuits 耶稣会士
- Mongols 蒙古人 57, collapse of official and scholarly research on Confucian texts under 治下官方和学者对儒家经典研究的瓦解, 63; impact on book industry in Sichuan 对四川书业的影响 5; in Yangzi delta 在江南, 57, 63

- Morrison, Robert 罗伯特·马礼逊 14, 15, 23, 24, 205 注 67
- Mote, F. W. 牟复礼 172
- moveable-type printing 活字印刷 9, 13, 119, 120, 202 注 53 和注 58, 203 注 56 和注 60, 207 注 88, 210 注 124, 以及 237 注 13; Chinese records of 中文史料, 197 注 19; cost comparison with woodblock printing 与雕版印刷比较成本, 19-20, 21-22, 46, 71-73; cost of casting in metallic type 铸造金属活字的成本, 22; durability of font 活字耐久性, 201 注 48; first Chinese descriptions 最早的中文记述, 13; labor costs 劳动力成本, 22-25; materials used 所用材料, 202 注 53; missionaries' use of 传教士的采用, 15, 18
- Mu Jinwen 穆进文 39
- Mu Xiu 穆修 108
- mulu xue* 目录学 3
- Murray, William H. 203 注 62
- Nagasawa Kikuya 长沢规矩也 34
- Naikaku bunko 内阁文库 46
- Nanchang 南昌 99, 100, 113, 133, 229 注 98
- Nancun chuogeng lu* 《南村辍耕录》 75
- Nanjing 南京 6, 35, 36, 38, 39, 50, 53, 57, 87, 92, 113, 127, 128, 130, 140, 151, 152, 153, 157-161, 175, 207 注 90, 217 注 60, 219 注 92, 222 注 144, 227 注 77, 230 注 109, 234 注 154, 256 注 21; imprin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enter 印本生产与发行中心, 32, 33, 60, 99-103
- National Library, Taipei 台北中央图书馆 44, 62, 68, 79, 80, 221 注 121
- National University, Ming 明代国子监 (Beijing 北京) 59, 64
- National University, Ming 明代国子监 (Nanjing 南京) 35, 49, 53, 55, 56, 211 注 92, 231 注 38
- Naudé, Gabriel 加布里埃尔·诺代 122
- neifu* 内府 28
- Nevill, Lady Dorothy 多萝茜·内维尔小姐 142
- New Territories 新界 (Hong Kong 香港) 77
- Ni Zan 倪瓚 52
- Ningbo 宁波 16, 54, 55, 56, 61, 83, 86, 113, 136, 137, 138, 139, 244 注 110 又见 *Tianyi ge* 天一阁
- Nishikie no hori to suri* 錦絵の彫と刷り 16
- Niu Shixi 钮石溪 54, 152
- Ouyang Xiu 欧阳修 54, 59, 247 注 4
- Ouyang Xun 欧阳询 26, 29
- Oxford University 牛津大学 238 注 20, 240 注 38, 246 注 135 又见 Bodleian Library 波德里安图书馆

- palm wood, for woodblocks 用作雕版的
棕木 19
- paper 纸 18, 19, 23, 25, 98, 248 注
14; cheap bamboo paper from Fujian,
Jiangxi, and Zhejiang Provinces 福建、
江西、浙江产地便宜竹纸, 26; high
cost and reputation in tenth-century
Persia 十世纪在波斯纸质高价昂,
205 注 76; invention of 发明, 4, 9,
12, 13; low quality 劣质, 204 注 63;
manuals for production 生产指南, 13;
price 价格, 5-6, 52, 101
- Paris 巴黎 121, 124, 125
- pear wood, for woodblocks 用作雕版的梨
木 16
- Pelliot collection 伯希和专藏 见 Dun-
huang 敦煌
- Peng (family) 彭氏 189-192
- Peng Dingqiu 彭定求 189, 190, 191
- Peng Qifeng 彭启丰 190
- Peng Shaosheng 彭绍生 76, 174, 189-
194
- Peng Yang 彭烱 132
- pingdeng 平等 192
- pinghua 平话 (romantic ballads) 96
- Pingyang prefecture, Shanxi Province 山
西平阳府 32
- po 破 187
- political writing, early Song publication of
宋初出版的政治言论 62-63
- Poon Ming-sun (Pan Mingshen) 潘铭燊
48
- poplar wood, for woodblocks 用作雕版的
杨木 101
- popular subjects 流行主题 58, 63, 67,
68, 96-98, 110 又见 entertainment
writing 娱乐读物
- prefaces 序言 31, 32, 43, 78, 105,
107, 110, 114, 169, 191, 227 注 72,
235 注 4, 256 注 28
- prefectural schools 府学 128
- primers 启蒙读物 10, 56, 96
- princely libraries, Ming 明代藩府藏书
32, 57, 85, 88, 122, 132-133; Song
宋代宗室, 85
- Prussian State Library 普鲁士国家图书
馆 124
- Pu Yuan 浦源 234 注 160
- publishing, commercial 商业出版 63-
76; compilation 编纂, 109; family
publishers 家刻, 69; literati involve-
ment 士人参与, 104-114; Ming ex-
pansion 明代的扩张, 100-113; sales
销售, 103, 111, 115 又见 censorship
审查, book lending 借书, lending li-
braries 租书铺
- publishing, government 政府出版 11,
28-29, 33, 57, 60, 91, 92, 133; de-
cline of government dominance of litera-
ti publications 士人出版物方面政府统
治地位的衰落, 68-69; at times inferi-
or quality of 有时质量低劣, 225 注 42
又见 censorship 审查
- Putian county 莆田 (Fujian Province 福

- 建省) 215 注 33
- Qi Biaoja 祁彪佳 154
- Qi Chenghan 祁承燦 53, 86, 138, 154, 155, 234 注 147, 249 注 41
- Qian Daxin 钱大昕 76, 166
- Qian Gu 钱穀 60, 88
- Qin Hui 秦桧 89, 225 注 35
- Qian Jinren 钱近仁 1-2, 6, 7, 39, 173-174, 176, 185-189, 193-194
- Qian Qianyi 钱谦益 88, 109, 114, 140, 152, 154, 159, 229 注 91, 245 注 123 and 注 126
- Qian Tingmo 钱听默 112, 175
- Qian Tong'ai 钱同爱 104
- Qian Yi 钱穀 139
- Qian Yisu 钱裔肃 135
- Qian Yunzhi 钱允治 88, 144, 247 注 6
- Qian Zeng 钱曾 141
- Qianlong 乾隆 emperor 119, 137, 138, 168, 190
- Qianshan 铅山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56
- Qin Xi 秦熺 225 注 35
- Qingbo biezhi 《清波别志》 75
- Qiongzhou 琼州 96
- Qiu Ji 邱集 135
- Qiu Jun 丘濬 85, 127, 242 注 73
- Qu Jinsheng 瞿金生 210 注 129
- Qu Shisi 瞿式耜 152
- Qu Zhongrong 瞿中容 175
- Rashid-eddin 拉施都丁 198 注 22
- Rawski, Evelyn 罗友枝 172
- Renhai ji 《人海集》 76
-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A* 《反思在中国传播新教的最初十年》 14, 16
- Ricci, Matteo 利玛窦 23, 198 注 22, 204 注 65
- Ruan Yuan 阮元 119, 168
- Rui'an county 瑞安县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省) 253 注 92
- Ruzang 儒藏 118
- St John's College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图书馆 123-124
- Sanguan, libraries of* 三馆藏书 128, 129-130, 133
- schools 学校 146, 173, 179; government 官学, 36, 55, 69, 73, 85, 99, 110, 111, 116, 119, 128-129, 133, 138, 159, 163, 241 注 56, 247 注 4; private 私学, 2, 118, 150, 185, 199 注 29, 217 注 66, 235 注 2, 253 注 92, 257 注 34
- scribal copying 手工传抄 4, 26, 28, 29, 33, 35, 40, 41, 71, 72, 73-74, 76, 77, 110, 129, 141-142, 153, 156, 167, 172, 199 注 31, 232 注 138
- scripts 字体 206 注 85, 207 注 89, 219 注 92, 228 注 83; artisanal 匠体, 26-

- 29, 73; Ou style 欧体, 29; standard style 标准字体, 29
- Seikad-o bunko 静嘉堂文库 46, 68, 167, 247 注 4, 264
- Shaanxi Province 陕西省 32, 102
- shan 杉 38
- Shang Jun 商浚 152, 216 注 59
- Shanghai 上海 12, 24, 52
- Shang shu 尚书 93
- Shanghai jing 山海经 64
- Shanxi Province 山西省 32, 33, 59, 151
- Shao Bao 邵宝 153
- Shaoqing temple 昭庆寺 (Hangzhou 杭州) 101
- Shaoxing 绍兴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省) 53, 54, 83, 138, 152, 180, 224 注 17, 234 注 147
- She County Museum 歙县博物馆, Huizhou prefecture 徽州府 207 注 93
- Shen Fang 沈芳 54
- Shen Kuo 沈括 12, 13
- Shen Yuwen 沈与文 75
- Shen Zhou 沈周 60, 87, 88
- shengyuan 生员 104-107, 109
- shi 史部 (history) 45
- shi 诗 (poems) 181
- shi 士 (scholars) 108, 188
- Shi Miyuan 史弥远 108
- Shiba Yoshinobu 斯波义信 57
- Shiguan 史馆 见 Historiography Institute
- Shiguo jinian 十国纪年 140
- Shiji 史记 53, 60, 64, 226 注 69
- Shijing 《诗经》 93
- shilu 实录 127
- Shilue 《史略》 93
- Shilue shiwen 《史略释文》 93
- Shisan jing zhushu 《十三经注疏》 99
- shoe repairman 鞋匠 186-187
- shouchao 手抄/钞. See manuscript, scripts, transcription
- shufang 书坊 67 又见 publishing, commercial
- shuji 书籍 65
- shupu 书铺 228
- shuyong 书佣 37
- shuyuan 书院 85, 150, 151, 256 注 28
- Shuyuan jinghua 《书苑菁华》 75, 213 注 139
- Sibu congkan 《四部丛刊》 66
- Sichuan 四川 91, 112 early printing center 早期印刷中心, 5, 9, 10, 11, 48, 56, 62, 85, 133, 217 注 63; Mongol invasion's blow to printing industry in 蒙古人侵摧毁当地出版业, 57, 218 注 75; survival of imprints during Southern Song 南宋时印本的幸存, 55, 150 又见 Chengdu 成都
- Siku quanshu 四库全书 又见 Four Treasuries 四库
- Sima Guang 司马光 51, 58, 59, 60, 89, 129
- sishu 《四书》 15, 56, 57, 58, 66, 93,

- 94
- Sishu jizhu* 《四书集注》 56, 93
- Sixtus VI, Pope 教皇西斯科特六世 142
- Song Binwen 宋宾文 176
- Song Mingu 宋敏求 54, 150, 155, 156, 249 注 46
- Song Shou 宋绶 247 注 8
- Song shi* 《宋史》 60, 64
- Songjiang 松江 60, 99, 110, 139, 215 注 38, 247 注 7
- Songti zi* 宋体字 26
- Sonkeikaku bunko 尊经阁文库 46
- Stein collection 斯坦因专藏 见 Dunhuang 敦煌
- “stories,” 小说 63, 67-68, 110
- Su Bian 苏弁 214 注 25
- Su Shi 苏轼 58, 63, 187, 247 注 7, 259 注 72
- Su Song 苏颂 54, 129, 153, 155
- Su Yangzhi 苏养直 153
- Sui dynasty 隋朝 213 注 16
- Sui shu 隋书 94
- Sun family 孙氏(Sichuan 四川) 85
- Sun Congtian 孙从添 94, 181
- Sun Daoming 孙道明 108, 215 注 38
- Sun Yunqie 孙允伽 76
- suren* 俗人 180
- Sutton, Donald 179
- Suzhou 苏州 1, 3, 7, 44, 77, 86, 105, 106, 111, 179, 180, 183, 184, 188, 189, 193, 227 注 77, 236 注 12, 255 注 19, 258 注 60; book artisans 书业工匠, 32, 34, 36, 37, 66, 102, 209 注 122, 230 注 106, 注 107; book collectors 藏书家, 51, 54, 59, 60, 66, 75, 77, 83, 86, 87, 88, 99, 109, 110, 135, 138, 139, 140, 141, 152, 153-154, 155, 157, 158, 160, 165, 167, 169, 170, 174, 175, 176, 181-182, 187, 188, 190, 192, 215 注 38, 216 注 43, 233 注 143, 245 注 131, 247 注 2 和注 6, 252 注 88, 260 注 76; lending library 租书铺, 96; labor organization in 劳动力组织, 34, 38; as major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imprint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enter 作为十六、十七世纪主要的印本生产和发行中心, 5, 32, 33, 39, 59, 99, 101-102, 11, 112, 113, 160, 234 注 154; Ming and Qing bookstores 明清书铺, 2, 99-100, 102, 112, 174, 186, 229 注 98; sixteenth-century examination statistics for 十六世纪的科举统计资料, 106-107 又见 Tiger Hill 虎丘
- Swann, Nancy Lee 252 注 91
- Taiping 太平 76, 170
- Taiping huanyu ji* 《太平寰宇记》 76
- Taiping yulan* 《太平御览》 170
- Taiqing pavilion 太清阁 127
- Tanaka Shish-田中子祥 30, 34
- Tandu 潭度 152, 248

- Tang authors 唐代作家 56, 58, 59, 63, 64, 74, 94, 109, 114, 156, 181
- Tang Binyin 汤宾尹 233 注 141
- Tang Huo 汤馐 160
- Tang Shunzhi 唐顺之 37, 38, 66
- Tang Yin 唐寅 154
- Tang Zhongyou 唐仲友 90, 108
- Tao Zongyi 陶宗仪 75
- Tiangong kaiwu* 《天工开物》 13
- Tangjian* 《唐鉴》 59
- technical manuals 技术手册 12-13
- Tianyi ge 天一阁 54, 86, 117, 136-139, 152, 156
- Tianyong ji* 《天佣集》 106
- Tiger Grove 虎林 (Hangzhou 杭州) 102, 160
- Tiger Hill 虎丘 (Suzhou 苏州) 1, 3, 102, 160, 173, 175, 194
- Tong Pei 童佩 84, 110-111, 113
- Tongdian* 《通典》 60, 94
- Tongjian gangmu* 《通鉴纲目》 63
- Tongjian jishi benmo* 《通鉴纪事本末》 63
- transcription 写样 12, 17, 26, 29, 33, 35, 36, 40, 41, 43, 46, 52, 56, 59, 70, 72, 73, 93, 94, 98, 110, 113, 129, 133, 141, 152, 155, 167
- Tsien Tsuen-hsuein 钱存训 12, 265
- Tu Tianxiang 涂天相 180
- tushu* 图书 34
- Twitchett, Denis 崔瑞德 69, 268
- Vatican Library 梵蒂冈图书馆 122, 142
- von Glahn, Richard 万志英 57
- Wade, Sir Thomas 威妥玛爵士 229 注 91
- wako* 倭寇 89
- Wan Sitong 万斯同 137
- Wang Anshi 王安石 58
- Wang Ao 王鏊 59
- Wang Bing 王丙 2, 174, 193-194
- Wang Chang 王昶 139
- Wang Guangmei 王光美 247 注 145
- Wang Jin 汪缙 174, 187, 189, 191, 192-193
- Wang Jing 王敬 54
- Wang Jingshi 王荆石 132
- Wang Kentang 王肯堂 131, 139
- Wang Lianqing 王廉清 235 注 35
- Wang Liushui 汪六水 225 注 30
- Wang Mingqing 王明清 88-89, 225 注 35
- Wang Qi 王圻 145
- Wang Qinchen 王钦臣 54, 150, 154, 156, 213 注 14, 214 注 28
- Wang Shimao 王世懋 100
- Wang Shizhen 王世贞 53, 88, 100, 105, 112, 152, 156
- Wang Xingzhi 王性之 225 注 35
- Wang Yangming 王阳明 65, 144, 174, 191-192, 231 注 115, 260 注 87
- Wang Yong 王雍 99

- Wang Zhideng 王穉登 112
- Wang Zhu 王洙 214 注 28
- Wei Zhongxian 魏忠献 106
- Wen Jia 文嘉 66, 154
- Wen Peng 文彭 38
- Wen Tianxiang 文天祥 58
- Wen Zhengming 文徵明 38, 86, 87, 105, 152
- Wenchang 文昌 36, 182, 184-185, 189, 190-191
- Wencheng 文城 258 注 28
- wenji 文集 45, 55, 59, 105, 108, 157, 232 注 136, 234 注 160; early publication of 早期出版, 62; Song, Yuan, and Ming publication of 宋、元、明的出版, 63-64, 65, 67, 109, 111, 176; written by literati-officials and degree holders 士大夫与拥有科名者所作, 104
- Wenxian tongkao 《文献通考》 65
- Wenxuan 《文选》 59, 65, 94, 134, 230 注 110, 247 注 7
- Wenyuan ge 文渊阁 53, 54, 127-128; neglect and pilfering of 玩忽职守与偷窃, 130-133
- Wenzhou 温州 (Zhejiang Province) 247 注 145
- Western science 西方科学 165
- women 妇女 10, 19, 97, 98, 107, 228 注 83, 241 注 47, 254 注 4
- woodblock printing 雕版印刷 见 imprint 印本
- Woodside, Alexander 亚历山大·伍德塞 169, 265
- writing, Chinese 中文写作 3, 164-165, 244 注 16
- Wu, Empress (Wu hou 武后, 或 Wu Zetian 武则天) 11
- Wu (family) 吴氏 215 注 33
- Wu Kuan 吴宽 86, 153
- Wu Qian 吴騫 76
- Wu Qiujian 毋丘俭 134
- Wu Yifeng 吴翌凤 157
- Wu Yue chunqiu 《吴越春秋》 65
- Wuchang 武昌 (Hubei Province 湖北省) 93, 99, 101, 112
- wujing 五经 58, 66, 94, 182
- Wuliang shou jing 无量寿经 192
- Wusheng 悟声 256
- Wutai, Mt. 五台山 33
- Wuxi 无锡 (s. Jiangsu Province) 51, 54, 71, 139, 190, 232 注 138, 234 注 160
- Wuying dian 武英殿 243 注 66
- xialiu 下流 180
- Xiang Yuanbian 项元汴 88, 144, 176, 225 注 30
- Xiangguo temple 相国寺 (Kaifeng 开封) 108
- Xiangshan wenji 《象山文集》 64
- xiaobao 小报 6
- Xiaojing 孝经 2, 77, 188
- xiaoshuo 小说 见 "stories"

- Xiaozong, Emperor 孝宗皇帝 55
- Xie Tiao 谢朓 94
- Xie Xuanhui 谢玄晖 94
- Xie Zhaozhe 谢肇淛 100, 132, 246 注
140
- Xing Liang 邢量 83
- xingli 性理 58
- xingling 性灵 181
- xingming 性命 64
- Xingxin baoxun 《省心宝训》 176-179
- Xiuzhou 秀州 (s. Jiangsu Province 江苏
省) 95
- Xiyang chaogong dianlu 西洋朝贡典录
76
- xizi hui 惜字会 见 Cherishing Charac-
ters Association
- Xu Bo 徐焯 48, 75, 83, 84, 87, 91,
113-114, 152, 160, 234 注 155, 235
注 2
- Xu Chunfu 徐春甫 163, 164
- Xu Guangqi 徐光启 165
- Xu Jie 徐阶 256 注 33
- Xu Pu 徐普 209 注 122
- Xu Qianxue 徐乾学 138
- Xu tongjian gangmu 《续通鉴纲目》 63
- Xu Xianqing 徐显卿 141
- Xuanzang 玄奘 11
- Xue Qifeng 薛起凤 174, 193, 194
- Yan Qishan 阎起山 153
- Yan Zhenqing 颜真卿 26
- yang 杨 101
- Yang Hui 杨徽 249 注 46
- Yang Jizhen 杨继振 87, 88
- Yang Shen 杨慎 231 注 115
- Yang Shiqi 杨士奇 58, 59, 60, 91-94,
98, 141, 150, 155, 241 注 53
- Yang Wanli 杨万里 153
- Yang Weizhen 杨维桢 52, 83
- Yang Xunji 杨循吉 59, 87, 105, 153,
154
- Yangzhou 扬州 (n. Jiangsu Province 江
苏省) 52, 101, 102, 168, 200 注
39, 213 注 16, 256 注 27; traditional
printing practices in 传统印刷技艺,
30
- Yanshi jiaxun 《颜氏家训》 141
- Yantie lun 《盐铁论》 64
- Yao Shilin 姚士舜 107, 142, 157
- Yao Zi 姚咨 75
- Ye Mengde 叶梦得 51, 54, 151, 152,
153, 155
- Ye Sheng 叶盛 52, 59, 86, 99, 105,
135, 153
- Ye Shulian 叶树廉 154, 157, 249 注
37
- Yi huitong 《易会通》 93
- Yi zhuan yi 《易传义》 93
- Yicang mulu 《医藏目录》 110
- Yijing 《易经》 227 注 77
- Yili 《仪礼》 65
- Yin Zhongchun 殷仲春 84, 110
- yinban 印版 65
- yingchou 应酬 161

- Yingzao fashi* 《营造法式》 75
yinwen jiandao 因文见道 192
Yiti tangzhai renyihui 一体堂宅仁医会
 163-165
Yixing county 宜兴县 (s. Jiangsu Province 江苏省) 214 注 25, 215 注 37
Yixing juji 《一行居集》 76
Yixue qimeng 《易学启蒙》 93
Yongle, Emperor 永乐皇帝 127
Yongle dadian 《永乐大典》 127, 222
 注 144, 244 注 94
You Mao 尤袤 51, 54, 76, 129, 135,
 139, 153, 154, 155
Yu Bian 俞弁 153
Yu Canzheng 虞参政 83, 135
Yu Renzhong 于仁仲 108
Yuan Cai 袁采 175
Yuan Mei 袁枚 153
Yuan Shao 袁韶 56, 61
Yuan shi 《元史》 64
Yuan Yi 袁翼 247 注 2
Yuan Zhen 元稹 59
Yudi jisheng 《輿地纪胜》 76
yue 约 见 book-sharing pacts 藏书共享协
 议
Yue Fei 岳飞 108
Yue Jun 岳浚 215 注 37
Yue Ke 岳珂 108
Yutai ji 《玉台集》 245 注 131

Zeng Gong 曾巩 58
Zha Shenxing 查慎行 76

Zhang Ao 张翱 135
Zhang Fengyi 张凤翼 105
Zhang Gongduan 张拱端 157, 249 注
 37
Zhang Haishan 张海珊 252 注 88
Zhang Luxiang 张履祥 75, 181
Zhang Xikong 张习孔 180
Zhang Xiumin 张秀民 9, 10, 25, 47
Zhang Xuan 张萱 25, 105, 180
Zhang Yingwen 张应文 144
Zhang Zhao 张炤 215 注 36
Zhao Buyu 赵不宇 150, 247 注 4
Zhao Mengfu 赵孟頫 225 注 33, 245 注
 119
Zhao Minxian 赵民献 181
Zhao Qimei 赵琦美 75, 88, 140, 152,
 153, 156, 245 注 123
Zhao Yongxian 赵用贤 153, 155
Zhao Zongchuo 赵宗绰 214 注 28
Zhejiang Province 浙江省 33, 92, 113;
 bookstores in 书铺, 108, 111; collec-
 tors 藏书家, 87, 100; as a Ming dy-
 nasty source of cheap bamboo paper 明
 代便宜竹纸产地, 26; relative cost of
 printing in 印刷的相对成本, 101
zhejie 折节 194
Zheng 郑 215 注 33
Zheng Qiao 郑樵 94, 98, 135, 153
Zhenjiang 镇江 (s. Jiangsu Province 江
 苏省) 168
zhisheng 治生 175
zhongshu fenji 众庶纷集 184

- Zhou dynasty texts 周代文献 74
- Zhou Bida 周必大 55
- Zhou Dunyi 周敦颐 188
- Zhou Liangong 周亮工 102
- Zhou Mi 周密 213 注 16, 215 注 33
- Zhou Xizan 周锡瓚 170
- Zhou Yongnian 周永年 119
- Zhu Changwen 朱长文 51
- Zhu Chaqing 朱察清 144
- Zhu Gui 朱圭 36
- Zhu Liangyu 朱良育 247 注 2
- Zhu Xi 朱熹 34, 56, 63, 64, 75, 90, 108, 177, 191, 260 注 87
- Zhu Yizun 朱彝尊 141, 150, 158, 167, 243 注 81
- Zhu Yun 朱筠 168
- Zhu Yunming 祝允明 66, 72
- Zhuang Su 庄肃 52, 87
- Zhuzi yulei 《朱子语类》 64
- zi (philosophy) 子部 45
- zi (characters, literary name) 字 36, 187, 190
- zixing 梓行 10
- Zizhi tongjian 《资治通鉴》 58, 60, 63, 66, 77, 129, 210 注 92, 230 注 110
- Zuoshun Gate 左顺门 127
- Zuozhuan 《左传》 93
- Zürcher, Erik 许理和 48

